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社区伙伴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献给老石及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



本书策划

邓文嫦 薛启婵 周 衍

编辑人员

郜璐莉 张乃亮 薛启婵 周 衍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社区伙伴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區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目录

序 / 001

前言 土壤耕耘与种子培育——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背景介绍 / 005

第一章 归去来兮：逆流而上的返乡青年

“返乡青年”现象近年在中国开始出现，并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潜在的不容小觑的力量。这些年轻人的农庄梦，似乎完全违逆城市化、农民进城打工的主流浪潮和社会发展趋势。也因此，这种逆流而上的个体探索来得并不容易，它绝不浪漫，而是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和压力：人与土地、与社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写在前面的话 / 003

◎大学毕业务农去——返乡“萝卜”波仔与英子 / 006

◎台湾“秀仔归来”——正扬与阿兰妹 / 024

◎返乡媳妇 / 036

◎“土地禅”：安金磊的另类探索 / 048

●后记：返乡青年工作坊 / 064

●掩卷有感 关于“返乡”的思考 / 067

第二章 另一条“返乡”路：社区支持农业的探索

虽没有返回自己的家乡，这群年轻人通过心无旁骛地面对土地，探索和思考人与土地、与农村以及城乡之间的关系，同样在泥土上留下活泼的生命印记，寻到了个人的扎根之所和同道人的共同体，背后，还有很多机构、网络和师友的平台支持和帮助。

- 写在前面的话 / 077
- ◎ 生命旅程就是“一连串的相遇” / 078
- ◎ 年轻人的实习报告 / 080
- ◎ “土生良品”餐馆——开在城里的“乡村圩集” / 090
- ◎ 与香港先行者的对话 / 101
- ◎ 实习之后再启程 / 119
- 后记：年轻人的近况以及与其他伙伴网络的联系 / 131
- 掩卷有感 一条青年与农村的会遇之路 / 135
- 附录 从红到绿，返璞归真——杨宝熙谈共同购买 / 141

第三章 个人与社会之间：扎根NGO的志愿者

这群年轻人在底层里扎下来，投入和参与公益行动，成为专职的公益行动者或者志愿者，如何去平衡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家庭期待、社会压力等诸多层面的矛盾，探索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和意义，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切实挑战。

- 写在前面的话 / 147
- ◎ 何志雄：社会理想之重与个体之轻 / 149
- ◎ 郭慧：对外在的认知与自我的找寻 / 171
- ◎ 唐婧与晓玮的通信：爱、相信与坚守 / 188
- ◎ 韦罗东：负重下的穿梭——NGO与商业社会之间 / 207
- 掩卷有感 花儿终将开放 / 230

第四章 青年是用来成长的：青年培力与薪火相传

这几个在中国及海外展开的不同类型的青年人培养的项目和案例，呈现出对社会发展以及青年人参与的不同想象与期待，并因之而形成不同的培力路径和模式；但它们又分享着相近的青年人成长的愿景；扎根于社会与社区的土壤，践行与反思。

- 写在前面的话 / 241
- ◎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因青年培育而聚集的合力 / 242
- ◎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当代青年的乡建运动 / 265
- ◎ 台湾农村阵线：找一条“回家”的路 / 292
- ◎ 泰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的改变与力量 / 316
- 掩卷有感 将理想根植在土壤里 / 342

致 谢 / 349

序

文/邓文婷

从2005年起，通过“青年实习生”这种方式，社区伙伴和一群愿意以一年甚至更多时间探索另一条生活道路的可能性的青年人一起上路，通过在农村和基层社区的在地实践，询问很多既基本又核心的问题，探索未来的生活道路。

青年实习生项目的探索源于我们对青年人成长的想象。成长像是一粒种子在土壤中冒出的过程，每个青年人都是独特的，各有着对生活和梦想的追求。而孕育其生长的社会也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和传统，这些多样的土壤为青年人提供丰富的养分、千般的想象。不过随着现代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在看似多样和富裕的生活背后，生活的想象和选择反而变得单一和模式化。现实的社会给青年人塑造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生活想象，这种想象是以物质基础建立出来的生活。在以欲望和消费带动的社会里，我们看见更多以感观去消费的“幸福”。有点奇怪的是，这种“幸福”的想象，没有为青年人带来幸福感，反倒是一种焦虑、不安和压力。

和我们同行的青年人都是不甘被这种想象所束缚的人，他们希望知道怎样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们寻问明天的方向，并探问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回应这些询问没有最好的方式，作为同行的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以“青年实习生”的方式提供一个空间，让青年人看到有主流生活以外的另类选择。如今，这群在不同的项目和平台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超过200人，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北京等不同省区市，参与和扎根于乡村发展、环保、教

育等各类NGO^①和志愿领域，努力成长、耕耘和反思。

2008年的某天，我和工作伙伴薛启婵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聊着用哪种方式去记录社区伙伴一直陪伴同行的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基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我们一部分记录和总结工作也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从个体的鲜活的“人”、这一群成长并探索着的年轻人开始，展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对话、碰撞和反思。

在飞机上的一番探讨催生了“对话”的想法。我们希望通过推动实习生和相关领域的师友或其他实习生之间，通过面对面交谈、书信或别的交流方式进行对话，共同探讨对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的体验和思考。这一系列对话和思想碰撞，将形成一本文集，记录来自几个青年实习生项目的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对与主流选择迥异的“另一种生活”的探索。这些探索和反思将涵盖年轻人个体成长、成长环境伙伴和网络平台、对相关社会议题的参与和思考等不同层面及角度。

记录生命的成长可以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记载，它是一个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朋友回顾、整理、思考和重新出发的过程。它同样是一个让人彼此看见和连接的过程。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看见每个个体的思考变得立体、个性化和真实，而这样的过程也为参与其中的伙伴和他们的师友带来激励。这是一种温柔、有力而在生长的力量。我们通过对话，彼此发掘对生活选择的想象和行动。它在展示主体的意识，并通过互动，在其中发现新的生长点。

这本三十余万字的文集由四个部分组成，以四个不同的议题去展现参与对话的十多位青年朋友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分是波仔与英子的返乡探索。在北方深沉的土地上我们看到那鲜活的身影如何重新扎根，为自己和家乡建设一种能润物养人的耕读文化生活。两口子 and 台湾正扬、阿兰妹夫妇的书信交往，与河北枣强的安金磊的相遇让我们对青年返乡有重新的思考和感性认知。在第二部分里，记载了胡佳、华明、明莘、丽芬四位青年伙伴的另一条返“乡”道路。这条回到乡下的小路遍地阳光，以社区支持农业^②和良性的城乡互动为想象，他们追着土鸡满山跑，为饭店寻找家传土品种，协助农民卖大米给城里那些真情实意的消费者。

在朴素的文字后面，我们看见那种对手艺的传承、农民朋友的智慧以及自然生趣的赤子热爱。他们也幸运地遇上了陪伴走过的香港老师杨宝熙，展开了多段对生活与道路选择的对话。从群体回到个人，第三部分里的何志雄、郭慧、韦罗东、晓玮和唐婧是跃动的生命故事。志雄在行动中不断整合着宏观的社会思考与自身个体生活实践的关系；对用简单的物质通过一系列反应制造出化合物充满了热情的北京女孩郭慧，在NGO的平台上实践、思考着科技、文化与人情种种事情，并从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晓玮和唐婧在十八个月的通信中，一起探索着关于施与、爱、善意、坚持、选择与寻找的话题，在她们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希望和温度；而罗东经过一段在公益和商业领域的抉择，现在于NGO平台上切切实实地做着糅合着心智良知和管理技术的尝试。这些青年伙伴都真诚地探问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张力中前行。最后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尝试探讨中国及海外地区对于青年培养工作的不同理解和行动方式，在多元中我们看到，改变都源自内心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建立在对当下发展模式的反思之上，并深深地扎根在泥土、历史和人文关怀当中。

三年多前这个“对话”的展开，源自对一群青年伙伴对生命中种种疑问和议题的反思的记载意图。后来通过想象和互动，我们发现它同样是一个行动的过程。感谢在过程中同行的每位青年伙伴为我们展示每个思考、挣扎和行动，是你们对自己生活的询问和选择让这个彼此同行的过程变得丰富。感谢和这些青

① 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缩写NGO)，是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在我国，NGO也被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

②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指社区的消费者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的小区域公平经济合作方式。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

年伙伴一起“对话”与分享生活中的智慧的朋友们，是你们坦诚的话语让那些或许未真正沉淀的经历得到一个梳理的机会，期待它也是一个鼓励彼此勇于询问和追求理想生活的实现的过程。也感谢郭净、张正扬、洪馨兰、郝冰、陆晓娅、曲栋和麦芒几位老师在不同部分的回应文章，这些敏锐和善意的提醒为这些青年伙伴带来鼓励，也让我们看见超越个体故事后面一个更宏观的社会背景，那是当下寻找另一种生活想象的伙伴处身的现实。

最后，我特别感谢和我一起策划“对话”的团队成员启婵和周衍，我们一起像姊妹般走过来。三年多来，我们一起想象这个“对话”如何发生，努力发现和激励参与在其中的青年伙伴去展示他们这段生命的经历与思考。我们相信这个过程的收获不应该只是此刻置于你手中的这本文集，而是“对话”的本身。因此，我们在过程中寻找愿意参与的伙伴和对话者，并且创造“对话”的互动空间，或是静心地等待机缘的到来，展开那可能又或是不可能以文字去呈现的生命对话。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周期，过程中许多参与其中的伙伴或许已走出了呈现在这文本上的选择，走在未来的道路上……

（作者为社区伙伴项目统筹）

前言

土壤耕耘与种子培育

——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背景介绍

文/薛启焯

当今以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导向的主流发展，过分注重经济、物质、消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朝向竞争、疏离的态势。在资本化的浪潮里，农村往往作为被城市裹挟着发展的一方而存在，其传统的价值根基遭遇着持续不断的冲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很多青年人，他们的理想缥缈而脆弱，他们的生活现实而无奈，往往顾不上对社会的关切，就已经随波逐流迷失在物质的世界里，如同小说《蜗居》中那些被现实束缚和捆绑的个体。

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怎么样的？青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青年应该如何在每个时代安身立命？

社区伙伴选择做青年人的工作，如云南省社科院的赵群、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郝冰两位老师在《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影响评估报告》里所说：

“希望生活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大潮里的年轻人能在现实主流发展中看到不可持续性；希望年轻人不冷漠，能和伙伴一起，用生命照亮生命，去关怀弱势群体的生命状态；希望年轻人不是踩着太空步行走人生，而是脚能踏到泥土里，链接起城乡，朝向更加持续的方向，并从中汲取行走的力量。”

我们的青年人工作，便是在朝向这样一些期待：一、青年一代如何反思主流发展和自身生活选择，怎样重构我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二、推动良性的城乡

互动，关注乡土价值，重寻我们生活的根基；三、培养可以带来改变的行动者，这样的改变既包含个体的改变也包含社会的改变。

从2005年起，社区伙伴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共同孕育发展了四种不同模式的青年实习生^①项目，具体包括：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漱溟乡建中心”）合作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与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非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合作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2009年之前该项目是与北京NPO^②信息咨询中心合作），与四川多个NGO合作推行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以及社区伙伴自己操作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这些项目从不同的角度和议题入手，通过支持青年人参与为期一年至三年的农村发展、环境保护、乡村教育或生态农业等工作，推动城乡互动，使青年人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获得深入认识自己及社会的机会，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学习和成长，逐步找到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

①不同于企事业单位里的实习生，这里的青年实习生是指那些对社会发展和自我探索有兴趣，且愿意投入至少一年的时间到NGO或农村社区进行全职实习的年轻人。实习生一方面要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一方面也需要完成与自我成长相关的学习目标。

②非营利组织，英文全称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缩写NPO），是指不为组织所有者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

这类青年实习生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 接待机构（或社区组织）给实习生提供的实践平台与工作指导。项目通过与NGO合作的方式，让实习生进入不同的民间组织（或农村社区）工作和学习，接待实习生的组织将作为青年人的一线培养基地，负责安排和跟进实习生的工作、学习计划。

● 针对实习生的成长情况，在实习的不同阶段提供集中培训与交流。

● 提供外出访问学习的机会，让实习生进入不

同的工作现场学习，启发思考。

- 提供行动基金，让实习生有机会通过做事锻炼其行动能力。
- 实习生网络的搭建，伙伴间的相互支持与共同成长。
- 定期的实习总结与回馈，透过对实习生及接待机构进行定期的总结，协助青年人更好地梳理自身的学习与成长。

在青年实习生项目里，其主要的策略与方法包括：

其一，搭建多方共同参与推动的青年人培养平台。如果我们把青年人比喻成一粒粒期待破土而出的种子，那么，种子的培育则有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的肥沃程度。在青年实习生项目里，这土壤就是承载他们的载体——NGO的生态环境。从最初启动青年实习生项目开始，社区伙伴就意识到，人的培养不是一个机构所能完成的事，人的成长也不该受制于单一的生长环境，要让青年人生长出广阔的视野，就需要搭建多方参与的培养平台。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组织看到支持青年人成长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参与其中时，才足以成就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而滋养到更多的种子。因此，在不同的项目里，透过与不同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形成NGO共同培养青年人的合力，就成了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在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里，每年都会有15家左右川内的NGO参与实习生的接待与培养，其中部分的接待机构还参与项目的整体决策和培训的策划组织。在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执行的这五期里，先后有40余家草根组织参与进来，成为实习生的接待和培养基地。

其二，基于基层实践的行动反思。通过基层实践，实习生在行动中不断地反思现有的社会议题，关注底层的生存现状。让青年人进入真实的基层社区，进入现场体验和学习，与现实产生更紧密的联结，这是认知和关怀外在世界的起点。行动与反思，作为推动青年人成长的两翼，在整个实习的过程里不断循环，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修正自己的行动。

其三，基于人的关怀与情感。在一个生命与生命相互交织碰撞的项目里，青年人不是功能性更不是工具性的存在。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因此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回归人本身，由个体的人出发，去真正关心和在乎每个人，也去建

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交织、彼此关怀的情感网络。这样的关怀与情感，为培养人的支持系统充填进灵魂和生命，也孕育着超越项目流程的友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支持、关怀与爱。2011年3月刚刚离我们而去的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刘老石，他对青年人温柔的爱、真切的关心、深沉的情感，让我们在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中，窥见到最最动人和持久的力量。

其四，清晰的主题探讨和广阔社会视野的引导相结合。青年人的学习，需要扎下根来，沉潜下去，因此清晰聚焦的主题学习，会有助于他们深入的实践和探索。在不同的项目里，选择相应的议题作为实习生工作的焦点，比如在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里选择了农村社区发展和乡村教育主题，而社区伙伴自己操作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本身就是以一个清晰且聚焦的议题推动的青年人培养计划。在埋头走路、踏实实践之外，广阔的社会视野的引导，则可以让实习生看到行动背后的视野、价值与意义，找到不同事情之间的关联，建立起整全的理解和思考。所以，在探讨社区发展时，会加入发展观的学习；在谈论每个人的工作时，要考虑将其与社会发展的脉络相连；在做教育实践时，也要学会理解教育的本质，建立教育与社区的关联。

其五，多样方式搭建网络。网络的推动，作为基本的策略，贯穿在所有的项目工作中。同事邓文婧在青年实习生项目影响评估的访谈里曾经说：“过去的经验让我意识到，当来自NGO的人离开工作的场景，有时会表现得割裂或狭隘，因此一直非常希望培养一群有行动能力的人，他们能超越不同的领域，超越机构的视角，互相支持，有能力和其他人建立联系。希望他们能超越功能性的工作关系，展开人和事物的情感联系。这一进程在同一时间展开，通过共同生活获得共同身份。”除了实习生网络的推动，也有培养年轻人的NGO在地网络的推动。我们在工作中创造不同人相互交织的机会，设计各种网络结点，如工作坊、评估、互访、对话等等，来进一步推展网络。而网络本身，也在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发展，既有实习生网络、接待机构网络、培训网络，也有跨越项目、机构、地域的青年人培养网络和青年协作者网络。网络的发展，与实习生的成长共生。

其六，青年人主体身份的建立。青年人的成长，有着其自身的主体性，他们

是懂得自主成长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虽然有对青年人成长的想象，但这并非是把青年人当做“被成长”的群体，更不是设计与控制青年人的成长路径。意识到青年人的主体性，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学习和开放的心态，去理解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了解他们为何改变、如何成长以及他们希望自己去向何方；意味着我们要尊重青年人主体的发展，保持过程里的弹性，支持和鼓励他们走上自我探索之路。你可以有你的理念和期待，但同时也要有对青年人的相信和尊重，他们需要有自己的过程去做向外与向内的探寻，去找到自己与内心、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联结。你可以支持和陪伴他们走上这样的探寻，但不能代替他们去探寻。

在青年实习生项目里，我们有幸与众多合作伙伴、接待机构、相关师友及参与其中的青年人一起，走过一段相互协作、共同成长的日子。这样一个陪伴和支持青年人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审视自身、不断调整期待、也不断丰富对人的成长的理解的过程。在与一批批青年人的交会中，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人的成长绝不是在一个有限的项目框架和项目周期里可以完成的事。如若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来想象他们的成长，那就需要不断超越固有的框架和思维，突破惯常以具体项目为思路的工作模式。

最近两年，我们也开始拓展实习生项目以外的工作空间，去回应当下我们对青年人成长的理解，包括：一、在四川、广西等地的高校里，透过议题探讨、自主行动尝试、农村调查实践、NGO探访学习等方式，创造大学生学习和行动的平台；二、推动基于议题的青年人共同行动网络，如可持续生活、青年返乡、青年人成长等议题，这样的网络并不一定以常规项目的方式去推展，它更有赖于网络里内生的需求和动力，以共同的行动作为焦点，让人与事在网络内相互交织、彼此推动；三、通过与海外经验互动，扩展青年人的社会视野，建立对“另一种世界”的想象。

当我们选择了支持青年人成长的角色和位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择了以教育去带来改变。而一个教育者，需要有他的立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对

人的成长的探索与洞察。“台湾农村阵线”的蔡培慧说：“教育从来不是中立的，意图站在‘中立’、‘客观’、‘学术’的立场进行教育工作的教育者，就算不能称为虚妄，也将被指出其不愿意面对社会现实、不愿意正视学习者的生命经验，而给予一种经过社会价值筛选的系统性教材所显示出的权威。”

而一个有着清晰理念的协作者，同样需要定位并不断反思自己在青年人工作中的角色。我们怎么理解自己与青年人的关系？教化，培养，陪伴或是别的？抑或兼而有之？对社区伙伴来说，我们选择与青年人彼此陪伴，相互激发，并在这个过程中里，让青年同辈间彼此相连，这是一个“在一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里，我们分享彼此的梦想与渴望，也在相互鼓励和激发中，找寻共同的愿景和想象，看见那要走的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对青年人成长的关注，就不只在技能层面，也不仅是思考层面，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他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人智学和华德福教育的开创者鲁道夫·史代纳说：“当一个群体的灵魂能射出每一个个体的灵魂，同时，每一个个体的美德能在群体中鲜活起来时，健康的社会生活就能建立起来。”当一个个体的青年开始发生改变、有了另一种选择时，当这些青年可以看到彼此、互相联结时，一个群体的改变就有出现的可能。由个体的改变到群体的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就有形成的可能，社会也就因之有了改变的可能。

特别感谢：

以上关于社区伙伴青年人工作的经验总结，来自于与不同的项目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时的累积与碰撞，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参与、努力与贡献。包括：

◎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广西大学农学院、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

◎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

◎ 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 城市可持续生活青年人成长网络支持项目：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青年学生可持续生活理念学习与行动项目：四川大学可持续性教育与研究中心

还有曲栋、赵群、周衍、周瑾、郝冰等一路陪伴我们走来的伙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贡献了许多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作为一个彼此陪伴的团队，一起分享了过程里的收获，也在不断的学习中超越和创造。

同时，也要郑重感谢这些年参与在青年实习生项目里的接待机构、相关师友，以及所有选择了与我们一起共同探寻和成长的青年伙伴。那些生命彼此交互而来的启发与探索，是今日可以如此思考和选择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及青年人行动网络项目工作人员）



第一章

归去来兮：逆流而上的返乡青年

编者 | 周 衍



写在前面的话

这两三年来，我们在几个不同的实习生项目中寻找对话项目的参与者，并为这些年轻人“物色”适合的对话伙伴。同时，围绕这些年轻人的兴趣和行动领域，确定能够持续纵深探索 and 共同实践下去的社会议题。

毕竟，对话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互相陪伴成长、共同关注学习并投身于社会公益行动的过程。

而“返乡”议题，也因此不期而至。

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3月的一天，刚开完“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会议的文婷，满脸兴奋地对我说：“天呀，怎么回事？！我发现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一个农庄梦，都想去找一块地去种！”

大家都乐了。刹那间，很多张年轻而熟悉的面庞就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生动热切而激扬，像清晨海面上升腾而起的太阳。再转念一想。其实，文婷、启婵和我的内心深处，不也都隐约怀有一个农庄梦吗？

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缘故，实习生项目（尤其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①人才计划项目以及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中的众多青年人，都对“返乡”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4年12月在北京成立。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和城乡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致力于大学生行动教育和新文化研究及推广、农民组织化试验、绿色农业及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和推进工作等。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中心的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梁漱溟乡建中心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下属分支机构之一。

情有独钟。他们有些因来自乡村而对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乡愁，从小存着农耕梦，有些虽在城市长大却开始反思主流发展观，并慢慢触摸到乡土对个体心灵及社会的深远意义，有些是通过实习生项目的机缘走进底层之后，发现扎根土地的踏实；有些因在实习生项目网络里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孕育出小小共同体的梦想——建造“另一种生活”的农庄，并逐渐在这里寻找更大的平台、资源和全新的视角，试图将之付诸实践……

无论怎样的出发点，这些年轻人的农庄梦，都似乎完全违逆城市化、农民进城打工的主流浪潮和社会发展趋势。也因此，这种逆流而上的个体探索来得并不容易，它绝不浪漫，而是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和压力：人与土地、与社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些困难，尤其在只身回到乡土、直面父老乡亲的“返乡青年”群体中凸显。

“返乡青年”现象近年在中国大陆逐渐冒现，并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潜在的不容小觑的力量。与政府助推的大学生村官或西部计划等项目不同，这些返乡青年的出现，更多源自自发主动的个体选择，并逐渐得到民间某些公益组织和志愿团体的关注、助推或支持（本文集谈到的梁漱溟乡建中心、柳州爱农会等，都是其中的突出力量），逐渐呈现出群体性和互为关联性，并呼应近年的民间“新乡村建设”运动，对一些宏观社会议题给出虽微小但富有生命力的来自民间和底层的建设性回应。

从中国大陆乡建和农村社区营造的整体走向和发展势态来看，一个突出困局是：乡村青年人大量流失和匮乏，而依赖外来NGO、精英和大学生参与的外来输入型乡村社区发展模式，虽近年广受关注和推崇，却处境尴尬，缺乏持续的生长点和本土化的力量。虽然部分民间机构如社区伙伴等正通过“社区支持农业”和其他乡村社区发展项目，致力于通过发掘本土合作伙伴、文化传统、乡土知识等，培育乡村社区自主发展的更内在和自主的力量，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社区发展的关键内生力量还是在于社区内部尤其是返乡的年轻人。而这个方向在中国大陆农村青年不断往城市走的浪潮中显得阻力重重。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近两年，“返乡青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对话项

目的讨论和工作日程上。我们试图努力搭建新的平台，来承载这一股新鲜的脉动。我们也相信，返乡青年这一“新鲜群体”的形成和经验，也为一直关注乡村社区发展和文化反思的实习生项目，提供新的启发以及探索的方向。

这一章呈现的，就是几位返乡青年的故事。我们将围绕人才计划第二期实习生王永波的返乡探索，以自述、博客、对话、信件往来等方式或文本，展现这几年来他与台湾的返乡夫妇张正扬和阿兰妹、同在河北的返乡青年安金磊，还有更多各地的返乡伙伴们之间，冥冥间彼此联系却又有鲜明差异的返乡故事和成长轨迹，以及他们对话和互为扶持的过程。

王永波的故事远远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成功个案，他是返乡青年面临困境却坚韧不拔地寻找出路的一个精微缩影。他们前行路上的艰辛，不断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殷殷关切和沉重叹息，但更为打动我们的，是这几位带着农场梦返乡的年轻人的不竭探索所呈现的执著昂扬的力量。

大学毕业业务农去 ——返乡“萝卜”波仔与英子

波仔 本名王永波，1979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南楼村，2003年西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山东寿光一家种苗公司任职。2004年，回到家乡南楼村从事农作，进行乡村建设探索至今。2006-2007年间，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

英子 本名王小英，1976年出生在湖南邵阳农村，199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从事了七年的企业管理工作。2004年，在现代都市做了7年白领的英子，带着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嫁给已经回乡创业的王永波，落户河北农村。

编者的话 王永波是我们所知的大学毕业后自愿返乡务农的为数不多的青年之一。由于对话伙伴——台湾的返乡夫妇正扬和阿兰妹的原因，王永波得了个很南方的“波仔”的昵称。

2006年4月，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第二期培训结束的那晚，大家一身轻松地欢聚一堂，在歌声中畅饮畅聊，只有波仔一脸严肃又满眼热诚地找到了我——那次培训的协作者。他得知我们一帮朋友正在广州做民间组织和底层行动者的培训，极想参与。返乡后绝大部分时间蹲在村里的这个年轻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眼界，去和同行者交流分享经验教训，去学习更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志愿者招募的技能。

他的愿望的迫切，让人无法拒绝。我们也发现，这个扎在泥土里专注农耕的汉子，有着最底层最切身的乡村社区经验，并沉淀下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于是在我们

的引荐下，波仔如愿报名并顺利通过了广州NGO草根工作者培训的选拔，但最后，他却忍痛把名额让给了他的妻子英子，他疼惜这个辞掉深圳的工作跟他回村、在泥土里艰辛打拼的湖南媳妇，理解寄身陌生异乡的她，更渴望汲取新鲜的空气、获得知识和新的伙伴。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将所有返乡青年以及想扎根农村工作的青年伙伴们称做扎根的“萝卜”，波仔是返乡的“萝卜”，英子是跟着爱人返乡的外来“萝卜”媳妇，共同扎下根来后，繁衍出可爱的下一代“萝卜头儿”——波仔和英子的小萝卜头儿四岁了，叫奇奇。

渐渐地，通过和波仔夫妇的交往，以及英子那个性十足的博客，我慢慢地了解到，波仔的返乡路走得艰难。这个大学毕业返乡的另类“萝卜”虽然根扎得很深也很坚定，但回到故土却时常“水土不服”，蹲了数年，却难以开拓出足够的空间去探索自己最初的梦想。忙碌的农事，父母加诸一个大学生身上的期待和压力，如藤蔓一般一圈圈缠绕在身上，难以呼吸。下面的波仔自述^①，以及英子的自述和几篇博客，是这几年他们在土地上的探索以及与伙伴之间互动交流的片段分享——

①波仔的自述

我的乡村梦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从小就对土地、对种地特别感兴趣。记得高三时，学习压力很大，望着窗外一望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关于生命，关于人生，不想再说有什么意义的存在，或许说认真地生活，脚踏实地地生活就是真实吧！

李留洋 / 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有割不断的情感，对像父母一样质朴的农民有割不断的血肉之情。

尚荣才 / 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①2010年5月，在安徽南塘返乡青年工作坊上，王永波和大家的分享，根据录音整理。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每个乡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蕴涵。也许你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可以去探究其中的原因，但请不要试图去改变她特有的底蕴。

倪永旺 / 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无际的绿色麦田，看着农人在地里拔草，就非常地向往。报大学的时候顶着家人的反对报了西南农业大学的农学种植专业，实际上就是冲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内心的梦想去的。

大学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课本的东西，而是每个假期我都回家参加“大学生支农”的经历。另外就是利用“十一”、“五一”黄金周返乡支农。那个时候我在重庆读大学，平常也会时常下到学校周围的田里去。我觉得当时我就已经开始自我定位——将来返乡。这个梦想，自始至终都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面。



波仔在地里收获花生

因为这个梦想，当时也开始认识一些朋友，包括有搞房地产的朋友，后来却去承包荒山，到荒山上一点一点开垦……这样一批人对我影响很大。所以2003年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山东寿光。为什么去山东呢？因为虽然说想着以后肯定回家，但还不清楚回家干什么，还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当时山东农业搞得比较好，我就想去山东转一圈，希望能学到些好的经验再回乡创业。俗话说，“蔬菜大棚看寿光”，我在那里开始学习相对比较领先的种蔬菜的模式。所以从毕业后到2004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逐渐找到了返回农村最初的构想：把山东的东西搬过来，在河北南楼我的家乡种大棚。

返乡第一步：种大棚

我们家乡也有种大棚的，但是和山东比，在品种、种植技术上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就为我这个学农业出身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舞台——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把先进的东西引过来，再带动村里人。但我的这个想法，一开始就引来了家里人的反对。我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最后才说服家里，在2004年弄了两个蔬菜大棚。

我最初的想法是建起大棚来就能够影响周围的邻居一起种。但是后来我发现，种了两年大棚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周边的老百姓并没有人跟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和村里的老百姓接触太少了？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大棚里干活。后来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这一年，我的思维和认知从此有了模式，我的心中从此有了个人之外的关注。无论离开或是坚守，只是成长的方式不同，火一样的种子，早已深深埋在了每一颗柔软的心中。

靳志宏 / 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我用自己学的专业知识在村里面开了一个农资店，希望通过开农药化肥店推广种大棚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农资店的经营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相当于一个窗口，以此来带动更多的农民。当时我们说“科技支农，信息致富”。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传播了一些先进的技术，也给大伙儿带来一些外面的信息。

合作社的尝试

2006年，我接触到了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参加第二期人才计划的培训，接触到了一些乡建派的专家学者。从农业发展、从宏观角度、从当时碰到的问题出发，他们都帮助我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那时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思路太窄了，导致根本发展不起来，和老百姓结合不起来，所以说那会儿参加人才计划有种开窍了的感觉。

从那儿回来以后，2007年我就开办了一个合作社。我从梁漱溟乡建中心学到东西，受到了启发，也到山西永济学到了一些经验。但是搞合作社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合作社还得在土地上下文章，但是土地都是一家一户的，比较分散，社员的地也比较分散，我那时第一个把成片的土地用来耕作。

因为我在山东时搞的是蔬菜，所以我就把承包的土地拿来发展经济作物蔬菜。可惜那年的行情不行，效益不太明显，甚至可说赔了点钱，社员的积极性一下被打下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成立了合作社以后，我们又有了农资店，所以就搞统购统销，和大公司协议收农产品。结果那一年我们遇到了天灾，小麦收割的时候下了一个星期的雨，那些小麦一直生芽，导致我们和公司口头协议的订单人家没法履行——你的小麦生芽了，没法收。这一年，合作社进行得不顺利。

后来我改变了思路，自己一个人先承包土地搞起来。2007年，我自己承包了500多亩的农场规模种植，也就是先拿自己做实验，尝试把更多的土地集中起来，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希望把管理搞好、效益出来后，再把整个合作社带动起来。但那一年又遇到了麻烦：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葱上面，那年北方的大葱行

情比较看好，但是我那年是在英子的老家湖南衡阳培育的葱秧，结果葱秧遇上了南方50年难遇的大雪灾，整个20亩的葱秧全部冻坏了。那一年也是亏本不少。

2008年我缓了一下，把自己的农资店经营了一下，2009年我又回到村里承包了30亩地搞经济作物。总的来说这几年发展都不太好。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关于传统土地种植，我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增收困难。一个是农业种植风险大，这几年自然灾害对整个农业的影响很大，包括春天的低温，去年的大雪，我种植的这几年来年年都遇上。而实际上，这几年最制约我的还是市场的问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年近三十的我们生于乡土，终于不再害怕城市，终于相信农村是常维新的，自有其不朽的生命，然而最终还是徘徊在城乡之间。

陈晶晶 / 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生态农业的探索和思考

由于有市场方面的考虑，我这几年种蔬菜还不敢讲有机的，有机的相对难度较大，我现在尝试比较健康的生态农业这块。自2008年开始我们就在逐步地摸索。在种500亩地的那一年我种了些红薯，并进行深加工做成红薯粉条，由于货真价实，在市场上反应非常好，但是量比较小，只是供应一些朋友。

2009年，我在小麦田里又拿出几块地尝试不使用农药、化肥，但产量很低。还有就是把石磨重新搬出来了，因为有个朋友研究了一套石磨的机器。大厂家用的那种滚子都是高速旋转的，小麦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经过高温以后基本上杀掉了，没有小麦原有的香味。而我们这种石磨原来都是推碾的，或是驴拉的，没有破坏小麦原有的营养，只是颜色有点黑。我



波仔将自己种植的小麦送到当地的面粉厂，加工成不含任何添加剂的青蛙牌绿色面粉。

们当时在包装上就打了“我黑我健康”，尝试着把这个东西往外推。朋友们拿到东西之后，觉得很好，但是不容易推广开来。因为没法和普通的面粉竞争，当时人家面粉价格在一块五六左右，但是我们的成本比较高，大概卖二块二左右。所以也只能一点点尝试去做，面粉销量有限。

这样的面粉拿到超市，或者说是走粮油批发，都比较困难。超市是大卖场，你说你的是石磨的我怎么相信呢？如何推向市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再做进一步的深加工，比如做成馒头，在北方这是主食，这样就有了一个附加值。另外，农村的妇女们一般都是在家的，如果把闲置出来的劳动力集中起来，来做面条、馒头，利用手工的作坊去做加工，是不是也有可行性？当然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还没有一个计划书。

回首六年苦与乐

从2003年开始尝试，2004年返乡，到2010年，已经六年的时间。

六七年的时间，酸甜苦辣都经历了。其中最苦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母。回家种大棚蔬菜之后，本来他们都该到退休养老的年龄了，却不得不跟着我受苦受累。你不让他干呢，他看着我整那么多事挺着急的。所以说，真是苦了自己身边的人，还有就是我的妻子王小英。她是放弃了在深圳工作的城市生活，选择了跟我一起回乡创业。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苦中作乐。我在田里面看着我的庄稼一天一天变样，看着我的小麦一点点长起来，干农活时呼吸着这样好的空气，心里很舒服。在土地上才能找到这样的感觉，这也是我回乡的最根本动力。

一个难处就是难在“发展”上。我尝试了各种方法，这也想探索那也想探索，包括合作社，但是到现在我的思路也不太明确，发展也都不太顺利。我有时在想，我一个大学生在农村发展都那么难，一般的老百姓可想而知。毕竟我有知识，有一些资源，包括媒体资源。但是老是搞不起来。特别是合作社发展，带动社员难，给老百姓带来一个新东西，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赚不赚钱，能不能带来实际的效益。老百姓最实在，他会按他原来的方式去对比，如果真的让他增收了还好，但如果你这次让他担风险，下次就难了。也许我需要多积累一些经验，需要去磨炼。

而且，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很孤独。虽然英子是我坚强的后盾，但是我们俩在很多时候也有不少分歧。总体来说，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现在她管文化，我管经济，但实际上，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只靠一两个人能做好的。而且现在，我们的资金投入也好，包括人员也好，都是靠我们家自己找，没有其他的人员，基本就是白手起家。特别是今年我承包了80亩地，这段时间一直在忙播种。过去在田里干活我还哼哼歌，现在觉得根本没有哼歌的时间了。

当然，我们的支持者也很多，包括社区伙伴的支持，包括梁漱溟乡建中心，

还有一些立志农村的大学生的支持。中央财经大学的大学生就经常到我们村支农。我成立合作社的时候，社员说“是不是搞两年之后就把你吸收成村官走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在这儿，合作社就不会倒。我想，正是有了这些，让我有信心坚持走下去，不管再苦再难。

编者的话 波仔这个北方汉子的分享，是简洁内敛甚至木讷的。若想在他理性的不轻易流露情感的论述背后，感受到这对返乡青年带着真实血肉和温度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况味，就要去看英子的博客了。

英子在乡建圈里鼎鼎有名，这位波仔在网络上的“三农”论坛中经过惺惺相惜的交流、从深圳大都市“拐回”家的返乡媳妇，在圈里人口中，是一位敢作敢当、直爽执拗的巾帼女侠。

我第一次见到英子，是她去广州参加NGO培训时。那个清晨，在女学员宿舍前的绿树丛间，英子夺目地裹着一条红裙，专注而用心地啃读一本管理哲学方面的书。这明媚的一幕颠覆了我对乡村媳妇的刻板印象，后来才知道，英子只能在屈指可数的外出的日子里，穿一回鲜艳的衣裳，稍稍重温那久违的被她自称为小资趣味的读书人兼城市女子的生活。

而在打开英子的博客之前，我们从没想到坚强少言的英子，可以在网络上将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冷暖滋味，如此“惊心动魄”地写下来——农作的艰辛、经济的窘迫，以及两人试图兼顾经济和公益、乡村文化事业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他们努力探索，彼此取暖，共同扶持，却又因为性格和处境的不同而不时摩擦出伤口……

②英子的自述

1997年，我大学毕业之后独自去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在深圳做了七年的企业管理工作。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成为令众多打工妹艳羡的白领，过着衣食无忧轻松快乐的小资生活，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因此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农村的发展和走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量的

与“农村、农业、农民”有关的理论书籍，了解到“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并在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等一批“三农”专家的呼吁下浮出水面，引起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迎来农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也正在这个“春天”里，我终于按捺不住对土地的思念，嫁给了已经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王永波，落户到河北农村。

我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孩，自幼喜好读书，却往往读不到课本以外的书，接受的是母亲三步式的教育，即第一步：你看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好，为什么你就那么笨呢？第二步：你如果能做到什么什么，我在手掌上煎鸡蛋给你吃！第三步：你说你想干这干那，你是那块料吗？母亲的这种否定加反刺激式的教育方式使我从小就非常自卑，甚至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患上了自闭症，不和任何人说话交往，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了母亲，用各种形式的竞赛证明了自己的优秀，才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我。

因为对书的饥渴和对母亲错误的教育方式的反抗，我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立志将来要在农村建一所图书馆，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农村的孩子，并且还要培训农村妇女，使她们也能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然而研读的教育理论书籍越多，我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越不认同，所以毕业之后我选择下海锻炼自己，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儿时的梦想，苦苦寻觅着回归农村的途径。

嫁到河北农村之后，我一边努力学习农业种植技术，一边开始实现我的理想：招收一批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的孩子组建阳光少年队，利用周末的两天时间带领他们开展书本之外的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而且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组织能力，带领或协助他们筹办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也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如引导他们用选举的方式组建团队，用讨论协商的方式制订每月的活动计划，用民主集中的方式决定各种管理规则等，我用游戏式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喜欢上学习，快乐地学习，实践了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想法，也为学校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和补充，让孩子们更健壮地成长。

2007年，通过公益组织朋友的介绍，我争取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年四次的免费培训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参与

式教学方法的理论和组建草根NGO组织的管理方法，同时认识了一批致力教育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通过这些朋友，我开始实践我的第二个理想——筹建村图书馆。我分别从北京麦田计划、广东澄海阳光志愿社、香港杨大哥处募捐到一千多本图书，为后来成立南楼村农家女书社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8年，我又争取到一次到四川成都华德福学校学习半个月的机会，通过这半个月的学习，我感觉到自己终于掌握了教育的精髓：爱和尊重加赞美鼓励。如果想要一个人成长为我们心中所想象的样子，你首先要接受并爱他现在的样子，然后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不断地用赞美鼓励的语句去肯定对的行为，长期下去，这个孩子就能成长得非常杰出优秀。而且通过实践我还发现，这种教育方法不仅适合小孩，同样也适合大人，这个发现使我对今后在村里更好地开展妇女培训和孩子们的周末教育更有自信和把握。

2009年，通过网络认识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主编谢丽华老师，在谢老师推荐下我参加了北京农家女学校举办的农村妇女创业班的培训，并认识了农家女书社项目的负责人高月琴老师，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村委会的支持下，正定县南楼村农家女书社于2010年5月份终于成立，由15个农村妇女志愿者义务值日，每个周末开放，为全村的孩子和村民提供了一个学习成长的平台。

随着对农村生活的逐步了解，我越来越发现村民对文化娱乐活动的向往以及这类公共生活对于乡村建设的长远意义，于是我和先生王永波通过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培训的机会，联系到中央财经大学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和“五一”、“十一”假期来我村支农调研，推动村庄里的公共文化生活。自2006年到2009年，我们分别联系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的支农社团来我村下乡7次，这些支农大学生在村子里为孩子们筹办暑假支教活动，为村民们举办联谊文艺晚会、教授太极拳，还协助我们成立本村大学生联合会。

③英子的博客

■ 不抛弃不放弃 2009年12月31日

说句心里话，这几天我一直被波感动着，从他的行为中，我看到一个创业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从他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刚毅坚强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从而在心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重。

地里的萝卜，第一次下雪就已经把地面上的半截全都冻坏了，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请人来挖坑把没有卖的坏萝卜储存起来，可是挖出来的萝卜还没埋完，老天就降起了大雪，而且连续不停地下了好几天，直到把屋门封住才罢休。前两天因为一个老顾客要萝卜，我们去地里挖萝卜的时候才惊心动魄地发现：来不及埋土的萝卜全部冻坏了，黑紫黑紫的一坑，看着就让人想起南京大屠杀，令人在心里感到莫名的惊恐；而那些埋了土的萝卜，因为没想到大雪会来得那么早，还想等到再冷一些的时候再复一次土，也就都因为埋土太少而冻坏了大半截。当波跪在坑里极其艰难地砸碎冰冻的土层把坏得开始腐烂的萝卜挖出来的时候，我一边砍着坏萝卜一边看着他跪地求生的姿态，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地里的白菜，因为没有捆绑，在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外面的叶子就全都被冻坏了，再遭第二次的大暴雪，几乎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了，但是波还是决定用铲车开道并用最高的工价觅请了十几号人从雪地里把白菜挖出来，用草苫盖了起来。等到雪消融之后再去看白菜，边上都被冻得死邦邦的像死鱼一样了，中间的叶子全腐烂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剥开每棵白菜，几乎每叶上都布满了黑色的斑点。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下是彻底地完蛋了。当波在半夜里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英子，白菜全部坏掉了”的时候，我宽慰他：坏了就坏了，已经这样了，就没指望过它。但其实在感情上却还是难以接受，虽然没有在心里埋怨过波，却也对现实的艰难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波还是时刻关心着天气的变化，一听到说要刮风降温就去给地里的白菜加盖草苫和塑料薄膜。我紧跟在他的身后，帮着他一丝不苟地做好他想做的事情，也禁不住被他的执著深深地感动了，进而在心里对他产

生了深深的敬重：不论这些白菜最终的结局会如何，他做了他力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全力以赴地去做，就永远不会后悔。

从他对坏白菜的态度上，我看见了深藏在这个北方汉子瘦弱的身躯中的耿直的灵魂，看到了他对事业对家庭对婚姻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忠诚，我忽然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三四年了，也只有这一刻，我是真正懂得他的。

■ “出轨” 2009年12月15日

如果说我是因为厌倦了城市追随着理想而回到农村的话，那么农村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后的宿地，我应该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为生存而挣扎在农村的，然而11月下旬的一天，我有些神志不清地一拐脚就又一次地踏进了城市的城门。

自得知小妹腊月要举办婚宴之时，再到地里所有的萝卜白菜全被大雪掩埋之后，当我踏着快没及膝盖的大雪在冰天雪地的旷野里艰难地从积雪下面挖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白菜、胡萝卜时，我忽然对农业的脆弱和原始资金累积的困难感到恐惧，进而对这将近五年的一无所获的求索感到绝望。而怎样回去、如何为小妹准备礼物等等世俗的问题也都逼迫到了眼前。我的骄傲、我的自尊，还有不容父母埋怨半句的虚荣令我在深更半夜里辗转反侧。

我把家里所有的财源翻来覆去地盘算了十几遍，但每一次的结果除了让我更加焦急之外便只剩下绝望。我不愿向波诉苦，我太明白重压之下备受劳累折磨的他只要再加上一根稻草也许就可能倒下。

我现在急需的是金钱，最缺乏的也是金钱，所以我必须去做风险最低见效最快挣钱最稳妥的工作。确定了工作的性质之后，我开始给所有的亲友发送求救信息，告诉他们我想出去找份工作，让所有的人都帮我留意。但是即使身临绝境，我还是不愿意饥不择食，所有操作性的工作像工厂工人、服务员、售货员、质检员，还有弟弟门下的网管都被我谨慎地排除了，直到泓姐介绍给我一份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我才欣然同意出门进城。

波对于我的决定有些无可奈何，自顾无暇的他把带着沉重行李的我扔在马路边上急驰而去。我背上书包，左右手各提一袋行李，再腋挟一箱粉条登上了去往陌生城市的汽车。

然而波的忽然来访和指责让我倍感不安，我懂他指责背后没有说出的所有语言，也懂他内心所有的恐惧和担忧，所以我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我的为难来自聘请我的老板——他的信任、赏识以及为我提供的施展才能的平台，让我在内心无法决然地推卸掉承担在肩的重任，而理想和家庭的威胁也无法让我坚持内心的那点妇人之仁。思虑再三，我还是让波为我整理好了行装，任由他带领着我回到风雨飘摇的家中，见到了看到我时喜出望外的正在生病的儿子……

生命的轨迹自城市中划了个圆弧最终又回到了农村的断点，而我的理想和事业还能在这里继续延续吗，在“出轨”之后？

■ 对待孩子的分歧 2009年12月27日

忍了很长时间了，终于还是发泄出来了……

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在生病输液，奇奇虽然躲过了上一次，这次却也不能幸免，不得不喝药打针输液了。由于波买的药特别苦，孩子每次喝药的时候，也许是心里本能地在抗拒，所以每次都会干呕得想吐掉，但是碍于众多大人的压力，孩子还是极其懂事地把药喝了下去。然而几天之后终于喝不下去了，由于不愿意让波灌他喝，他被迫喝了一口之后，就连着早饭一下全吐出来了，我心软了，不想让他再喝，却无法拂逆全家人的坚持，只能好言好语劝他喝，奇奇却扯东扯西地拖延时间。看到我们母子俩拖拖拉拉了很长时间也没把药喝掉，波生气了，冲过来夺过奇奇手中的药杯，把孩子扳倒在床上就要灌他喝。奇奇惊恐万状地哭喊起来，我也急了，大声地喊：“你别呛着他了……”婆婆赶紧过来拿了药杯，搂着孩子继续哄逼他喝，公公开始嚷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默不做声地走出家门，往店里走去。

心里有些悲哀的落寞，三年多了，我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和这家人的育儿习惯

达成一致，直到现在他们一家人仍然在强烈地抱怨和指责我对孩子说理的教育方法，他们不停地教或逼迫我去打骂孩子，而且会引亲据邻地现身说法，可是我始终无法越过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去顺应这种教育方法，也就在每次的分歧争论中居于孤立无援之境，心受挫伤。

■ 图书室的挫折 2010年3月3日

初五回家之后，趁着白天拜年晚上没事，我又开始忙乎书社挂牌的事。我粗略地想了想大概的流程：组织管理班子，清点图书，布置书社，准备文艺演出，邀请各级领导干部……拿出手机给爱香嫂子发信息，问她是否还愿意当图书管理员，又问她要灵娥姑姑的手机号码，她回答了我后一个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却避而不答，我感觉她可能会变卦。

送走嫂子一家躲进被窝里，波一边翻着书本一边说：“不行吧？我早和你说过了，没有报酬谁也不会给你干。”

“谁说不行了？她也没有很推托，我就算上她，在她没出去干活的时候拉上她，而且管书社也占不了她多少时间，一个月顶多也就值一到两天的班，一天才六个小时。再说了，即使她不干，也不代表别人不会干。”

“不信你就试试，碰得头破血流了你就信了……”

我继续在晚上的时候去找人，在路上碰见香文婶子的媳妇，想起婶子老对我抱怨她媳妇天天守着电视的话，我就试着去接触她。“不愿意，你找别人吧。”她直截了当地说，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又去找了几个人，一听没有报酬也都不愿意参加，她们生硬的拒绝让我感到难过了，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往家走的时候，心里真是沮丧到极点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心中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就开始用手机给农家女书社的负责人月琴姐发信息，诉说这几晚跑腾的结果和心中的苦闷。月琴姐认真地倾听我的苦恼，安慰我不要焦急，一边帮忙想着办法。尽管到谈话结束，我们也没有想出什么行之有效

的办法，但是我的心里却轻松了许多，而且重新燃起了战斗的激情和信心。

■ 挑战与成功 2010年3月15日

书社挂牌揭牌的仪式是我对自己的一项挑战，我想测试一下自己能力的深度，更想知道自己执行力的力度，因为我很清楚：人要在实践中成长。

经历了书社人员初步筹备的困境之后，我花了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做出了一份《南楼村农家女书社挂牌成立计划书》，写出计划书之后我又找了些相关的人咨询交流，并对计划书做出了相应的修改，然后定稿，然后实施。

这是我回到农村之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单独去做一件事，因此我走得小心翼翼。

也许是因为正儿八经地写了计划书，广招图书管理志愿者的工作忽然变得顺利了，短短两天的时间里，我竟然“忽悠”到了十来个人，这使得我非常兴奋，紧锣密鼓地进入第二步：对所有的管理志愿者进行图书基础知识的培训。



英子在农家女书社和阳光少年队的孩子们一起举办的诗歌朗诵现场

培训那天，我第一次在村广播室广播了培训消息，使我从此不再对自己的声音在全村响起和对扩音设备感到畏惧；培训那天，我第一次气定神闲地给妇女们上课并且丝毫不乱，使我从此不再惧怕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言，并且终于确信了自己的能力。

争取到书架后，参与图书管理的妇女们的热情更高了。就在昨天，又有两名妇女报名自愿参与。晚上紧锣密鼓地召开骨干会议，商量接下来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的布置工作。

为了要书架，欠下很多人的人情，欠得最多的是李秋晚。李秋晚是南楼村的名人，曾在靶场办过高等专科学校，当然这些事之前我是毫不知晓的，直到他把学校废弃的书架存放在村广场的闲屋子之后，我为了要书架才开始从人们口中得知这个人。然后我找人要到他的电话号码，不断地打电话、发信息和他讲我们要办书社的缘由和目的，他从最初的怀疑、不信任到最后和我结成兄妹，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真诚的力量。

■ 九个书架 2010年5月6日

历经半年马拉松似的央求，村委会终于在昨天给我们买了九个旧书架，虽然是旧的，但是是自己看上的，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终于把这块硬骨头嚼碎了，我的内心在瞬间的欣喜过后，只剩下疲惫，想起为要书架焦急上火得生病两三天不思茶饭，想起一个人来来回回地找这个求那个的辛酸，我在费力地洗刷书架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不过，我的固执与倔强终于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成了。为了犒劳自己，在书社挂牌那天我要穿上结婚时的红色礼服，做最漂亮的自己！

（转自英子博客，有删节）

编者的话 这是一位从繁华都市扎根到冀中平原乡村的返乡媳妇的内心独白和宣泄。里面有快乐忧伤，有矛盾挣扎，也有挑战和成功。她将最深处的喜怒哀乐直接袒露在网络上，然后像拍掉尘土一样，继续走眼前的路。所以，虽然有时这些文字像箭一样锐利，一针见血——甚至让人担心：这无遮无挡的袒露是否如双刃剑一般，也会伤了自己所关爱的人，但寡言的波仔却很理解并一直给予默默的支持。

他知道英子承受的压力：要不断地忘掉城市里自在优渥的过去和在陌生的村庄扎下根来，这种城乡的差距、生活的反差与尴尬，理想的重负与主流文化和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于是，在我们眼里的英子，一直呈现出极端而充满张力的一个硬币的两面：绚烂的童话世界和沉重甚至充满灰色的现实挣扎。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好友：台湾的返乡媳妇——阿兰妹。如此相近的处境，让我想到将她们拉到一起。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理想不是头脑中的宏伟蓝图，也不是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理想要扎根于土地，基于现实，敢想敢做，关键是做。

刘良 / 人才计划二期学员

台湾“秀仔归来” ——正扬与阿兰妹

张正扬 台湾高雄旗美社区大学主任。1988年进入台湾大学机械系就读，1995年8月进入“中国钢铁公司”，1997年离开“中钢”回到故乡美浓，进入“美浓爱乡协进会”工作。后参与创办旗美社区大学。

阿兰妹 全名洪馨兰，台湾台北福佬（闽南）人，在台北成长求学。大学二年级时受“本土运动”冲击，重新学习母语福佬话；两年后更进一步接触客语，并于研究所期间参与客家社团与客家庄调查。1997年3月至1998年2月于美浓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蹲点，1998年完成硕士论文，随即返回美浓，并留居当地工作。2000年成为美浓农家媳妇，与婆家合住。

秀仔归来^①

秀仔决定回来/回到爱恨交杂/感情落根的地方

这个决定很难说清楚/同事问他/你按呐打算撒好？（闽南语）

朋友给他警告/你转去庄脚头壳是咧坏去呀哦？（闽南语）

祖母的问题更难捱

她问/秀仔什么时候回去呀？

但是秀仔决定回来/回到爱恨交杂/感情落根的地方

他没有办法再像他的朋友/把不满交给选票代理

他没有办法再像他的同事/把寂寞交给市场处理

他不想再像上一代人/认做认命认份
 儿子女儿赶出去找工作
 日子好坏全都任由政府(重复)
 因此管芒结花/栽烟苗的时候
 秀仔回来/回到尴尬拉扯/感情落根的地方
 跟着他回来的问题/从庄头蔓延到庄尾
 但是秀仔回来/就是答案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在这一年中，我并没有给当地的农村带来什么，而恰恰是农村给了我很多的感悟，农民帮助我更快地成长。正是他们改变了我，使我更多地认识了自己，使我更多地从虚无的空想中转变过来。

王晓平 / 人才计划二期学员

编者的话 《秀仔归来》，是台湾美浓很多年轻人返回乡土的浓缩体现，而正扬和阿兰妹，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对。

正扬和阿兰妹这对返乡夫妇，算是社区伙伴的老朋友了。因为对乡村问题的共同关注和长期涉足，正扬夫妇和中国大陆乡村建设网络中的很多年轻伙伴，已经在不同的乡村社区发展项目以及培训交流活动中有过接触。2008年初，在广东番禺社区伙伴主办的一次乡村建设工作坊上，波仔和来自台湾美浓的正扬、阿兰妹一见如故，波仔也因台湾《秀仔归来》这首歌而成为我们口中的大陆“波仔”，这也是两对返乡夫妇的“对话”因缘的萌芽。

第二次会面，在2010年5月底的安徽。最后一个风尘仆仆赶到安徽南塘返乡青年工作坊的波仔告诉阿兰妹和大家，来之前在田间抢收无比忙碌的那几天，他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唱起《秀仔归来》，而英子也被这首歌深深吸引，憧憬着返乡人的相聚，尤其是和另一个返乡媳妇阿兰妹的首次碰面。而阿兰妹，这个台北都市闽南家庭长大、最终落户台湾南部美浓客家的女子，则在每

① 《秀仔归来》收录在台湾“交工乐队”的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中。交工乐队由和张正扬一样同为美浓返乡青年的林生祥等人组建，以美浓当地客家八音传统音乐为基础，结合现代摇滚乐，创造呼应现代社会议题的客家新民谣，也是美浓青年返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交工乐队曾多次获台湾金曲奖。

一次相见时，都会操着美浓夫家的客家话，为我们一遍遍吟唱并解释《秀仔归来》的歌词和背后的故事。

不夸张地说，是《秀仔归来》最初牵起两岸返乡青年的对话，并逐渐成为两地返乡人的一种寄托和鼓舞。

①张正扬：农村是一所学校

文/吴飒

在农村，你面对山，面对河，面对天地，面对农民，都能够学到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象征。人在物质与心灵上，都没有办法脱离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发展经济的时期，经济的需求会被放大，这些东西会被忽略。可是我想，台湾大概也过了那个阶段了，开始有一些东西需要反省和沉淀，所以农村的价值、农村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刻，凸显出来。——张正扬

美浓，南台湾著名的客家小镇。这里有人口5万，90%以上是客家人。美浓是全台湾的“硕博之乡”，先后出过300多个硕士、博士。土地和知识，或许是美浓人多年沿袭下来的最高信仰。

两代米家

张正扬家所在的村庄，很安静。村里的私家车很多，很多的二层小楼新式又漂亮。张家就在路边，院子里的水泥地面上正晒着一小片刚收割完的稻谷。怕小鸟来偷食，张妈妈用绿网将稻谷遮住了。这些稻谷都是有机的。不过，张正扬却用“完全不用药和化肥”来定义它们。因为他没有去做有机认证，“如果宣称有机，是要被罚款的”。他并不打算去认证：一、他们是小农，规模小；二、有机认证花费巨大；三、他对台湾现行的有机认证标准和机制深表质疑。他们并不希

望自己的农产成为冷冰冰的商品。

张正扬是旗美社区大学的主任。台湾土地都是自有，张家在美浓有几块地，共计一公顷（15亩），都是张妈妈在种。她今年60岁了，却一点也看不出。工作闲暇，张正扬也会帮母亲做一些粗重的活儿，或者开车协助运输。

在美浓，农业种植基本是“三期三货”。前两期种植水稻，第三期种杂作，譬如番薯、豆类、萝卜、南瓜等等。张妈妈也是如此，但与其他老邻居不同，自从儿子9年前任职旗美社大后，受到儿子及其同仁的鼓励，也出于对更健康生活的追求，她开始在自家的土地上尽量实行有机种植。

农药化肥的丢弃，让张妈妈辛苦不少，肥料要选最好的有机肥，很多事情都必须用人工，随时要防止病虫害等问题。再加上没有有机种植的经验，起初她的稻米产量“一分地（约1.5亩）只能收获五六百斤”。种了几年，摸索出了一点门



农历过年期间都是收红豆的农忙季节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还记得那句“悲悯苍生苦，坚志效先贤”；还记得当初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加入乡建，追寻人生的理想；还记得老师的教诲，农民的访谈，同学的探讨。

吴丹 / 人才计划二期学员

道，最新这季她家每分地的产量已经翻番，但平均产量还是会比其他使用化肥农药的人家低25%到30%。

也有让张妈妈和儿子很头疼的事。张正扬拿出一包红豆说：“这种红豆，在台湾几乎不可能有机种植。因为虫子特别喜欢吃红豆，假如整个栽种过程不用药，可能最后都没有收成。大部分红豆为方便采收，还会被喷落叶剂。但在这个环节，我们坚持不喷，都是用人工一株一株地把它们拔起来晒，然后再用机器把豆子打出来。”在张家看来，“只要能够减少一次农药的使用，就是对土地友善的开始。当你没有办法全面性的不用药时，就从小规模的一点一滴开始。”

因为这种“对土地友善”式的种植，张正扬和妻子在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名曰“美浓两代米家”^①，这也是他们家农产品的统一标志。他们在博客上与访客分享他们的农村生活、农耕故事或常识，也会讨论与农业相关的一些议题。此外，他们也在博客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白米、糙米、粗粮，偶尔还会售卖一些张妈妈亲手做的豆豉等等。

张家的客厅里，有一箱粳米一箱糙米，都用真空袋一袋一袋包装好。每袋两公斤，200新台币。张妈妈说，订购她家农产品的基本都是熟客，“都是很讲究生活的人，高雄、台北多些。”事实上，这一公顷的水稻很难维持全家的营生，“不扣除自己的工钱，你能够赚5万块新台币就很不错了。”好在张正扬有旗美社大的薪水收入，美浓当地很多种地的农家都与张家一样，家庭成员的工作或生意收入才是家庭收入

^① 美浓两代米家的博客网址：<http://www.wretch.cc/blog/ricenotes>（本文集编者加注）。

的支柱。

张正扬说，他和太太在网络上做农产销售，更多的是想介绍一种农村的生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单纯地生产，我们也会策划一些体验活动。”譬如，番薯收获季，夫妻俩会在博客上向城市里的消费者发布消息，邀请他们来到美浓的田地，与土地和作物亲近，在土窖里一起煨番薯然后品尝。

返 乡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在其名作《原乡人》里写道。美浓人对自身社会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和自主意识，美浓也因此被称为“客家原乡”。

张正扬也正是带着朦胧的原乡意识归的乡。这个当年从台湾大学机械系毕业的高材生，进了高雄“中国钢铁公司”，却最终决定回乡，这一举动显然有些违逆“历史潮流”。

日据时期以来，美浓曾是台湾最大的烟草生产基地，居民生活普遍富足。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烟草经济大幅衰退使得农民收益大不如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向城市讨生活，而美浓人也极力培养后代，期冀其能通过知识和教育飞出凋敝的故乡，到大都市去光鲜过活。随着90年代情势的恶化，以及之后台湾加入WTO，台湾农村无可挽回地走向颓败和低迷。

张正扬却偶然成了美浓的第一拨返乡者。张正扬刚回来时，只是想做点事情，没想到赶上了著名的美浓反水库运动。在张正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美浓就遭遇了号称“亚洲第一高坝”的美浓水库提议案。当局拟在美浓兴建水库，而美浓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珍贵的生态资源和人文遗址都将被淹没，以及水库随时崩塌所带来的生命威胁。美浓人当然不干。张正扬偕同当地同仁筹备成立了反水库组织——美浓爱乡协进会，并担任总干事。他成了反水库运动的骨干。

在反水库的阵营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经历无数波折，反水库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如果一个人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都没有，真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毫无光彩的。

许丙举 / 人才计划二期学员

运动终获成功。“反水库不只是一个攸关美浓生死存亡的议题，它也是一颗磁石，吸引着美浓知识分子将乡愁化为力量。”

“其实我回来十几年，也常常在想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在这期间想离开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可是我还是决定要留下来。原因不是我能抛弃都市的花花世界，而是我真正喜欢农村，喜欢在美浓生活。”张正扬说。如今在美浓，像张正扬这样的返乡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据闻，一位叫钟宜秀的姑娘，为了协助弟弟在家乡的餐厅经营，辞去了自己在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高薪工作，返回美浓。而现在，她已经投身



希望让小孩能在农村成长，拥有不离开泥土的童年，这是我们选择留乡工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机。每天傍晚，小朋友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家里所有人烧温暖的洗澡水。

有机米的种植中来。美浓农会推广股的钟雅伦透露，在他们的有机米产销班中，有一位台大经济系毕业的美浓小伙子古文锦，毕业后毅然回乡从事有机米的种植实践。张正扬的妻子是台北人，却跟着他也返了乡，嫁到了美浓。当时，他们一起在爱乡协进会工作，旗美社大成立后，她亦随同加入。

农村是一所学校

喊出这记响亮口号的，是张正扬所在的旗美社区大学。

美浓反水库运动成功后，张正扬与爱乡协进会的同仁决定筹备创立一所农村社区大学。2001年，旗美社区大学创立。它覆盖包括美浓、旗山在内的9个高雄乡镇，直接面向当地居民。“以立足农村、服务农村为宗旨，积极扮演农村学习、组织、结晶的平台”。旗美社大的编制没有学院之分，它有部分经费来自当局，不以营利为目的，“比较像是非营利的政府组织”。

随手翻阅旗美社大2008年春季班的课程简章，会发现他们针对不同乡镇会有不同的课程设置。例如，他们为美浓客家地区开设了“美浓风情导览班”、“客家八音南湖琴韵进阶班”、“客家民谣社”等特色课程；而原住民较多的三民乡，社大则为当地居民开设了“MAMANANU部落成长团体”、“原住民创意拼布班”等课程。除此以外，“有机作物产销实验农场”、“静心瑜伽”、“日语会话”、“水墨画”、“从喝咖啡谈起”等大众课程则覆盖到多个乡镇。“我们开课是以社区的切实需求为主。这些课程都是生活上需要用的知识，有一些比较实用，也有一些比较抽象。”张正扬介绍道。

据悉，目前旗美社大的课程主要分“环境与健康”、“农村与农业”、“族群与文化”、“社区与成长”四大块。“让农村学习”和“向农村学习”，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旗美社大的报纸和课程简章上，这也是旗美社大一直所坚持的理念，不是知识精英对农民俯视式的传教，而是充分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生活劳作经验，为他们搭建传承、交流和创新的平台。知识分子同样需要从农民那里汲取知识和养分，为他们搭建“向下层学习、向农村扎根的平台”。



协助农务是重新向农村学习的过程，从中体验气候、土壤、动植物的知识，并且唤醒身心的感觉。正扬和母亲在后院小番茄园搭棚子。

所以，旗美社大的学员中也有很多返乡知识青年。譬如钟宜秀与社大种田伙伴邱静慧，合种了一块有机田。社大木工班的学员黄盟生，在祖辈留下的土地上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座别具欧风的建筑，开了间崇尚自然健康的香草餐厅。餐厅里的有机米都是他和太太亲自种植，吧台、天花板、鸽子笼等则全是他在社大木工班的学习成果。

如果说以美浓爱乡协进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的活跃是美浓的特色景观，那么，旗美社大则成为这些团体以及社区居民的公共生活平台。它不但凝聚了返乡和当地的知识青年，也让社区居民可以在此交流和分享当地文化，重新凝集社区情感与共识，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旗美社大一直在敏锐地关注和参与农村议题。针对小农产销问题，旗美社大2006年首创“农夫市集”，为当地小农建立区域产销网络，并鼓励责任生产，

让农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接触。同时，旗美社大经常组织学员进行一些岛内特色社区访问，策划类似于收割稻谷之类的体验活动；他们亦与城市及海外相关专家或地区保持互动，交流学习，扩宽本地农民的视野。旗美社大已经成为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平台，一种经营人与生活的学习运动。在台湾岛内，这所发端于美浓反水库运动的农村社区大学，已长成标杆。

张正扬和他的美浓，正在书写传奇。

[转载自招商银行《财富生活》期刊（现为《财智生活》）

2009年7月号，有删节。]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尽管我过得很艰难，但始终怀抱梦想，不言放弃。我知道我是在“沉潜”！

陈乾方 / 人才计划三期学员

② 责任种植：种出信赖与尊严

文/张正扬、洪馨兰

责任种植：这是种给朋友吃的！

友善农业与责任种植，不仅是对土地、万物友善，它也是一种对生产者、消费者也充满友善的新农业观念。常常听到有朋友回乡下老家时，总带回一堆蔬果，“这是种给家里人吃的，因为家乡的亲戚会把要卖的跟要给自己人吃的分开种。”这似乎是个不能明说的“默契”，但却明白地指出了生产行为在追求表面最大利润的错觉下，所产生的一种不得不然的无奈。

就此单方面来指责生产者的黑心或消费端的贪好又贪便宜，其实都可能太过片面。长久以来，因交通不便或城乡距离拉大，造成相对应的产销设计隔开



阿兰妹在家中的农活之一就是为家里的农产贴上标签。这些标签并不花哨，它代表的是一种心意：我们想跟消费者交朋友！

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并豢养着庞大的中间商社群，农产品在“价格”争夺与剥削中失去了“人味”，不仅生产过程面目模糊，流通通路也往往是个大黑箱，连消费者也成为只被视为掏出现金的顾客，名姓是什么无任何意义。

地产地销鼓励人们吃在地的食物。这个行为意味着产销之间尽量减少运输距离，更进一步则是尽量缩短相互认知的模糊空间。透过直接品尝当季、当地以及小农的产品，拉近消费端和生产端相互的疏离感；生产端的小农将比以前更有机会去知道、认识甚至熟稔他们的客人是谁。“我们因为知道要种给哪些人吃，所以觉得跟来买的人就像是朋友一样，也觉得对对方有责任。”这就是我们认为的“责任种植”精神。

追求食物安全，就是要让食物的产与销都变得“有机”。这里的“有机”是指鼓励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建立友谊关系，看到活跳跳的农家、有想法的种植者、带着希望的农村和一批有责任心的环境运动者，让大家一起努力，发挥地产地销的最大效益——重建城乡之间“有机”的人际网络，这便是责任种植的梦想。

农产既是目的，也是媒介。食物的交流是味觉与料理的旅行，而产地直销的方式，传达的其中一种默会知识，即是地方的风土与人情。农产不仅仅是标示着价钱物品，在生产与购买两个行为之间，地方风土正透过每一种粮食、蔬果、种作，传递着地方价值。每种作物能适地生长，必然带有其适土性，而有信心有尊严的农家，就能将这种适土性发挥到最好，因为他最懂得一方之土，而他也有意愿为珍视、肯定他努力的友谊，种出友善的礼物。

鼓励有机的纽带最好的动力就是友善购买。真正的喜爱，是会让人激发正向的力量。由消费者打心底真正地喜爱农家的农产，其实也稳固了自己的安全饮食与稳固的食粮来源。农家也可能因为这种喜爱，更能肯定务农的价值，间接鼓励更多朋友投入务农的未来。责任种植将鼓励农家对于农产的研究心与持续力，同时提供农村自尊自重的一种机制，相对来说，对土地、对消费者都是最大的保障。

（原文发表于台湾《农训月刊》2010年元月号，有删节。）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作为一个想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一个集体主义者、一个节约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精神要像火一样感染着周围的人，他的生活像怒放的花朵一样多彩绚烂。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答案。

皮亚明 / 人才计划三期学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参加人才计划是改变我生命的事情，在这里我发现以前自己做梦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真实地实践了。我分明感受到我的理想在逐步的探索之中，我感受到了进步和成长。

张 斌 / 人才计划三期学员

返乡媳妇

编者的话 相比较沉默寡言的北方汉子波仔和客家男人正扬，两个性格爽直的返乡媳妇阿兰妹和英子明显更快地进入了“对话”的氛围。在返乡青年工作坊上，两人一见如故，走进彼此同样丰富绚烂而又五味杂陈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因境遇相近而惺惺相惜。一周之后，借着这难得的缘分和契机，阿兰妹终于踏上波仔和英子一家的土地——河北正定南楼。

至今依然记得，我们去看英子经数年努力终于搭建起的农家女书社时的“惊艳”：在这灰蒙蒙尘土纷飞、被一家家线条硬直、毫无美感的灰色院落切割的北方村庄，它就如同蓦然撞入眼帘的童话：青石板的院落，一侧是拱形顶的剧场舞台，图书室就占据了这村落间最绚烂的院子的一角，小小而朴素的两间房，纱门是蓝色和粉色的，绿树红花点缀。同样生动活泼的是被英子辛苦说服来做图书室志愿者的乡村年轻媳妇们，明媚大方，充满朝气。

而这童话的创造者英子，被黑色衣裳包裹得一身瘦削，低调沉静，却又与众不同地凸显着坚持甚至执拗。回台湾之后，阿兰妹写下南楼行记，并开始了和英子的鸿雁传书——

①外来的萝卜两样情

文/阿兰妹

踏上往南楼村的路，有周衍一道，还有嫁入南楼这位纤细的南方女子：英子。

知道英子已是数年前。她的夫婿永波到广州番禺参加社区伙伴的乡村建设工作坊，在会场上，我与夫婿正扬同时认识了这位从西南农大毕业却返回冀南平原、与家人种植小麦花生的年轻小伙子。永波当时就说：阿兰妹，下回带英子给你认识认识，她也跟你一样，是嫁到农村里的“外来萝卜”呢！

（一）

“萝卜”是我们这群由社区伙伴牵线促成的社区NGO青年工作者彼此的昵称。我们说，“萝卜”在村子里要能待得下去，就要有好的“坑”（工作位置、社会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没坑就挖坑，没萝卜就找萝卜。有时候，想要待下去的萝卜得有自己的挖坑能力——英子的夫婿、我的夫婿，都是返乡自己挖出坑来的“萝卜”。相对来说，英子和我就是“外来的萝卜”，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不一样的客观与主观因素下，飘荡而后定着，且有着类似的迷惘。

面对迷惘，英子的性格显得更为阳刚。她选择呐喊，以及某种带着棱角的顶撞。只是，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却怎么都不相信，这个身着盛装袍服的女子，就是那个丢下城市工作只为将脚扎进泥土如辣椒般的英子。

与英子的见面是在今年（2010年）五月份社区伙伴在安徽的返乡青年工作坊。承蒙当地返乡青年杨云标的安排，我们大伙儿相聚在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自立造屋而起的二楼半木造房舍，白天聊天，晚上裹着村里大叔大婶借来的被枕，一夜安眠。第二天清晨，当我在及腰的小麦田旁排队等着刷牙洗脸时，看到了永波口中那永远的新娘：英子。

英子穿着黑绒色连身裙装，她带着点倦容，回复着我对她首次招呼“啊，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每次想到人终有一死，虽没想明白为什么选择去背负那些责任，但我仍愿意那样去选择。

曾利华 / 人才计划三期学员

好漂亮的衣服”说：“昨天我们南楼村的女书社才刚揭牌，就忙着过来了。衣服也没换。”我笑着说，不换好，这样我们都可以欣赏到英子不同于农妇的另一面呢。

周衍将我与英子以及另一位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小成安排在一个环节，叫“返乡媳妇之实话实说”，让我们三个轮流针对同样的问题，说说我们的处境。英子的性格相较于小成的随性显得更犀利，而且真的实话实说，让我们常常在英子回答提问的同时，忍不住把眼神瞄过去看了看坐在“观众席”里她的另一半永波的表情。



去河北南楼之前，阿兰妹（左二）、英子（右二）在北京拜访生态农场。

有意思的是，我感觉永波就是能沉醉在如此犀利的英子话语底下，一点也不受到我们担心他是否会觉得窘迫的影响。英子说她那不安的灵魂想往泥土里扎下，当时还是网友的永波就回了个信说：我愿意当你的双脚，帮你（带你）扎进泥土。

就这样，英子接受了永波“要不要先到南楼乡下试着干半年农活儿”的建议，提着行李就这么地（我听起来像是私奔）去了南楼。半年后，成为扎下根的“外来萝卜”。

但我仍旧对于她所真实生活的南楼充满好奇。一个南方的女子，从城市如何来到农村生活？她口中所说的那些冲突，包括农作的、性格的，是在什么样的乡里与社会结构中所生出？英子有没有自己的“支持体系”？

（二）

从石家庄北站下车，搭市区公车到石家庄站，再搭长途客运班车往正定县城，永波帮我们叫了一辆小箱型车接我们到南楼。抵达村子口时已经是夜幕低垂八时许。

北方初春的凉意袭来，大家就在村口的烧烤摊吃着羊肉串，喝着生啤酒，英子则让奇奇靠在身上，但还是满脸笑意地跟着我们喝下好几大杯。“呵，酒量好！”我借着微醺，邀周衍一块怂恿着永波去敬英子。英子曾说永波对于她穿着长裙就到安徽参加工作坊“颇有微词”，其实我曾偷偷问永波这件事，永波跟我说的是：“她穿这么漂亮，给谁看啊！”原来，是醋坛子打翻了。呵！永波，你该老实告诉英子的。英子这么直接的人，你可以很大方地说出你真的是在乎她的。

英子其实应该也知道，但是太多在农家里现实的生活压力让她与永波总是处在一种相当的张力中。英子带着已经沉沉睡去的小孩先离开烧烤摊，周衍与我随后就跟上永波的脚步转了好几个弯，走入胡同内的王宅：一处小小的四合院。

(三)

翌日，英子一早就在厨房里忙。我跟周衍在井边帮忙洗菜挑菜。英子的公婆准备捆着白菜到市集上去卖。英子没跟着去市集，她有她得做的事。

我把洗好的菜拿去厨房给英子。这个小室仅一盏可能仅有40W的灯泡从梁上悬下，五斗米柜在昏暗的空间里显得模糊不清。厨具就是一台电磁炉，英子正在准备用这个电磁炉“炒”韭菜蛋。我探着头问英子：“这么暗看得到盐巴放了多少吗？”她说：“习惯了。”苦笑了一下。我说：“要不换个较亮的灯泡？”英子这回没有应话，沉默了一会儿。

“其实，我很不喜欢做饭。”英子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她跟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她宁愿去干地里的活儿，也不想留在家里做饭。“我不喜欢油腻腻的感觉。”英子的话勾起我再仔细端详了这个做饭的空间，在暗处里做饭，冷冷清清地更使人孤独。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家庭价值与餐桌构成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环节。但是其实在农村（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客家地区），女性忙田里又要忙家里，厨房一向像是个战场，也是妯娌争吵的地方，要有个“优雅”的厨房，其实是很中产的期待。

英子不否认，自己血液里那点中产的期待，这在她坦白到不行的部落格（博客）里看得很清楚。我也一样，一点也不否认自己根本还是个城市的小孩，常常需要去城市“补充”血液里需要的城市感。我在城市长大、求学，一直到读完硕士研究生，才开始在意识中出现明显的农村向往。然而，曾经体会到城市那种极度迅速却充满竞争、刺激、鼓励人超越自我等的力量，已经练就了一身诡异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一旦进入强调家族共同体、村落集体主义的农村社会，就会变得格格不入。融入的话，自我就会窒息，跳出来的话，那种想要跟土地对话的自我实践又会落空。

英子与我可能都是在这样的摆荡中挣扎着。

英子带我们去看了女书社，她现在身担南楼“农家女书社”的经营者工作。女书社借用以前的活动中心闲置空间征集募来近千本的图书。已有一二十位村子

里的女性参与完成书目编码，而且开放借阅。这些女书社的成员每个周末都要全员到齐服务，其余时间则以排班为主。

她一面是个农家媳妇，得帮着家里干活，另一方面又组织了一群村里的妇女，开始知识下乡的尝试。家里的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这么有才情的“外来萝卜”呢？

“其实，他们都不太喜欢我做这（女书社）的工作，”英子说，“但我也不是不喜欢去田里，不是因为不喜欢干活，而是因为现在干活都是‘帮他们种’，家里的人（主要是永波）都不喜欢也不接受我的意见。”英子说她曾经就种类、数量、时间等提出她的看法，但永波就是觉得英子没有他懂。所以英子总是觉得在种地这件事情上，她永远只是被动地配合，为此她帮家里种地的无偿劳动使得她没有自己经济上的自主，而种地也没有任何成就感。

我在回程的笔记上写下这句话：“英子希望自己有一块小田，种植茴香，但波仔认为英子不懂田里的事，因此一直都只要英子‘协助’就好。这使得渴望自主性以及希望能有自己经济来源的英子总处在非常沮丧与焦虑的状态之中。英子因此情绪起伏很大，不知不觉便常与家里处在冲突的边缘。”

（四）

从田里骑着单车回南楼村。一路上都是被冷冬冻坏的小麦田。我在后面拍照，英子与周衍则骑在前头，我顺势把相机调成录像模式，录下了她们两位年轻女性在田间骑单车的背影。我在看着英子，是不是在我的背后，也有人分析我像我分析着英子那样呢？

我与婆婆甚少冲突，应该说相对于许多婚前即“声明”不与公婆同住的媳妇来说，婆婆与我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即便如此，我至今仍有很大的适应困难。其实重点并不单纯在于城市女性对于农村的不适应，而是我们的身份变成“媳妇”这个角色。未婚女性在农村里工作跟嫁入农村成为当地媳妇，被社会给予不同的期待以及要求。英子与我都是在

这样的要求下，开始觉得身体里的“个人主义”或属于个人的才华，与农村里的某些期待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撕裂着自我。而那一种无形的、来自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同时建构着她以及我的夫婿，男性一旦回到农村（自己的家）就自然而然必须表现出农村里男人该有的样子。而那个“样子”或那种态度，在过去半世纪正是女性主义者大加挞伐的东西。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充其量我觉得自己支持性别解放。我认为女性在追求解放的同时，也要让男性解放——从“传统”的责任中解放。不过，双重解放的结果很明显地就是农村既有结构的瓦解。我们追求现代彼此解放，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时又在做“瓦解农村”的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才是真正拉扯与痛苦之处。

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说，返乡青年绝对不是也不该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必须带着一种纠结的心情去面对，然后充满疑惑、愧疚、挣扎地在这里扎根。这与下乡服务或单纯地住在乡村但收入其实是依附城市经济的人绝对不同。

英子也许还会有一段浮沉。我也是。但未来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很认真地赤裸地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段幸福时光——世界上有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从没有机会认识自己呢。

②阿兰妹给英子的信（节选）

英子：

今天是我们美浓这边的端午节（我们习惯称为“五月节”）。在这一天的一大早，依俗家里要拜祖先。通常，准备祭祀用的牲礼颇为复杂，尤其是生鲜的猪肉以及全鸡，得前些日子就到墟场上预订好。鱼的部分可以用干燥鱿鱼代替，而其他素果、鲜花、金香纸烛之类的，就在平日稍做准备即可。

从城市嫁到传统的农村里，我意识上很清楚这该是媳妇要学着点做的事。长久以来，这也一直是我极度焦虑的部分。我从小就被父母宠坏了，这些该有的仪俗其实都没有学到。

在安徽阜阳工作坊的时候，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当初要嫁入农村做客家媳妇时，我这个闽南人还真的担心会被定位为“懒惰的人”。文化是很奇妙的东西，它是一套体系，在我们的身上作用着我们，但我们却不一定看得到、意识得到“它”的存在。

我还记得5月25日，你带着儿子奇奇，背着旅行包，跟着大伙儿去访问北京小毛驴生态农场。前一晚你才风尘仆仆地从阜阳搭火车回石家庄并接待了一批朋友，而这一早又在梁漱溟乡建中心外路口见到了你。熟悉你的人跟我说，这几年你是越来越黑瘦，神情也常显落寞。但我见你在“小毛驴”时兴致盎然地询问了许多种植的技术，我觉得你眼睛在发亮。那一天你在“小毛驴”自我介绍时，我偷偷地记了下来，我在想的是，住在农家里，英子如何同时扮演媳妇、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英子，我们都一样，会利用部落格来抒发心情调整状态。但你性子更真更烈，我常语带保留的事，你更勇于披露所承受的不平等与委屈。我会继续看你的部落格，希望我们的陪伴能让你有更多的支持。

阿兰妹@台湾美浓

2010年6月16日

英子：

我是阿兰妹。我现在正在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的招待所内，下午刚拜访过嘉应客家学院院长，告知接下来的田野调查行程，之后就要开始我在这儿的短期田野调查。我一面整理着这两天的所见所闻，一面也转换脑袋，毕竟学术生涯与农村媳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

这种身份与角色的“游移”，我记得和周衍也谈过几回。有时候，刚从大学课堂兼课回家，马上把书本教材放在客厅一角，卷起衣袖就得进厨房，要不就是面对被小朋友弄乱的客厅，提起垃圾桶弯腰整理。家务对我来说，有时是劳动的一种，但有时却让人不耐，尤其是当我需要一个人的空间与时间书写的时候。城市人的习性，大概真的有时会跟美浓格格不入。就像是我喜欢公共空间的整洁，

但农家必定是靴筒沾满泥巴、后院布满鸭屎，而置物间则永远堆满零散农具或五金。我并不想摆着读书人的高姿态，但是，有时候就会想静一静。

我真的很幸运，我的夫家提供了我这样都市来的媳妇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与时间。我拥有自己的书房（即便根本算是“圈地为王”的过程），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乱、可以思考、可以躲起来掉眼泪。我捍卫自己在这个空间里的主权。

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这或许真有点幸运：我嫁到一个重视读书的文化家庭里。其实，我婆婆仅读过几年小学，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帮农，直到出嫁后至今仍然是专业农民。但婆婆她承袭着客家女性的思维，认定“耕读传家”缺一不可，家里有人种地就有得吃，有人读书看得懂字有文化就不会被欺负。

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农家媳妇，因为婆婆并不要求我实际下去务农（她的话是说：能读书的人就应该去读书）。相对而言，英子，你的处境可能更为难了些。因为你想要专心做文化的工作（女书社），但家里的人还是要你去帮忙种地，这真的是难为了一个具有纤细心灵的女子。

角色的游移有时候并不成功，在转换的过程里会充满情绪。英子选择远走他方，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选择窝在书房。也许，英子真的需要自己的小空间，一个小仓库、一块小地都行。

祝福我们彼此！

阿兰妹@广东梅州

2010年6月23日

③英子的近况——博客

编者的话 然而，阿兰妹却迟迟没有收到英子的回信。

祝福英子能够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的阿兰妹没有想到，当时的英子，甚至连待在村里安心耕作并经营“农家女书社”的空间都没有了。

2010年6月，英子再度面临返乡道路上的一次严重转折——因为家里的压力以及生计上的考虑，不得不去县城里的饮食连锁店工作。于是，英子甚至很少有时

间和渠道上网收阿兰妹的电邮。面临现实和梦想间巨大的张力以及内心的挣扎，英子关闭了和外界几乎所有伙伴的联系，她说“我必须斩断过去所有的一切才能继续现在的生活”。

两篇短短的博客，呈现英子当时的心情缩影——

■ 给自己的信 2010年8月9日

忽然想写一封信给自己：

亲爱的英子：

背弃自己理想的人，永远不可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活着，只是种磨难。

你可以忘记自己是谁，你也可以忘记曾经肩扛的责任与义务，为了尘世的承诺，你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鬼，所以上帝对你的诅咒和惩罚，永远没有尽头。

忘我的工作，自虐式的作息时间，归根到底仍是懦夫式的逃避行为，在婚姻与家庭中，你始终是千年前的小媳妇，老祖宗的遗言真的比化石更可怖。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记恨任何人任何事，如果不是你自己允许的，又有谁能够伤害你？！

善待，善待。善待！善待所有的一切特别是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再珍惜自己，谁又会真正地怜惜你？！

过去，过去。过去！让一切都成为过去，只有自己在内心深处真诚地说声“PASS”，所有的恩怨是非才能在之后真正地离去。

英子，孤独是生命的本色，你一直都知道的，所以请你不要再自暴自弃，不要再郁郁寡欢，重新振作起来，找回曾经的自我吧，英子。

如果你想哭，就大声地哭出来，黑夜宽大的怀抱会温暖并抚慰你孤苦的灵魂，但是，天亮之前，一定要把眼泪抹干，让笑容灿烂。

英子，照顾好自己，我会再回来看你的，你一定要好好的。

爱你的灵魂

■ 什么是快乐 2010年8月11日

被迫离开农村与被迫进入城市，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与决绝的逃离，也更让我看清了农村的没落与软弱、贫穷与无助，当资本进入农村，就像台风扫过，永远的强势甚至不需要对手。

喜欢农村是种天性，厌烦城市是种意念。回归农村，是灵魂的一种洗礼，是生命的怒放与自由；而挤进城市，则像被捆绑的粽子，只能任人啃噬。

我亲爱的老公为了不再让我受苦受累，毅然决然地将我退还给了城市，让我去过一种与我骨子里的情趣相符的小资生活。也许我应该感谢他的体贴，他的真心真意，可是我却一直纠缠在流逝六年的青春里面，满怀哀怨。

世俗中人，用尽一生的时间去追逐物质财富购买快乐，殊不知，快乐是存于心的精灵。

最近我常常在想“吃喝玩乐”这几字的进阶意义，终于开悟生存的本质或本源最终仍需归结到“乐”之上，所以如果我不想再侮辱自己的智慧，就应该斩断过去的一切，珍惜现在的拥有，并且赋予生命新的使命与意义，如果这两样东西真的对我如此重要的话。

我想要振作起来，尽管我仍不能理解今日的行为和决定会为以后的命运埋下怎样的伏笔，但是，只要我活着，就不能活得不明不白。

所以我对自已承诺：忘掉所有的恩怨，掌握管理之精髓，打造一支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团队，用我独有的热情去温暖和照亮身边人的前程。

留言人：波 仔

看了你写的文章，我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我知道离开农村的这一个多月以来你看似平静，实际内心对我充满了怨恨。面对你的哀怨，我选择了沉默。忍痛割爱地逼你离开，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次痛苦的抉择！原以为我们能够互勉互励地在农村创出一条路来，没想到几年下来，我们两个人却是伤痕累累，不是农

村没有空间，而是我们彼此都太有棱角了，我们都需要一个痛苦的蜕变。这些天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变化，我为你高兴，虽然你现在还很不习惯这种变化。你很有才，你一定有能力让自己升华，我坚信你，支持你。

编者的话 从英子 的博客，看到命运的一波三折和变动不居。

虽然两三个月之后，英子又毅然在波仔的支持下，辞掉县城的工作回到乡村，重新投入农作家事以及她日夜牵挂的农家女书社，但是这一段对英子和她的朋友而言“惊涛骇浪”般的“变奏”，却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这些逆流而上的返乡青年，不得不一再面对他们无法预知也难以把握的无常、转折和变故。这是返乡人面临的普遍困境：因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天灾而无法自我掌控的生计，以及来自父母和社区的种种不理解和压力，而前者又加剧了后者。于是在一次次执拗的坚持之后，只有更深的心痛：离开人们眼中的繁华都市，已经在父母内心留下太多创痛和失望，如果再不能稍微减缓家庭的生计压力，只会更加愧疚。

这样的冲突是惨烈的，一边是内心朦胧的却渴望坚守的信念，另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爱情。

关于这一点，时常被长辈哀求“返回城市”不要待在没出息的乡下的阿兰妹和正扬，也有相似的痛，只不过，城乡差距相对严重的中国大陆，问题更为凸显。那么，在中国大陆是否有些返乡青年能冲破这一困境，走出自己独有的路呢？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你选择了，并不代表你有着多么高尚的道德，你选择了为理想奋斗，也像你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一样，必须要认真地把事情做好。

卢 欢 / 人才计划三期学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大家都是年轻人，刚入社会，经验不多，在承担事情的同时，慢慢有了进步和成长。这样的成长也许是愉快的、分享的，更多的可能是沉重的，含着泪水和汗水。

张 可 / 人才计划四期学员

“土地禅”：安金磊的另类探索

编者的话

“对话”蛮像是谈恋爱的过程。在这方面，波仔夫妇和正扬夫妇的“对话”，总让我们感觉是天作之合。无论相似还是相异之处，在互相的碰撞交流和彼此支持中，都能撞击出诸多反思和再度向前的动力。

然而，“对话”和谈恋爱又不同。谈恋爱和介绍对象必须是一对一，如果是“多角”那麻烦就大了，而给波仔夫妇找对话伙伴的时候，我们却越来越觉得该“多多益善”。毕竟，不同视角和背景的刺激和启发，对正在艰难跋涉和锐意探索的波仔夫妇而言，非常必要，而且，台湾的正扬和阿兰妹毕竟距离太遥远，台湾和大陆的情况也因为背景的差异，有很多无法借鉴的地方。

因此，如何推动大陆本土的返乡青年或伙伴之间的多方交流，也成为我们尝试的方向。

2008年12月，我带着两位对返乡青年有浓厚兴趣、也对农村工作有实践经验的年轻人何志雄和李大君，去了河北正定南楼的波仔家走访。我们希望带着波仔夫妇去同处河北的衡水县走一走，那里有另外一对为波仔夫妇相中的对话伙伴——已返乡农耕近十年的安金磊夫妇。

①一个“罨种”的7年

文/《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

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棉花的神话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



安金磊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在你最不能承受住的时候坚持下来了，就说明你挺过了你内心里的惰性。

经 杰 / 人才计划四期学员

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棉花的。今年，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定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了土地上。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刺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也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瓢，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

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一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磕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骡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有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做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

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刺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

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久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吃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拍翅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天涯社区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记者手记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对于农民个人来说，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但调研证实：国家为此支付的巨额财政收入，只能有15%落入农民的腰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对土地、对环境、对生态的特殊责任，比起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实在是一种苛求。多少年来，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这对一般农民来说，太长太长了。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以前有过很多，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但对砍树的人来说，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卖了钱落袋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况且是成是败，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完全就是苦行僧嘛。这样说的人，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就算他无以为继，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

（原文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6月21日）

②到田里来：波仔与安金磊夫妇的对话

编者的话 如果说波仔近似于将社区和家庭的期待和压力都扛在肩上，在土地上展开一场负重阵地战、一种与现实的“肉搏”，那么，安金磊夫妇的探索则更近似于与土地之间温和而纯粹的“哲学对话”——一种“土地禅”以及对人之终极生存处境及信仰的追问。

2008年12月，三位走访波仔家的乡建伙伴——我、李大君和何志雄，与波仔一家，以及一位有意与波仔共同探索乡建的多年好友海斌，一起前往河北衡水枣强东紫龙村安大哥家。波仔和安大哥夫妇，有了第一次接触。

事后回想，因为我时间安排的不周，这是一次过于匆促的走访，对长期频繁地接待陌生匆匆来客的安大哥而言，半天的走访很难建立一种可以沉淀下去的、彼此信任的交流方式。对土地上耕耘的人而言，访点更应该是把泥土也邀请进来的对话：数天默默的共同劳作，静静聆听自然的声音，并且彼此之间缓慢而耐心地倾听，共同生活作息，才真正可以彼此懂得和产生“在地感”。

再加上，当时双方处在完全不同的状态，安大哥家正在顺应天时的“冬藏”和内敛阶段，而波仔和我们却是激昂也不乏焦虑地试图寻找一种“出路”和办法，这也让彼此的探讨急促而难有从容的共振。

但回头看，对于执著探索的这些伙伴们，不同理念和视角的碰撞，无论多么匆忙甚至不舒服，或早或晚，总会催生出新的启发和反思。

自给自足的种植

安金磊妻：我们这点东西，少，一般都是有朋友要就给了，也不去市场上卖。

波 仔：现在都卖完了吗？

安金磊妻：还没有啊，都还堆在家里呢。我们冬天没事，就在家挑选，把不好的挑出来。

波 仔：种谷子有一点麻烦，就是鸟吃得多。

安金磊妻：其实我们也愿意喂鸟、供养鸟，麻雀吃剩下的，我们就收。而且麻雀来了，它不只是吃小米，它主要还吃虫子。所以说不用怎么去管它。

海 斌：你们棉花虫子多么？

安金磊妻：没什么虫子，我们棉花一次药都不打……我们种地不是为了要求产量，缺些苗也不在乎，反正就是一种探索，太耗地力了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你要追求一个产量的话，用肥啊，太多地去干预它也不好。看它长多少就是多少。

海 斌：你们不去推向市场，那自己吃能吃多少啊？

安金磊妻：市场啊，我们走不向市场……我们以后还种一些果树、药材一类的东西，主要就是自给自足，不去想别的什么。

波 仔：就你跟安大哥两个人干吗？

安金磊妻：今年北京的一个朋友就经常在这里，他辞掉工作在这。

周 衍：原来好像还有几个？

安金磊妻：是有几个，但是一下子过不来。他们一段一段地在这里。

跟从内心的方向

安金磊妻：我们尽可能地不用机械，基本上就是用人工或者牲畜。

英 子：这其实是已经回归自然了。

波 仔：也不讲究什么效率是吧？就这样吃了饭就上地里，觉得干得有兴致呢就多干会儿，也不考虑能够产多少？

安金磊妻：是，吃饭确实没有准确时间。但从早到晚的，还是很忙。忙的时候还是要抓紧时间。

波 仔：就像我今年，种萝卜，来不及了，这边地膜花生要收，然后今年雨水确实大。那边萝卜苗子还没有见呢，但是那草就疯长了。

安金磊妻：是，你那个面积太大了，三百亩！就我们这四十亩，还忙不过来。你那面积太大，如果请人工的话是不太合算的。

波 仔：对，那肯定是不合算的。这就得用药。

安金磊妻：即使用药，我觉得你那三百亩最后也没什么剩余吧。用药太贵了啊，而且三百亩用药的话也管不过来，所以必须要请工人，另外还加你每亩承包费就是三百。

安金磊（刚刚从外面回来）：有多少人报名去你那里种田啊？永波。

波 仔：给我报名？我昨天鼓动李大君去，但现在大君还没表态呢。大君老家也是河北的，过两年也想回自己家务农。

安金磊妻：做农民就是最自由的。

李大君：主要是家里父母给压力，父母不想我回家。

周 衍：对对。父母接受不了。像永波在家里也是，压力其实还是有的。我们去，他爸妈还念叨了半天……

安金磊：其实不是这么去想的。要去想你最初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供养天地呢，还是为了一个市场的目的去做？或者是为了实现人生的所谓价值？再或者，是为了给老百姓探索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路子？这四个方面你先考虑，然后你再去做。哪怕你就是去做一个小农也没人能说你是失败的，因为你是跟从内

心的方向去做的。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一下子跳楼了，你说他成功还是不成功呢？所以说，内心的成败也是对人生的领悟的程度。所以说，你这三百亩地，如果你能照顾得了田里那么多生命系统的话，那你就去做。如果单纯关注市场这块，那么那些经济投入啊高产要求啊都把你给压住了。那就不是你最初想要的目的了吧？你返乡是不是因为你上大学时就想回来了？

波 仔：昨天还跟大君说呢，我上学时就决定了我肯定是要回来的，然后先在山东寿光待了一年。

安金磊：你的初衷跟现在相比有变化吗？

波 仔：有啊，但在农村发展的决心没变。我回来先是弄了一个大棚，做了两年，然后又搞了一农资店。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有机会租这个土地，合作社也做。

安金磊：你其实挺厉害的。

波 仔：做的事情是挺杂的，但就是没有立起来。开始是围绕这个商业寻找出路，其实有点被困住了。越是围绕它在转，越是达不到效果。

安金磊：哦，你还预测市场？

波 仔：是的，不是像你这样，你每年都是收多少就多少，没有市场的期望。你不用考虑产量市场价格，我得考虑。而且我的销路都是走普通的市场，走批发。但是，也一般跟着大环境，跟着大浪，还是避不开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困局。在梁漱溟乡建中心的时候，他们都在传阅你的文章。这一次，正好来拜访你，我今年特别需要交流反思。

安金磊：嗯，周衍也是说了好几次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我想我目前的情况很难帮得上你。自己的路，终究还得自己定下方向。

“走到田里来”

波 仔：我现在基本上思路还是走商业化的。主要是这个市场怎么去卖。

安金磊：你用化肥吗？



安金磊取出蒲公英种子，身后为安金磊的妻子。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成人达己，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应当是人生最有意义的奋斗方式。

徐文财 / 人才计划五期学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在每一个点，我总会遇到一些人、一本书、一些事，让自己感动，去敦促自己反思，感悟责任。画圈的过程，原是青年人生命力的释放！

李翰昭 / 人才计划五期学员

波仔：嗯，用肥是用的，用药这块就很少的。打算今后走社区支持农业这块。比如面粉，以前是用的化肥，今年什么都没有用，亩产量有八百多斤，简单地加工，申请了商标，也是熟人推荐，质量确实挺好。有一个单位的人要，他们相互传啊，我就给他们。

安金磊：多少钱一斤？

波仔：两块。但是一亩地的成本（不算人工）呢，就是130块钱了。因为要专门去送，他们一开始说要五十斤，但你得送过来……

安金磊：那你说不可能，价钱，必须要考虑资源成本。你说你开车那个造成的资源成本多大啊，还有环境成本。你开车来相当于往植物上喷汽油，和喷农药

有什么差别呢？你怎么看这个化学农药？是不是觉得很不好弄？你的趋向是不是想上有机肥，还是走化学的路子？

波 仔：我是想上有机肥的，但还是走商业思路。我想的是，如果取代的话，我把它做安全了，价格上能够提高的话，我肯定要去这一块。这一年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是一个契机。我希望告诉消费者，按照我这种思路种出来是健康的，我是想推动这个过程。今后可能我不一定都亲自去种吧，我可以指导农户按照这种思路种出来，要比市场上的安全啊。我想推动的就是这个。

安金磊：你的思路其实很好，带动老百姓，其实你在往上走，在推动改变，像志雄他们，梁漱溟他们的思路，也是儒家的，以儒治世。像老百姓为什么要种大棚？是为了挣钱，你再往上想想：挣钱干什么，为了孩子上学和让老人养病？养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好好活着。但现在种大棚化肥农药的方法，行吗？

你别急着做那么多事，你有一个过程。我在农大的时候，跟那些大学生说话，很多大学生觉得上大学就是跳出中国农村了，可能上了大学留在城里的机会多了吧。但我觉得其实是进了油锅，也面临一种煎熬啊。你要走到田园里来。所有的白领，所有的有头脑的人，都要走到田里来，回到田园。今天来讲，城市和农村仍然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说回到农村，不是回到那种破败的农村，而是那种像老子所说的人应该在里面活得有五行五气的那个田园。这种农村现在没有，它不会马上有，但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做，它虽然不是一代人就能够成功的，但是需要有基石啊，可能你是在为大楼挖地基，别人都没看到，你把地基挖好了，第二代人才能够垒砖，大楼才能在地面上起来。这是一个过程。

波 仔：我自己很庆幸，2004年回家的时候，很多家人都反对，但是我回来了。农村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家人担心干了几年的意识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唉，当时我也担心这一点，后来的几年我接触很多朋友，我庆幸自己的脑子没有停留在那块。自己一直能够保持一种心态跟大伙交流，大伙也在帮我，让我以一种开阔的心态看事情做事情。

安金磊：其实你现在相当于大赚特赚了。很多人即使赚钱了，但是他思想就没你这么有收获。我看了很多的，这个那个做得很大，后来都迷失在里面出不来。因为他越往上面走，就越封闭了。

波 仔：我当时看到那些练功的，就说人不一定要去寺院里去之类的，但人必须要有佛心。

安金磊：上寺院的人第一节课就是问，你觉得这是寺院吗？如果你说是，那你就回去，走。

何志雄（接着往下说这个故事）：当另外一个人来，也问这是寺院吗？他说这是圣地，你也回去。问第三个人，你觉得这是寺院吗？他是一个农夫，他就回答说，我就是来找一个能够用心砍柴的地方，方丈就说，好，那你过来吧。

安金磊：很多人觉得寺院那是圣地，到了那里，什么都收敛了，言行举止、心态仪表、思路、妄想等等。但是他一回来就马上回到世俗。人为什么要在一起，有一个集体？有些朋友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人在生活，其实不是，田里有千万个生命在跟我一起。我特别强调感应这个。我交心的朋友不多，一共才十三位。一起种田的时候，他们举手投足，能够感应天地之气，能够感应所有田里的生命。然后对植物啊，触摸或者靠近啊，那时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读过老子的，就这种感觉，你有求就会有所应，像高老师来这里种地，说话都少，都是心灵去感应……

周 衍：安大哥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你原来有想过做合作社吗？或者说你是不是原来想过把村民也调动起来后来又觉得不太可行？

安金磊：我一直没有弄那个合作社……我就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走到一起的。当前的这种工农对立的、所谓的二元的现状是非常不稳定的。但是我没那个灵感，真的是。不过合作确实是需要的。我跟老百姓也说，你们一起买生产资料不是省钱吗？

波 仔：周围的农民有多少跟你这样想的？

安金磊：比较少，但还是有。这边人均土地比较多，可以获利较多。一个人平均四亩多地，一家二十多亩地，可以从地里得到不少的收益。他们主要也是为

了赚钱，这是现实的，现在是消费时代，他们要盖房子啊……

编者的话 确实，第一次对话，就可以看出安大哥和波仔所选择的返乡路有不少差异。浅层次上，似乎是家庭父母压力以及如何面对社区乡亲的问题，但深层次上，更有定位和方向上的不同。

安大哥的佛家信仰，使他坚定地探索自己的“土地禅”；而波仔虽然将农庄梦看做从小的梦想，同样有浓浓的对土地的情感和农耕的兴趣，但他的方向依然在等待沉淀和明晰，目前的他，当面对父母妻儿以及村庄的压力时，依然有太多的困惑和挣扎。

我们也曾经为此焦虑莫名——因这些对话和访点似乎并没有给波仔的处境带来任何明显的改善。然而，回头再想，或许这注定是一段漫长的路，只能由波仔自己的双脚走出来，而这些对话，至少是一段真挚的注视和伙伴间遥远的彼此守望，能激起一丝理解以及陪伴的暖意，已经不错。

何况，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在感受、体悟和学习，体会彼此短暂“交会间互放的光亮”，不只是波仔、英子甚至安大哥，更包括我们这些走访者和表面的“旁观者”，我们也在这个过程被启发被震动，并自内心开始反思和变化。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我们是有自我价值的，关键看你怎么去实现，抱着哪种心态，要想做好一件事应该积极积极再积极吧。

朱春花 / 人才计划五期学员

——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

有些路不好走，可能得不到某些享受，可是只要忠于自己心中的那份真，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王文涛 / 人才计划六期学员

后记：返乡青年工作坊

随着认识更多的返乡青年，以及了解上的加深，我们设想，不只是推动一对一的对话，而是让天南地北的返乡青年伙伴们有机会聚在一起。

之前社区伙伴已经做过一次“无心插柳”的探索。2008年初的广东番禺，以社区伙伴发起的乡村建设工作坊/交流会作为初步平台，一部分“返乡青年”开始碰头，并和其他共同关注乡建的伙伴初步形成一个“返乡”的小小网络和松散群体，部分等待共同探索的主题也初见端倪。返乡青年们开始意识到因为彼此的存在，自己不再那般孤独，在广袤土地上的某些角落，已有同路人，在做着相近的探索。

然而，那次聚会毕竟不是以返乡青年为主题，后来的几年，也没有足够的跟进，使得对返乡青年议题的探索依然只以零散个案的形式存在，缺乏可持续的建设性的支持网络。绝大部分时间，返乡青年依然孤独地守护于自己的村庄。于是我们开始设想，如果有个返乡青年工作坊能让返乡人真正走在一起，集中交流返乡的感受和经验，思考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浪潮，彼此扶持展望未来，岂不是很有意义的事？

经过半年的筹备和努力，社区伙伴支持的第一个返乡青年工作坊成为现实：十余位来自不同省份的返乡青年以及十余位在农村社区进行乡建探索的年轻伙伴们，在2010年5月下旬共聚安徽南塘。

波仔终于有机会来到向往已久的南塘——这个在合作社探索中名震全国的地方。正是农忙，波仔没日没夜忙完地里的活就拉着英子直奔火车站，在火车、汽车和小旅店间奔波颠簸几十个小时之后，才在工作坊正式开始的那个清晨赶到。也正是这一次，波仔才知道，在实习生项目中，除了“人才计划”的老同学河南

青年黄传进，还有从CSA实习生项目中走出来的小伟和王宁，也回到河南开展了开拓性的返乡探索：小伟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十几年的积蓄租赁300亩地，与一群朋友一起探索关注生态的共生农场模式；王宁则通过当村官，尝试将乡村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和生态农业相结合。而从成都赶来的高大哥，则专注于家庭式生态农业以及社区支持农业的探索……

此次聚会的主题是返乡青年之间的人生故事分享，土地上的经历感悟的交流，以及伙伴友谊和网络的建立。聚会的地点也不是常规的宾馆和培训中心，而是真正的返乡青年的阵地，与会者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返乡青年的情景和生活——白天的活动就在南塘合作社生态简易小楼的一楼，和满屋的农具、种子、化肥一起开会；开饭了，椅子桌子一拉开，再摆成几个圆，就是大伙儿的饭堂，合作社的大婶大叔从隔壁小伙房端出热腾腾的农家饭菜；晚上，大家统一睡在合作社二三楼的会议室和接待室，从老乡家里抱来的褥子棉被打成地铺。女生三四个人一个小房间，男生则是通铺。因为是低成本的生态建筑，层与层、房间与房间之间都没有密封，不可能隔音，于是晚上各个房间的“小会”成了大会，不但有很多只竖起来的“不速之耳”，甚至有谁想“非礼勿听”都不成。

对彼此生命故事的倾听，也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分享友情、亲情和爱情，了解返乡夫妇的相濡以沫，分享对于另一半的理解，对各自理想的珍视和扶持，对父母的歉疚和烦恼，对乡间事的无奈和偶尔的愤怒……

南塘工作坊是一次总结，更是新的起点。

波仔英子夫妇、正扬阿兰妹夫妇、安金磊夫妇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接触到的数十位返乡青年以及关注返乡的伙伴们，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看到返乡的艰辛和长期性。

这个部分的文章，尤其是英子的博客和阿兰妹的文字，虽然不乏优美和童话般的想象，但更让我们看到：返乡绝不是浪漫的，甚至不乏撕心裂肺的挣扎；挣扎之后也未必是柳暗花明，反而可能是更多的挫折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尤其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下，返乡青年成为本土文化传统与全球化下各类理念和力量之间的尴尬中介，必须直面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多重压力以及沉重的

期待，于是他们最初的个体选择和生活探索之上，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重负和迷茫。

所幸，在这还在继续的“对话”过程中，我们看到背后的支持网络和伙伴的力量，他们从返乡青年的经历中汲取土地的养分和直面困境的勇气，并回馈以默默的陪伴倾听，信息和资源的分享等等。这种互为扶持、共同分担和关联，使得返乡青年个体的探索，不仅仅只是被动承载社会的压力，更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协作和坚持，对社会议题有建设性的介入和行动。

我们庆幸参与这个小小的返乡青年网络的动态构建过程，它刚刚开始，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有了开始，就有了希望。

掩卷有感

关于“返乡”的思考

文 / 郭 净

读一部返乡笔记，竟读得惊心动魄，为何？前些天在纪念音乐家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会上，有人说他创办云南民族艺术传习馆，却落得抑郁而终，是在“与时代拔河”。本章的几位主人公，在看似轻松浪漫的“返乡”话题下，艰难乃至惨烈地奋斗和挣扎，又何尝不是在与时代拔河？他们不相信命运的安排，要做一枚顽固不化的鸡蛋，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击看似固若金汤的体制之墙，自然会令观者震惊。

1

冲突来自于身外。家务和农活的乏味尚在其次，最令他们，尤其是外来媳妇难以忍受的，是一个迥异于城市的制度。跟年轻的朋友们聊起到农村的感受，他们总会提及待在城市的“好处”：可以躲避复杂的人际关系，保留个人的隐私。这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共产党宣言》说过，资本降临世间，要无情地消灭传统社会中所有温情脉脉的东西，把个体从群体中剥离出来，成为可以充当劳动力和消费者的“个人”。与个体解放伴随而来的，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社区的土崩瓦解。城里人一方面由此陷于孤独，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所谓的自由。而返乡，则是选择返回到乡村的社会中去，所有与乡村联系着的信仰、亲情，都笼罩在一张密密麻麻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下。这张网络的最小单位便是家

庭。只有成家，才能返乡，对男人或有例外，对女人则成通例。尤其是外来的女人，必得以出嫁的方式进入乡村，才能获得合理合法的身份。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化过程。难的不仅是它背离了城市化的时代大潮，而且，除开文化、习惯甚至民族的差异之外，还有年龄的障碍。人已成年，却要再度转换社会角色，非要有坚强的神经而不能成功。阿兰妹清晰地表述了这样的困境：

其实重点并不单纯在于城市女性对于农村的不适应，而是我们的身份变成“媳妇”这个角色。未婚女性在农村里工作跟嫁入农村成为当地媳妇，被社会给予不同的期待以及要求。英子与我都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开始觉得身体里的“个人主义”或属于个人的才华与农村里的某些期待其实是相互矛盾，甚至撕裂着自我。而那一种无形的、来自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同时建构着她以及我的夫婿，男性一旦回到农村（自己的家）就自然而然必须表现出农村里男人该有的样子。而那个“样子”或那种态度，在过去半世纪正是女性主义者大加挞伐的东西。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充其量我觉得自己支持性别解放。我认为女性在追求解放的同时，也要让男性解放——从“传统”的责任中解放。不过，双重解放的结果很明显地就是农村既有结构的瓦解。我们追求现代彼此解放，某种意义上我们同时又在做“瓦解农村”的事。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才是真正拉扯与痛苦之处。

她将英子和自己纠结的境况总结为：

这种“个人主义”一旦进入强调家族共同体、村落集体主义的农村社会，就会变得格格不入。融入的话，自我就会窒息，跳出来的话，那种想要跟土地对话的自我实践又会落空。

面对此情此景，返乡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是坚持理想，还是坚持生存？是

固守自我，还是融入家族和村社共同体？要向乡村学习什么？要让乡村学习什么？这些难题，也是我在参与社区教育活动中经常问自己的。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来，认识农村，与农民结合，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秉承着这一理想，土地革命和乡村建设的实践延绵不断，成功之时能动员亿万农民，推翻三座大山；极端之际却导致集体化冒进，饥谨蔓延，百万知青岁月蹉跎。在如今资本高歌猛进的时代，农村诚如英子所言，变得“没落与软弱、贫穷与无助，当资本进入农村，就像台风扫过，永远的强势甚至不需要对手”。

尽管如此悲观，英子依然选择了与强势的资本作对，她的依靠和后援，非农村莫属。为什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农村和农民，从来都是改变时代方向的根本力量。现如今，与资本社会相对立的价值观、人生观，在迅速扩展的城市里已难生根发芽。唯有在乡村，才能找到根本扭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矛盾的钥匙。乡村看似软弱，但乡村就像植物，容易被摧毁，也能够再生。谁也说不清返乡的行动会走到哪一步，谁也无法预料这行动的后果。但英子、阿兰妹、永波、正杨、安金磊夫妇用行动创造了一个城乡知识和文化体系展开对话的情景，他们亲身充当这种对话的媒介。新事物的萌芽只会在坚忍持久的对话中生长出来。

2

冲突也来自于内心。一个人要选择与众人相异的道路，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自己和自己的争论与搏斗，大概很难停息。为此，英子直率激烈的述说，就显得格外动人。我曾经跟广西的实习生们说过：你们到农村做志愿者，都是内心不安分的人。我虽然不曾返乡，但在个人的经历中，“出走”和“返回”亦常常成为一个主题，或一个难题。究其原因，大概是存在于故乡和异乡之间的距离充满张力，由此开启了潜藏心底的幻想。英子和阿兰妹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返乡，也可以理解为出走，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且，其中出走的成分或许更大一些。对于许多农村来说，外来的媳妇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在公婆家立足，何况

这媳妇是不熟悉农活和祖宗规矩、打城里来的读书人。而在城市里养就的习惯，并不因为生活的磨砺轻易消失。残留的记忆或许还会发酵，在内心引发一场又一场“美丽的战争”。所谓“惨烈”，全因为那是一个人的战争，无人可以排解。

藏族作家唯色有篇文章，题目叫“安全与激情”。人们总希望以出走寻求安宁，但选择了激情，安全便不复存在。英子的博文多次用了“惊恐”、“恐惧”的字眼，处处显现出生活中的危机感。多年前，我也选择过出走，从此，曾经看不上眼的平凡日子一去不复返。出轨，逃离，为自己所不齿。唯有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一条道走到黑。

出走或许会带来别样的风景，云南德钦藏族民歌唱道：“我往高高的雪山上走，是想与你在山间的圣湖相遇。”

人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到远方，把他乡当做故乡，总是受了梦想的驱使，期望在陌生的地方有一种奇遇，为人生开启新的视野。但就像佛教所说的那样，任何事物都会经历成、驻、坏、空的循环，陌生会变成熟悉，新奇会变为腻烦，理想会蜕变为平淡与无奈。时代也好，潮流也罢，渺小的个人无法度量也无法把握。关键的是能否像金磊那样，“跟从内心的方向去做”。他讲得真好：

内心的成败也是对人生的领悟的程度。

3

金磊的确另类，他开启的方向是大多数人未曾想到的：

不是回到那种破败的农村，而是那种像老子所说的人应该在里面活得有五行五气的那个田园。

有很多人向往老子的田园，却很少把它当成行动的目标。大多数返乡者的思路，还是如何打通土生良品和市场之间的渠道。金磊却并不在意市场，不在意效

益，而在意和田园里生命系统的沟通。我感觉他仿佛要写一本中国的《瓦尔登湖》，却又比梭罗高了一筹。跟一个朋友说起金磊的独特之处，她说：他想造一个个人的乌托邦。看表面，金磊似乎也像梭罗那样离群索居，在外人的白眼中自得其乐，但他自己说：“有些朋友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人在生活，其实不是，田里有千万个生命在跟我一起。我特别强调感应这个。”这就是他高出梭罗的部分，他接通了地气，接通了传统知识中强调天人合一的宝贵思想。这使得金磊不再孤独，使他的行动有了自信的依据，也有了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其实，农村社会自身的“支持体系”除了社会关系之外，还包含着许多方面，其中非常重要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它的信仰体系。这个体系以祭祀、表演、节庆、生命礼仪、空间分隔等方式表达，它解释万物的由来、生命的循环，规定人的行为规范。它就如同土壤里的养分，涵养着农民和牧民。当今许多农村的凋敝，同执政者和知识主流长期以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封建迷信”分不开。失去信仰的依托，乡村普罗大众便无力抵挡资本的台风。外来的志愿者不懂得，或对农民、牧民的信仰不加理会，也同样无力抵挡资本的台风。因为资本是有思想作为后盾的。

台湾旗美社区大学喊出“农村是一所学校”的口号，是在努力重建乡村的价值体系。就像张正扬所说：

在农村，你面对山，面对河，面对天地，面对农民，都能够学到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象征。人在物质与心灵上，都没有办法脱离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发展经济的时期，经济的需求会被放大，这些东西会被忽略。可是我想，台湾大概也过了那个阶段了，开始有一些东西需要反省和沉淀，所以农村的价值、农村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刻凸显出来。

我想，农村最重要的意义，大概在于它保留的信仰。在任何一个尚未解体的村庄，以信仰形式表现的价值观念无论怎样微弱，都有踪迹可寻。记得我和云南社区伙伴的朋友到巍山汉、回交错居住的农村做社区教育，回族的村子能将全村

的男女老少整合在伊斯兰教的教育制度中。相比之下，毗邻的汉族村庄则显得有些脏乱差。村民有点自卑地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传统了。可我们举办讨论会的场所，就是汉族村子的寺庙。这样的寺庙并不只存在于一个村子，而是遍布巍山坝子的大多数汉族村庄。每个寺庙都凝聚着以“坛”为组织形式的行动团体，其成员便是本村的村民。村民既是寺庙建设的捐助者，也是寺庙祭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坛”的动员能力远远大过外来的民间机构。同样的例子，在云南省德钦县也能找到。当地草根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在江坡村的活动，一直依靠村里的居士团体展开。这些传统的信仰团体，承担着维护和传承乡村信仰体系的重任。在近代历史上，乡村信仰和相关的组织被一次又一次地扫荡，却一次又一次地复苏。它们的生命力，可以用藏传佛教“伏藏”的观念加以概括：西藏历史上有很多佛教大师，因社会环境不好，或因机缘不合，会把经典埋藏在深山和圣湖里，等待后来者发掘。藏传佛教能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后复兴，与“伏藏”的观念和行为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返回农村，所携带的思想武器或者不够用，或者会起反作用。我们应当像金磊那样，安下心，去发掘传统信仰的伏藏。它就在那里，等待有心的人到来。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与山野中其他生命共处的思想和行为，还大量存在于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当中。近年我们一直在关注藏族文化中的神山信仰和“聚”（bcud）的概念，聚是万物的精华和精气：

自然神灵和大地精华“聚”，构成了一个非人类生命的世界。藏族人相信，所有的山水、土地，都有主人照管，他们照管的主要就是万物的精髓“聚”。我们看不见聚，也看不见非人类的生灵，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人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以生存发展的名义侵犯其他生灵的地界。

.....

外来的人太相信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忽视生命的无所不在和相互联系。我参加过多次保护规划的培训，学了各种以英文缩写字母命名的生态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很少涉及当地民族的知识传统，不关心当地人

对环境、对生命抱有什么样的观念。这样的培训反而使我们盲目。人在六道之中，是一种既有灵性又有贪欲的生物。他的欲望会遮蔽他的心灵，使他难以洞察大千世界的真相，让他看不到山中神圣的事物。而没有敬畏之心的环保活动，很难得到社区文化的依托。^①

关于“聚”的认识以及金磊对土地生命系统的钟爱，发人深省：乡村这所学校能教给我们什么知识？我们返乡，要返到什么地步？是返回到村庄里，家庭里，人际关系里，还是要更深一步，返回到泥土里，返回到还有许多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世界当中？

最近，青海果洛的藏族环保组织“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发来它们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道：

我们的会员基本上都是佛教徒，这是我们协会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的今天，我们无力改变这个疯狂发展疯狂消费的世界，但是我们希望以古老的智慧警醒人类。当前的环境变迁问题，本质上是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人的内心。以“保护环境”这个现代词汇来说，我们不需要新理念，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传统中去，在佛陀古老的智慧里，重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那就是菩提心、慈悲心，是佛教传统里的生命平等的理念。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也是属于所有生命的。因此，我们希望组织会员里那些有学问的堪布，整理佛

① 参见郭净《人有病，天知否——藏族社区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一文。

教经典中关于“环境保护”（暂时借用这个现代词汇）相关的思想，这里头蕴藏着古老的生存智慧。这是一笔人类的重要财富。这个工作从未有人做过。

计划的藏文标题叫“热切啦”（ri chu lags），其中，“热”是山，“切”是水，“啦”是冠于人名后面的尊称，等于“某某先生”或“某某君”。热切啦的意思就是“山水君”，是把山水当做人一样来称呼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开启了我们的眼界。是这些牧民和僧人，在为我们发掘古老的伏藏。

2011年7月6日

郭净，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西南山地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发表论著《心灵的面具》、《中国面具文化》、《雪山之书》、《朝圣者》等，并参与社区环境和文化保护的行动。

第二章

另一条“返乡”路： 社区支持农业的探索

编者 | 周 衍

写在前面的话

安徽南塘返乡青年工作坊最后一天总结分享时，李大君的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与波仔和丁华明两位伙伴重逢的感受：“你们的探索深深打动了我，一想到波仔，我就无比感动又感觉沉重；而想到华明，就会被感染而感觉快乐。”

这是同样深刻却又截然不同的印象，我相信，这么想的，不只是大君。

波仔和华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怀带着对农耕和土地的长久热爱，做了多年的“农庄梦”；同时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实习生，在梁漱溟乡建中心以及其他支持网络的扶持下，共同学习成长，并肩作战。然而，“人才计划”一年结束后，两人选择了不同的返乡路——波仔回到老家继续自己的返乡探索，华明则是转为社区伙伴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实习生，在广西横县继续探索生态农业。

华明并非没有想过回自己的家乡——位于广西钦州的乡村。然而，再三思量后，他意识到时机未到。确实，“重返乡土”未必能够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很少人能够在自己的乡土挖到适合的“萝卜坑”。于是华明和不少同伴一样，在家乡之外寻找扎根之所，轻装上阵地与生态农业以及社区支持农业等议题打交道，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返乡需要面对的家人/家族的牵绊和阻力，在另一片土地上探索和思考人与土地、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关系。

当然，华明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接触土地，并在异乡扎下根来，离不开很多机构、网络和师友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视线转向华明和他的小小伙伴共同体，去探索和分享这几位年轻人虽未直接“返回故乡”却依旧“回归土地”的故事，并在里面探寻这群年轻人身后的支持者们。

生命旅程就是“一连串的相遇”

文 / 朱 明

在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中，年轻人加入之前，通常我们都会先找机会和他们聊一下。

和丁华明聊，是在横县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餐馆中。到达的时候，已经傍晚，屋里亮起一盏昏黄的电灯，我们点了两个盒饭，就农业的话题热烈地聊了起来。华明极热忱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虽然当时横县项目的策略重点在农民组织和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但他在这一年中，还是用自己的时间，在社区支持农业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华明的好友刘胡佳，在柳州爱农会的平台上做实习生，我记得他们是参加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时相熟的。很长一段时间，胡佳都极不适应：爱农会每天的事务性工作很多很琐碎，也在准备以商业操作方式来整合本地资源，做消费者教育工作……这在当时的他看来，似乎与自己的理想距离很远。在我第十个月去接待机构回访的时候，胡佳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他是感性、热情、有行动力的人，也许在这点上，与爱农会的特质是相合的，所以最终，他度过了磨合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

李明苹到爱农会实习，是因为华明的缘故。来的时候，几乎对社区支持农业一无所知。我最初的反应是，觉得这对恋人希望工作和生活得近一些。但也看得出来，华明极热衷于社区支持农业，认同爱农会的做法，所以也希望明苹通过实习有更多了解。明苹是在下乡的过程中找到感觉的，她性格直爽，手脚麻利，老乡很喜欢。在爱农会的平台上连续做了两年的实习生，现在的她，和华明已经是

革命夫妻了。

杨丽芬是因为参与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来的爱农会。我去爱农会访点的时候，她正好外出参加实习生项目的聚会。返回时，人还未出现，就听到银铃般的笑声。都是爱农会平台上的实习生，我也没拿她当外人，去了，经常拉着他们一起聊天，开会。她和明苹一样，都是“下乡的好手”，到老乡家中，生火、烧菜、杀鸡、煮饭，样样都行，做腐竹的阿伯总是暗示她，家中还有个没结婚的侄子，是个好后备生……

他们是我在四年多的工作中所认识的实习生的缩影，也还有其他的年轻人，在另外的平台上努力工作，现在已经成为机构的骨干力量。因为接待机构、实习生和项目搭起来的“机缘”，我们相识，成了朋友。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时，我有个体会：每个人，当你真正走进他/她的生命时，他/她的生活经历、他/她的内心世界都精彩得让你无法想象。写这句话，不是说我真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命，而是我刚刚开始意识到：我还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生命。

每个生命是如此的美丽和不同，也因为这美丽和不同，我们会欣赏对方，会愿意携手，在这个地球上，建立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家园。

（作者为社区伙伴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前项目官员）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在共同购买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产品是哪里来的，谁种的，怎么种的，又是怎么加工的，以及这背后的故事。免除了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和不必要的包装及运输，大家可获得真正价廉物美的食物及生活所需品，吃得安心，用得放心。

胡伟和/第一届CSA实习生·成都华德福学校

年轻人的实习报告

编者的话 下面的两份实习生报告，分别来自丁华明和刘胡佳，他们都是从“人才计划”实习生转为CSA实习生的。

从丁华明的报告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他在不同实习生项目里的学习成长过程。华明是一个踏实而有思考力的年轻人，他的报告很少写实习的过程，更多的是对现行发展观的思考、对项目的思考、对如何在村庄推广健康农业的思考。

刘胡佳是华明的亲密战友、好伙伴。从胡佳的实习生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很认同爱农会支持土生农业的做法，在报告的字里行间，胡佳津津有味地描述着稻鸭共作种养法，还有乡间的家传品种、老手艺……他也因此得以深深地扎入乡土。如今，胡佳已经是爱农会的社区支持农业专员，社区农圩负责人。

①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成长历程

文/丁华明 2007.6.15—2008.6.15横县健康农业项目点^①实习生

着陆之后仍然可以让心飞翔

如果说参与梁漱溟乡建中心的“人才计划”是思想大冲击的一年，那么，参加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则是大起大落之后思想意识开始成型的一年。从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到专注于健康农业，这是一个漂荡在空中之后降落到一个据点的过程。蒲公英的花朵盛开之后随风飘荡，终于可以寻找到一个能够让种子降落和

生根发芽的地方。尽管这个据点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相对于其他仍然漂浮不定的蒲公英队友，我算得上是已经找到了方向、开始做点实事的一员。一年的实习期，有收获，也有困惑。

视线之外有力量

在“人才计划”的总结里，我以为我们这个团队是孤单的清醒人，而经过一年的不断接触，发觉身边和远方都不乏还保持着头脑清醒的人，只是大家所关注和从事的事业不一样罢了。因为我们是专注于健康农业一个很小的领域，所以我所能看到的还仅仅是有限的力量。相信在我的视线之外，还有很多为这个社会做出或多或少积极贡献的力量存在。同时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就是很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是源于个人的爱好，并且能够将这种爱好跟社会的发展进行完美地结合。这让我对公益事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发现这种出于爱好的人跟其他一些专职的工作人员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工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工作，而并非是任务。由此可知，最理想的志愿者并不一定是兼职的，而是能将爱好与公益完美结合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喜好与公益结合起来，那么公益事业的发展将是飞速的。

另一种世界是希望

另一种世界是有可能的，只是这种可能所面临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树是活在大地上的，只要它们有地方可停留和生长，我就一样感觉到幸福和踏实。树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人体不会说这一块空气是我的，这一片氧气是我的。我们大家都是生命体，我们都同呼吸。所以，即使我的那些树离我很远很远，我依然可以从身心深处闻到它的气息。

苏德标/第二届CSA实习生·沃土工坊

①横县健康农业项目：2005年至2007年4月，由香港社区伙伴资助，与广西农业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在横县以参与式农业技术推广的理念在三叉村和陈塘村推广有机种植水稻、大头菜和玉米的试验与示范。从2007年末到2010年底，社区伙伴进一步支持广西玉米研究所在横县推行系统的有机农业种养培训与实践，并协助当地农村组织的发展和社区支持农业活动的开拓。

的挑战愈发严峻。健康农业的发展面临很多的困境和压力。在相隔不到一条水沟的同一个村，我们还能看到有人大量地喷撒剧毒农药；在相隔不到一条公路的地方，我们看到不断增长的连片的塑料薄膜覆盖着西瓜地、甘蔗地。那不长一根绿草、见不到一只青蛙和小鸟的死气沉沉的化学田就像是漫无边际的海水，将我们的有机田像孤岛一样地隔离起来。大量的土地被租让，林地被砍伐，种上单调的甘蔗、速生桉；花费毕生的财力争先恐后建起的表面光亮却仍然空荡荡的楼房，不断矗立在曾经很宁静的村庄；随处可见的工业垃圾侵蚀着健康的水、土、空气以及人的灵魂。被城市光环笼罩下的村庄越来越向往的是城市的消费、铺张、奢侈。迷信金钱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讲求享受和消费。严重的老龄化和被漠视的农业价值使得农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产业化的步伐又加剧了农业污染和农村经济崩溃的危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所期望的健康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就是在如此困难重重中进行着探索。无奈与希望并存，不断的困顿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以及不断壮大的队伍并行，相信我们所做的努力将给这个“三农”问题带来一丝希望。

真正的生活是工作，工作是生活

台湾谷东俱乐部的赖青松说，作为一种产业，农业也许是夕阳；如果作为一种生活，那农业肯定是朝阳。柳州爱农会将个人爱好与社区支持农业、社会企业联结在一起，演绎着生活即是工作，工作即是生活，生活有乐趣，工作有意义。这是我听到和见到的、我所认为的理想生活。我一直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化学农业泛滥的今天，率先参与健康农业发展行列的人将是最直接的受益对象。而实习生则成了健康农业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和生活是如此的接近。健康农业、健康饮食、健康消费等等既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又影响着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我们的团队成就我们的梦想

在这两年里，我一直都在寻找跟我志同道合的团队。对于我们来说，构建团队的过程就是成就共同梦想的过程。有团队在，梦想就有可能实现。在乡建中心，我们有蒲公英队^①。我们一起接受理想主义的教育，开诚布公地批评与自我批评，成就了一个富有反思精神的乡建团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人才计划的学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队伍。在横县，我和尚荣才（“人才计划”一期学员，也是我大学同学）成了携手共进互勉互励真诚合作的伙伴。我们一起学习有机农业，一起研究自然农法，一起为横县的农民协会的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有一句俗语：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手把式，又说又练真把式。我想今后不管走到哪里，应当说做结合，知行合一。

姚继忠 / 第三届CSA实习生·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① 同一期人才计划的学员所组成的团队名称。



2006年1月，丁华明（左）与人才计划同期学员尚荣才在横县项目点查看田间农业试验。

成型奔走于平马、南乡、校椅。一起走过的这一年，培养了我们较好的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素养。自然农业成了我们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成了我继续申请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最大的动力所在。同是乡建学员的刘胡佳是我最为志同道合的队友。我们在乡建学员结业之后都一致选择继续留在广西。也就是通过胡佳，我开始了解爱农会。我在爱农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新伙伴。我们一起见证了爱农会在这一年的成长过程，也一起接受了CSA理念，对CSA和社会企业相结合之后对健康农业巨大的推动力量深信不疑。周锦章会长几乎成了我们所崇拜的精神领袖，他源源不断的新创意和果断的决策，以及对我们大学生的认可、期待和悉心指导，使我们这个小小的CSA团队迅速成长起来。健康农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可以开创很多新的希望。

横县项目的意义在哪里？

农村发展项目从诞生到现在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论题。对于我所参与的横县项目，我一直在思考意义所在。以项目的形式推动村一级社区的有机农业发展，投入数十万专注于一个村庄，这样累积起来的成果，能有多大的推广意义呢？值得怀疑和思考。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村庄，能有几个获得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关注？不得而知。其他一些慕名而来的求经者，除了看到我们的成果，能否注意到背后的付出呢？他们能否因此而断定这是一个只能量力而行的事情？难以肯定。培养和激发村民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减少直接的财物补助，集中于能力培养和信心培植，是我们部分地免于以上尴尬局面的一个长远的发展策略。我们项目组是一个多元组合，需要更开放的合作态度。我们相信横县项目在我们真诚的合作下可以做出更加富有推广意义的成果。从我们多次组织各地参与者交流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健康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可以标榜的成功对象。走在健康农业发展前列的横县项目，其特殊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为其他希望从事健康农业的农民朋友增添勇气和信心。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农村发展项目是矛盾体的集合

投入越多，可推广的意义就越会打折扣，投入跟推广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我们发现农村不乏能人和智慧，另一方面我们又为培养村民的生产技能、组织能力而安排一系列的培训、交流。我们强调参与式工作方法^①，自己仅作为协助者，即强调村民的主体参与地位，但却坚持和引导村民朝着符合我们意愿的方向发展。这又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的矛盾体。

项目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对农民、农村、农业不断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持批判的态度，是为了更深层次地认识“三农”，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方向和成效。跟农民打交道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追求健康的消费生活方式的基础就是在细节和毅力上。

经杰 / 第三届CSA实习生·梁漱溟乡建中心

②向消费者传递土生农业

文/刘胡佳 2007.6.15—2008.6.15爱农会实习生

爱农会一直在寻找一个更为大众化的平台，以解决逐渐增大的合作农户网络和消费者群体不够稳定的矛盾局面，而生活化的城市反思也将有机会开展。

爱农会想要把社区支持农业做成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获得食物的方法那么简单。食物不仅要好吃健康，还要有益于思考，包括食物之外的在地当季、互信重建、相互支持、平等关系倡导，已经涉及可持续生活反思，以及一种全新农村发展及工作方法尝试。

①参与式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简称PRA) 工作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区工作方法，其核心在于赋权，即将老百姓的权利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自己的事由他们自己做主。以当地老百姓为主体开展社区工作，外来者起的只是协助的作用。这种工作方法也常常应用在培训、教学、评估等领域。

爱农会倡导土生农业，保护家传品种，支持传统小作坊延续手艺，坚持“吃当地，吃当季”，依季节进行农耕体验活动，消费者跟生产者走到一起，构造安全食品直供基础上的“小而美”的生活系统。

土生农业

在乡村依然有农民在延续不用农药化肥、不放化学添加剂的农耕方法，与爱农会提倡使用土生土长的食材、支持土生农业的理念不谋而合。土生良品^①和他们走到一起，认可并支持小农依土生的方法生产，要求种养结合，协助合作农户在自需基础上设计生产项目，购买农户富余的农产品。与这些秉承传统的小农、小业主走到一起，是发展健康农业的一条捷径。

在与农户的交往中，爱农会的做法会区别于订单农业，并非订购帮种，而是以掌握技术为前提，信任建立于彼此欣赏之上，而价格也会在信任建立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社区支持农业的意义不在于给得起多高的价格就给多高，而在于是否我们都已经具备了同样良好的心态。价格是对信任、朋友关系的认可，是在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而不应成为农民欲望膨胀的动力。

土生农业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信任为唯一原则，并保持小农生产的原则，因而区别于有机农业或绿色、生态农业等认证农业。种养结合在多样性方面的体现也很好地回应了规模化、单一化造成的农业瓶颈。

爱农会支持在种养结合基础上的生态小农场建设，引导农民在土生农业生产上的专业合作。现在推行稻鸭共作、自然养猪、小菜园计划、生态建筑等。

稻鸭共作具体操作：

（1）寻找到合作农户，主要考虑农户意愿，是否有老谷种，是否有条件好的田块（独立，上水田，旁无“甘蔗地”，放鸭方便最佳）；

（2）确定稻鸭共作试验田，拿其中一小块先尝试，保证当前种养结合情况力所能及，要有足够的农家肥，开始学习堆肥技术；

(3) 以爱农会消费者为主体的参与式农耕体验活动（消费者各自承担风险，结伴农耕体验），插秧，放鸭子，收割体验；

(4) 水稻从育苗到收获过程中穿插新老合作农户互访交流，传帮带，学习病虫害处理、多品种间作防虫技术，交流堆肥、放鸭经验，品种考察；

(5) 合作农户进城，到土生良品参加消费者与农户共尝会，讲述鸭间稻背后的故事，品尝并反馈，讲述朋友关系，相互信任，平等而又互相支持；

(6) 连片鼓励原则。价格因田地情况各异而不同，整片洁净无农药污染可以得到较高价格，在城市消费者需求下鼓励其他农户参与，已有合作农户适当增加稻鸭共作面积；

(7) CSA项目志愿者与合作农户一起发掘稻作文化中的传统知识、品种资源，认可并鼓励，提高合作农户对土生农业的自信心。

家传品种传递

一个物种的存在必然和生活或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它的消亡也会导致或是反映文化的更替。爱农会引导城市消费者从食物的角度去延续生物多样性，支持农户饲养家传土鸡、家传土猪，用老母鸡孵化本土小鸡，种植本土黄豆，种植壮族地区特有的粗粮——三角荞麦，吃本土玉米，种植可以自己留种的老谷种等。

而往往在那些偏远贫穷的山村，朴实的小农正在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在菜地帮忙让我知道，一个看似简单的环节都有学问。比如摘菜，先挑成熟的、大的，这样小个的就有更多的养分和成长空间；又或者留下植株下部枝节，节间会滋长出新芽。这些都是节约的做法。

周曦 / 第三届CSA实习生·德润屋

①土生良品是爱农会在广西柳州开办的餐馆，食材全部来自合作农户，土生、生态，餐馆同时作为联系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的媒介。目前在的南宁也有土生良品餐馆。

延续着这项工作。土生良品真诚地欣赏这些传统的做法，提高合作农户对家传品种的信心及对传统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意识，延续生物多样性。

家传土鸡保育传递项目具体操作：

（1）追着土鸡满山跑，寻找家传土鸡。
土鸡一般相貌明显，有胡子鸡、帽子鸡、重冠鸡、裤子鸡等，养城里人“看”得懂的土鸡；

（2）夸土鸡，问鸡从哪里来，拿什么来喂，合适则讲好价，鸡长好时再过来要；

（3）寻找土鸡保育合作农户。种养结合有空间、有大片鸡活动场所的，则在地或就近建立家传土鸡保育场，收集周边家传土鸡品种，给保育项目合作农户繁育。这里有个传递原则：给多少到时要还回多少，或是传递给下一个有条件续养家传土鸡的农户；

（4）不喂饲料，坚持放养；

（5）爱农会召集城市消费者参加寻找家传土鸡和土鸡传递活动；

（6）除保育场外，其他合作农户大致保持小规模养殖。这些农户不定期有家传土鸡供应给爱农会的饭店，消费者得以品尝。

家传土猪、土鸭也类似以上操作。



专注于拣土鸡蛋的胡佳

手艺是生计也是传承

当吊白块、增白剂、增嫩剂、甜蜜素、柠檬酸、增稠剂、二氧化硫等化学品广泛运用于食品加工工业时，爱农会选择了拒绝，转而和那些传统的小而健康的作坊走到一起。我们发现，这些传统的手艺都离不开本地的资源——家传品种，比如老谷种、柴火竹簸箕蒸粉等。结合合作农户网络已开展的家传品种保育，用合作农户生产的无农药化肥本土小黄豆，支持传统艺人依天气生产纯正腐竹，不

用任何添加剂而用卤水点豆腐，本土小麦传统小作坊面粉（面条）加工，产于天然、传统酿造的山野葡萄汁，以及支持城镇艺人做姜糖、烟丝糖。手艺是社会的细胞之一，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有其存活的空间。土生良品还支持竹编艺人编织竹器，向消费者传递竹制工艺背后的故事。在留住手艺的同时，也留住与之相应的物种多样性和文化传统。

传统小作坊具体操作：

- （1）在地方特色或朋友介绍中寻找真正“纯粹”的传统艺人；
- （2）做朋友。土生良品购买他们的食材，或义卖，并欣赏、鼓励他们；
- （3）在合作农户网络中做种养计划，生产无农药无化肥的与之相应的食材；
- （4）逐渐实现网络内食材供应的传统作坊；
- （5）饭店平台上，推动消费者的传统作坊体验，消费者跟手工艺者一起玩耍。

问题一大堆

对农村/农民的把握不要仅仅用价格来拉动和维系。

价钱好商量，斤斤计较，我也就要精打细算了。我们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博弈，然后才走在一起的。

不是因为我们给得起高价就给高价，好像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善事，或者才是我们做事的意义，要看到我们认为的高价比农民幻想还要更高。我们要淡化这个欲望，不是我们抠门，而是要让大家冷静下来。合作是长远的，大家要看得远点。

下乡少的人每次回来都有一番感慨，说现在“只剩下买卖关系了”，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哟，下乡多了就理性多了，就生活化了。

之所以不用“有机”这个概念，是因为“土生”这个概念早在“有机”之前就有了，而且谁都可以用，不用认证，不会被罚款。

“土生良品”餐馆 ——开在城里的“乡村圩集”

文 / 刘胡佳 李明苹 杨丽芬

编者的话 华明的报告里谈到，他在柳州爱农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新伙伴，而正是爱农会这个团体，尤其是里面的三位年轻人——刘胡佳、李明苹和杨丽芬——成为华明探索社区支持农业并进一步放飞理想尝试“半农半×”^①生活的坚实后盾和强大动力。

爱农会是CSA实习生项目的一个接待机构，是项目探索以CSA推动城乡良性互动及可持续生活的在地合作伙伴，也是将CSA精神本土化的实践者。

下面的这篇关于爱农会的文章由在爱农会实习的这几个年轻人所写，虽然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他们如何受爱农会的影响，爱农会又是如何提供他们学习成长的平台，但字里行间，这群年轻人对于爱农会的认同，以及爱农会给予他们的潜在空间，都丰盈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赶乡圩，认识可信赖的农户，与农户交朋友，让城市消费者了解乡村生产者——他们与爱农会团队一起进行这样的工作，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了解农民，了解农村，更深入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

在柳州，从小生活在都市的三个城里人，酝酿并实施着一个计划：用支持的价格，来购买农民种养的、原生品种的蔬菜、家禽、家畜（有人称为“土生良品”），来支持农业、农户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吃上原生品种的食物。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关心自己的健康，热爱乡村生活，喜欢土生良品。当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充斥在自己生活中的时候，他们转向去乡村，寻找“土的东

西”。他们喜欢赶圩，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土生良品，比如土鸡；同时，也有机会认识那些像他们一样不喜欢农药化肥的农民。他们会找时间回访，和农民交朋友，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土生良品（不放农药化肥，不放饲料添加剂）。工作之余，他们也会去农户家里，体验农务，插秧、收割或是吃土鸡。

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喜欢土生良品的朋友参与进来。他们也找到更多的合作农户。2005年底，“爱农会”成立，因找不到挂靠单位，并未正式注册。

爱农会有自己的理念，但需要一个承载的平台。三位发起人自己出资，租下临江的一个门面，成立土生良品展览馆，向更多的朋友传递“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合作农户数量的增加，展览馆越来越难消化掉已找到的土生良品。在寻找新契机的同时，展览馆房子被房东收回，所以就生出了“土生良品”餐馆。

2007年7月 饭店的诞生

格局

当原有CSA模式的共同购买已无法解决合作农户土货众多的情况，爱农会尝试用另一个平台来继续发展——爱农会创办人以及两个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自筹资金组建“土生良品”餐馆。他们在合作协定中提出：利润的百分之四十用来做爱农基金，做社区支持农业。尝试用自己的理解，去做本土化的社会企业。

因为没有经验，一切都天马行空。大厅完全是

①“半农半X”一词源自日本塩见直纪的著作《半农半X的生活》。作者提出了一种既利于可持续发展又兼顾社会价值创造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亲手栽种稻米、蔬菜等农作物，以获取安全的粮食（农）；另一方面从事能够发挥天赋特长的工作，换得固定的收入，并且建立个人和社会的连接（X）。目的是追求一种不再被金钱或时间逼迫，而回归人类本质的平衡生活。在日本以及其他地区已经有许多人在以这种方式生活，并进一步带起了风潮。



土生良品店门，过路人也可以看的海报。

“柳北农家堂屋”的形式：一架板梯架到阁楼，鱼篓做灯罩，旧的青砖铺地板，板梯底下的石磨石缸，大酸坛，木门……效果跃然眼前。这样的装修和摆设，会让很多消费者找回旧时的记忆：有回到农村老家或是外婆家的感觉。

对原则的坚持

饭店理念，是坚持社区支持农业理念——不是当季的菜，没有；不是当地的菜，也没有。坚持吃在地，吃当季；所有食材必须来自了解的合作小农，今天有的，明天不一定有。很多消费者是带着期盼来吃饭的，但饭店坚持“没有就不做”，给消费者一个警觉：不是有钱或任何时候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不用鸡精、味精、化学调料；用压榨一级非转基因(无基因改造)花生油；所有食材，都

不经过事先加工；不用化学洗涤剂，用茶麸……

最开始跟“土生良品”提供食材的农户，都是爱农会老的合作农户。

2007年7月，也就是饭店试营业的那段时间，刚好是根坡合作农户刘以兵稻间鸭、鸭间稻上市的季节；纳社老队长家的土鸡，偶尔也可以得几个；沙塘黄大嫂的土鸡蛋，每个星期可以得一轮，也就是供应一两天；不放石膏做豆腐的阿姨也开始每天帮“土生良品”做一板豆腐；黄佳密的老婆姑在城郊养猪种菜，她种的红薯苗、空心菜是“土生良品”主要青菜来源；大头菜是南宁横县特产，因为社区伙伴在横县推广的生态农业项目，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也纳入了饭店食材。村民徐富谷开始定期发送大头菜到柳州，加上刘以兵的牛仔肉做的“头菜牛仔肉”，很受消费者欢迎。因为可运用的无农药化肥、无化学饲料的食材不多，每道菜都成了“土生良品”的特色菜。

最初的萧条与消费者的包容

最开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试业，门可罗雀。但爱农会这帮人并不着急，没有客人，就会聚在石磨周围的草凳上，喝茶，聊天。当时的合作农户、消费者、厨师、服务员都少，所以菜少、上菜慢、没发票成了“土生良品”的负面代名词。但由于饭菜好吃，加上志愿者与消费者的充分沟通，消费者对“土生良品”非常宽容，对这里犯的“小小错误”都表示理解与支持。

那个时候，老骆（骆泽红，唯一的厨师）虽然很辛苦，可因为带着为爱农事业付出的美好的愿望，在厨房炒自己从小就喜欢炒的菜，所以每天都开开心心。味道，自然而然，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奇好。那时的志愿者有足够的时间和消费者畅谈，讲食材背后的故事，饭店经营的理念，以及为什么会有“爱农会”这么一帮“发癡”的人。虽然服务不专业，但服务质量比较到位，因此饭店仍处于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

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很多消费者带着自己的朋友来。菜太少，只好一桌点两个同样的菜；或者，都不知道有什么菜可以加。还有些人，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吃同样的菜，抱怨的越来越多。爱农会也明白消费者的宽容是有限度的，经常



土生良品食材角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人们的追求都在改变，换来了资源的无限制利用、环境的加剧破坏，我们这些人为了保护小小的一片净土，也承受了不少艰难，可是我们又能改变多少呢？只希望做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吧。

李遇夏 / 第四届CSA实习生·德润屋

断档的事情如不解决，这份事业可能就真的要断档了。消费者需求的增加，也促使爱农会必须去寻找更多的土生良品。

宣 传

爱农会不做明广告，而做口碑相传的暗广告，因为想要脚踏实地地去累积农夫网络和消费者网络。大学生志愿者前期在“土生良品”与消费者的沟通、交流，是口碑相传的基础，而经常性的、不一样的限额农耕体验活动及品尝会横幅，都能给消费者提供“说三道四”的借口。爱农会不担心某一次农耕体验活动

没有人参与，也不赞成做人数太多的大活动。在爱农会看来：活动，只是一些显性而成型的机会，与农民的沟通是不能仅仅由这样来判定，这只是和农户沟通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有没有消费者参与，爱农会都一样成行，而人数太多会给农民造成接待上的压力，或是扰民、影响农事，对此，爱农会也不愿看到。和与消费者沟通一样：认可或不认可不是最重要的，往往消费者之间的讨论意义最大，也是通过争论让事实明朗。

分 歧

“土生良品”饭店经过半年的积累，才进入一种消费者高度认可的状态。而在这半年中，一直存在对运营压力的考虑。在股东里，对如何缓解这些压力是有分歧的。饭店开始的时候是用农民的茶油，后来因为供不上，开始用大厂的转基因压榨一级花生油，价格都很昂贵。中途有股东顶不住高成本运营的压力，提出改用大豆油，同样非转基因，以降低成本，但因会长的坚持没能通过。换油事件就不了了之，这样一直维持下来。

现在用的油，是本地大厂压榨的一级花生油。合作农户的花生刚刚采收，不久就可吃到农民自产自销的花生油了。真好！

2008年2月 春节过后 赶江口农圩

江口农圩，距“土生良品”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三天一圩。

到江口农圩，是因一位去纳社参加收割鸭间稻的消费者颜军介绍。消费者越来越多，爱农会也开始寻找更多的合作农户。在颜军介绍下，爱农会开始与当地的一个屠夫合作。屠夫答应帮助寻找村民饲养的小栏土猪，而爱农会则以支持的价格购买。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农圩。如果单买猪肉成本会很高，如果有丰富多样

的土生良品，每一次的运输成本就可以接受了。从第一次进入开始，江口便成了“土生良品”主要的土鸡蛋来源地。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爱农会开始与赶圩的小农交往，购买其种植的用农药化肥的蔬菜及家养不多的土鸡（江口人称“家下鸡”）。也开始留下农户的姓名、电话及村庄，以便找去他家看看。“土生良品”的食材，渐渐丰富。

赶圩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要赶着中午开餐前回到饭店，所以出发早，返回也早。但这些都不影响爱农会非常明确地告诉小农：“我们要土的东西，没有农药化肥，没有化学饲料！”也就是这种讲法，几个月后，江口人都有一个要土货的柳州饭店。一到赶圩的日子，在爱农会停车的地方，总有卖土鸡蛋的农民等候。走在江口的集上，经常会有人从后面拍肩膀问：“老板，我这个也是土的，你要么？”下到村路，也会碰见认识的农民邀你进家坐坐。而农户也似有组织般的交代一个人，拿村里面的土鸡给爱农会。

但是，圩场也是一个商业场所，不见得碰到的人都真诚，所以，如何辨别土的东西，如何辨别小农与商贩，都是爱农会得加强学习的。在询问一个农产品是否有化肥农药上面，会有很多讲究。一般如果你问：“这个，有没有放化肥？”农民会很容易地回答你：“没放的，就放牛粪。”而当你去讲：“哟，这个放好多化肥的，好贵的哦？”或是：“放什么复合肥？”就比较容易得到实话。

事实上，当爱农会介入越多，交往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时，对圩场的情况才渐渐把握。每次去都可见到，而且有固定摊位的，是商贩，爱农会则不用考虑。合作小农也会提醒爱农会：哪几个人的鸡蛋不能要，因为是假的。而很多时候，在圩上碰到和真正到他家去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圩是生意，在家更像朋友。而这，正是爱农会想传递给农民的信息：我们是要和你做朋友，而不是做生意，我们之间的买卖是相互支持的。

当爱农会把和农民做朋友放在首位时，很多工作方法也在改变。爱农会知道：农夫不用化肥农药种东西很辛苦，所以一直用“合理”的价格来购买农户的土生良品，比如：鸭间稻4元/斤（市场2元/斤），土鸡18元/斤（市场15元/斤），土鸭10元/斤（市场7元/斤）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农户的交往一开

始就这样，因为这么做很容易让农户产生“这样卖很划算，可以得钱”的想法。不想和你做朋友的农户，下次就会拿几个“柳土鸡”（从圩上买回去的鸡仔养大，或是柳州市场拉过来的）来卖给你。

其实在爱农会看来，农民更需要的是一种认可。当你非常高兴地去欣赏他种的苦瓜、淮山，他也会很高兴的。而大多时候，支持价格的实现是在家访之后。但在另一边，爱农会价格支持的做法，被很多鸡贩议论说是“扰乱市场”。

2008年3月 反思与有意识地走访农户

到2008年春天，“土生良品”饭店运营稳定，合作农户大量出现。对食材进行认证、寻找合适的合作农户、确定下一步的种养计划——种本土黄豆，做腐竹、豆腐；种花生，榨油；养够一年的土猪；种植配菜用的辣椒、西红柿——可以进行了。

爱农会开始建立合作农户档案，用另一种方式向消费者呈现他们做的事情，让消费者跟生产者走到一起。同时，进行更为丰富、频繁的农耕体验活动。这已不仅仅局限在插秧、收水稻了，饭店所有食材的种养，消费者都可以参与，比如：放原生土鸡、种黄豆、挖子姜、扯花生……

和农户做朋友，需要在社区支持农业的体系下进行。像不放农药化肥一样，爱农会会明确告诉农民：市场上的优良品种未必就比自己的传统品种好；不要在技术不成熟、对市场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大规模种养，必须种养结合，种多少玉米则养多少猪，种多少水稻。也只有种养结合，才能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爱农会没有技术，技术都在农民自己手中，就是老老板的那种方法，都是传统而健康的。

爱农会做的家访，是对无农药化肥、无化学饲料种养的再次明确。爱农会很关心农户的化肥、饲料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把复合肥不当化肥……但也不仅局限于此。和农户做朋友，那么和农户之间的交流也是朋友间的交流。爱农会很乐意去农户家吃粥，吃点农户自己腌制的咸咸的酸菜，边吃边聊，同时去发现并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时间并没有带走家庭养鸡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同样也没有带走我们在生态养殖中所得到的数不尽的乐趣，更带不走我们做健康农业的决心与信心，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一起努力，一定会还大家一片蓝天，还大家一个健康的餐桌！

张彦杰 / 第三届CSA实习生·梁
漱溪乡建中心

鼓励还在进行的一些传统农耕习惯：越土，越健康；越土，越好吃；越土，越环保。

在这过程中，更多去和农户讨论种养结合的要点，也会根据饭店的需求，让农户帮种一些做豆腐用的黄豆、榨油用的花生……而对一些传统小吃、传统农具，爱农会更愿意和农户分享其背后的故事及意义，告诉农户“这个好吃，过年的时候也帮我们做点”，或是“你看，这个好厉害的，榨的油最香，不会做假”。

当然，和农民做朋友有时候看起来是爱农会的一厢情愿。因为彼此了解不深，农民把你当有钱的大

插秧时节，爱农会组织消费者来到农友田间，一起体验脚踏泥土的感觉。



老板，只是想着卖掉就成功。爱农会始终以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因为农户也需要进步。当爱农会创造出更多机会来增进了解时，也在收获感动。在爱农会的合作农户年会上，芝麻冲的韦春玉讲：她从来都不相信还有这么好的事情，请农民到饭店吃饭！她头天晚上还在考虑是不是真的。她说：爱农会到她家买鸭子，秤都没看，她还把鸭子喂那么饱，感到不好意思。她说：做人要讲良心，以后她家卖给饭店的土鸭，都要多养一个月。她讲：其实斤两是多不了多少，但肉质却是完全不一样，要卖最好的给爱农会。

中厂的农夫曾宪宝，因为看土生良品报纸上的“原生土鸡”看得比较仔细，以至于老是把爱农会叫成“原生会”。爱农会非常乐意买他的淮山，就一棵，种在牛栏旁，种了两年，六七十斤。他的鸡，他说不能卖给爱农会，因为是在圩上买的鸡仔，不是原生土鸡。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阿公，很久才来卖一次土鸡蛋，但每次都带着爱农会送给他的报纸，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三天赶两圩：江口里雍。直到现在的每天一圩：江口里雍，洛满、沙塘。

很多时候，是坚持，让“土生良品”一步步走下来。

【结语】 实习生是“活”在其中，所以他们的讲述，十分生动、具体与细致。有些有趣的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用爱农会的话说：“做的每一件，都是小事情。”不过细想下来，生活里的每件事情，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我觉得我们在从事着最有希望的事业。

任永珍 / 第四届CSA实习生·德润屋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真的觉得从容的生活态度很重要。在我们无法控制外部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抱怨，可以等待，可以暂时忘记问题存在，也可以就从我做起。

刘秋菊 / 第四届CSA实习生·梁漱溟乡建中心

真的都有它的意义，有它和宇宙的、地球发展之间的联系。当我们看得出这些联系，去做它们，完成它们，每天的生活就有了满足感。

爱农会有个朴素的合作农夫，叫刘以兵。他很喜欢画画，曾在柳州城的美工厂工作过。后来有感于环境的破坏，扔下画笔回乡做了农夫。有一次，“大学生”李明革写邮件分享他们之间的对话里感受颇深的一段：刘大哥讲，“大自然的生态的东西，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改变的。你喷除草剂，想让地上寸草不生，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用水泥抹在泥巴上，就像我们的公路一样。但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就算是在公路边，或是一些石缝里，也会长出野草来。所以这些生态的东西，不用去管他。你拔草，拔了又生，生了又拔，你说有什么意思？我开玩笑告诉村里的人：你买杀虫剂、除草剂，你以为杀到它们了，其实你是在杀你自己。”

她说：“和刘大哥聊天，我觉得非常开心。我会被他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和用心的讲话所感动。相信您也和我一样。”我的确是很开心，也在和他们以及其他朋友的同行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本文原载台湾《青芽儿》杂志第30期，2008年11月12日，此处有修订。结语作者为社区伙伴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前项目官员朱明。《青芽儿》是台湾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所发行的一份双月刊杂志。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于2003年成立，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它立足于台湾的“三农”在面对跨国集团所推动的全球化潮流下，致力于与世界各地的农民、与关心“三农”及社会良性发展的各方朋友共同摸索，开创出一个可持续的“另一种世界”。教学中心主持人：舒诗伟。联络方式：away1103@ms25.hinet.net。

与香港先行者的对话

时间：2008年12月1-2日

编者的话 很明显，CSA实习生项目以及爱农会这个合作机构共同为年轻人提供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扎下根来做事的点，更是一张不断延展、彼此互动的伙伴网络和资源平台。

而这些实习生们，反过来又成为这个平台或网络中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节点，因为他们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努力，不仅在爱农会和广西玉米研究所之间，还在横县几个有机种植农民协会、爱农会的合作农户，甚至远到香港的“自在生活”有机购买网络、台湾的“青芽儿”等团体和机构之间，逐渐培养出牢固而不断的“社区支持农业”伙伴关系。

也正因此，当对话项目为华明们寻找对话对象的时候，我们很快想到香港“自在生活”的杨宝熙。宝熙和社区伙伴以及四位年轻人很早就结下了缘，她不但但是广西的有机生产农户和香港消费者之间的“红娘”，还帮助组织香港“社区支持农业”考察团来内地分享相关理念及香港的实践经验，并在消费者教育和联结等方面，成为内地CSA实习生项目的重要支持者和同行者。

选择宝熙做对话伙伴的另一个原因是，华明们当时正在深入探索“社区支持农业”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一个需要着力的点，就是社会企业。宝熙从嘉道理农场到自己出来做“自在生活”的经历，恰恰可以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借鉴，另外她几十年来在公益和环保路上的探索和人生故事，无疑也能带给年轻人很多启发。而从宝熙这方面来说，她也希望更多了解内地进行相关探索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和面临的问题，于是两方“一拍即合”。

这次和宝熙的对话，我和社区伙伴的邓文嫦、薛启婵以及CSA实习生项目当时的负责人朱明也都共同参与。对话的内容远远超出之前预设的“社会企业”这个话题，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个人与社会理想之间、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与融合，从共同购买到CSA道路的深层意义和前景、如何理解农民和乡土、如何看待人和土地的关系、实习生成长路上的支持网络等等。

对话是在爱农会的“总部”所在地柳州进行的。到达柳州后，我们并没有马上开始对话，而是先融入这几个年轻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中。记得下乡的第一站，是生产土法腐竹的吴伯家。我们几个外来者才终于知道，原来可口清香的腐竹就是将熬得表面凝固的豆浆皮儿，灵巧迅速地如搭毛巾一般挑晾在竹竿上，稍稍定型之后，再放在大日头底下，从容缓慢地晾晒而成。

吴伯一家和这几个年轻人是那么熟络，亲密无间得像一家人。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农家院落里，当我们欢呼雀跃地品尝着此生喝过的最美味的豆浆、听吴伯娓娓道来如何精选上佳的土产小黄豆并如何制作腐竹时，明革和丽芬已经在轻车熟路地帮助处理刚刚宰杀供我们午餐的农家走地



2008年12月，爱农会的几位年轻人带大家到做腐竹的吴伯家，宝熙在闻豆浆的香味。

鸡和鱼。很明显，这样的活路和家务，是她们下乡时常常要做的。我之前刚刚知道明苹和丽芬已经茹素一段时间，于是很过意不去地悄悄将丽芬拉到一边，问她们会否很挣扎很难接受？丽芬轻柔地对我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下乡就是要入乡随俗，并且一开始就要共同准备饭菜、一起劳作。虽然我们不吃肉也不想去碰肉，但是家务不能挑挑拣拣的，我们也应该去理解老乡的生活习惯！”

丽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落一角绽放的温厚明朗的微笑，至今还不时在我脑海浮现。虽然串访农家的经历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长期去做，其实需要无比细致入微的用心，特别是要从农户的角度去体会并且承担，甚至，某些时候也和自己的个体偏好乃至生活哲学产生冲突。但这几位年轻人已经懂得用纯净、包容的心去体谅、体会和感受，于是即使面对彼此的差异而去坚持或妥协时，也可以是温暖和充满关爱的。

回到柳州，年轻人和宝熙的对话正式“拉开帷幕”。其中一部分对话是在几位年轻人的集体宿舍，边吃早餐边聊。他们的宿舍简单而温馨，这里那里的角落里，堆放着从农家发掘来的宝贝——农具、种子和其他土特产，最多的是无化肥无农药农家自种的食材，还有用野生葡萄和果子自己酿制的醇香清新的果酒。大家一边吃着农家走地鸡蛋、新鲜豆角花生、农家手工面条和粥、蒸出来的喷香的大脚板薯，就着醉人的野葡萄酒，一边在小饭桌旁你挨我我挨你地围坐着，开开心心地聊起来……

个人与社会之间，工作与生活之间

胡 佳：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如何把社区支持农业这个事情持续下去，反倒对于自己的生计什么的都没有考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华 明：因为这些农户和消费者，尤其是农民给我们很多的力量。我们现在是乐在其中的感觉，跟农民在一起，你可以不断思考很多问题：生活是什么、如何更有意义等等。我们也在接触其他一些志愿者，他们好像都有很多东西放不下，把工作和生活对立起来，好像为了工作要放弃和割舍很多，然后找到种种理



丽芬（前）与实习生伙伴进村访点途中

由让自己不能去做。但我们感觉没有矛盾，它本身又是工作又是生活，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可以持续的。

丽 芬：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整年都在家种地，那一年感觉心灵比较纯净。比如春天时种下土豆，秋天去收，挖开来看看到十个、二十个土豆在里面，很可爱，内心会感到喜悦。后来上完大学再回去就发现不行了，很好的菜还没有长成就死掉，扒开一看，根都烂掉了。就像大学校园里曾经美丽的银杏树，慢慢这几年树叶都残缺不全，叶子还绿时就死掉了，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是环境污染，但我能做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后来就找到爱农会，也遇到你们。所以，我更是从一个农民的角度去看社区支持农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农民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根据市场的变化去改变耕作计划，也不会只想着买卖。有时我们去找他们说：“你的姜那么好，卖给我们吧。”他就会说：“不行，它们还没长成，必须要等到最好的时候才挖。”他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对市场依赖得很严重。

以前我只是沉浸于个人感受之中，认为做这个很开心，还环保。但慢慢了解农民之后，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华 明：我们都觉得应该有很多人羡慕我们。

丽 芬：对，这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也改变了我们。过去我心情不好，就会到超市去买很多东西回来吃呀吃，现在我会去看说明书，很恐怖的：防腐剂、氧化剂、香精香料、膨松剂等等，我也知道了，很多原料都是化肥农药种出来的，所以，现在去超市常常空着手出来……

明 苹：而且我们的生活很好玩！我们一起去村里的阿公回来时，天黑了走在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感觉（真好），还有我们和七叔一大早去放牛、看荞麦花、拍照片，那种感觉呀，好美好哦。

宝 熙：这事你们已经做了几年，有没有觉得自己放弃了什么？是很自然走过来的，还是有很多矛盾需要去克服？

华 明：我和胡佳第一年在“人才计划”项目的时候，是在村里做合作社的，和社区支持农业没有什么关系。当时因为梁漱溟乡建中心还有各位专家老师的影响，都是考虑和想解决整个大的社会宏观问题，但真正做事时，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宏观和微观力所能及地结合起来。接触CSA和爱农会之后，开始看到和做很具体可操作的事，就感觉找到了结合的途径，我们和爱农会一起成长、摸索和讨论。我逐渐发现，做CSA时，我自己的理想和工作可以完全没有冲突地结合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我们认为，CSA回应的是很根本的社会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社会人之间的关系很陌生，隔离得很开，尤其是城乡之间，而我们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透明化，让消费者看得更清楚，只有了解才能信任。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关注，也很头痛，因此我们以健康农业为主，也是在回应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重新找回过去的那些土法，尽量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我们希望即使是金融危机来了，对我们的合作农户也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是它的意义。而且发展更多的农户来做健康农业并且让消费者更认可，这个群体就会越来越大，大家彼此支持。而我们自己也在里面生活。

宝 熙：你们不用“有机”的概念，却用“健康农业”，香港人是不太能理

解的。现在你们一解释我知道了：健康就是一种种养结合的状态，关注的不只是食物蔬菜是否“有机”，而是如何让城市和乡村、让消费者和农民之间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认识和关心，这是你们认为的“健康农业”。

华 明：这种健康农业，对我们自己也是健康的。我们过去搞小农合作，好像是我们带着公益支持小农的心态去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只有这样做，我们自己才能吃到健康的东西。

宝 熙：我觉得你们比我当初做这个的时候思考得更深刻，或者说更快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在这方面，你们更像是我的前辈，哈哈。

我是在嘉道理农场的时候接触到有机农业的。我也知道它是环保的，对生态是好的，但是在香港农业已经没落了，只有一部分人在坚持。其实在香港，农业就只是种菜。当菜农很辛苦，一般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接受性又很低，一方面觉得贵，又觉得这么多年吃那些不生态不环保的东西也没有死掉呀！所以在香港要推动有机农业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希望推动香港的一批有机农民，我们用的名词不是“社区支持农业”，而是“共同购买”，这个更直观更容易理解一些，而且毕竟香港也没有多少农业，主要还是菜农。“共同购买”要做的就是消费者联合起来向农民买菜，后来才发现这和CSA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当时的思路没有你们现在那么清楚，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香港农业的出路，因此我就有这个情结了。离开嘉道理农场的时候，我想把“共同购买”这个概念和做法推广出去，但是总觉得欠缺一点什么，所以2006年到柳州来看到爱农会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如何理解农民，理解农村

宝 熙：2005年初刚刚开始嘉道理农场的同事之间推行共同购买时，虽然说得很好听，“我们不是‘施舍’”，但其实心里还是觉得我们在帮农民找市场。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其实是他们在帮我们，是我们在“求”他们为我们生产出生态健康的食品。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七十年代，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

候，香港有一批年轻人是很“左”的，坚信“向工农兵学习，到农村去改造”等等，我也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个，但我们根本没有接触过他们。后来真的去做共同购买和CSA时，看到实实在在的农民，我们才真正觉得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养活了我們。

记得你们周会长（周锦章）对我讲过，他们也被农民骗过。如果不理解农民的处境，肯定会很生气，今后再也不要合作了。但是爱农会不会这么想，会体谅他们，因为你们和农民的关系很深厚很笃实了。在香港，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在过去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你们现在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关系。

现在香港的农民也不是传统的普通农民，大部分是带着有机或者环保的理念半路出家。我也是直到那次和社区伙伴一起去贵州，才第一次真正住在农民的家里。香港的农民是不能招呼我们住的，地方太小，但是内地的农村哪儿都能找到地方给你睡；香港的农民大多没有社区的概念，而且很多人的农场和自己的家是分开的。

华 明：我做CSA志愿者以来，对农村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是很机械地认为就是帮助农民，现在觉得我们谈不上对农民有很多支持，只是认可他们的东西，赞赏他们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合作，感觉到农民变得越来越自信。

明 莘：很多农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认为种出来的东西不好，甚至自己吃菜还要上街买。

文 嫦：那些合作农户今天的“自信”和你们有没有关系？是他们本来就很自信，还是因为和你们合作，他们越来越自信起来？

几个年轻人异口同声：这个都是慢慢互相影响的。

胡 佳：我们去找他们要东西，他们一开始就说“不好吃的，不好看的”，我们就说，很好的，这是健康的、好吃的。他们慢慢就发现这里面的意义和价值，很快就有改变了。

华 明：慢慢地他们也会用“土”这个词了，也觉得“土”是好的了。我们去吴伯家，他也开始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是土的”，猪是土的，鸡是土的。还有农民会开始说“有机”这个词。除了食材，他们也会联想到其他东西是不是有机

的，是不是土的。

明 莘：比如有一块田，用了除草剂后没有了收成，村里人就都知道化肥农药是不能用的。道理上他们未必懂，但是他们明白今后不应该用那些东西了。

华 明：现在我们鼓励农民主动把家里的“土”东西拿出来展览，他们也会很自信很开心，认为这些东西的确很有味道。这种活动还能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相认同。

宝 熙：你们和农民的感情这几年间有什么变化？不是说和某个农民，而是一个整体。

华 明：以前会认为农民是需要我们拯救的，农村也很落后需要改变，在梁漱溟乡建中心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周 衍：从昨天到今天，你们都谈到农村这么美好，非常理想化，但是也有合作农户的子女想离开家乡进城或者想离开饭店的工作等等，他们为什么总是想离开？他们的离开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农村不可能总是美好的，农村里的人和事也有好有坏。

华 明：其实去寻找这些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花了很多时间。碰到一些未必有诚意的农民，我们都会敬而远之。所以这里面，跟我们合作的农民，其实都是一种缘分。如果我们是一个维权组织的话，可能更关注苦难的一面，里面的一大堆问题啦矛盾啦，但我们是做社区支持农业的组织，我们更关注农民是如何看待土地、如何生产健康的粮食的，看他们那种心态……

丽 芬：还有，这个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种，和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关系。所以未必看到很多问题。

从宏大理念到脚踏实地

胡 佳：最初我还是“人才计划”实习生的时候，是被梁漱溟中心“洗脑”的（笑）。我们要去学通货膨胀、贬值、经济危机什么的，我是学理科的，对这个不感兴趣，感觉压力很大，觉得随时要被他们淘汰。

明 苹：但是你们当时也很兴奋呀，每天开会到凌晨一点都没问题。

胡 佳：当时是呀，我们要不断学习，学的内容想不起来就感到很惭愧。要学的名目太多了，太宽泛了，感觉要把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给你分析个遍。几个放在一起我就搞不清楚了，只能背一个标题：农民的联盟、要影响中央政策等等。

华 明：当时就说我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和市场对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农民应该有发言权。

宝 熙：那你们现在觉得农民需要团结起来吗？

华 明：还是应该团结呀，但是我们现在对农民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在这一年里，我如饥似渴地追求内心的成长，努力探求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与生活不断地碰撞与摸索中找到自我，找到未来的人生目标，并且得到了内心的平和。

辛春 / 第四届CSA实习生·沃土工坊



丽芬、明苹下乡探访，和农户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的看法有些改变了。农业这一块的话，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搞的。我们感觉到不能用产业化和规模化来搞。过去在中心是鼓励农民和市场对接，而现在我们更多的是鼓励农民种养结合。过去谈的问题很宏观……

周 衍：“人才计划”给你们留下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如果一开始就做社区支持农业而没有参加“人才计划”，会有不同吗？

华 明：如果没有参加“人才计划”，可能我们会变得比较小资。梁漱溟中心的环境给了我们宏观的视野，而且它也要求我们找一个契合点。现在我们就是在找我们的契合点，而且从这些小的具体的事情，可以看到背后大的问题在哪里。比如现在我们做的，背后是食品安全问题，是“三农”问题，这些都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之前没有这种视野的话，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理解，可能更多着迷于如何把一个饭店做好。

胡 佳：我在中心只是待了两个月就被安排到爱农会这边来，被爱农会“洗脑”可能更多一点。我受到的更多影响就是要去做一个志愿者，而且理解到有NGO，可以去做公益的事情，有一帮人可以这样选择和生活……

明 苹：我在晏阳初乡建学院（位于河北翟城，编者注）做过志愿者，不过只有一两个月。我的大学专业其实就是农村发展，但是全班除了我、丁华明和尚荣才这三个参加过“人才计划”或者在晏阳初学院做过志愿者的，最后做了跟农村有关的工作，其他人全都和农村无关。这也是“人才计划”对我们的长期影响呢。

当时“人才计划”那边，主要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做合作社文艺队，但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更看重的是与农户发展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信任之后我们给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而那些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农户的产品，我们是不敢相信的。这种对消费者生产者关系的理解，和乡建中心提倡的把村民组织起来统购统销、买化肥农药、增加购买能力、跟市场对接好像很不一样呀。

胡 佳：我们一般第一次和一个农户合作是给市场价的，要先看他们的质量，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好骗，我们还要回访的，这样几次之后就知道是否可信。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开展比较传统的种养方法，保持更好的土地和更健康的食

品，这样我们能给好的价格；我们也鼓励他们的种植连片，这样方便推动有机或者生态种植。我们会从他们周边的土地来考虑给价格，比如周围如果有甘蔗地的话，就不好了，甘蔗地是很恐怖的（单一种植、面积大，且对农药化肥过度依赖，编者注），但是如果这块地是单独的，或者都是连片的不用化肥农药的，产品价格就可以高一些。

文 端：你们好像都是谈跟单个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相比较来看，梁漱溟乡建中心更看重农民的谈判能力，如何去面对主流的市场等等，所以他们认为组织起来是很重要的。你们如何看待农民之间的互助关系？

胡 佳：我们不认为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中国是个小农国度，我们认为不应该培养小农对外界的依赖，而是希望单个的小农自给自足。

周 衍：你认为应该以单个小农家庭为单位，还是以社区为单位？

胡 佳：当然如果比较全面地去看的话，应该以社区为单位，社区自给自足，或者一个家族、宗族，因为农民对宗族看得很重。

周 衍：那么谈判性强，也可能有两方面，究竟是会让他们更依赖，还是让他们其实在某些方面像你说的那样自给自足？

胡 佳：我们认为从谈判性上，我们已经帮他们解决一点了。

周 衍：解决的只是合作农户的？

胡 佳：那当然了，我们能够去面对和解决的也只是这类小的社区，是做这些小而美的事情。我们通过对口合作，来提高这些合作农户的地位，改变他们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也能做到把这些进行复制，在很多地方。

文 端：其实现在你们的一些合作农户也走到一起了，有没有可能突破，变成另一种新的农民组织和联合的形态？比如我们过去总认为农民的合作就应该在同一个地域的社区里面，有没有可能不同地域的合作农户之间，通过沟通看到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尊严？网络其实也是一个互助的概念，所以这些合作农户可能不单单是和爱农会的关系，而是他们之间可能形成更紧密的关系？

胡 佳：我们其实是做过的，比如不定期根据农民的需求有一些互访，主要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我们离开大地自然太久了也太远了，远到忘记人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以为人类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是创始者。当自然的美好消逝时，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也许认为是它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这难道不让人遗憾吗？

饶琪弘 / 第四届CSA实习生·南岭会

是技术层面的。刘以兵是鸭间稻的专家，有新农户参加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他们去刘以兵那里考察，水稻种到一半的时候，再让刘去这几个农户家，看看他们种植的情况。每年我们都会组织合作农户的年会，请他们到饭店里来，做品尝会，进行技术上的总结整理传递。

华 明：比如做豆腐的那个阿姨，我们就会组织其他种土黄豆的农户把黄豆提供给她。

明 苹：其实就算我们不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在大榕树下聊天，或者是去别的公共场所，小商店、赶集等，经常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一起。

周 衍：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公共生活，我们未必需要去介入。但是他们的确也面临着很多新的威胁，比如市场全球化，比如很多村庄的年轻人都走出去不回来了。你们都关注农村传统的东西，但是这些传统的东西是在流失和缩小的。我们看到别的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尝试，就是想办法让年轻人返乡，因为单单靠一些善意的外来者的力量，虽然可能激发和组织当地探讨好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究竟只是暂时的还是可持续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哪个度上和空间上，是需要外来的力量或者新生力量的。

胡 佳：我们认为在传统的乡村社区，互助是非常普遍的，比如祭祀。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认同和参与。但我们做事的出发点可能主要不是从公共生活的角度，而是出于人对土地的感情，对土地的敬畏。人很早的时候对土地是有一种敬畏在里面的，在春天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到秋天的时候会感

谢土地给他收成。只有这种敬畏存在，才不会去索取索取，就不愿意去看到土地一点一点地僵化，不会去捕杀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活动是表达这种感情在里面的，可能他的确会受到很多冲击，但是只要一直能够去做，就能看到可能性在里面。

讲求规模，还是注意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动？

文 嫦：你们也谈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如果你们真的把这种紧密关系作为很看重的指标，那么就要考虑规模。如果你觉得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互动是很宝贵的，也是你看重的东西，它和扩展规模之间可能是有张力的。作为中间人，你们怎么考虑规模增长后农民和消费者的直接互动？

胡 佳：我们就算今后去做食材店，也不仅仅是为消费者提供放心食品，我们还要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发生实实在在的关系。就算每年发展得慢一点，一个两个地增加，也无所谓。这样的努力需要人力作为桥梁，让他们认识，彼此了解。

明 苹：那什么时候我们才“退”出来？

胡 佳：我可以一直做，这个桥梁搭起来了，我就去搭另外一些人的桥梁。共同购买的时候我们是用活动让他们走在一起，现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发地走到一起。关于规模，肯定是有界限的，比如一个饭店总是要饱和的，但是如果足够的人，就可以再去做一个新的店面，再去扶助另一群农民。这个就像食品特供一样，一个饭店，一群消费者，支持一群农民。我们希望的是这种模式。比如有些消费者很喜欢吃豆腐，他就想去看如何做豆腐，而且有些豆腐是可以专门根据他的口味来做的。他们不用通过饭店，而是直接去向生产者购买。我们希望支持这些传统的好的东西。我们就做两个事情，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传统的。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总在促进或者说是在保存一些好的道德的方面，比如祭祀，对老人的尊敬，这是文化。我们认为食物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个点出发，实现文化的传承。现在很多人是没有归属感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烦恼，所以需要这种东西，让他们感到内心平静美好。

明 莘：比如很多邻近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做豆腐的，因为我们的宣传才发现，以后他们就会自己去找，这样他们自己内部的关系就慢慢建立了。这些还是有用的。

宝 熙：如果消费者只是因为食品安全和好吃的原因去农村，而不在乎和农民建立一种很好的个体关系，这个怎么办？

胡 佳：这个不太可能，消费者要得到这些还是要想方法和农民搞好关系。

启 婵：但这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交易呀？

胡 佳：不会只是这么简单的。

文 嫦：对，比如今天我们去看了他们做腐竹。很多人过去没有机会，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改变，发现人性里面的好的东西，内心会转化的。当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担心：一个消费者到农民家里，也可能会有“剥削”的关系产生，比如说“我有钱，我想吃什么你就要给我种什么”，这个就危险了。

周 衍：农民也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你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比如对有钱的消费者说你可以多带点人来，我可以规模种植满足你们的需求呀等等，这样就不是你们希望看到的不迎合市场、可持续的种养结合了。

宝 熙：做消费者活动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去了就是拍照呀、好玩呀什么的……

华 明：其实这个很难控制，我们也不能直接对消费者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拍照也不可避免，他很好奇呀，这个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吧，我们还在摸索，不能说很有经验了。

胡 佳：我们在南宁搞了三次活动了，每次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出现，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我们的活动也有主题引导，而且在过程中他们还是能够慢慢找到感觉的。很多消费者下乡之后，都会告诉朋友很多有趣的很好的东西，然后就有更多人想去。

文 嫦：你们是如何把你们的态度和立场展示给消费者的？

胡 佳：首先是平等吧，对农户的态度。我们认可农民，这种打交道的方式

也会影响消费者。

一路风雨：宝熙在香港探索CSA/社会企业的经验

宝熙：我在做“自在生活”之前就是做有机豆腐，因为那时看到香港的豆腐不好吃，而且会放很多石膏粉。当时我们搞的合作社生产了很多黄豆，就找了一个豆腐厂，让他们用我们的黄豆做豆腐。

最初是有些朋友订购，后来我们就找那些做共同购买的机构的消费者来订，因为豆腐一次就要做三四百块以上。后来有一个律师朋友说，你这是在卖东西，要注册的，否则不报税，你就是偷税，而且如果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怎么负责？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办了一个NPO。注册的时候就说明，赚到钱是不会分给股东的，股东也不用拿钱出来做股份。当时香港在推动社会企业，我们也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企业，但是就用了这个名字。

注册之后就有其他朋友说，既然注册了就不要只卖豆腐，多卖点其他有机干货呀。但其实一开始做干货的买卖很辛苦，很多事情很琐碎。广西的米运到香港卖起来那个时候，几乎就要崩溃了，而且又要过年了等等，太忙了。后来我就对理事说：不做了，真的不做了。这些理事没有时间来接我的工作，但他们又觉得不做很可惜，就说：不要紧的，你休息两个礼拜再做吧。当时我真的很委屈，怎么可能就休息两个礼拜，我要放假两年呀（宝熙谈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刚开始我们把货卖给很多个共同购买机构的点，而消费者是这些共同购买点的志愿者，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有人就质疑我们，说你们是什么共同购买呀，其实就是中间商呀。我们的确就是中间的统筹，是下面的很多共同购买点和生产者之间的中间统筹。如果是做菜的共同购买，的确是可以让消费者直接去农夫那里访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因为香港这个也很少的。但其实我们也组织了三次去豆腐厂的探访。我们是在起桥梁的作用，而且尽量让透明度很高，比如说我们从豆腐厂那里拿货是多少钱，下面的点和消费者都知道，而且也会和共同购买点商量好，用什么价钱卖给他们，又是用什么价钱卖给

消费者。

明 苹：如果没有你们，的确我们横县的米不可能卖过去，香港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来广西看这些米如何生产的。

宝 熙：我也曾想过，不如把“自在生活”变成一个不做生意的NGO，只做消费者教育，就是一个社团，营业执照也不用拿了。那时一个朋友就建议说，不如你们去申请一个基金。我们就申请了，所以现在有了资助。不过最初他们只支持我们做教育的部分，对于做生意的部分不资助。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很好了，因为终于有仓库和办公室了。现在的这个半职的职员，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共同购买的消费者。

明 苹：你们的教育部分怎么做？

宝 熙：其实就是做讲座，做生态、健康、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和生产者之类的讲座。

明 苹：这样，其实把教育和实干联系起来了。

宝 熙：对的，我们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也是去验证我们的教育工作好不好，看消费者会不会因为理念的变化而转到这些产品上来。

文 嫦：不过在香港，虽然这几年社会企业炒得很热，但其实很多都是依赖政府的资助，是不可持续的。

宝 熙：关于这个，很坦白地说，我们现在只有两年的资助。如果真的没有资助了，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也许只能是消费者的支持。

挑战与展望

胡 佳：我们现在的烦恼就是，可以找到两三百个农户和我们合作了，范围越来越大，就需要有支持消费者的网络，因此工作量和过去很不一样了。现在她们几个人每天都下乡，而且要不断去发现新的东西，这就面临人力问题。

华 明：最大的困惑就是找人很难，找合作伙伴难。我们很需要人把消费者网络建立起来，再把农民这边的事情传递给消费者；我们需要跟进消费者的发

展，看他们如何和农民打交道，农民如何配合；另外，把农民的种植经验做成小册子，也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采访农民、记录等等方面。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能够细致地做。

宝 熙：所以主要有两块，一个是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一个是农民和农民之间的。但是农民这一块需要你们来做吗？他们自己不会做？

华 明：我们需要对合作农户非常了解，而且要把这些生产的过程协调好，这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找一个人的话，他的心态要对，他要很喜欢这个事情，对农村感兴趣。

胡 佳：对，这个人应该对农村很有感情。只要对农村有感情，就能很容易去做，也就会对消费者这一块很重视。

华 明：我们也在考虑做一个“自在生活”这样的经济实体，由我们自己来运作。找实习生和合作伙伴，也是想让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新的人进来要先去学习如何跟消费者和农民打交道，如何去建立消费者网络，去引导他们，然后再学习如何把两者衔接起来。我们需要有农户网络来作为基础，新的合作者可能去开一个新的食材店或者饭店，但是这个和之前的饭店是不会有冲突的，他会去发展出新的相对独立的农户网络。每个饭店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独立的网络。现在这种模式不是泛滥的阶段，反而应该更多一些，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有相同理念的人去组织消费者，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消费者主动出来组织农民。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着千姿百态的活法，关键在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做了怎样的选择，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怎样的行动。

谢雪梅 / 第五届CSA实习生·双山自然农园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手艺既是生计又是传承。我相信传统手艺人还会重新拾起引以为豪的手艺，而且传承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传统手艺是在当地有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经过长时间的洗礼早融入当地的文化里了。

丁华荣 / 第五届CSA实习生·爱农会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像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权利和空间，我们要学会善待每一个生命。善待我们自己。以一颗善心去重塑这个世界的美好。

王卫卫 / 第四至五届CSA实习生·梁漱溟乡建中心

胡 佳：所以如果有人想去做这样的一个饭店，我们是很愿意协助的。现在南宁有一家“土生良品”，希望我们为他们提供食材，但是我们告诉他，我们可以协助你去发展一个独立的农户网络，而不是在中间为你提供货源。如果一个地方饭店够了不用做了，我们还可以发展别的店呀，比如甜品店。如果有资金支持的话，还可以做得更宽，比如农庄、乡村博物馆等。

华 明：食物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家都要吃，每个人都关注，而且这个和农民的联系更加直接，因为农民自己也要吃。另外做这个我们压力也不会很大。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去做更深入的东西，慢慢地让农民都去做“土”的东西。这是一个过程。

实习之后再启程

编者的话 在这次对话以后，几个年轻人的生活都有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是继续他们的追求。华明结束了在横县项目的工作，来到位于漓江边的一家农村公益环保机构“桂林山水涅槃健康中心”做志愿者。中心由两位因患癌症而对健康生活有了更多反思的人士孙立哲和郭林创办。中心建有自然农业学习示范基地，向周边农户开展自然农业培训推广和合作，也积极向到访的游客进行健康消费以及“半农半X”生活理念的倡导，协助本地健康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华明和明苹结婚后，在那里过上了他们向往的回归土地、将农耕和社区支持农业相结合的生活。从华明博客里选出的这篇文章，可以窥其生活之一斑。

①山水涅槃的乡村生活

文/ 丁华明

第一次培训

在8月份，桂林山水涅槃迎来第一批团体客人。入住期差不多半个月。在郭林的盛情邀请下，我负责策划了一次“半农半X生活培训营”，和Ada一起设计了“自然农业”、“社区支持本地健康农业”、“吃在地，吃当季”、“情意自然教育”为主题的培训。其中的“吃在地，吃当季”活动就是带领客人一起到兴坪



华明与明莘在漓江沙洲捡牛粪做堆肥

——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

这个繁华的时代终将会曲终人散，因为它没有内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脚踏实地，劳动就是脚踏实地。坚决不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罗瑞君 / 第五届CSA实习生·沃土工坊

赶集，分组购买土生良品，回到山水涅槃之后按照小组设计的菜单各做一道菜，一起品尝。这个活动很成功，得益于兴坪街上还有很多的小农在卖各种当地的农产品。同时也得益于之前的赶集经验：我们要求购买小组要问清楚买来的农产品是哪位农民的、哪个村的。而山水涅槃在当地也找到了做豆腐、种蔬菜的合作农夫，所以我们也组织了客人去菜园里面摘菜，看做豆腐。做腐竹的阿姨每天只做一根腐竹，这是豆腐的副产品。山水涅槃有足够大的教室和设备，投影仪、电脑、网络也都有。以后搞中小型培训肯定没有问题。离兴坪不远的雁山镇，我们找到一位之前来过

“土生良品”的朋友，他有一个自然农场，开了近两年，这次我们也组织客人去参观了自然农法养猪场、果园。以后那边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好去处。名叫童志强的朋友很热心，并将他积累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对爱农会是赞不绝口。

饲养农场

在山水涅槃的院子里有近三亩的果园，里面的果树已经有近三年没有使用化肥农药了。土地的生机和活力在慢慢地恢复。现在已经长满了草和我们先后种上的蔬菜瓜果：郭林种的瓜，丽芬种的玉米、芝麻，小成种的番茄、Ada种的红薯苗、茄子，还有请来的阿姨种的豆角、葱花、黄豆、花生……每次去都可以吃到从果园里面采摘的新鲜蔬菜。

现在还养了猫、狗、土鸡、土鸭。不过我买的六只小鸭子只剩下一只，其他的要么被狗咬死掉，要么就掉到水池里面淹死了。Ada之前买的小鸡也所剩无几，要么被老鼠咬死，要么被老鹰叼走。后面就干脆买母鸡回来养，不过母鸡太野了，经常跑到没人的地方下蛋。这次还有一只母鸡带了一窝小鸡回来，之前还以为被偷了。果园里的鸡还有些是其他村民的，经常跑过来把菜苗吃得干干净净，好是可恨。所以在果园里已经播了差不多四五次菜种，到目前为止都是绝收的。

我在里面建了一个堆肥池，专门用来处理厨余，到目前为止已经派上用场了。只是缺乏足够的微生物来分解，还需进一步改善。接下来想在明年再建一个“席梦思”猪圈养猪。厨余利用更加充分，也种植多一点的饲料作物。

果园里面的果树经过我几次的修剪已经呈现出一点模样来了。在那草丛里还时不时爬出青蛇。明年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的百香果、柿子、黄皮果、金橘、橘子可以吃。

中水池的污水处理在客人多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失灵了，还需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和石灰放进去。上次我还把鸭子放到里面养。结果鸭子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再后来水多的时候无法在里面待了，就把鸭子赶上来，结果有鸭子想不开就跳进

去自杀了。现在剩下一只鸭子很可怜，它还经常做噩梦，常常在睡觉的时候猛地惊叫一声就醒了。还好有一只老母鸭陪同，不过老母鸭是西洋鸭，不是本地水鸭，听不懂它在说什么，也常常不理睬它在叫什么。

制作果醋果酒

果园里面结了很多的黄皮果，在Ada和我的带动下，大家采了好几罐来制作果醋。味道非常好，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喝完。Ada这次还拿来卖给客人呢。我记得好像是15块钱一小瓶。明年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百香果果醋、金橘醋可以品尝得到，也可以用来做汤、煮菜。因为这些都尝试过，很成功。只是这次没有喝到野生葡萄酒，因为刚发酵不久。下次去就可以喝到了。

那边的桂花也不少，用来泡酒也是很香醇的。

合作农夫与土生良品

我们在厨师小黄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愿意种植鸭间稻的阿叔。阿叔的老家是梧州，会说白话，对于稻田养鸭、稻田养鱼很懂。他说他在老家的时候就是这么种的，只是来这边分到的田块很散，加上已经年老而没有继续养鸭。不过他现在还在种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叫做竹尖的老品种，亩产量足有1200斤，而且很耐旱。阿叔使用的化肥也比较少，我们到田里一看就分辨得出来哪块田是他家的：没有用太多化肥颜色明显比较淡黄，叶秆也比较硬直稀疏。阿叔很乐意明年拿1.3亩田来恢复稻田养鸭。他家的鸡、鸭都很土。我们这次去拜访他的时候还连老母鸡一起抱了一窝鸡仔回去养。阿叔人很老实，他跟我们说用了除草剂和复合肥在水田里面。

山水涅槃申请作为安典（广西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编者注）的实习生接待机构之后，招了本地的一个返乡大学生小赵做实习生。小赵对自然农业很感兴趣，他家人也很支持明年尝试稻鸭共作。

这次我去桂林的时候还跟小赵、小成（山水涅槃的前台接待）、小黄（山水涅槃的大厨，到过南宁土生良品学习一个星期）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做腐竹的阿姨。阿姨没有用腐竹精，但使用的不是本地黄豆，而是河南豆。做腐竹的方法跟吴伯不一样，用铝板来蒸，底下烧开水，上面用竹条隔开一格一格的。爱人是杀猪的，也养了很多猪，不过都是喂饲料的。阿姨倒是对我们传说中的席梦思软床养猪法很感兴趣，很期待可以借鉴。

兴坪街是一个很传统热闹的集市，街上卖各种传统农产品的农民很多，要找到土生良品合作农户很容易。当地人也保留很多传统的农耕生活习惯，一直保留种植绿肥（当地种的是“鱼菜”），还有专门喂牛的麦草也很多。板栗非常便宜，我这次“国庆”去看到有一整条街专门卖板栗的。也经常看到挑各种各样草药的农民去赶集。漓江养的鸭子下的蛋比横县的鸭蛋土得多了，很多都是青皮的。当然土鸭的味道也很清甜。

旅馆初创

“国庆”期间有三天是客满的，还加了好些竹床。旅客除了郭林介绍来的朋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散客。有好些朋友临时没有成行过来，如果一起来的话真得让郭林、Ada她们晕头转向。客人普遍对这里心生喜爱。这是一个非常清静也非常有农村气息的旅馆。同时旅馆讲究环保，实行垃圾分类，不提供一次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他们一群不懂农业的城里人在发展有机农业，而我一个在农村种了十几年地的人，却抛弃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迷茫地徘徊在城市的霓虹中。我是不是应该为那几十年如一日耕种的乡亲，为那生我养我的土地做点什么呢？

姚慧锋 / 第五届CSA实习生·沃土工坊

性用品，吃本地土生良品，让客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品位、放心安全的好住处。只是现在旅馆还没有图标，没有简介，也没有做足够的细节去服务旅客，小问题不断。不过大家热情高涨，郭林、Ada、小成夫妇还有我都集体搬到三楼小间去住，让出房间给客人。我还在楼顶搭了几夜帐篷，正值中秋月圆，第一次体验跟月光如此亲近的接触，睡得非常舒坦。

（本文摘自丁华明2009年10月11日博客《CSA泥巴坊》）

编者的话 和华明的农场梦想不同，刘胡佳则一直对社区支持农业、将消费者与生产者相连接的工作感兴趣。2009年底，刘胡佳在爱农会的协助下，在柳州一个住宅小区里办起了社区农圩，每天把有机食材送到位于柳江边的那个小区。他是怎么做的？居民们会买吗？这样的尝试有没有前途？台湾“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的阿伟（舒诗伟）来到广西柳州，在“土生良品”与“社区农圩”扎扎实实待了一周，也给我们带来了生动的图景。

②广西柳州的“社区农圩”

文/舒诗伟

“社区农圩”

农圩，其实就是“市集”的意思。通常是几天会“赶集”一次。我在走进柳江江边的小区，看到“社区农圩”时，有种“意外”之感。原本想象的，是在一片公园或停车场或什么的空地上，会有不同的“摊位”贩卖各种农产/加工品、生活必需品，会在空气中飘着人声、飘着烧烤食物的香味，会有人来人往的各种活动……

看到的也没错。在一个约六坪的店面前的人行道边，在可坐下的矮墙上端、在靠店面墙壁边，是摆放着或挂着一些农产品、加工品。有当天清早由郊区农友

亲手摘取，再经运送、整理过的季节性生鲜蔬菜，如白菜、竹笋等；有经加工过的豆腐、腐竹、笋干等；也有当地特有的红米，豆类，还有生鲜的鸡蛋及偶尔在鸡笼中的一两只小农户饲养的母鸡等等。来往的顾客，有时是一群人，有时连个影子也看不到。只有住在邻近的小朋友，偶尔会跑来逗逗母鸡，打打计算机，或是在玩捉迷藏游戏。

这，也叫做“市集”？我想到那些在美国、香港、日本或台湾的一些“农民市集”，不禁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但是再想想：凭什么“市集”只能有一个样呢？然后，我又想到：每周开七天，如果要小农也天天在市集现场，来贩卖自己的农产品，那么，这又算是什么呢？



帅气的圩主刘老板

怎么冒出了个“社区农圩”？

目前，在负责“农圩”经营的，是小刘与小潘。两人皆二十来岁，是一对搭配良好的朋友与工作伙伴。

其实，于住户小区中开设农圩的想法，在周会长等人、在小刘的心中，这一两年一直在萦绕着。但要想能落实下来，而且还要能营运下去，这除了各种机缘外，还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吧。在开张前不久，小刘认识了小潘，两人情投意合，也有共同打拼的想法，于是，基本的人力，有了。至于场地呢？正好有朋友在小区中开设幼教班，三个店面的教室，用不完，更何况都是在晚间上课，于是多出的一间教室也

就分租出来，成为农圩的场地。那么有关筹设农圩的经费呢？那是由小刘自己掏腰包，“投资”了四千元人民币（约两万元新台币），再加上向一NGO申请了一些年度性小额经费，作为制作文宣、差旅与杂物的支出，于是行政运作方面的经费，也大致有了个底。

至于贩卖的货物呢？既然是开设农圩，那当然是要贩卖五谷杂粮，以及作为食材的农产/加工品。有关食材上架的标准，还是会有有的：土生的——柳州一带生产出来的，土法的——以传统方式种植、饲养、加工出来的。至于是否有“有机”、“绿色”或是“无公害”等认证，这倒不是主要的考虑。毕竟，我们也明白：在人世间，对一些事务，规矩如果是变多了，也就会与原本良好的立意逐渐地有了距离。

当然，货源、货物的质量、数量等问题，是农圩在经营上得面对的挑战。不过在这方面，“土生良品”饭馆，发挥出它另一种“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这里想指出：这新成立的“社区农圩”，在目前有很多方面，还是以“土生良品”为根本，至于将来能逐步地发展出自己的“货源”与多种社会关系，也是一个重点。最近，小区中的一些阿姨，已协助小刘在农圩中制作泡菜、腌菜，以便将来贩卖。这倒也是一种与居民新的关系的进展，也是种传统、家常式加工技艺的交流与发挥。这类关系，好像与台湾这几年新冒出的农民市集，也有些不同，而比较与传统市场类似。

货 源

“社区农圩”目前的生鲜食材，大都是由几户协力的农友，每天早上四五点于自己菜园中采收后，经整理、装篮，用小拖车开几公里蜿蜒的小路，送到大马路边，然后转给定时车班的公交车，把蔬菜转运到柳州的白沙客运站。饭馆的工作人员与小刘，则是于近中午十一点多去车站接货。载回饭馆后，再看有多少是给饭馆用，又有多少可载到农圩。小刘、小潘在算清要贩卖的蔬菜类别、重量与价钱后，就再转运到小区的“农圩”，经整理后上架。



社区农圩里的米粉

另外，每天由其他处送到“农圩”的，有豆芽、豆腐、鸡蛋等。至于猪肉，则是每十天膛一次。由郊区的合作社所共同养的猪，每十天抓一只，早上“烫”好，骨、肉分开后，再运送过来，现场分售。有贩卖温体猪肉的日子，也会有与饭馆相关的农户带着自己的生鲜农产或加工品一起出现，于是这时往往就是人来人往：做买卖的，询问的，聊天的，休闲的，好奇的，路过的……全都凑到一块儿。

至于一些较能耐久的谷类、豆类，以及加工过的，如米线、腐竹等，则是看需求状况，由饭馆来调度。

“土生良品”在支持“社区农圩”上，就我看来，也不光只是在食材方面，批货、运送等的人力、物力，也属其中。周会长也与我谈过：由年轻人来创业，投入这个能协助小农、照顾自身生计的产业，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以前，是没这个条件的，但现在比较可行。如果能让创业的门槛降低，年轻人就比较

——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现在在逛罗坑的集市时，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互相打着招呼，很多人也都知道我是做什么的。经常走到半路，搭别人的顺风车就回来了。我也知道，唯有认真工作，来回报帮助过我的人，回报这个世界。

毕凯 / 第五届CSA实习生·南岭会

容易进入，然后或可以持续地做下来。而且这条路，如果走得出来，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投入进来。

我觉得这也有它的道理：由小、易入门的事业做起，慢慢地再渲染出去。但只是有些事，我也在想，如协助尤其是年轻人在“三农”方面的创业、支持在地小农等，无论是在何处，好像更应该是政府该做的。

“社区农圩”的生意

开设农圩、农民市集或是店家，适当的地点，是很重要的。“社区农圩”所处的小区，约有1000户人家，居民约5000人。以前，由于位于江边，地理位置好，居民多为中上层。但这十多年来，由于人们迁进迁出的，已不若以往的状况，但基本上，还算是井井有条的，还算是宜居、有社区感的。



社区农圩小店前，刘胡佳和小区阿姨们一起研究土猪肉。

“农圩”贩卖的货品，一般是要比市价高一些的。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饭馆付给农民的价格要比行口来的高些，于是售价也变高了。但我看来购买的人（多为小区居民，或是居民邀外地的朋友过来）大多为家庭主妇，她们对价格，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这或许是食物的新鲜、干净与营养等，才是主要的考虑，或许是小刘、小潘会很认真地对有疑问的顾客，说明货品的产地、生产者与付出较高的收购价格。

比较让我纳闷的是：在台湾、香港，“有机”、“绿色”的食物，是比较有钱的人，或是生病的、不得不吃的人，才会购买的。而在这“农圩”，则是地方居民也会来买。或许是他们也认为：农圩货品的价格，即使比自己再走个十分钟即可到菜市场购买的，要卖得高些，但是“划得来”。东西，是不一样：一看，一吃，即可分辨出来。

贴近真实的生活

我问小刘：“在小区中经营农圩，和在土生良品饭馆中有什么不同？”

小刘想了想，回答说：“在饭馆，通常是客人进来，然后吃完饭就离开。我们在饭馆做土生食物的推广，是倡导性的。但是在小区中开农圩，就比较生活化，节奏比较慢。可以与居民真实地讲话，贴近他们真实的生活。”

即使才开张近两个月，“社区农圩”似乎已自然地融入小区一些居民的生活。中午，只要生鲜蔬菜、豆芽、鸡蛋等一到达，店门一开，即会有人过来。下午时段，来买菜的人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农圩没人气，有居民会在菜摊边聊天，话家常，或交流某种蔬菜的最佳烹调方式，或讨论检查鸡蛋新鲜度的方法等等。小刘、小潘，就我看来，倒是从这些家庭主妇身上，学到许许多多的生活常识。

没客人的时候，小刘会去清理菜摊，调整或添补些货品；或扫扫地，把环境弄干净些。小潘也会在旁做些事，或是记账。然后接近黄昏，下班回来的人多了，农圩又开始热闹一阵子；然后收摊，打扫环境，回饭馆。

“农圩”也不只贩卖现货，有居民想买特定品种的土鸡或是野菜，也会委托

小刘下乡采购时，代为选购。

由于才开张没两个月，小刘对旺季、淡季时段，还没抓得很准，只知道天气好的时候，有猪肉卖的时候，生意比较好。但不论是好是坏，基本上该赚的，能维持温饱的，还是有的。只是看多还是少，而非经营不下去。

“社区农圩”到目前，似乎已发展出一票“死忠”顾客群，每天非要吃“农圩”当天的生鲜蔬菜与土制食材。换个角度来想，我觉得这些居民，也真算是幸福的：就在住家附近，即使没有个自家的小菜园，但很方便地每天都可得到生鲜、干净的食物。

小 结

故事，其实是说不完的。由柳州的这个“社区农圩”，我似乎看到一种新的可能，那是不必得刻意标榜的，它自自然然地就融入了居民的生活中，而且提供一个可以让居民之间、买方/卖方之间、城乡之间相互交流、交谊、学习的空间。

它，未必要很大，未必得人多，创业的门槛也不算高。而只要它一旦开始运作，逐渐地，应会有更多的小农，更多的消费者，甚至更多的新创业者，可跟着滚动起来。

柳州的这个“社区农圩”，才开始运转不久，虽仍有许多的问题与有待改进之处，但它至少已往前踏出还算是稳重的一步。我甚至在想，由“农圩”切入，逐步地再带动起贴近当地居民生活的、各种在地的小店家，在地的食、衣、住、行的生产与服务，而这好像也不是不可能的。

（原载台湾《青芽儿》39期，2010年5月6日，此处有删节。

作者为《青芽儿》双月刊的责任编辑、义工。）

后记：年轻人的近况以及与其他伙伴 网络的联系

几个年轻人的想法，“跑”得特别快，他们的关注已经从社会企业和共同购买，转向探索集种养结合为一体的可循环的农庄、农圩，或者集生态农业教育和培训为一体的“半农半×”生活。他们也慢慢基于各自的长处和梦想，开始有多元化的规划：华明的农场梦越来越清晰坚定；而胡佳越来越坚守自己的“社区支持农业”梦想；丽芬则开始考虑自己在云南的小家庭，以及真正返回乡土的可能性；而明苹，还在不断地行走和探索，希望在明晰自己的梦想的同时，能和爱人在路上接壤，并肩而行。同时，他们也在慢慢地发现和拓展新的伙伴。

几年来，这些年轻人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社区伙伴CSA项目前协调人朱明是最直接的观察者也是亲历者。下面就是朱明与我们分享的这几个年轻人的近况。他们，在泥土和城市农圩间，将更广大的社会关怀、社区参与与自身每一天的点滴生活践行，悄悄地、圆融而喜悦地结合在了一起……

丁华明 在实习毕业后，留在横县项目点上工作一年多，后去了桂林“山水涅槃健康中心”做志愿者，主要协助中心农园建设和与农户合作。随后在中心的平台上，他申请了社区支持农业项目的“老实习生创业小额基金”，结合桂林双山自然农场在自然农法上的实践经验，在中心发展合作农户。2010年婚后，他和妻子明苹成立“泥巴坊”，与中心一起发展阳朔兴坪周边区域的合作农户。透过国内社区支持农业网络搭建的销售平台，在地开展协助农户进行有机生产、传统食物加工等工作，希望鼓励更多的人理解乡村、农业的价值及文化。2011年5月加入爱农会，现在土生良品南宁店。

李明苹 在2009年6月结束实习后，继续在爱农会的平台上，负责餐厅管理及

消费者教育方面的工作。期间，她申请了“老实习生主题奖学金”，去香港学习“社会企业”餐厅的文化塑造和管理。2010年6月，她去了桂林双山自然农场，在农场负责人童志强的协作下，开展农户及消费者网络的发展工作（该农场从2010年7月成为“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的新接待机构）。婚后去了阳朔兴坪，和华明一起成立了泥巴坊。2011年5月重回爱农会，现在土生良品柳州店。

刘胡佳 在2008年6月结束实习后，继续在爱农会的平台上工作，负责餐厅管理及农户网络的发展工作。2009年底，他申请“老实习生创业小额基金”，结合爱农会的合作农夫网络，和爱人一起，在柳州开办了“社区农圩”（土产店）。小店不仅仅是卖东西，他们和在农圩平台上的实习生一起，举办过小区厨艺大赛、儿童教育等活动。从2010年7月起，“社区农圩”也成为“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在广西的新接待机构。

明苹（后）和农户一起去看地的路上



杨丽芬 在2009年6月结束实习后，应聘社区伙伴云南办公室，参与生态农业和城市文化反思团队的工作。2011年7月底离职，现在昆明租了个小店，准备开土生良品餐馆。

在“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中逐渐形成的网络，成为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平台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连接了实习生接待机构、新老实习生以及在全国各地关注和尝试“健康耕作方式、城乡良性互动”的伙伴和朋友搭建起来的平台，并承载了多种功能：通过提供实习机会、参与培训、互相访点和网络互助等渠道，推动年轻人相互交流和学习，成为他们成长的沃土。

于是当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去探索和实现梦想时，不再只是个体单打独斗，而是在这个网络的支持下——包括专家、组织资源、一定的资金补贴等等——“空降”到一个之前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社区和项目点去进行探索，不需要白手起家，也不再像直接返乡务农的年轻人那样，不得不面对家人的反对，以及乡村社区里错综复杂的社会家族关系而可能带来的压力、束缚或障碍。

“社区支持农业”的接待机构与社区伙伴合作培养年轻人的模式，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弹性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将他们牢牢捆在某个接待机构或是特定项目上。当年轻人打下一定的基础，逐渐成熟，有了新的思路，希望开拓新的探索领域时，也有可能渐渐从原来的机构平台上剥离出来，前往新的伙伴网络或机构平台，进一步探索。与此同时，他们和原有机机构和伙伴依然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彼此给予温暖的扶持和鼓励的力量。甚至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努力和网络联系，能推动不同机构之间达成更多互补创新的合作契机，也因此为“社区支持农业”领域带来无限可能性及建设性发展空间。这样的有着更广阔空间和更大灵活性的成长网络，不是项目至上，而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纽带，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身处其中的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相互之间的关爱扶持。

因为篇幅的关系，文集所记录的，只是正在涌现的“社区支持农业”网络中的一个典型的群体。和华明们一样，这个大网络中的年轻人，也有分享相近的特质：热情、真诚，带着爱和梦想去生活并埋头苦干。他们也逐渐走出CSA不同的

道路：有些年轻人关注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国学教育的平台一起，在自然教育方面做尝试；而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平台上的年轻人，回应的是“三农”问题，他们组织“国仁绿色联盟”，希望能促进城乡之间的良性对接；而在华德福教育这一颇具特色的另类教育体系下的实习生，则更乐于探索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华德福的“人智学”指导下，延伸出在农业（生物动力农业）、建筑、艺术、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探索，并借鉴国外经验，摸索另类合作社区的做法……这些探索丰富了“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并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更重要的，也许并非“社区支持农业”概念或理念框架本身，而是这一群活泼成长着、因着对社区和土地的共同关注而走到一起的年轻人，他们心中涌动的爱和创造的力量，以及彼此的生命联系。

掩卷有感

一条青年与农村的会遇之路

文 / 张正扬 洪馨兰

同样是经历过内心的探索，这一章的“对话”收录了多篇相关报道，勾勒出几位年轻朋友在经历了人才培养与农村实习之后，自我探索并找到后续行动的过程。从这些“对话”里，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以及各自又有着不同的情怀与行动路径。我们读到一种逐渐成熟的热情，也参照到全球性的CSA运动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几位经由社区伙伴支持的CSA实习生，因其秀异的人格特质参与了关照中国农业议题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参加的年纪都相当年轻，约摸就在大学生阶段。在这个部分的案例中，华明或胡佳，则都在二十岁出头时得到了进入研习平台的机会，他们不仅在平台中吸取知识与能量，他们的实践行动后来也成为这些平台继续推展下去的动力。就像是文中的几位青年们，他们在乡建中心的“人才计划”中呈现的是一种思想的冲击，这种冲击不是来自于制式化教育体系里的教育，而是离开校园之后这个社会所提供的一个另类的管道。更有意义的是，民间NGO持续支持这些年轻朋友到农村进行直接的现场学习，整个扩展了他们的思想与实践间的对话。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对话有矛盾，但华明或胡佳似乎都觉得实习之后，在情感上有了根，梦想有了依据，因此，这种延续着“学习”的过程，让年轻人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农路，其中不会遭到断裂的考验。因此，我们在此首先要表达的，就是对于这些支持青年的学习平台的敬佩。

我们在文中最先看到的便是这种理念与实践的持续性——没有断裂意味着在

精神上可以持续地锻炼，而这些在精神上与体力上的试练，也让年轻人学会更为沉稳且宽广地思考，并且懂得在面对农民时撇开读书人姿态而更为谦虚。我们看到华明或胡佳等年轻朋友与农户接触的过程，那种细腻的对待以及体谅式的理解，都有着超龄的沉稳表现。同样是充满着热情，台湾的年轻朋友似乎就显得激情昂扬，这或许是两岸政治社会条件与氛围的不同。我们较为熟悉的台湾情形是：台湾的年轻朋友过去对于农业议题的讨论亦十分小众，这两三年因农地征收为工业用地的激烈议题，许多学者与NGO工作者的投入，使充满社会正义感的年轻朋友得到关注议题的能量，进而开始思索台湾的“三农”问题与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因此，是议题的力量把年轻人拉在一起，而不是一种常设机构。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年轻人对于农业议题是充满着愤怒，选择较为激烈的自力救济运动。但相对地，在华明和胡佳等年轻朋友的身上，农村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一种斗争性的结构，他们并没有选择具体的“敌人”，而是务实地走入农民生活的交换体系里，去体会另一种属于农村的思维结构的运作逻辑，并对农村民生进行可持续性的行动介入。根据文中内容所知，这种对于农村的关怀并非自小培养起来的，而是后天的思想建构而来，有这样的决心，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本章中收录了几篇年轻人自己写的记录与回馈，里面有感性，有理性，有微观的分析，更有宏观的视野。在他们这样年轻的年纪里，我们似乎嗅得了一种在他们这种年纪里相当稀有的“平衡”——他们尝试在理念、梦想、实践、行动间解决可能存在的矛盾，更努力在大脑（思想）与四肢（行动）间取得统一。只是有点遗憾：这种取得平衡的过程我们并不能在收录的文章中看到更多。取得思想与行动统一的过程里，年轻人是否经历什么难以超越的困惑抉择？从理想到现实的跨越何以如此顺利地就“想通”？遇到老同学时如何描述自己的转变？抑或遭遇否定挫折时，有哪些支持体系发挥过作用？又怎么启动？

因此，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观察：年轻人很少诉说他们自己与外界支持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大多选择谈论他们自己。从开始接受培训到后来走向CSA掌店或经营农庄之梦，这几位朋友的例子都显得相对完美，呈现出整个培训阶段的正面成果，以至于我们较难看到其他最后受挫选择离开的例子。他们的路径有

极高的类似性，从就学期间开始参与学生培训，然后接受民间NGO的支持进入实习，在实习之后逐渐有创业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以“适应”概念来谈这第二点观察，也就是具有良好适应力与适应不良的年轻朋友之间，他们曾经存在什么样的“对话”？是辩论，纠结，还是拉扯？

我们相当好奇。因为在台湾的经验里，最初充满梦想而决定选择进入农村议题正式工作的年轻朋友，其“阵亡率”是很高的。离开的原因难以细数，但在我们于美浓工作的十多年中，那些年轻人往往是经历一段痛苦的拉扯之后，才选择离开或留下，通常都非一路走来信念坚定。然而，那种“挣扎”与摆荡其实是相当宝贵的经验，这使得“留下”本身更令人回味与珍惜。回想因适应不下而离开的几位旧伙伴，其中不乏拥有高度农村意识与社会改革理念的年轻人，然而当真正进入琐碎细致的工作时，绵密且单调的组织行政工作就考验了他们继续留下的意愿。若单打独斗在农村里蹲点，往往缺乏组织的后援陪伴，或因既有社会网络派系的排外纠结，使他们难以为继。这是为何我们觉得在农村工作还是要用最大的心力发展在地组织的原因，就是希望建立更为永续的支持体系——即便单是在农村里建立距离现场最近的支持体系，所需要的能量就已经足以让许多年轻人必须投入在相对无聊且超时的繁琐行政工作里，而不是原先“梦想”中的农村工作。

实际上，在这个“对话”部分有个第一线角色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重要，那就是“爱农会”。在胡佳、明苹、丽芬提供给台湾《青芽儿》的文章里，对爱农会的工作内容有相当精彩的描述，而华明亦是在爱农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新伙伴。这些年轻朋友如何在爱农会里相遇、共同工作与摸索，是一段很有趣且充满故事性的过程。包括年轻人如何通过听爱农会周锦章会长描述早期创会的经过后，激发投入的意愿，以及后来怎样透过实习生计划，在爱农会里真真实实地贴近农村与农民生活，而不再是理念上的“想象”农村。我们的第三点观察是接续第二点来的，即这个建立在社区伙伴与实习生之间的“对话”，似乎较少呈现出这些年轻人与爱农会创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对话关系。进一步来说，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能在爱农会发展出他们的可持续性，实际上与爱农会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平台

是息息相关的，但从年轻人谈论自己的文章中，较少看到那些前辈们的影子。

换句话说，这呈现出第三个观察的重点：对年轻朋友们来说，他们对于在爱农会去接触农民或重新向农村学习，都是“有意识的”行动，因此他们会花很多篇幅去谈那种自生的农村意识，但对于爱农会为何“能”成为他们的学习对象，也就是爱农会存在的“社会性”，较不着墨。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像爱农会这样的团体？爱农会又为何从一个自立生成的群体，变成培力（empower）年轻人的平台？爱农会本身怎么思考这件事？是否曾经与年轻人聊过这个转变对爱农会本身的意义？等等，这类“对话”，在年轻人之间或许是较少谈论的。实习生关心自己为何而来，但对于来此之后对该实习单位影响的回馈意见，对于我们思考一个地方团队“如何”作为年轻人培养基地，是非常重要的资讯。什么样的支持体系是年轻人喜爱的、“阵亡率”较低的？抑或是什么样的团队特质、组织班底对年轻人来说，是具可持续性、可沟通且具有创造性的？这其实是思考爱农会何以能够“成就”这些年轻人、催生并延续他们的“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基础。

那些“梦”的出现是这个部分“对话”的内容主轴，而我们看到“梦想”的编织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摸索到行动。有趣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不是选择回自己的家乡；在前言中说他们未必能适时地找到得以安身立命投入的工作（萝卜坑）。在台湾，返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广大的大陆，但返回自己家乡本身的困难度一样充满着荆棘。台湾在工商业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许多人唱着“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歌曲，提着小包袱就离乡到城市里去找工作，而后落脚选择永远的离农离乡。这个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岛内大迁徙，相对于广大的大陆来说，在台湾，“返乡”的距离与困难度是小许多，且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对落户城市的致命吸引力。

因此，我们在这段回馈的最后一点观察就是关于“返乡”议题。根据我们初步的接触与认识，“返乡”这个议题，是近一两年才出现于社区伙伴的年轻人培养计划里——台湾则相对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生产力大幅解放，在探

讨城乡关系期间，“返乡”议题即沸沸扬扬地蒸腾着年轻人的热血。过去人们谈论到“三农”议题时，“乡”通常是“下乡”的概念，一个实体的“乡村”，有着具体的人口结构、土地面积、生产模式、种作形态等，这与后来我们所说“返乡”的“乡”，是不同的想法，后者是故乡或家乡，不一定有具体的地理坐标，甚至未必是偏僻的乡野农村。我们或许是受到台湾20世纪90年代“新故乡运动”的影响，“乡”作为哲学“共同体”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社会”，也就是“新社会运动”，把一个被现代化摧残的人群生活重新组织使其社会化。“乡”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可以建构的，因此“返乡”的意义在于重新使“乡”经由人们的“返”而重新社会化，重新组织建构成一个新的有机体。

因此，当这个部分的对话以“另一条‘返乡’路”为主题时，我们的理解就有两层：一层是作为编辑的社区伙伴将“乡”以第一层意义来解读，就像是这个部分的前言所写的——这几位年轻人虽未直接返回故乡却逐渐“回归土地”，我们猜想这应该是延续着“下乡”里“乡”的概念。从第二层次“乡”——即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一种相对于城市的乡民社会——来看，我们好奇题目中“返”的是什么？是具体的乡村，还是乡土？“返”对于那个乡土本身以及年轻人作为一个新的“乡民”，这两者之间带来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实际上，在这个部分的“对话”里，我们认为最精彩的第二层次，就是这几位年轻人如何与乡土之间的相互试探与磨合的过程，他们学习着乡土社会里的行为模式与逻辑，这一个部分是他们的“返乡”过程里相当精彩的地方。

“返”，必然相对于“离开”。曾经离开过才有“返”。比较可惜的是，或许受限于当时对话与提问的脉络，在这几篇“对话”内容里，较少提供给读者理解“返”的对应面的文本，也就是年轻人是否曾经经历过“离开”？又其“离开”的时间点与意义何在？或许他们的“离开”是社会大环境与家族期待共构下的结果，“回归土地”因此意味、暗示着这些年轻人曾“离开”过土地，只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让这些年轻人经历过那样的“离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过程。这对于提供读者去理解并诠释逼使人们离开土地的大环境，并理解年轻人的“返乡”（回归土地），都是重要的信息。

在台湾，我们几位农村工作者常常这样说：“台湾的教育只教人怎么离开，却没教人怎么回来。”长辈因为家庭与社会压力要年轻人读书、求取名利光耀门楣，所以读书是带着要人离农离村的目的。台湾的教育没有告诉莘莘学子，如果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如果向往贴近自然的生活，我们又该以什么方式、什么说法——应该问为什么需要个“说法”——回来以及“返乡”。正因为人们何以“离开”以及为何“返乡”实际上都不见得是一种单纯的个人选择，所以我们相信这些在爱农会实习的年轻朋友，他们的另类返乡（回归土地）并不全然是一种个人式的偶然，而是时代与社会的潮流把他们冲向都市，而镶嵌在他们身上的限制逐渐松绑，让他们走向农村CSA道路。人们常说“因缘际会”，因的是什么“缘”？际的又是什么“会”？这些缘分与际遇，不是凭空偶然存在的。在看似许多偶然形成的际遇里，实际上带着某种必然在里面——我们依旧相信，有好的支援体系，就有机会提供年轻朋友获得符合他们生命情怀的较多的选择权。

支援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建立过程。我们很钦佩社区伙伴以及爱农会扮演了这样坚强的支援体系，让年轻朋友们在其中获得如此丰富的自我对话关系。同样的，也是年轻人的努力以及高度的自省，让这种对话关系产生创造性与再生产，拉拔着后续参与者的信心以及源源不绝的感动。

附录

从红到绿，返璞归真

——杨宝熙谈共同购买

杨宝熙是本港（香港，编者注）推动“共同购买”先锋，成立社会企业“自在生活”（Life in Harmony），推动共同购买。她说欧美也有类似组织，一些农夫想种植健康有机食物，难以找买家，便组织起来找消费者。有时会直接把农产品送到消费者家中，又或把东西拿到Farmers' Market（农夫市集，编者注）上去卖，这种把农产品卖给自己住的社区内的人、而不是交由大企业或财团收购、然后卖到世界各地去的做法，统称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天然食物不能存放太久，包装简单，只有就地消费，所以叫社区支持，也不无道理。”

“共同购买”这个名词，源起台湾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台湾“主妇联盟”的环保妈妈，为了想吃健康无农药食物，发起找农夫种植有机稻米及有机蔬菜（台湾在1988年发生过桃园水稻田遭受镉废水污染事件），后来发展成“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会员现已达数十万之众。

杨宝熙说共同购买发展至今，有数项特色：首先，双方关系，必须平等合作，甚至有商有量，该生产什么、如何定价，双方先行商议；第二，生产必然是环保、对大自然有益及不用农药；最后，是双方共同承担风险。

本港环境较为特殊，实践方式仍在摸索之中。“本地农场出产较单一化，不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多元化，难以用一位生产者，全面供应一家全部食物。此外，本港社区感薄弱也是困难之一。所以现时我们共同购买的消费对象，多以单



宝熙（左一）与广西横县三叉村农民合影

位为主，如学校及志愿组织等。”

杨宝熙推广绿色产品，既推动生产有机豆腐，也出售干货、肥皂及天然洁肤用品。她说本港陆续成立不少消费者和生产组织，共同购买正在成形。本港也有不少女性，如由“绿色女流”衍生的“绿慧公社”，以回收食用油生产循环再造清洁用品，甚具创意。

火红年代转折投身环保

杨宝熙的少年时代，投入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到了火红尽褪，人生几经转折后，投身绿色怀抱。最近，她夫子自道，发表演说介绍自己的转变，以“从红到绿，从‘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总结多年来为不同理想奋斗的心路历程。

当年她是学运先锋，左倾反叛，思想激进，毕业后念了一年教育学院，仍找不到津校教席，最初执教私校，辗转再进入金禧中学封校后新成立的津校五育中学。

“1982年，老师们想教中国近代史，便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以国歌作抗日历史教材。当时的香港社会，普遍对内地政治敏感，校长激烈反对。”如今听来理所当然的事，当年却引起轩然大波。

及至1989年任全职主妇，最终至1992年，她决定到由几位中大社工系毕业校友创办、位于沙田大围的汇贤社会服务中心兼职。“汇贤不属社会福利署属下，而是私人集资，由十位志同道合社工组成。汇贤聘请不少人组织补习班，收到补习费后，再用诸社区活动，如环保回收及义工活动。”

“当时虽是兼职，薪水低微，但仍然全身投入。但到1995年，汇贤终于入不敷出而倒闭。”

有机耕作并合共同购买

1996年，杨宝熙凭着社工经验，进入了社联新闻部，四年后又转往嘉道理农场及植物园出任农业部行政主任。“嘉道理农场刚成立农业部，希望发展社区工作，思想前卫。他们认为兴办农业不能只追求技术，同时希望通过活动让大家认识社区和农业之间的关系。”

嘉道理农业部刚成立，她负责有机农业背景研究，阅读大量资料，赫然发觉有机耕作原来乃解决人类当前环境和污染的最大契机。“其实有机非单指不用化肥农药，而是指如何养好土地，生生不息，可持续生产农作物。”

2003年，杨宝熙转职为项目主任，推广有机耕作。嘉道理农场角色既教育农民、传授转型有机耕作知识，也教消费者接受有机食物。

当时渔护署亦推广有机耕作，却无法帮助农民拓展市场。刚巧杨宝熙接触到共同购买观念——外国消费者为生产者分担风险，让有机农夫维持下去，生产和消费互为其利。

“蔬菜统营处进行收购，再分销到不同地方，但统营处出价甚低，生产者根

本无以为继。外国却很早就看出，不解决生产者收入问题，根本无从提供诱因，让农夫投入有机耕种。”

2005年，杨宝熙前往台湾向主妇联盟取经，回港后逐步建立共同购买点。在离开嘉道理农场农业部后仍深信共同购买是发展本地有机生产的不二出路。于是离职后与朋友搞“土生合作社”，先在内地采购有机食物，再转售给社员和共同购买点。

不过，土生合作社是渔护署注册机构，规模有限，非商业经营，去年初终于结束，留下一批有机黄豆售不出去。

后来，杨宝熙偶尔读《明报》资深记者伍成邦所写文章，慨叹香港豆腐愈来愈没有味道，灵机一动，找豆腐厂合作，将剩下的黄豆制成豆腐；她又成立社会企业“自在生活”，继续推动共同购买方式，营销有机豆腐，转售共同购买点。起初厂方只愿承接生产任务，后来生意不俗，愿意自行生产。

“有机豆腐广受欢迎，厂方甚至应接不暇，除了健康，味道也是原因。”

“市面上普遍出售的豆腐，因成本关系，放入石膏比例较高。而有机豆腐利用古法，利用天然盐卤作为凝固剂。盐卤所用黄豆比例较高，卖相没有市面豆腐好看，却较天然和耐放，豆味浓郁，用水煮会愈煮愈滑。”原来有机豆腐非新鲜事物，古来有之，返璞归真而已。

不过“自在生活”处于草创阶段，未能收支平衡，每月的营业额大概只有两万多元，除了杨宝熙这个“一脚踢”的主席外，只有三位兼职员工，负责接订单，联络供货商、共同购买点和其他客户，收送货物等。最近“自在生活”也在大埔南华甫租下地方，除了存放干货，也预备将来举办活动，推动有机和绿色消费。

杨宝熙除了推崇有机食物，也向共同购买点推销古法炮制食物，如本地的“大仔豉油”，不致在工业化生产洪流中消失。

也许通过“共同购买”，至少能让一些传统风味不致只流为集体回忆。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事务处《中大校友》2008年12月号）

第三章

个人与社会之间： 扎根NGO的志愿者

编者 | 周 衍 薛启婵

写在前面的话

前面两部分，我们分别结识了一群投身“返乡”或者“返土”探索的年轻人，了解了他们的另一种生活道路选择，他们和师友之间的对话、彼此扶持，以及个人故事。

还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的探索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返乡”或“返土”，但也类似于一种泥土里的扎根——在底层里扎下来，投入和参与公益行动：他们进入NGO或志愿团体，成为专职的公益行动者或者志愿者，经历了至少一年在社区蹲点工作的经历。也是在不同的实习生项目平台上，经过一到两年的项目实践和底层志愿行动的磨砺之后，他们作出相似的选择，一种主流之外的另类生活形态。

这条路径，同样要面临很艰难的选择：目前的社会，更多年轻人朝向政府（公务员）、商业部门或者学术界的主流发展道路，而中国大陆的NGO和民间公益/志愿团体尚未具备足够的合法性，没有受到官方普遍认可，NGO行动和志愿服务这一新生事物也同样没有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对个人生活而言，参与公益绝对不是一条坦途：偏低的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和前景、社会以及家庭的不理解等种种压力……所有这些，让这群追寻内心梦想的年轻人经历了更多的挣扎、起伏和困惑。如何去平衡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家庭期待、社会压力等诸多层面的矛盾，探索个体在社会中多方面的位置/意义，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切实挑战。

何志雄、郭慧、唐婧、刘晓玮、韦罗东……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在下面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梦想与追寻。多多少少地，他们在不同阶段都经历过不同的困境，也一直在力图去平衡和兼顾。他们或许还在迷茫着，或许如今已豁然

开朗，但不管如何，都还在不竭地执著探索，他们拉起手来，互相倾听、对话和扶持。

同时，我们也会“邂逅”这群年轻人在数年探索中的“对话”师友：陆晓娅、郝冰、刘老石和曲栋……这些良师益友们，绝不仅仅是年轻人的倾听者和反馈者，更是共同的成长者、滋养者，NGO界的教育者和行动者，他们以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公益行动和生命故事作为养分和土壤，谦卑却又坚忍地与年轻人分享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的色彩。

何志雄：社会理想之重与个体之轻

编者：周 衍

编者的话 2010年初，去成都开会的路上，得知何志雄结束在南方工厂做工人的经历，回到北方天津，重新投入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工作，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给志雄写了下面这封信：

志雄，你还好吗？

很久没有联系了，你在深圳时就给你去过短信，后来听说，你似乎需要一段时间自我沉淀和探索，就先不去“打扰”你，但心里，时常惦念！

前两天听说你现在已在天津，希望你新的“阵地”一切都顺利。……前两天重温了我们河北之行你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录音笔记，也回忆起我们的横县之行，心里感觉很温暖，那些在南楼烤着炉火吃花生谈着“迷茫”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在广西红土地上穿越大江和村寨与丁华明和老乡们相遇畅谈的瞬间，实在让人怀念。也在这种回望中，我意识到，我们似乎一直在社会宏观思考和个体生活实践之间，寻找艰难的平衡和出路。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也是你这段时间进行不同的新尝试的原因呢？

……

写下这段话时蓦然回首，发现在实习生项目以及对话项目中，和志雄已经同行了一段路。

志雄来自湖北江汉平原的农村，从小承载着父辈们的期望，最终考上大学脱

离了农村，大学毕业后如父辈所愿在南方大都市广州成为一名公司白领，但在这条似乎前程无量的坦途上，志雄却失去了目标，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在经历迷茫、失落、反思和抉择之后，志雄于2005年义无反顾地加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去寻找人生另一条可能的出路。

在参与到对话的年轻人中，志雄几乎是最早就确定的理想人选，他也跃跃欲试，对项目提出了不少建议，并与我们一起参加过番禺的乡村建设工作坊，一起去河北南楼波仔和英子家以及衡水安全磊大哥家访点，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正在搭设的CSA平台为波仔寻找红薯粉条的销路，其后又前往广西横县丁华明处访点……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志雄已经超乎与某个固定师友“配对”对话的状态，而是在行走访点中，与我们、与不同的实习生伙伴一路对话并探索下来。

志雄清秀内向聪敏，爱钻理论，看问题深入又颇具批判性。走近志雄，可以感到他那种怀带社会关怀、天真纯粹而又倔强直率的气息，或者更贴切地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志雄跟上一部分的主人公丁华明和刘胡佳之间，有很多交集：都是先参加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再进入CSA实习生项目，更重要的，志雄也是一个一心向往“返乡”的人。然而，他最终放弃了很快返乡的期待，而是将梦想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某刻。目前，他以梁漱溟乡建中心为“据点”，行走在异乡的土地间，投身于为农民工、当地农民创造一个中国新农村、让更多人实现返乡梦的努力中。

也因此，当得知志雄在2009年七八月不辞而别，突然南下进工厂做工人磨炼自己，我大吃一惊。直到看到他的“归来”，收到他的电邮，尤其是读过他后来完成的文稿，我知道，他正成长为一个更坚定平实的前行者。

①何志雄：乡建五年

回首乡建，已然五年整，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新的开始，尽管天未明，但前方依稀透着曙光。

作为一个80后农村大学生的我，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方某大城市的一名上班白领。在外人看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和快乐。也许正如梁漱溟先生对儒家学说的阐释那样，人生命的本性应该是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大城市白领生活导致的压抑和焦虑，我挥之不去。我也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一度沉醉于哲学和心理的思考，陷入自我的藩篱。当我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走出去时，便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

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知道前途和方向，只知道要出走，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生命冲动的洪流，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迎接新的开始。不经意间，现在已经走过了并不轻松的漫长五年。从繁华城市到残破农村再到血汗工厂，从白领到农民再到普工，其间精神上的煎熬和痛苦，犹如三重炼狱一般。现实中的新农村建设更像是一场运动，又像是思想反省的历程。它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整齐划一的行动，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它虽说是乡村建设，但很多时候又不在农村，而在城市。鲁迅先生曾有过“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结。

而我，是偶然而又幸运地闯入了乡建的场域。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我来自农村，家乡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很美很美，但长久以来我都没有意识到。田野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玩耍的地方，学校则一般是令人讨厌的地方，但几乎每个孩子都被逼去学校。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好孩子都是要离开农村去城里上大学的。事实上，每个上到大学的青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应试教育所占据着。因此，我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并不熟悉农村。反而是我们从小就

电视中看到了另一个富裕的、丰富多彩的城市。

在参加乡建之前，我并不知道社会上还有所谓“‘三农’问题”的说法。在我十五年的正式求学生涯中，农村只不过是一个要离开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里，没有“三农”问题。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的成长，所受到的教育，特别是有机会接受的高等教育，它真的只告诉我们要离开农村，它给了我们一个现代化生活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上大学，找到好工作，过城里的生活。在农村的父辈，他们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和价值观。借着这种理想和价值观，家庭、学校和社会就将“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理想和价值观传递给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在这里断裂了，它无以为继。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稳定的，它的文化也是可持续的，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理想和价值观，能够在以后的农村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然而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他们在意识中虽然形成了一套“现代化”的理想和价值观，这个社会却似乎并没有给予实现的空间。也许正是现代社会的这一悖论，导致了很多青年思想上的矛盾和精神上的苦闷。五年前，我刚离开大学走入社会生活时，也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会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困惑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不知道为何而活着。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自己就像原子一样孤零零的，水泥丛林，心灵荒漠，让人痛苦。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渴望找到人生的理想，对于我，理想已然是一种解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终于，短暂的工作后，在同学建议下我辞职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在此之前，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只是为了出走。事实证明，我来对了地方：原来，这个时代还是有一小部分青年大学生，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掀起了一股理想主义运动；他们用实际行动，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支农调研。他们喊出的口号让人振奋——关注“三农”，塑造自我。这一切，在我曾经的大学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如此的庸俗和市侩，但是这些可爱

的大学生却营造了一个清新的、激情的理想主义氛围。当我走入这个场域中时，很快就忘记了以往所有的一切，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画着自己的理想。在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中，理想就是希望。

我对于农村的种种表象并不陌生，乡建中心的宏观理论培训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开始思考关于农村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发展忽视“三农”的情况下，仅仅从美好的愿望出发，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呼吁要依靠农民自主合作来自救。乡建中心将推动农民合作作为一个主要的尝试方向，这也是志愿者下乡的主要工作。可是，对于什么是合作社却众说纷纭。一方面，我们借鉴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原则，移花接木。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发起过合作化运动，过去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多借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记忆和想象中，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开展新乡村的建设。而对于农民为什么需要组织起来的理论解释，在新一轮乡建运动代表那里可能被如此表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并完善，农民作为市场的交易主体，自身却分散原子化，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太小；农民远离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此种种，必然导致大市场下小农户交易成本太高。所以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在于“三农”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作为参与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志愿者，刚开始，我们热切地帮助农民成立任何形式的组织，只要组织起来就是好的，无论是公益服务型的协会，还是经济性的专业合作社。可是，在不断的尝试与失败后，农民的行为和想法促使我们不得不将合作的重点放在经济上。因为农村的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人都认同发展经济的第一重要性。至于农民合作的文化、教育、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只被看成是发展经济的辅助手段。各种金融互助、购销合作、生产合作等涉及经济的农民组织被作为实践的重点方向。

我们的参与程度逐步从合作社外围的文化教育管理到合作社的经营、分配，一步步深入进去。但在具体的经营实践中，任何的理论逻辑都显得黯然失色，耸立在合作社面前的是商业资本的高峰。尽管合作社因此有了收益，但我们知道这建立在巨大的外部援助之上，外部承担了合作社的种种成本。如果从经济的角度

来看，这样的尝试根本无法持续。大部分志愿者都是短期参与合作社的发展，至少短期看起来不太可能扎根农村。

这样的局面让我不得不思考合作社的意义和可持续性。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单纯通过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在我看来普遍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农村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农民被束缚在生产这一环节，其他有利可图的流通、加工、信息等环节都被垄断。在整个农业经济链条中，农民没有任何主动权，他们依赖市场，可是所有商品的价格不由他们控制。我不知道我们仅仅从经济方面做农民合作的意义何在，以往那些简单的想提高农民收入的想法，此刻动摇了。

我为自己从理论上建构的理想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从城市出走，有很多理由，可是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梦破碎，那农村对于我还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否仍然要从农村再次出走？虽然青年大学生下乡提出“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的口号，虽然对农村满怀感情的知识分子提出我们要到农村去寻根，可是这一切都还是无比模糊，当这一切进行时，很多人也许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要什么、根是什么……

之后，在我一边做合作社工作一边苦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重新认识了农业。事实上，我早已见惯了农业生产的流程。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生产，建立在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基础之上，农业生产者普遍只追求劳动果实的交换价值，这一劳动过程不是与工业化流水线生产无异么？先不论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给环境带来的巨大污染，在利益驱动下人们过分追求产量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已经严重威胁农业安全了。如果说工业生产过程可以机械化，以经济单一目标为导向，那么农业的生产过程则必定与农村社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正是当前资本控制下的小农经济，才导致农业生态的破坏和农村社区的衰败。以往，我仅仅只是在经济理性的逻辑圈里认识到农村的落后，以致将农业本身作为一种落后的代表排斥，而没有意识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对自己盲目要求农村现代化的信念进行反思，农村并不是落后的。从这里，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建立起反思“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想和价值观的自信。

我开始深深地认同某种健康农业，它甚至给了我返乡的自信。我们这一代青

年对农村落后的看法和不自信，往往是农村当前的文化和舆论氛围影响所致，农民自身也从内心里放弃了农业，他们不希望青年回乡。我希望唤起他们对农业的兴趣，燃起一种新的社区文化的希望。

于是，我们在农村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一边和合作社农民朋友做生态农业种植，一边做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消费者运动。适逢社会上食品安全问题越闹越严重，我们借此舆论氛围推动城乡互动，希望以另外一种途径来解决农业与农民的问题。我们还试图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搭建绿色联盟的服务平台。

在逐步的实践之后，我们也亲身尝试健康农业的生产。我开始体验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角色。对于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来说，最大的尴尬就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生态农业。这不仅是我个人身上发生的问题，这在当前的农村是很普遍的。我试图弄清楚横亘在我们理想面前的客观现实。

但是，在农村的生态农业实践，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农民并不太理解。我们想象的某种基于生态农业的农村社区合作文化，看起来有点遥不可及。传统小农社会在小区域范围内是自给自足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区集市是他们生活关系的节点。但现在的小农社区，却处在全国性甚至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末端，货币成为这一庞大链条的纽带，交换成为普遍的关系，看似彼此靠近的农村社区，其实已经分解了。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都自愿或不自愿的外出务工，使得我们在农村里的任何实践都看起来没有意义。我已经不认为在农村范围内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三农”问题受制于整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我已经无法再为自己构建理论的理想，理想终归不是解药。

我以一种似乎逃避的状态去了农村青年的聚集地——“世界工厂”。在这里，我成为一名普工，不需要建构理论。在这里，一切都是流程。我看到了真正的现实，不加任何理论掩饰的现实。一个不再通过理论思考与社会联系的个体，作为一个消费主义者而存在和生活着。以往如此之多的理论思考显得很荒唐，它离现实生活是那样的遥远。甚至，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去思考社会，一切不都是个体的事情么？与他者、与社会何干？

在南方沿海工业区血汗工厂的经历，促使我回到了现实充满矛盾的生活中，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不管从事怎样的工作，都需要在工作中学会生活，在生活中学会享受，这样自己的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生活最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贺天博 / 一期实习生·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无可逃避。我五年的乡建历程，从没想到过最后的一年会是在工业区与千千万万无差别的农村青年一起度过。现在，虽然我不再刻意去工厂当普工，也不一定长久呆在工业区，但我也不会再出走。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工业区，哪儿都一样，我将会继续我的实践，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我回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原点……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每个人都在感受和经历这个复杂的社会，并给出不同的话语和行动回应。我的五年乡建生活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社会的运转逻辑以及我自己。回首往事，我一开始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自身的问题，而是时代的社会问题在个体身



2010年，何志雄与梁漱溟乡建中心团队去张北草原闭关学习。

上的烙印。社会给予了我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命运却又让我来反省和解剖自己的思想。也许我在乡建一路走来，伴随的是挣扎和苦恼，但最终还是让我坦然接受这反思的历程。

五年来的学习和成长，得益于乡建中心这样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融入进去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同体。没有这个共同体的支持，我想自己不可能走得那么远，也无法坚持下来。单凭理论建构不可能解决现实社会的既有矛盾，它需要更多如乡建中心这样的共同体通过实践来回应。

哪里都是社会，没有什么是个人的事情，我不再需要出走。而在每个人的参与下，理想会变为现实，社会终将变得美好，对此我充满信心。

编者的话 志雄的文字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从主流社会“出走”的年轻人在投入乡村建设这一巨大社会议题时，不断面临个人困惑、心灵挑战，并不竭寻求答案的探索过程。

因为是一份内心独白和个人总结，他在文中并未过多提及这五六年来乡建路上的对话者和同路者，他与他们的碰撞和相遇相知，但同行的我们深深明白，他是多么努力勤奋地在这些伙伴和团队中汲取能量和灵感，并沉重而丰富地思考着。

梁漱溟乡建中心，就是志雄成长并最终坚定乡建道路的最重要的平台和共同体。

志雄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离开公司后），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志愿者组织——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这个全新的团队和领域里，理想、集体、辩论、反思……一切都让人感到希望和兴奋，这里与当初体验的那个大学与社会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我对梁漱溟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人的生命活泼泼、勃勃向上的信念。一个人在悲观、失望、焦虑甚至绝望中，没有什么比这种生命意志更能拯救他，乡建中心青年团队的理想氛围激发了这种生命意志……通过这个平台，在随后的六年中，我参与了大学生支农倡导和培训工作、农民合作组织工作、城乡互动交流工作，然后投身城市工业区，成为千千万万农村青年打工者中的一员，进而参与到农村青年打工者群体的服务工作……乡建中心提供

给我广阔的空间，让我走进一个又一个社会工作领域，面对不同的底层群体。让我能够坚持对理想的追求，并在实践中探索，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性与精神的双重力量，让自己更加坚定地走在理想道路上前行。”

但在这个年轻人共同劳作生活和进行乡建探索的另类共同体中的成长，也绝非坦途。下面是我们和志雄在河北南楼波仔家访点时的一段对话，我们可以更具体鲜活地感受到志雄迈入乡建行列以来，在梁漱溟乡建中心平台上不断的挣扎坚持，在“青年公社”的共同体内，与周遭师友互为扶持和思想碰撞的过程。

②与志雄的南楼对话 2008年12月

宏观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之间

周 衍：志雄你的迷茫是什么？

志 雄：我的迷茫是，在将来的方向上，其实我想得挺多的，但是，问题却解决不了。

周 衍：你是说返乡吗？

志 雄：返乡也迷茫过一阵子，但现在不迷茫了。那时候是返乡也返回不去，家乡的那个舆论，让人都不敢去面对。我现在的迷茫，可能是自己做的事情和宏大的目标挂不上钩吧。

周 衍：那么你渴望怎样将具体的事情和社会理想结合呢？

志 雄：比方说，我对安金磊做的事情曾经非常羡慕和感动，那时恨不得马上就跟着他一起去做。他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只是隐士一般的、挺土地禅地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安大哥谈到自己的期望，是改变中国的一些农村问题，改变机械化的化学的农业状态，他是很明白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目标的，在这个前提下，他能很踏实地做他的事。

周 衍：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到像他那种状态，才可以静下心来做事？像他一样，有着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理想？

志 雄：对，我觉得，我没搞清楚自己的想法就跟随他去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他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很多人把社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人心上来。我宁愿想着这个“三农”问题是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啊，甚至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剩余价值的博弈，否则，我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觉得真的是绝望了。我有很大的社会目标，希望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但是，在这个宏大的目标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什么，就会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急着去投入行动。但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脑子里也不会关注真正的目标了。

我为什么愿意看那么多理论的书呢？其实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联系不起来，在做事情的逻辑和大的理想之间。所以就很困惑。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啥也不看，随便去找一件完全不用动脑筋的事情去做。比如，淘厕所，我最喜欢干那个事情，完全不用动脑筋。

大 君：哈哈，还有洗碗。这两天你都抢着洗碗。

志 雄：（乡建）中心大门的锁，是我保养得最好。还有淘厕所、涮锅什么的。比如刷盘子，我就不停地刷，那段时间是空白的，然后盘子就刷完了。

周 衍：但在那个过程中，究竟你是逃避另外一些烦人或者想不通的想法，用一些重复性的动作来填补和移情，还是你就是享受劳动的过程？

志 雄：两者都有。一方面是强迫自己不想那些东西，但过程中，也的确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又脏又累又臭。有劳动的享受在里面。但干久了又不行，这些事情总是做得完的，事情做完了，还是困惑迷茫啊，虽然也能从中找出很多好的方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路，别人的路不一定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我更现实的是如何在中心一边思考一边做，解决自己在做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周 衍：你和丁华明都是从乡建中心“人才计划”项目出来的，然后又转做CSA的实习生，现在也都在做和乡村和CSA有关的事情，但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都蛮大，思考也很多。那么你觉得你们的思路有什么不同？

志 雄：可能他比较集中一些，专心呆在一个村子里做健康农业。而我这里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承载NGO的，更多是社会的需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既然有些人可以在财富中找到满足，有些人在权势上感到愉快，一样也会有些人可以在NGO中自我实现。

曾传真/一期实习生·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

事情会多一些杂一些，我要关注中心很多合作社的事情，以及绿盟^①的事情和健康农业的事情。

关于乡建中心团队

志 雄：关于理想和琐碎事情的话题一直是中心重点讨论的。那么多人在一个大院里一起住着，就有点像是居家过日子，你说平时会有多少琐碎的小事情要做啊，像烧锅炉、生炉子、做卫生……当大家心情好时，做这些琐事就是一种休闲了，很乐意去做。但很多时候恰恰是在一部分人情绪不好时，又不得不去做，这就很难以忍受了。

周 衍：是呀，你们就是一个青年公社一个共同体，这多么好但也多不容易呀。我想问个八卦问题，在你们中心这个共同体里，带头人老石其实不太愿意关注个人生活，考虑的都是国家、社会、集体，但是最近他又热衷于撮合你们这些一对一对的。这里面是不是也挺矛盾的？谈恋爱是个人生活，是两个人的事，那么和老石以及你们中心强调的集体主义和公社生活之间怎么结合？

志 雄：的确是，老石现在真的很关心，他每次都讲，哈哈，过几年你们都要结婚的，中心要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不怎么讨论，反倒是他老喜欢讨论这个问题。

周 衍：哈哈，他可能生怕革命队伍流失，一定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解决。

志 雄：中心以前还规定不能谈恋爱，其实就是

^①全称“国仁绿色联盟”，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领导的新乡村建设中所成立的一批农民合作组织的经济联合体。绿盟成员合作社愿意通过农民合作生产的方式，承诺采用绿色健康的农业生产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农副产品和服务。

他规定的，但是后来也被他自己给取消了，结果一年一下子发展出来了十多对。

周 衍：那大家在一起如何过一种共同体的集体生活？这个状况毕竟和一般的家庭生活不一样。

志 雄：我们说过，呵呵，在这里结婚的可以分一间房子什么的，还有被子。至于谈恋爱的方式，反正是很少有私人空间的，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基本上一个月平均只有一天两天可以出去。

周 衍：大家都很认同这一点？

志 雄：也没觉得有太大问题，真的。甚至还有“找错对象”的，本来这一对在一起，后来发现不对，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是旁边的一个。但是大家也没有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什么矛盾啊。

周 衍：是革命伴侣吧？经历这种集体生活和共同做事的检验。中心这样的团队真的很与众不同，对很多人而言，工作和生活都是截然分开的。

志 雄：你也可以不在中心那个院子里面住，其实里面都是男女生集体宿舍，哪有一点私人空间？所以曾经有一对有一段时间就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附近。中心也会给一定的补贴。

周 衍：是吗？那大家会不会因此有隔阂感？

志 雄：不会。其实大部分的活动时间还是在院子里面，还是大家在一起。

周 衍：这样的氛围，可以让你很少去考虑个人的生活处境，因为你甚至连感情都是在这里生长出来的，似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交付给它了，不需要离开。所以，你根本不去想你个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这一点曾经让我很费解，现在我明白了。

志 雄：可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面，考虑得更多的是大家怎么共同去做事，怎么去使目标更清晰化、更可执行。不过，大家也经常讨论这种共同生活，集体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我们真的经常讨论。讨论结果往往就是没有根本矛盾，或者说一起考虑怎样促进事情往更好的方面发展。所以中心也很少发生个人之间的矛盾。

编者的话 “集体讨论”确实是梁漱溟乡建中心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大到工作方向，小到吃喝拉撒。下面这个发自2011年元旦的群邮件，是因锅炉熄火没有暖气的事情引起，来来回回共三十多封信，貌似只因“取暖”而起，却像其中一个学员所说，是在“认真地讨论关于生活与工作、个人与集体、现实与理想、改造自我与改造社会这些很核心的问题”。从这里节选的几封邮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心的风格。

③关于烧锅炉的集体电邮讨论

梁云燕

……在风寒刺骨地赶回中心时，本想回到“家”就可以好好暖和休息，然而回“家”后，锅炉灭了，煤球灭了，似乎中心没人似的，无人照看。

……中心“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口号现在想想真的很空，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克服自身的惰性、自私时，中心也只能是一盘散沙，那又何以言谈去改造社会……

刘老石

……首先我想问一下在中心留守的同志，你们感觉到冷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像寒号鸟一样缩缩脖子，用衣领把脑袋盖上？或者干脆钻进被子里面？

……我再问一下留在中心的同志，你们有没有想过要为此集体，也就是说你们赖以生存和奋斗的集体操点心？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暖气冻了中心要有损失，大家都要挨冻？你们在内心是如何说服自己把如此巨大的损失置之不顾的？

吴丰恒

……灭火什么原因大家了解没？今天有值日负责吗？假期谁不想多休息一会儿

啊！人之常情，不用上升到涉及本质判断的程度。大家在一起相处了那么长时间，彼此有怎样的性格、习惯、品质应该很清楚，不用相互指责，总这样伤害感情。

……中心这么一个大院子，至少需要聘请一个专职的后勤，管理公共的空间和劳务，私人的空间自己处理。这会给大家减少很多工作外的负担，平时不用为那么多小事计较、烦心……

梁少雄 —————

……如果不能把事业和生活融和在一起，那这种事业很大程度会脱离实践和人民群众。有些事，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值日和干一些活会是一种负担或硬性安排呢？后勤包出去？那要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干什么……

刘老石 —————

……中心这种组织方式其实是想让大家广泛参与，我们只有自己更多地主动参与才能够形成互助式的生活，才能实现成本内化，用劳动替代资本。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是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来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和牺牲其实是为了把阳光变成温暖给别人……

魏丰收 —————

……我们几乎所有的宿舍都乱得像个狗窝一样，我们的办公室、会议室、厨房、菜地、院子，大多时候也总是一副杂乱荒凉的样子。……如果我们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打理不好，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管理不好，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妄谈国家的治理、世界的改造呢……

何志雄 —————

……大家是否想好了要还接着做10年、15年、20年？真诚地问大家这么个问题。如果是，我们该把那些最基本的做好……

编者的话 在这样一种坦诚直率的讨论氛围中，中心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对话”伙伴，有时是像上面的暖气问题中那样群聊，有时是一对一的谈心，有时这对话也可能是无声的——在乡建路上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践行劳作中、集体生活的鸡毛蒜皮里，彼此逐渐了解、互相关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话、倾听、陪伴，不易觉察间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

对志雄而言，他和梁漱溟中心的负责人刘老石之间的“对话”，就是这第三种。甚至直到失去，才蓦然发觉它的珍贵以及嵌入生命中的深度。

“对我们，老石亦师亦友。老石经常很直接地批评大家，但从不当面批评我。我还奇怪，他从不在原则上让步、又对年轻人的成长极负责任，为何对我是个例外？后来才知道，他说‘对志雄，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当面批评，给他时间，他自己会去想……’原来，他不是不关心，是真的懂我，我不怕反思不怕改正错误，却脸皮薄，最怕批评之尴尬……”2011年8月的一天，在北京市郊温泉村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小办公室里，志雄望着照片上刘老石温暖绽放的笑脸，这样回忆道。他的眼神，在数个月的悲痛和沉淀之后，已经变得沉静坚定。

④ 跨越生与死的对话：既然踏过铺路石，那就永远不回头

刘老师：

自从您昏迷后，我一直在忙啊，不知所措地忙，紧张、焦虑。22号下午，医生说家属可以进去看一看，那时我好紧张，我不敢想，害怕他们是让见最后一面。我躲在一边，看，还是不看？无数个念头在脑中闪过。最后，我鼓起勇气进去看您，您在艰难地呼吸着。问医生说我可以碰您吗？医生说可以，我握着您的手，说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接下来的几天，心情起伏，就像过山车，一时感觉大有希望，一时又担忧害怕。可是，最后，您还是离开了我们。您太累了，您是去休息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肯定是这样的。直到此刻，忙过了一阵子，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却无法抑制悲伤，哀而不伤我做不到，任泪水滴在键盘上。就在2009年，因为一个我曾经最亲的人的诀别，我也如此放肆地哭过。您离



刘老石

开，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想着父母生我养我二十年，还有那么多老师教过我，可是，所有那些人都未曾教过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刘老师，只有您在这五年中给了我灵魂。正因为我们把您当做亲人、老师甚至是慈父，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和您吵。我们不顾言语是否伤害您，就像小孩子一样发泄自己的任性。虽然您是机构负责人，我们却没有把您当做高高在上令人畏惧的领导。记得五年前，我刚来乡建中心不久，那时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啊，就是一个任性孤僻自我自卑的孩子，原本就快是一个愤世的废人，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冥冥之中，我来到中心，才找到活过来的一线生机，这里有集体，有关心，有理想。记得有一天，您对我说，只要我们彼此内心里互相信任，其他的就都好说，任何分歧矛盾都可以讨论清楚的。您是如此的真诚交心，可惜，也许您是伯牙我不是子期。我还小，很幼稚，不懂得当时中心要做的事，体会不到您的用心。又有一次，我的言语说得很过分，肯定是很伤人的，我也没有道歉。后来我自己也后悔，但是却不好意思去说声对不起，是没有勇气。

刘老师，您是我们最真诚的朋友、兄弟。您是一个看到理想的青年就容易感动的人。记得“人才计划”第一期结业答辩时，大家说您读着我文章里最后一段话流眼泪了。这里我把那段话摘录下来，让我也为您流一次泪吧：“当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时，我们也许会变得一无所有，但这并不可怕，坚强的人至少还拥有自己，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更多的人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我们不需要把自己降低到畜生的程度去与某些人进行比较，但是我们不妄图逃离这个社会。任何对社会的翻天覆地的改变都不是社会之外的上帝所干出来的，一种社会内生的力量才能决定这一切，某个必要的时刻，乡村建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至于如何进行我们的乡村建设，这不是写文章该承担的责任。过去一年的实践，给了我极大的锻炼，但这只不过是开始，未来更是值得期待。一无所有的人挣脱的是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个人失去的是名利和权势，实现的却是他自己。”

以前，当您还没有成为父亲、还没有成为乡建中心的负责人时，您像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那样激情四射，会冲动，免不了发脾气。大家都知道，在2005年、2006年之前，您的脾气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暴跳如雷。可是您从来没有对我发脾气，我却在某一次喝酒后对您摔碟摔碗。就在您劳累操心到如此地步的今年初，我依然在会上任性地说不负责任的话。我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您的辛劳呢？那时您一言不发，谁能想象那时您的心情啊。看到不成器的我们，您是多么的忍辱负重。第一期“人才计划”结业大家聚餐喝酒，我烂醉如泥，躺在路边水泥板就睡，看到您气冲冲地走过。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不争气的一期学员，让您深感失望，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您是一个性情中人，拿门出气了。可是，后来您就变了，再也不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发脾气了，而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不仅如此，您还对大家的生活无微不至地关怀，以至于我们这些人顽劣地评您为中心“四大伪娘”（之一）。当然，大家都是开心的，您也是。可是，您却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好，没有做到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做到的那样。这让大家不得不在给您的“好老师”证书上提醒您，对师母要好些。

当然，这些仅仅只是您光辉人生中的极小一部分。您是我们青年人的精神导

师，这一点未必是别人能够做到的。中心吸引大家的是理想主义，而这又是因为您的缘故。有您在的时候，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乐观面对；再艰难的时候，中心院子里都会有笑声。我不敢想，您走了，我们还能否扛过未来的压力。关于理想，您从不像那些人老说教忽悠人，您总是启发大家思考，通过反思来找回自己的理想。您是最强调大家的理论学习的，就算大家再怎么不耐烦，您还是诲人不倦。您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虚怀若谷。您一再强调让我们学习了解各种思想流派，对我们的种种偏激小心地矫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层，您把我们当做共同成长的伙伴，向着理想的未来一起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我们曾有共同的回忆，更有着相似的憧憬。为了这个世界和我们身边的人生活得更美好，一切汗水与泪水都是值得的。

张梅珠 / 一期实习生·贵州妇女能力建设与发展促进会



2007年，何志雄与乡建中心团队分享，其后为刘老石。

探索。还记得我当初沉迷于各种思想流派，天真地以为这些意识形态就是真理，以为社会的解决之道就在这些思想之中，沾沾自得、自以为聪明地观察您究竟是信奉哪一家哪一派。当然，我是观察不出来的。这几天整理您大学时的文章，还有您老同学对您的理解，也许年轻时候的您像我们一样用革命激情表达着自己的激进理论。可是您没有轻信那些意识形态，因此您也就不会让我们迷信那些所谓的思想。您强调实践，为了理想而实践，不是为私利去蝇营狗苟。您相信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找到真理，能够成长，即使探索的道路曲折，您都坚持带着我们走下去，而不是扔下我们。

您的伟大就在于您选择当了铺路石，温老师说得太对了，他真的很了解您。而我，只有在您离开后才能意识到，悔之晚矣。您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大学里当老师，可是您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为着理想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您选择当最累最苦最默默无闻的铺路石。您总是维持着中心的良好运转，让中心成为大家学习实践的坚实依靠。您容忍大家的瞎鼓捣和一次次的失败，依然给大家鼓励。当我们缺钱的时候，您总是把本就不宽裕的家里的钱拿来，可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啊。您为中心操劳太多，您太累了。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从情感上我觉得您没有离开我们，您去休息了。可是，即将到来的工作，还有我们未来的方向，一想到这些，我们还需要您回来帮忙啊。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但我相信我们都是被您领上理想之路的青年。我们会走下去，会学着自己走。您不仅是铺路石，您还一直是坚持冲在最前方的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您“拍脑袋”想出新主意，但其实那是您在革命道路上的勇敢探索。我们很多时候跟不上，您也有着急的时候，这都说明您还是一位理想的带路先锋。现在，您离开了我们，我们既少了脚下的铺路石，又少了总指挥，刘老师您能体会到我们的困难吗？我一静下来就想我们该怎么办……写着写着，眼泪不再流，内心更坚定。

既然我是一个踏过铺路石的人，那么我就为了理想永不回头。

我知道，刘老师您会支持我的。

您永远的学生：何志雄

2011年3月30日

编者的话 乡建的路上，志雄曾不断漂泊。与老石以及诸多师友的对话和陪伴，帮助他在漂泊和自我质疑中，一次次重新定位和更加认清自我，而老石的远去，最终让志雄真正扎下根来，做一颗新的“铺路石”：

“……我逐渐将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位置确定下来，不再有那么多非分的欲求和困惑。虽然我不能像一个产业工人那样打工生活，正如不能像农民那样生活一样，但我觉得自己理解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我曾经像他们一样面对一样恶劣的环境去争取生存的权益。我少了小知识分子的狂热和急躁，打算慢慢地理清一下自己，不急不躁地做一些工作……”

而老石的离去，顿时让自己感觉责任重大。这几个月，我学着像他一样无所畏惧地拼命去工作，这是一个全心投入的阶段，不再怕失败。一个漂泊无根又没有清晰目标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思前想后、踌躇不前，最后不免以自己的得失顾虑来权衡行动。他的离去，就好像是让我自己经历了一次生死的洗礼，顿感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最终让我可以放下一切自我，学会真正地融入自己所关注的那个群体中……”（摘自何志雄的自述）

这跨越生与死的“对话”，还在延续。

附录：关于刘老石

刘老石，本名刘相波，读研时因仰慕湖湘文化求学岳麓山下，又取“湘波”之名。带领大学生下乡时，他认为自己懂的东西并不比农民多，叫“老师”太惭愧了，为保持与学生、农民的地位平等，于是自称“刘老石”。他是这个世俗的时代里可以近乎无私地在最纯粹的意义上追求自己理想的人。

（研究生）毕业后的湘波在天津科技大学任教，成为一名政治经济学老师。这位充满激情的政治经济学讲师，每到寒暑假就要带着学生到农村去，调研，法律宣讲，支教……大别山区、沂蒙山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闭锁的山路上是鲜红的支农队旗帜。十年乡建，十年知识分子再下乡，从拮据到要自掏腰包的

调研里，从与过年回家的农民工挤坐绿皮车的访谈中，渐渐显出轮廓。

2004年成立的这个后来被称做青年公社的梁漱溟乡建中心，每年会迎接一批批即将到基层、到农村去实践去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很多年轻人把刘老师称为青年导师、教育家，这不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了多少好的道理、发明了什么理论，而是他在这个理想缺失、物欲横流的时代，秉着乡建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和行动派的作风，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在倡导一种新的生活。

十多年来，曾和他一起下乡支农倡导乡村建设的人们多已陆续离开了这个领域，曾经的支农队员早已成家立业，而他却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信条。家在天津的老石，和青年在一起的时间不知要比和自己年幼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多少！

2011年3月21日夜20时20分许，在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六个月后，在他43岁生日20天后，在他像往常一样开过乡建中心周例会20小时后，在他给长别短聚的爱妻发过短信20分钟后，回家路上的刘老石遭遇车祸。

2011年3月24日21时50分，刘老石在天津武警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纪念刘老石的网站：<http://www.liuxiangbo.net/>

（本文由梁漱溟乡建中心前工作人员吕程平编写）

郭慧：对外在的认知与自我的找寻

编者：薛启婵

郭 慧 200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后留职去广西支教一年；2007年彻底离开科研工作，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广西一家助学组织实习；2008年开始在北京的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工作，2011年7月离开；现在北京另一家民间组织参与流动人口社区青少年教育的培训组织工作。



郭慧在广西实习期间，到教学点发放学生资助款。

郝 冰 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中国华德福幼教论坛副主席。从事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十余年。近年主要精力投入于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主持家庭幼儿园天下溪自然学园、天下溪妈妈汇，中国华德福幼师培训与督导项目北京协调人。



郝 冰

编者的话 郭慧是社区伙伴与NPO信息咨询中心合作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第二期的实习生，这位一直梦想着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视诺贝尔化学奖为最高追求的女孩，却鬼使神差地闯进了NGO领域，从此背包行走于中国辽阔的土地上。

被称为郭大侠的她，早在实习生时代就留下许多让同伴仰慕不已的传奇故事，比如去村里打摩的时遇上“坏人”，从车上跳下来在偏僻的乡村公路上狂跑；半夜在火车站铺一张报纸席地而睡……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实习时面对压力和困难，想要退出又最终坚持下来的勇气和执著；是她实习生毕业之后，找工作那个阶段的艰辛与忍耐。后来，她到四川地震灾区工作。去过她工作环境的朋友回来后，都会提起郭慧一个人在乡村里的不易与坚守。对这一段经历，郭慧曾经写道：“虽然这一年要忍受工作的艰辛、冰冻的侵扰，还有一个人的孤独，有时甚至到了自己难以忍受、要放弃的地步，但就好像原来一样，越是痛苦挣扎的时候，就越是自己在成长的时候。”

从当初沉醉于实验室、甚至幻想着“科学救国”的科技的坚定崇拜者，慢慢开始转向对人文的关注和思考，这背后，既是郭慧对外在世界看法的变化，也映照着她自身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郭慧说道：“想想一个曾经坚决赞同食品添加剂、崇尚科学技术的人，终有一天放下这层盔甲，不喜肉，不喜辣，与清淡而朴素的食品为伍，逐渐地放下自己，走出自己，说实话，我还是挺期待这样的变化的，发源于内心的变化。”

这几年在不同NGO平台上的历练，是为郭慧带来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些不同视角的实践平台拓展了郭慧接触的世界，也丰富着她对社会的理解。“我好像找到了要走的路，它是指引着我心的方向。”

那么，那是怎样的路？又是怎样的方向？曾经的化学痴迷者，是怎么走进另一种生活，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些历程，最终又化为了怎样的思考和成长？我们可以在下面郭慧的自述里，听她娓娓道来。

除了郭慧与自己内心进行的对话，这里也摘录了两则她与师友郝冰的通信。郝冰是郭慧参与对话项目所选定的交谈对象，一个对教育有着丰富实践的先行

者。郝冰对教育本质、乡土价值、个人成长的深刻理解，正契合了郭慧一直以来在乡村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经历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带来影响和改变，乡村与城市、科技与文化、传承与发展等等这些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①我的路：郭慧的选择与追问

放弃研究工作

2003年“非典”时期，我即将大学毕业。当时通过班主任老师的介绍，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毕业设计。高能所拥有亚洲第一大规模的中子加速器，在它周围应运而生了很多利用它释放的能量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中心。当时我所在的室，是利用其能量对稀土元素进行辐射，通过对稀土元素同位素的含量分析进行的环境化学——毒理学方面研究。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位在辐射化学界很有名望的院士，我的毕业设计导师李老师刚刚被这位院士带出博士后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位敬佩的人。对于一些大四学生来说，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设计就是找工作。而我那个学期从2月份直到6月都安心地在实验室做着实验，除了对实验样品进行核辐射外，其他每步都是亲自操作，论文也完全是自己试验的真实结果。这其中，李老师带我走过了整个研究过程。实验结果最终很符合研究结果。之后我才得知，我是学校里几个在研究所做毕业设计的人中唯一拿补助的，而且李老师向研究室说希望可以留我在这里工作。但最终，我作了一个让很多人想不到的选择——拒绝了李老师，这意味着我放弃了安稳的研究工作，放弃了更容易深造的机会。并不是自己不喜欢科研，而仅仅是更向往着外面不安定的生活吧！

毕业设计结束后没多久，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仍旧是研发，是通过不断的有机合成实验，研究出某种最简便且成本最低的化合物合成方法。由于有机合成属于毒性较高的一个化学专业，在工作的前大半时间中，部门里做这项工作的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我遇到了另外三位好老师，他们教会我如

何严谨地对待研发工作，如何更有创造性地研发出新的产物，更教会我如何以严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与工作。

2007年初，一个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NPO信息咨询中心与社区伙伴合作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正在招募实习生，让年轻人可以到广西和贵州的一些公益组织了解真实的社会问题，并开展相关的社会工作。现有的工作环境虽然是我所喜欢的——纯净单一的研发工作，但看到单位一些中年老师的工作状态，我就感到害怕，他们的现在可能也会是几十年后我的样子。还是二十多岁的我，难道一生就这样下去了吗？再者，通过这几年接触一些公益组织，尤其是2004年起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一个网络助学组织的工作，自己好像找到了一种使命感。每当看到家境贫困的学生获得了资助，那种高兴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也许会一天之中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喜悦。也使我逐渐地在想，是不是在公益组织中工作自己会有更大的热情呢？虽然对以后会面临的压力还是有所担心，但内心有种不可言喻的东西告诉我，应该大胆地迈出那一步。

支教、助学以及信心、失落

开始助学工作是源于大学时的一个梦想：到西部乡村进行支教，给那里的孩子们带去新鲜知识的同时，也让自己了解真正的中国乡村。所以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曾经停职一年，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扶贫接力计划，作为支教志愿者服务于广西的一所小学。那是一个村级小学，学校所在的村子，乡村建筑富丽堂皇，活像个度假村；学校也拥有全村最高的建筑——5层的教师宿舍以及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操场。但表面的粉饰无法掩饰内在的空洞，村里的百姓由于当地兴建土木而失去了原有的耕种土地。当他们被赶下山聚集居住时，心中就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上级政府不断的视察、调研让百姓们处在了一个矛盾的境地：怀念自己原来的生活，又因逐渐产生的依赖性不愿回去；对当地管理者满腹牢骚，却又因视察可以带来更多的资金来养活他们，而不断地巴结讨好。学校也是在视察、宣传、活动中开展教学。这里的老师仅仅是以应付的心态教育学生，

唯一能让他们提高警惕的就是每学期的全镇学校成绩排名。

为了使支教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我们在学校开展兴趣小组，在自己所任的课堂上以新颖的教学方式传授，课余在学校周边开展资助贫困学生的活动。一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收获了一句在这里的志愿者代代相传的经典话语：“不要试图去改变环境，能够让自己不改变就好了。”伴随着这话语中的辛酸和无奈，我们仅仅是和学生们以及个别老师保持着日后的联系。

支教留下的一丝多少还让人欣慰的牵挂就是当时结识的一群志愿者。在那个县每年都会有不少支教志愿者光临，离开后大家仍旧想为这里的贫困学生做些什么，便一起建立了一个助学网站，以一对一的形式让城市的爱心人士资助大山中的贫困学生。

几年的参与，看着这个助学组织逐渐羽翼丰满，同时也会因组织中的一些问题而发愁。2007年，我再次踏上广西的土地，成为这个组织专职于助学工作的实习生。这次的我有备而来，带着不但要使自己不被大环境淘洗，还要对周边产生影响的壮志。

当我满怀信心到达广西其中一个项目点时，发现了助学工作上存在的很多疏漏之处，也接触到了各种形式的来访资助人。有些资助人是怀揣着助学之心虔诚来访，他们的真诚让我感动。但还是有些资助人仅仅因为之前一些生意上的劣迹，来这里补过赎罪。随着他们到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纸醉金迷。而项目点的负责人对这些资助人也是尽量讨好不敢怠慢，这让我有了很大的反感情绪。开展助学工作，我们到底是主要服务于贫困学生，还是资助人？如果把助学的工作重心偏移至资助人一边，我们的工作就仅仅是为了满足资助人的爱心，那岂不有违最初的理念？另外，随着西部教育的发展及优惠政策的增加，基础教育阶段贫困得上不了学的现象基本没有了，原有的一对一的资助模式，使得接受资助的标准逐渐下降，一些时候资助甚至变成了促使受助学生染上挥霍、依赖之习的推手。再加上对于当地一些人及事物的不适应，我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了质疑。首先，自己是否值得这样再次回到广西？其次，自己再次被周遭环境所影响。虽然我仍固执地坚守阵地，但已经感觉自己的渺小，没有办法以最初的信心去试图改变什么

了。那段痛苦的时间，压抑、懦弱、被动席卷而来，想做的就是逃离这片环境，也许只有那样才可以找回自我。

那个时候恰巧在看拿破仑的传记，看到他后来认定的低谷对于他人生的意义，我也开始幻想着自己的这次低谷是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次转机。这最痛苦的时期，也许也是我成长的机会。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的拼搏挺身而出？于是，我近似于盲目地挣扎着，任何新事物都像是我的救命稻草，越是在困难之时，越要拼命地汲取养分。逐渐地，我走了出来。广西助学点的走访，每天我带给当地志愿者的是那个精力充沛、对助学工作信心满满、且有更多助学思路的自己。那之后的4个月，我努力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不仅可以感染身边的朋友，更能使自己变得强大。也是从那时起，我真明白了主动工作不是表面的忠告或劝诫，它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态度，当内心足够支撑自己，并感染周边环境时，主动性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当理想照进现实

在广西的助学工作，无论过程和结果都与我的理想有很大差距，但那过程让我受益匪浅——没有盲目地追风，也没有被困境打败，当我在现实中一步步向理想贴近时，发现的是内心不断强大的自我，以及我将自身的强大影响周遭事物的能力，这也许就是理想在现实中的一种体现吧！

实习生结束后，回到家乡找工作，历经艰辛一无所获。当我对NGO几乎失去信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机会出现在眼前。那是曾经向往已久的一家本土知名环保机构，所做的事情也是自己曾经的一个小梦想。当找回最初丢下的梦想时，真是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就好像是上天特地送给我的礼物。我安然接受后，一边适应它，一边感受它，感觉自己又回复了平静的日子，没有什么可以阻挠到我的工作。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机构对于灾后工作的介入，让我有机会在地震后很短的一段时间走进灾区。5月下旬，随着机构灾

后救援先遣队前往茂县送医药、物资，与同事一起拜访了茂县教育局，当即提出意向，在茂县的学校重建方面出一把力。随后机构决定在茂县建一所“绿色学校”^①。当下的中国，可能都还没有一所真正系统的绿色学校出现，国家环保部所推行的绿色学校标准也尴尬地被解读为在原有标准化学校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造。我们接过这看似有历史重任的使命，希望将绿色学校的梦想扎根在灾区、西部。而我也被机构委以重任，负责绿色学校项目的执行。

2008年9月，在与茂县教育局达成了合作意向，以及寻找到理念和价值观相同的设计所后，我与设计负责人共同前往茂县进行选点及学校考察。教育局向我们推荐了黑虎等3所乡中心小学。这3所学校因为地处偏远，直到那时都没有社会团体问津。我们最终确定了黑虎，也是考虑到它独特的羌民族文化以及即将面临的旅游开发。当一个淳朴的少数民族村寨迎来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时，社区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可能被打破，外界的强势介入，将在社区中形成新的利益秩序，而其本身的民族风俗、文化乃至精神能否被健康地保存及传承，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以民间组织的视角介入即将变化的社区中，共同面对问题，寻求可能的良性改变。带着这一期望与梦想，项目正式启动了。编写项目计划、寻求项目资助资金、学校建设方案设计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中进行。

2009年2月底，学校由于灾后重建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不得已要易地建设。而此时学校原址的地质勘探已经完成，施工图也进入设计尾期，易地带来的问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因为有这么不同的经历，无论我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首先都会想：我能为社会做什么，而不是我能得到什么。

王献霞 / 一期实习生 · 云南省社科院社区发展研究中心

①绿色学校秉持环境友好及文化遗产的理念，硬件部分遵循绿色建筑的营造策略，从规划设计、建材选择、建筑方式等方面考虑，关爱环境，节约能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建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软件部分，在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使老师及学生们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绿色环保的理念，自主开展环境教育活动以及建立配套的学校管理制度。

题就是要重新在有限的空间中选择合适的用地，重新摆放校园内各建筑位置，重新进行地质勘探，再重新做施工图的设计。经过不断与茂县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沟通、洽谈，与规划局的相关人员解决技术难题后，在新选定的地点上，我们把前面的工作又重新做了一遍。

4月中旬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及审图的工作。4月20日，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我们与代理公司、设计方一起完成了造价的编制与审核。但随后的招投标备案时才得知由于此项目中包含国家资金，必须由茂县政府以比选的方式确定招投标代理机构并进行招投标。而在合作协议中，说的是由我们聘请招投标代理机构。这下又要重新选择代理机构以及进行招投标准备，直到6月中旬，终于确定了施工及监理单位。

由于绿色学校的设计与传统的标准化学校设计很不相同，无论是保温隔热技术、污水处理技术、门窗保温技术，还是为了与当地社区民居特点契合的毛石外墙技术，都需要耗费较多人工才能达到，施工单位对此有很大的意见。在最初的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建设单位随意修改图纸、进行建筑平移以及不按施工图操作的情况。这期间有争论，有相互影响，更多的我认为是一种磨合与沟通。

太多的重复与整改，让整个项目又拖延了半年多的时间，有时都会让人感觉遥遥无期。但反观整个过程，却发现参与的各方都是为了整个项目的顺利推进而有各自的让步、妥协，也为了项目的安全完成而有各自的坚持。

通过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建设施工，作为该项目的执行人，我的认识与想法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最初，我确实带着“给予”、“帮助”的想法来到茂县，但中间发生如此的多变故与摩擦，让我重新开始思考民间组织在当下社会开展工作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逐渐地，我对于该项目的想法变成了“陪伴”、“共同成长”。如果我们每天仅仅是夸夸其谈，重点关注一些高端政策问题的解决，我们会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吗？那样一帆风顺，是否真正在为民间组织的最初使命而工作呢？我们是要面对当下的切实矛盾，在其中以社会第三股力量的视角去关注并解决。这期间遇到视角乃至价值观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有真正扎根于基层，面对这些冲突时，我们才有可能以正确的心理准备以及合理的对策去权衡、

解决。民间组织做事，也许不需要有高高在上、一切皆正确的优越感，而是需要真正融入基层发现问题，并仍旧有勇气及理想去解决问题的平常心！

2010年11月，这所绿色的西部乡村小学经过近两年的土建施工后，终于露出她的娇容，迎来了她的主人——学校的师生们。回眼望去，这所学校拔地而起的过程，充满了颇多的坎坷与艰辛，而这一刻，她就从容地站在那里，由我们去观赏，去使用。外来者无不感叹她的美丽，使用者也开心于获得了这样一所人性化设计的学校，大家都在憧憬着如何更好地使用她，管理她，以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乡村像个殷切的长者，接纳了我的所有，观望着我的努力、我的失望、我的挣扎、我的快乐，每一次无论我是什么样子，她都始终不改当初的盼望和期待。

朱茜 / 二期实习生·中国滋根南方办公室



2010年，“绿色学校”建成。



2010年11月，“绿色学校”投入使用，郭慧给一年级学生上环境教育课。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尽管实习生活在我带来许多开始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疑惑，但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有我今天的疑惑，才有我今后的思考，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开启生命中的窗。

聂婷/二期实习生·广西大学经济
发展研究所

学校的建设，可以说是一个超前的执行与设计理念投影于尚处于懵懂阶段的西部乡村。环境问题不突出，乡村无论社区还是学校接受相关的教育活动就不会很主动。我们继续做下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一种示范作用，再过5年、10年，当全社会都开始正视环境问题时，也许就会发现，已经有这样一所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在持续坚韧地表达意见、有着积极进取态度的实体小学，矗立在西部的羌族村寨之中。

如果说最初几年在科研方面工作的经验，让我在

工作态度及工作方式上变得成熟且严谨——这是一种外在的修行，而之后的NGO生涯，让我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虽然有时，对于自己这迂回的人生之路会认为有些可笑或后悔，但每当看到这迂回的道路上，仍旧挺直站立着的我时，其中的一些伤疤、一些收获的礼物，会让我有更大的决心坚持走下去。

②我和你：郭慧/郝冰对话录

能将乡村变成精彩的世界吗

郭慧致郝冰

郝冰老师：

从旅舍二楼的阁楼向外望，可以看到那红色的屋檐，长出青苔的小青瓦屋顶。那并不是全部，而仅仅是窗外钢筋水泥大背景下的很小一角。这是在成都，一个很多人都说安逸、休闲、不是很现代的城市。但这也不再是绝对的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让成都已经扒掉了很多的小青瓦建筑。川西民居已经没有了历史的沧桑，而是为了开拓旅游经济。

城市里的人们已经可以自信地谈论自己的家乡，因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正在现代化，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而对于尚未很现代化的乡村尤其是西部的“欠发达”乡村，从这里出去打工的人们，还是照样的不自信，怕谈起自己的家乡，那依旧寒酸“没有价值”的地方。

原来的我，始终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看到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工厂里庞大的机械设备，我就会心潮澎湃。我热爱着自己当时的职业，也一直都把制造出一种新物质作为毕生的理想。而在广西乡村的两年岁月，让我对那些真实的、但看上去并不美、不容易看透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兴趣。在广西的第一年，乡村小学的支教生活让我接触到了大山中孩子们的纯真与顽劣，壮族人质朴的习俗和有趣的传说，当然还有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艰难学习的学生

和同样备受升学率煎熬的老师们。刚入小学的孩子就要学普通话，在学校规范化生活。在广西的第二年，又接触了很多的瑶族孩子和老师。相对于壮族，他们更朴实、封闭，生活也更艰难。孩子照样要到学校学习汉语，却又本能地对汉语排斥。一般上到初中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地流失，回家帮家里人种玉米，再大些就出去打工。而到外面“精彩”的世界打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冒险。他们不愿张口讲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不敢和身边的人说话，但他们还是想钻进大城市里谋求一份工作，只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再那么辛苦。但他们有些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民族，不论是壮、瑶或苗族，好像这就是贫困、迂腐、好欺负的同义词。

难道自己的家乡真的就那样“可卑”吗？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所在地区，本来要比城市纯正、多元，并且乡村的孩子们有着与当地环境及文化融洽相处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落后地区”，其实更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所谓的“发达地区”，总是想着如何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利益。现在，这样的思想也被一些开发商或政府官员带进了乡村，这片土地上的子孙们已经很难再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了。

生态网中，需要多元的生物及多样的自然环境作为依托，才可以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和谐的生态圈。文化同样也需要这样的相互依托。当那些敬重土地的民族文化逐渐消失，当有一天全中国只有一种民族文化，是否还能撑起整个国家？

有没有一些很自然的方式，不但可以让城市里的人关注到自己家乡深处逐渐消逝的文化，还可以让乡村的人们不再自卑，发现自己家乡中可贵的地方，并让自己的家乡也变成精彩的世界？

郭 慧

2009年6月2日

郝冰致郭慧

郭 慧：

见信好！

读了你的来信，看得出这几年在广西和四川的经历对你的影响。我也还记得我们有一次通电话时，你说所学专业对你的世界观的影响，对于科技的信仰与崇拜。

人类超越现实、追求梦想有错吗？我不觉得。但确实，我也会感觉在科技不断昌明的现时代，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也许正是你文中所说的“自信”。不仅是少数民族和边民不自信，我们自己自信吗？遇到困扰时，我们是向内还是向外找寻力量？很奇怪，不是吗？整体力量越强大，个体却越不自信。我自己呢？客观上我不会把科技与人及文化对立起来，也不会迷信科技或文化单方面的力量，他们是同时存在于现时代的，而与这两种力量并行的，还会有经济、政治等多种力量在塑形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作为一个个体，我希望能听到内心真实的声音和呼唤，走我应当走的路，有同路人，很欣喜。不同路，也没关系。最后世界的景象，是千千万万人共同走出来的。

前两天和（梁）晓燕通电话，她说和你一起过了端午节，也简单地说起了你现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扰。想想，你真的很棒。在和你一样年龄的时候，我好像还在混沌着，没有这么深的思考，也没有这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慢慢地，我觉得社会上和工作上很多事情都可以接受了，这种“接受”不是对现实消极的被同化的妥协，而是乐观的、渐进式的内在力量。

陈焯宏 / 三期实习生·广西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对于我，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只想做一个真实、诚实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适合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我贡献了什么，更多是这个行业为我提供了我需要的。

杨彩 / 三期实习生·贵州乡土文化社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我现在懂得了一个人不能机械地、自以为是地去改变什么，那是一种不尊重，而只能是以自己的内在去影响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内在，只有这种影响才是自然的、持久的。

曾令君/三期实习生·中国滋根南方办公室

样的行动。在下边工作，一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形，不过一个真正的有力者一定是从现实的泥沼里能拔出腿来的人，想想一个腿上不沾泥的人，力量从哪里来呢？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另一个考验，则如龙应台所言，“对于任何未经权力或利益检验的理想主义者，都抱怀疑态度”，再过些岁月，你也许对后者也会有感悟。以一份深切的同情投入，以一份理性的思考出离，这两者都是需要的。当然，这些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就仿佛日复一日的修行。不过，请相信，这份经历对于你生命的意义，一定会在未来透过时间得以沉淀和彰显。还有就是，照顾好你自己的身和心，才有力量和可能照顾别人和介入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这几日，重庆大雨，山体滑坡，不知你那边情况如何？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来灾区，一个巨大的灾难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吧，应该是沉静而孤独的，不管是那块土地还是每个痛失亲人的乡亲。很想了解，你在这个特殊事情特殊的地点所看到的基层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状况，有空的时候写信来讲讲，好吗？

多多保重！

郝冰

2009年6月10日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实习给了我一个契机，去思考我的人生。因为实习，我对NGO的工作理念有了思考；因为实习，我对自己的成长有了反思；因为实习，我开始去想整整一生的意义。

皮颖丹/三期实习生·世界宣明会广西项目办

我们尊重他们了吗

郭慧致郝冰

郝冰老师：

我是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有时不论做事还是自己的想法都好像有着工科人的思维定式，也有着工科人特有的偏执和木讷。原来在广西做了很长时间，但是自己的内心总是逃避那些很感性的东西，有时也包括交际，尤其是和政府部门，呵呵！不过这一年，估计真能好好地锻炼锻炼。梁老师也是常说，要迂回地做事情，也许退一步会更明了。

关于科技与文化，因为最近几年接触了很多原来上学时没有接触的文化领域的东西，发现自己真的是爱上了这些，但又不愿意放弃对于科学技术的热爱，自己始终是矛盾的。而这次看到您说的科学与文化甚至和经济、政治等等这些方面都应该是相互融和作用于社会，之间并没有矛盾的说法，一下子点醒了我。现在也逐渐在想怎么可以在一个地方做试点，把一些科技的东西与古老的东西融和在一起来做些事情。确实，大家都是想追求美好的、舒适的生活，难道这有错吗？也许作为外来者，我们的考虑是并没有尊重当地人想法的霸道的做法。

现在在做学校项目的时候，总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会不断冒出来，但真正执行起来，确实还掌握不好方法，也许这就是我需要一些经历的积淀，一种心的积累。我发现自己真是心的积累太少了，也许从小都还算平静地长大，直到现在都还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应该要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毛病了，不知道是不是80后都有的通病？

郭 慧

2009年6月11日

郝冰致郭慧

郭 慧：

抱歉，这封信又拖了很久。一个原因是上周老毛病又发作了，又一次领会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滋味。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好像根本没意识“身体”的存在，更多地活在“情绪”、“观念”、“行动”里，所以对吃饭、睡觉这类事是极马虎的。直到2002年住到医院里，彻底地停顿下来，才发觉这个“皮囊”不好用了，后来几年里有些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更多时候是力不从心，勉力支撑，这让我在内心里时感沮丧。直到这次来上海，开始下定决心认真对待身体，坚持花时间锻炼与治疗。说这些，是想说身体很重要，是我们行走在世界上的最基本的工具，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花一份心思照料它。如果现在不，将来要花更多的时间：）

同事从灾区回来，有好多感受。第一次出差，发现社会现实和接触到的人与想象中差很远，产生很多困惑，也激发很多思考。你负责的学校项目与他们的工作内容不同，但有些困惑可能是类似的。比如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这样？嗯，是一个好问题！值得再问一遍，他们怎么这样？他们可以是你工作关系里的任何人。比如是施工队，比如教育局局长，比如校长，比如羌情研究会的成员。我猜想，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面对着我们，在心里也一定曾经在某个时刻涌起同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这样？”我在你那儿听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答案？很想知道你找到的答案。

跃过这个问题，我想到另一层，我们在灾区，无论做学校，还是做乡土教材，我们在实现谁的心愿？这个“谁”是复数，还是单数？如果是复数，在“复数”中的每个“单数”对心愿的表达是独立而自由的吗？多个单数之间是相吸的还是相斥的？什么使其相吸相斥？如果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单数”，如何看待整个“复数”？如何看待其他“单数”的心愿以及处理相应的关系？

郝 冰

2009年7月1日

编者的话 这里的通信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她们对于理想和理想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那种思考和探究是无止境的，也因为不断的反思，才会在工作时不断调整，不断接近那可能的核心。

2011年的秋天，在告别自己“2”字开头的十年的博客文章里，郭慧这样写道：“回看这十年，我竟然有将近5年的时间，是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山野中。就好似古人的闭关修炼，在乡村的日子，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内心随周边景物而净化，似周围石山般更加坚强，学会了用更加谦逊、平等的眼光与心情去对待他人与物。不只是内心的修炼，我也感叹这近5年的时间，我并没有完全出世，而是在做着常被别人另眼看待的‘有意义’的事情，从最初的支教，尽量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孩子，为孩子们上课，与他们一起成长；到实习生时，与一些有着使命差异的‘同道人’一起做助学，在有着很大张力的小环境中，保持自己不被影响，学会用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并尽自己之力，跑下了广西10个助学点，走遍了所在地的每一个乡镇；在茂县，明白了什么是坚持自己该有的价值观，并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学会点亮内心的光明，在尖锐的多方冲突中，站在矛盾的中间点，试着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每一次地域的变迁，都将我带入了更深层的问题之中，于是我变得强大起来。”

带着这些积淀，郭慧站在了新的一个十年的起点上，她说：“我希望自己过去的努力，现在的努力，以及之后的学习、努力，都像台阶一样逐步走向人生的目标，也希望那目标就是自己始终怀揣的梦想。”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不要担心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只要你守护好内心那块天空，心灵的太阳会为你照亮前进的道路。

罗扬 / 三期实习生·爱在绿城志愿者服务队

唐婧与晓玮的通信: 爱、相信与坚守

编者: 薛启婵



唐 婧

唐 婧 女, 广西桂林人。毕业于广西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07年参与NPO信息咨询中心与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在南宁一个民间组织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实习。结束实习生项目后就职于一家NGO, 负责农村贫困家庭脑瘫儿童康复的项目。2010年项目结束, 辞职前往珠海, 开展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线社工服务。而后服务于广州一家社工机构, 往四川支援震后社区重建工作。2011年离开四川, 目前供职于北京一家公益组织, 负责尘肺病人的救治工作。



刘晓玮

刘晓玮 女, 1985年生于扬州。2003年进入扬州大学农学院学习, 同年加入学校助学社团。2005年, 加入“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志愿者团队, 通过网络参与贵州的助学活动。2007年8月, 参加社区伙伴CSA实习生项目, 在贵州省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实习, 推广生态种植、养殖和参与式社区建设。2008年8月后, 进入企业工作, 先后三次更换工作地点和内容, 在营销、经营管理和质量管理方面均有尝试。

编者的话 唐婧是“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第二期的实习生，与郭慧是同期同学，在启动“对话”项目时，首批选定的参与者里就有她。那时，唐婧刚结束实习生没多久，因为并不太如愿的实习经历，因为对自己未来方向的不确定，还处于不愿回望过去、也不想面对自己的阶段。唐婧后来说道：“最开始，我是极力拒绝的。逃避的行为模式，未解的情结，始终在那里。某一天，在抱怨了一大堆以后，有了一种新的期待。如果我从现在开始真实地面对自己，会怎么样？”

唐婧曾经在信里写道：“答应了‘对话’项目，对话的伙伴会是谁呢？同一个实习生项目的伙伴？不行，我们彼此太了解，经历太类似，极有可能变成叙旧而不是‘对话’。与实际的工作相关的志愿者朋友？不行，日常的工作已经是生活的大部分，对话的伙伴还与工作相关，实在太累人了。那到底会是谁呢？”

唐婧最后选定的对话对象是刘晓玮，社区伙伴CSA实习生项目第二期的实习生。两人都还是实习生时，曾经因为项目活动的机缘碰过两次面。而这短暂的碰面留下的印象，让唐婧在这样一个时刻，想到了晓玮可能是适合的对话伙伴。可自从晓玮2008年秋天结束实习、离开NGO领域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了音讯，我们找不到她的新手机号，发电邮也不回。对那时的状态，晓玮这样描述：“说起那时的‘隐居’，其实是断了所有的联系，几乎都是在家里待着。也许正因为不舍吧，才不愿去与朋友联系，不愿去面对可能的安慰、劝说、叹息和责备。”

对话的对象不出现，只能静静地等待。直到2009年春天，晓玮突然回归。听说唐婧正在找她参与“对话”，晓玮欣然应允。这样的应允，来自于寻找一位伙伴共同面对过去、探寻当下的期待，来自于突破自身不敢表达的渴望，更来自于在之前的眼见耳闻中对对方的一种熟悉和亲切感。虽然身处不同的实习生项目，但这个网络里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相互交织，让她们在实习生时代有了粗浅的相识，而对话项目，成为一条更紧密的连接两人的纽带。

那时，唐婧在广西南宁的一家民间组织工作，晓玮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企业里上班。相隔两千公里的对话如何展开？两人选择了电子邮件的方式，后来又加入了带有笔体温度的书信。

在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她们通过文字的往来分享彼此的经历、心情与思考。在她们的通信里，有对生活与工作的细微观察与体悟，有生命里对爱、对善意、对真实的践行。当然也有怀带着美好期待的年轻人在碰到现实环境时的无所适从与力不从心，乃至愤懑和抱怨。她们的笔下，也许很少触及宏大的社会，也甚少谈论高远的抱负与理想，但就如晓玮引用特蕾莎修女说的，“只有通过爱个体，才能够爱人类。”唐婧与晓玮对社会、对人群的理解、对自我在社会里位置的找寻，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思索与践行不断呈现与升华。

参与这个对话的过程，不管对唐婧、晓玮或是我，都是一件奇妙且觉着幸福的事。作为对话主角的她们因着这带有传统气息的信件往来，成为彼此支持、相互鼓励的亲密伙伴。虽然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那个沉默着的旁观者，但她们依然把我当做她们中的一员。不仅把所有的电子邮件都抄送给我，甚至那些手写的通信，她们也拍成照片或是直接把原件交给我，到后来，还用起了复写纸，每次写信一式两份，同时寄给收信人和我。

伴随着对话的过程，唐婧由南宁到珠海，由珠海到四川，再到北京，晓玮由镇江到南通，再到北京。两个一直靠信件往来的人，如今走到了同一个城市。看似辗转变化的经历，不变的是对心底梦想的那份追逐。从她们过往的三十来封信里，我们节选出一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透过这些文字，一起去见证两位年轻人生命里的一段成长。

写在开始之初

■ 晓玮博客 2009年2月25日

在离开贵州土地的那天起，选择将自己封存。信息时代里，远离了手机和电脑，就可以与一群人失去联系。而我，只是想一个人去面对自己，或是说服，或是让自己明白，在NGO之外找一份工作，并不意味着与NGO隔绝。

是因为一直将NGO看得太重了，觉得它就是生活的方向，生命里的全部意义吧，因而在最终决定离开不再改悔的那一刻起，心底里已满是后悔与埋怨了。不想听到朋友们的劝说或是理解的话语，心里的这个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解开，才算是真正的放下。

消失的时间越长，就越不知道该如何出现。这也只是想太多了。

发一个短信，打一个电话，群发邮件，打开QQ，我又出现啦：）看到朋友们欣喜而关心的问候，心里又被一股熟悉的温暖装载得满满的。你是否能感觉到电话另一边的我因兴奋而战抖？是否知道听到你的声音时，我的眼中已满是泪光？不记得有多少次，回想起生命中相遇过的那些年轻而鲜活的面庞和共同憧憬努力的日子时，想着要回到曾经的生活里去。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承担，也逐渐明白，形式与实质，并不总是相吻合的。心不变，又何以谓远呢。

很欣喜，选择了出现；很惊喜，一出现就可以去做些什么，与不同的生命相遇和碰撞：）

生活之中，又多了许多期待的日子。



贵州省威宁县草海镇助学回访，晓玮与孩子交流。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这一年里，对很多词语有了知觉，比如生活、文化、学问、局限。在我心里，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空洞的词语，而是真正有着它的内容。

魏乔 / 四期实习生·田东晨曦儿童发展中心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NGO的理念在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也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哪怕这些事情是那么的细微。

李敏 / 四期实习生·鹿寨艾滋病预防控制协会

施与和爱

刘晓玮致唐婧

唐婧：

到这家公司有一个多月了。来以前，心里总有些不安，担心公司是不是会太官僚，自己是不是会不适应那样的生活。真正开始还是实习，在车间里和师傅们一起装配，感觉上倒像是回到大学实习时那种简单的快乐里了，不用考虑任何事情，只要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虽然经常加班，但貌似机械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忘记思考，却很快乐。

可惜还没做完所有的工位，就被部门经理叫到部门里做事了。开始时还有些紧张，不确定公司里做事和以前在NGO里是不是一样。毕竟在NGO里大家是宽容而开放的，不像公司，特别是小的私营企业，会有明确的级别。刚开始的那几天，是整日里忙个不停，下班后整理一看，似乎没做几件事儿，还搞得自己紧张得不得了。后来转念想想，没这必要呀，心急也是这么多事，不如静下心来，不慌不忙的，岂不好？工作，还是一样认真地干，但心理的认识，已和做CSA实习生时不同了。实习生时，对项目是有一种责任感和拥有感的，心底里会想着如何将事情做好，工作与生活是相融合的。而现在，是老板用钱买我们的工作，只要不加班，下班归下班，上班归上班，是完全隔开的。这，也许是小企业的现状，但与NGO确是有很大的差别。也会有担心，自己在这样的企业

里待久了，是不是也会与那些老员工们一样，满足于现状呢？不过现在知道啦，担心的都是想象的事情，而现实，不会因此而改变。要相信自己心中的方向：)

晓 玮

2009年3月19 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早上一开电脑，收到一个志愿者的来信。他说他因为看到这些孩子的困境却常常不能做得更多而感到自责，因为自责所以会逃避去参加活动，而因为逃避会更为自责。我被他硬往身上拉的责任感所感动着，也知道，如果不能从这样的自责中走出来，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给志愿者回复完邮件，我闷头坐了一会，正好看见你的邮件。你问我现在的状况，其实，我很难讲明白。我想就像这位志愿者一样吧。我给志愿者回信说，只要享受过程，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专注和投入的就已经足够好了，在岁月的积累中他会看到今天他做的一点点，就是他想做的那些更多的。可是，轮到我自己，却不知道要怎么回复自己了。关注弱者，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可这样的关注以施舍的态度给予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以后还能怎么样去和别人平等相处。

昨天还和一位同事吵架了，为的是要不要把康复中心的书架锁起来。我一直要给家长和孩子一个开放的没有压力的空间，即使书籍有破损和遗失也没关系。可是同事一直从资产管理的角度认为要把那些书锁好，保存好，定期开放，登记借阅。很多时候，状况都是如此。我坚定地相信为了人可以改变制度，而同事们坚定地相信，制度是必须要遵守的，包括任何人。有时候觉得我就像个捣乱分子，专门做些让大家困惑的事情。我也为给大家带来困惑感到挺自责的，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依然以捣乱为荣。

糖 糖

2009年3月20日

刘晓玮致唐婧

糖 糖：

这几天一直在看特蕾莎修女的传记《在爱中行走》，一边被其中的小故事和特蕾莎修女的话所感动，一边读着你的信，看到现实的所在。不是施舍的给予，要怎样才算是呢？

周六时去书店，在门口有两位60多岁的奶奶卖唱乞讨。我笑着注视着她们，走过，也不清楚心里是怎样想的。从书店出来时，其中的一位奶奶向我走来，我又笑着看着她，找了枚一元的硬币，交到她手中，那一刻，她有些诧异地笑了，那一刻，真想去抱抱她。整个过程现在回想，仍是怪怪的。不知为何，每次给乞讨者钱时，心里总有一种羞愧。不是施舍的给予，那是要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而且我分明地知道，可以去做的，远不止给一元钱，只要停下脚步，家长里短一番，也会多一份人情味。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不作为！

记得曾经被朋友这样说过，乞讨的人那么多，你给得过来吗？有时自己也会因此而在遇到他们时保持沉默。这与你同事的问题很相似。我也发现，不仅在这些问题上，在生活中的许多琐碎的事情上，我们都会因看到整体的琐碎与复杂而不愿开始，止步不前。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希望在企业的日子里，可以通过不得不去做的一次一次的实践，让自己知道去做远比想要简单得多。特蕾莎修女说过，她每次看到的是独立的个体，所做的是对每个个人有意义的事情，只有通过爱个体，才能够爱人类。只是一个，每次只一个，会容易得多。

“我们爱人，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爱，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邻居，又如何去爱其他人呢？”现在的我，想的是如何去爱这个公司，爱我的同事们，爱这份工作，爱当下发生的点滴。

晓 玮

2009年3月22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刚刚进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机构时，正好是《特蕾莎修女》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却被修女所折服。她是在做事情的人，以服侍的态度在做事情。她把这些穷人中的穷人当成了她的基督去服务，这些人身上有她敬仰和爱戴的天父，所以她是服侍而不是施舍。但是，没有信仰的人，就一定是在用施舍的态度对待这些人吗？

在我回家的路上，曾经有一个婆婆在乞讨。我一共给过她三次东西、一次钱。第一次是两个包子，第二次是一杯奶茶，第三次是我自己晚饭里面的一碗汤。每次，我给她什么，都会蹲下来，让她看见我的脸，有时间我还会在她旁边和她说说天气和家里的情况。但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走过，或许是当着朋友的面，我没有了勇气，或许是有些生气，因为我从没有把她当成乞丐她却还向我伸手。我没有像平时一样蹲下来，也没有特意地去买什么，而是直接从口袋里掏钱，弯腰放进了她的碗里。那一瞬间，我们目光接触，我看到的是她受伤的表情。从此，这位奶奶再也没有在那里出现过。

怎么样才算施舍？我掏钱弯腰的姿态就是施舍。我一直很愧疚，我用施舍去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在工作中，我却发现这样的弯腰无时不在。尽管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己的项目里不要有这样的姿态，但却同样不免被“主流”。

其实，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的，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是施舍，什么时候是在真实地帮助。我所不能接受的，就是明明感受到的是施舍，却要违心地说我们在帮助了多少多少，骗自己，也骗别人。

糖 糖

2009年4月1日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据说，困惑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思考才会有困惑。相信，只要思考在继续，总会好的。

邱国献 / 四期实习生·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

工作是眼里能看见的爱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这个月出差，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有一次我甚至充当了一个孩子的代理母亲。照顾小麦子的那三天，我知道，或者说我才有一点体验到家长们所说的累。吃、喝、拉、撒，对于我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这个孩子和孩子的照顾者却是一场消耗体力的战争。

我的战争从小麦子上床开始。由于引导式教育^①强调儿童的自理能力，之前相关的老师也反复交代不可以过多地帮忙。于是，我就看着这个孩子，慢慢地抠开鞋子，把自己拖到旁边的榻榻米上，整整半个小时，半米不到的距离，仅仅脱鞋、上床两个简单的动作。我觉得，我看到的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拼命在拱着什么的小动物。按照引导式教育的要求，我努力地面带笑容，说很多鼓励的话，可心里却在琢磨，如果，如果我真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地面上吃力地拱着，还会不会坚持训练融入生活？要把训练融入生活，就意味着要时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搭把手，正常的孩子上床用2分钟；在母亲的帮助下，特殊的孩子上床也只需要2分钟，只是这个孩子将一辈子都学不会克服自己身体上的障碍，自己上床。可一个“面对”，又岂是写出来的这么简单。比如我自

^①引导式教育是结合了教育和康复两种理念的一种教育模式，在项目中运用于脑瘫儿童的康复。强调在教育中、在生活的细节中渗透康复的元素，鼓励儿童积极的性格。

己，当时当刻，看着小麦子在努力地拱上床，也只能是躲在揣测一个家长的心境后面，而不敢面对当时当刻我自己心中的不忍和折磨。

夏令营里面照例会做手工。而做手工，不可避免要用剪刀。可是小麦子那双手紧紧地痉挛在胸前，如何用剪刀？在尝试两次失败以后，一位照顾过小麦子的老师看见了，她说：“麦子拿不了剪刀的，你帮她剪吧。”看着孩子马上缩回去的手，我很不甘心。用剪刀不就是两个手指吗？小麦子的大拇指和食指好好的，为什么就剪不了东西？于是，我把动作分解了，先教小麦子把大拇指、食指同时打开、合拢。如此练习几遍，再放上剪刀练习，然后把纸卡在刀口，让小麦子用力，可结果还是一样。同行有位志愿者学的是康复，她让我像小麦子一样，把手缩在胸前，然后内翻着用剪刀。试了几次，我终于找到原因，原来剪不了东西的问题在内翻上，而不是食指。于是，后面的尝试我开始刻意地把内翻的手掌往外拉。没想到呢，稍微换一下角度，小麦子就可以用剪刀了。那个早上，我们啥东西都没做，不过小麦子开心极了，我也一样。

只有在把每个面对的孩子作为唯一一个孩子去关注的人那里，康复知识才是有用的。这个发现，让我对目下正在开展的社区康复项目愈发的有兴趣。康复的知识，要回到这个社区，回到这个孩子的生活，才是有用的。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医院或者康复机构里面。

命运，期待她成为一个更关注孩子的妈妈；命运，期待这个社区人与人之间更多交流；命运，期待我更多去体谅别人的生活。为何不接受呢？完成命运美好的期待。有位志愿者参加了活动后，回来跟我分享说：“不要感谢我，是孩子给了我很多。看着她们，我都没有资格自怨自怜。”我也没有。

糖 糖

2009年6月3日

刘晓玮致唐婧

糖 糖：

读完信，心情是复杂的。有些分不清哪些感受是自己的，哪些是你的，又有哪些感受是小麦子和她的父母的。

其实这一个月中，也会有想给你写信的冲动，却因思绪的混乱，迟迟没有动笔。公司里可真是一潭死水呢。只有遇到审核时，才会在审核的前一晚，拼命地补做假的工作记录和改进计划，准备一套漏洞百出的假资料应对审核。至于通过审核嘛，就要靠公关了。这是管理层的事，与工人无关。但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很令人讨厌，不仅对工人不负责任，也是对顾客的不负责任。心中有时不免想，这样的厂子关掉也罢。但是这样就太极端了。我所不满的，不是薄弱的根基与现实的无奈，而是不认真的态度和阻碍他人前进的行为。然而这不是管理层的错，他们的行为背后，是无知与保全自我的动机。改变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时，他们如何会支持改变呢？

这就是纠结了近一个月的结果。不想被同化，也不会被同化，我坚信这一点。而且我还想去改变它。从小事去影响他们。嗯，这又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呀，好在我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晓 玮

2009年6月13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看到信，常会想象你的坚持和挣扎。手上在做的，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没有了热情和投入，却要在一个氛围完全不对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对人的理解，会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勇气？在我身边，我亲眼看见了一位新同事，如何从满心“报

国”热情，到迷乱无助，再到安于与其他的同事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庆幸，庆幸做了一年实习生以后才进入现在的机构，庆幸我可以认识这么多有热情、有投入的伙伴。因为我相信我们不管身在何方，总是在一起。也因为，看到你在企业里面的坚持和努力让我相信，让我这些“在一起”的想象得到证实。

给你写信，总是希望有一段长长的不受干扰的时间，一份安静的心情。而这样的时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真是奢侈。对于NGO来说，你知道的，可以很轻松、很悠闲地审几份材料，做两个报告；也可以拼死拼活，却越来越批不下手头上的报告，写不出几个字的材料。其中的差别很简单，仅仅在于你把受助对象当成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词？你把志愿者当成是一个人还是一种“工具”？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我看到了希望，看到很多人存在的意义。我体会到了先行者对土地、对农村、对农夫深沉的爱。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他们对这乡土爱得深沉。

王向党 / 五期实习生·爱农会



2010年10月，唐婧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带领儿童进行户外课堂活动。

相比起这位比我更晚进来的同事，我可以很高兴地为自己庆祝，说自己一直在坚持。因为我见过，真正做事情的人，真正投入NGO的人有怎样的热情和看待的方式。但是，环境的力量真的是巨大的。倘若不能改变它，便会被它改变。在一次会议上，另一名同事对我说：“糖糖，你的坚持让我看到了希望。”当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总会一点点改变的，对吗？再麻木的心也包裹着一滴泪水吧？总会改变的，对吗？让我们一起坚持，并改变！

糖 糖

2009年7月25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我负责的家庭里，有一户忽然走了，而当我找到她们时，那位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会担心我们放弃，你放心吧，我们怎么样都会坚持下去的。”知道自己被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些人牵挂，会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吧。

最近，其实已经在准备跟家长们告别了，舍不得让他们承担这些灾难，恨不得把那些孩子都抱到自己的怀里看护。看到自己这么多舍不得以后，才知道，我也犯了跟妈妈们一样的毛病呢，把别人的灾难扛到自己身上。这些妈妈们是把孩子的灾难扛到了自己身上，而我是把她们的灾难扛到了自己身上。但是像我告诉这些妈妈们一样，我要告诉自己了：“这并不是你的全部。”这一步，要走多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现在知道，要敏锐地觉察到，然后诚实地面对就好了。

作为一个职业的助人者，这或许是整个人生生涯都要面对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不想去做什么项目设计、项目管理、项目推动，只想要做一个直接的服务者，在遇到不同的生命的时候，挣扎也好，痛苦也罢，长出不同的触须去跟他接触。这样的成长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真正的影响力是被感动，而不是被屈服。

糖 糖

2010年3月14日

选择与寻找

刘晓玮致唐婧

糖 糖：

说起那时的“隐居”，其实是断了所有的联系，除了去武汉履行许久前给好友的约定，几乎都是在家里待着。也许正因为不舍吧，才不愿去与朋友联系，不愿去面对可能的安慰、劝说、叹息和责备。

选择了逃避，想要鼓起重新面对的勇气是不容易的。也许并不缺少勇气，而是自己还没有理解和接受自己的选择吧。后来与朋友说过此事，她说不管走的是哪条路，只要目的地是心里想要去的地方就好了。在路上，重要的是一直向前，而不是路的距离与曲折，虽然还不曾完全放下，但总是要去学会接受自我的。

现在的工作，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生存，这个过程也许会漫长，我也许要用五到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它所指向的仍然是农业与NGO。因此，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又哪里会缺乏热情和投入呢。不是很在意别人是如何去想的，其实只要和善而真诚地相处，企业中也会有人情味的。只是偶尔会隐隐地担心，担心这一路走过，那心所向往的地方，是否会因时间的变换而改变？那颗心是否会在企业的种种事件中失去它的自得与敏感？是否会终有一天变得冷漠、坚硬？

晓 玮

2009年8月17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说起来，我进入这个领域，也是因为离别。因为看到了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奶奶，从家庭的中心权威被慢慢变成无力的人，从一个能惩罚别人的老人到只能

咒骂，从咒骂到抱怨，从抱怨到沉默，从沉默到永远不能说话。我尝试去改变她的处境，除了赢得一个孝顺的名声和父母对于我逃避学习时间的猜测，什么也没有改变。所以，当时，我就对她发誓，要帮她。这才有了后来报考的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可是，当她真的离开的时候，我读的专业还没有毕业。面对离别，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很愧疚，我已经没有机会改变她的一切了。

专业学完，发现完全不是想象的样子，心有不甘就去做了实习生，然后到了现在的机构。我在坚持的不过是当初的誓言。但很多时候，所行动与所坚持的并不在一个方向。并不是没有机会去寻找一个跟誓言相同的方向，却还是因为要不要面对离别而犹豫，然后逃避。

“离别哪里都有，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有结束就会有改变，唯一不变的，不过是记忆里美好的东西。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力量。”曾经在给一个孩子做哀伤辅导的时候我说了上面这些道理，但是在自己身上，却是做不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别的双方都在逃避，都不表达吧。

今天，出差回到办公室，发现了你给我的信躺在一堆的文件中间。很欣喜。未开启，已经能感觉到其中的娓娓道来和温暖，于是守着，慢慢等待，与心中的好奇抗争，直到这样的深夜，才开启，去阅读一份远方的心情。说起那会儿你的“隐居”，我禁不住又要去想象和猜测了。记得那个晚上，启婵问我：“如果你，选择离开的话，会怎么样？”坐在自行车后座，看着启婵的背影，我说，我也会割断与这个领域所有的联系。“难道连朋友都不联系？”即便她不回头，也能感觉她对这个问题的急切和不相信，还有悲伤。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的，我跟这个领域的联系，已经不仅仅是项目、活动、工作那么简单，朋友在这里，专心投入的热情在这里，甚至信仰也在这里，完全地割断，心要放在哪里？没有了心，如何投入？投入又为了什么？

那一晚纠纠缠结的自问让我多多少少地接近着你离开时候的心情。我没有离开，选择了留下来去适应，适应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环境，学习在环境中把持自己的坚持，然后学习改变的途径。至于这样的选择指向何处，依然是期待在将来可以为老年人服务。有时候想想，在追寻的，不过是一颗可以自由的灵魂，可以

自由地飞舞，然后像翅膀一样包裹那些孱弱的身体。

糖 糖

2009年9月17日

相信与坚守

刘晓玮致唐婧

糖 糖：

前几日回家了，收拾行李，家当都搬到了北京。坐在火车上，拿出厚厚的一叠信和明信片，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关乎内心，在相互依赖与倾听、追寻与单纯中所产生的。能够身处于这样的事件中，能够彼此分享生命中的感受与思考，深感自己的幸运。

再次重读我们的通信，将目光投向三年前，再次问自己，实习生的过程，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什么？当下这一刻觉得，它不是教会了我什么具体的知识和农村工作的技巧，不是在其中积累了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具象的实践，而是让我知道，存在着一群有理想、有行动、不断反思的人，他们以更为包容的心态理解世界，用行动去践行自己对未来的构想，用他们敏感、善良的心去给予所有的生命以关怀。他们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并通过实习生项目进入我的生命，使我得以与他们一同去学习、感受、思考、行动和创造。现在想来，无论在企业中的这两年里，有着怎样的困惑与矛盾，自己所坚守的，所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的，正是实习生生活中接触并认同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去寻找更为关怀和民主的可能。虽然当年的实习生伙伴们都身在他乡，不常联系，但曾经的相识，在异地的一份相同的坚守，足以成为相互信赖与扶持的力量。现在所期待的，是那短短的一年，是否还有其他的改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自我的成长而逐渐显露出它的意义来。

曾经以为在企业中，自己可以做到只为钱，只按规矩，只干8小时，只考虑

自己，我在信中也曾多次表达这样的立场。然而我们昨天的QQ聊天里，糖糖对我那句“做的事情就要做好”的汗颜，以及在北京的工作中感到对部门员工的那份责任之重，使我不禁怀疑，只为自己考虑，即使是在企业中，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完全地接受自己的过去，因而强调出企业与NGO的这点不同，以给自己安慰。但现在看来，完全就不是这样的。企业本身可以被构造成冷漠行事，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何能够是冷漠的？当我从只用自己做好事情转变为要让10人的团队做好事情时，当我需要从工作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时，才发现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简单地只为自己着想嘛。这样，生活的态度与工作又统一起来了。

糖糖，对于你此次工作的选择，是否依然会有难以面对家里的困境呢？也许对于父母来说，NGO，没有稳定工作的先例，不被他们身边的人所了解，会让他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吧？原以为我的父母让我回家只是因为离家太远，但通过这两年，我逐渐发现，他们所纠结的原因是对NGO工作所面对的未来的不确定。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子女的稳定和发展是他们所关注的。然而成为父母希望成为的人，并不是我的目标。这也许就是冲突之所在吧。现在，逐渐地了解了父母看着我们在外努力漂泊时的心理，正因为爱，正因为关心，他们才会不理解，才会有困惑。从北京回南通时，坐在北京站的大厅里想起了他们，心中的温暖竟使我热泪盈眶，于是便给家里写了第一张明信片。

目的，那个出发点，真的很重要吗？就像我们曾经的关于乞讨者的讨论，是目的还是行为本身在施加时的姿态，决定了那是施舍还是分享？近日接触到一种看法，当我们在寻找一种关怀的时候，无论关怀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只要是真心实意在关怀，就会传递出温暖。是否可以这样去理解，无论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只要行为本身在实施时是透着诚心诚意的，就不算是施舍呢？目的，可能并没有原先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晓 玮

2010年7月18日

唐婧致刘晓玮

晓 玮：

明天就开始一个一个社工站地走访了，这是机构为了让我熟悉机构文化又照顾我喜欢弹性的生活所特意安排的。很感谢机构，对员工有这样个性的安排，感觉像是在做一次深度旅行，又像是实习生时的访点。

说到实习生的访点，就忍不住想起生命中这一段奇妙的相遇来。你说实习生项目让你知道有一群有知觉的人，用敏感、善良的心去给予所有的生命以关怀，并通过实习生项目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共同学习、成长、体验，恢复自己的知觉。实习生项目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吧，也因为这个项目有了更多的视野和选择的机会，但又不仅仅如此。时间真快，一晃便是两年过去，那一段日子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而是一段感情、一种力量的来源。这样的力量，不是来源于别人，而是我在经历了实习生项目以后，所见所感形成的一种相信。我相信生命与生命之间有真实而必然的联系。以前，我以为是信任，现在，我想这联系是爱。

有人说我是自我纠结型的人格，我老纠结在一些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上，感谢老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跟我一样，愿意去纠结这些问题的人。看着这一整年我跟你的通信，我们一直在谈制度与人的关系，独立的个体如何在制度中保持自己的坚持，如何在制度中保护对弱势一方的爱……我们纠结，是因为我们与制度不同，我们不想让制度成为伤害的工具。在NGO，很多的制度都是为了保护机构的利益，这些利益里有机构的迷失，但肯定有爱。重点不在于不同，而在于我能否知道哪些制度是爱的保护，哪些制度是机构的迷失，而在机构的迷失中我如何做到爱的保护？一个制度是否有灵魂，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执行的人如何赋予它灵魂和血脉。讲来好像很轻松，但这个“如何”，却是要长期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所幸，我们认可了制度，并一起在努力学习着——如何。

再谈选择。这两个字我们常常提起，我们的选择，别人的选择，选择离开还是坚持？选择面对还是逃避？我们常常对比，NGO还是企业？选择在一个不完美

的机构待下去还是去寻找另外一个机构？选择推行一个制度还是专注一个人？似乎所有的选择里，我们都希望那个选择是纯粹的好：有自己的坚持和热爱，有机构的明确性和人性，有家人的支持，有专业的学习，有发展的空间……哪怕这个选择有一点不能满足，就会动摇，就会困扰。其实，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自己愿不愿意承担选择里的不好吧。选择来现在的机构，已经不奢望什么选择是完美无缺的，只知道选择了，就全然享受它的好，也全然理解它的不好。

以前的信件中，我们常常纠结在家人的压力和自己的选择两者的矛盾中。很多时候，家人为了看到我们过得好，施予的压力是不同寻常的。正因为他们是家人，是不可以割舍的部分，当他们搬出家庭责任这么巨大的帽子的时候，我们承受不住。现在喜欢给爸爸寄明信片，一方面告诉他我在哪儿，让家人放心，一方面也是真心地想跟家人分享我的生活。或许不一样，但我们血脉相连。还是很有张力，但我相信，家人是可以慢慢相互理解的。

未来会怎么样呢？还是一条未知的路。唯一确定的是，家人和朋友们总会给我力量去面对选择中的好与不好，这个力量叫做爱，就够了。

唐 婧

2010年7月27日

编者的话 唐婧与晓玮的通信，从2009年春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010年秋天她们俩都到了北京才暂时中断。在此之后，这对之前以文字相互温暖的伙伴，开始在时常的碰面中深入地交往与陪伴：她们相互分享生活与工作中的苦与乐，一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乡野山郊中行走，共同面对生命里那些纠结与选择……她们的关系，因“对话”而建立，却又超越了“对话”而存在。

对唐婧、晓玮来说，能遇到对方这样可分享生命的朋友是一种幸福。我们看在眼里，也是满心欢喜。那份真诚的陪伴，也在鼓励和温暖着我们，一起去走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韦罗东：负重下的穿梭 ——NGO与商业社会之间

编者：周 衍

韦罗东 2006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大四期间参与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在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全职实习一年。毕业后先后在BP及壳牌石油工作。2008年重返NGO，目前就职于社区伙伴四川办公室。

陆晓娅 原为中国青年报社高级编辑。1991年在中国青年报社创办青春热线，开始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and 心理咨询，投身公益事业。2008年，和青春热线督导杜爽共同创办了非营利性机构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服务于青少年群体和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人群。



韦罗东与衙门藏族老人考察水源点归来



陆晓娅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我知道虽然做公益的路漫长而弯曲，但我在其中并不孤单，有一群热血青年也在和我差不多的环境下做公益，每天面对着同样的烦恼，虽然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我们在心里互相支持着。

范毅 / 五期实习生·同心儿童发展中心

①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2004年2月在四川通江县注册成立的NGO，主要致力于生态保护、文化与健康促进、社区善治等领域的志愿服务，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生态事业的协调发展。网址：<http://www.dabashan.org>。

编者的话

韦罗东是2005年参与到“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第一期志愿者。自那时起，从实习并历练于巴山蜀水间的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①，直面乡村弱势群体，到远赴广东供职于世界五百强的BP石油公司，到回归川地在都江堰的短暂停留，再到“蓦然回首”重归NGO并再度投身乡村社区发展工作，这个曾懵懂却始终不懈探索的大学生，走过了曲折而又丰富的6年。

这里首先呈现的，是小韦与自己的“对话”。从他这些年的日志、博客中摘录汇总成的这份记录和总结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他这几年一直和实习生项目的师友们、NGO圈伙伴、商业界的同事、父母亲人乃至这个缤纷多彩充满挑战的社会之间，进行着多么认真而用力的对话。

也许在这本文集里所有来自乡村的年轻人中，小韦是唯一没有提到“返乡”梦的一个。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关于“故乡”的梦想和方向。他说，他人生定位的罗盘正是远在广西偏远山村的父母亲人。但也正因为这份爱和责任对他而言太沉重，“返乡务农”从来没有进入这个好不容易在父母期待下“跳出农门”的年轻人的脑海里。大巴山实习生经历之后，他选择以城市为主要据点奋斗。他在广东和四川的不同城镇间，求学，进公司，NGO任职，甚至做过公务员的梦。虽然，他的视线和关怀一直没有离开乡村社区发展以及公益领域，但他更多地选择了一种从城市回望乡村的视角。

对小韦而言，曾经挣扎得最多的，不是个人生活

与社会理想的冲突取舍，而是商业主流社会和NGO公益事业之间的抉择，或者说如何融合彼此——如何既能支撑起沉重的家庭责任，又能够让自己内心燃烧着的社会关怀和公益理想坚持下去？

于是，小韦一直在现实和理想的交战中进取，并怀带着追求卓越和成为社会精英的巨大压力和动力。他并不过度着迷于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也不像很多NGO伙伴那样对主流市场价值观直接展开尖锐批评。他知道现实中太多阻碍需要妥协，但他的完美主义又要催促他在所在领域中都要做到最好。于是在商业和NGO两个不同领域的穿梭中，他努力将各自的优势和经验糅合，兼容并蓄，使之成为自己继续上路的动力和资源。同时也必须直面两方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可能冲击和矛盾张力。

在这篇文章中，小韦最终删掉了许多曾经的“选择之痛”。比如，当他为了女友从广东发展前景一片大好的石油公司回到四川时，恰恰是女友离他而去之时。比如，他的儿时成长经历中的艰辛波折，家庭沉重的爱和无以回报的痛楚，他都更多留在了心底。

小韦的这种挣扎，在很多背景相近的朋友身上也许多多少少都有，如波仔、志雄、华明等等，只是小韦并没有选择断然地走向一个方向而关掉其他方向的门。他还在不断质疑和探寻，渴望更多元的探索。对他而言，NGO和其他道路之间，社会关怀和家庭理想生活之间，挣扎和选择似乎没有终点，但也因此，鞭策他永远做到更好。

①自我对话：爱如何更有能力

三年之后重回NGO，不知怎么的，好像找到了家的感觉、家的归属感，有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去广东之前，其实很有心地整理了志愿者整整一年的生活点滴及思考，现在重返NGO了，回头看看三年前的自己，还是很感动，因为激情、年轻，因为无所畏惧，因为目标明确，因为没有被社会里太多的欲望埋葬，因为有一群真正的师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这一年，让我更加明确的是，我的人生所追求的其中两点是梦想和爱。也许这一路会坎坷，会艰辛，但这就是我要去走的路，没有其他可以替代。

李微微 / 五期实习生·家工作营
志愿者协会

友一起走来……

可以说，我的人品、良知、意念的锤炼是在大巴山做志愿者时完成的，是社会基层的现实、是农民教育了我；而外企——英国BP石油及荷兰壳牌石油，教会了我如何建立团队、如何有效管理有效工作，是技术层面的提升；而现在我所在的NGO是一个让我把良知与技术能力糅合的尝试的平台。

我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平台是什么，但有一条我很确信，我对未来更有信心更有追求，每一个阶段，我都会停下来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要去哪里……这三个问题会让我更有安全感，更有方向感，更有行动力。

心智良知——大巴山的日子 (2005.7-2006.6)

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对于社会是没有太多概念的，更别说边缘的NGO。可是却恰恰与它结缘了。一次不经意的机会，我成为国际小母牛^①的志愿者，通过这样的小窗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又经过富有戏剧性的“面试配对”，最终我参与到了第一届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有幸到成长创业期的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与张浩良老师一起走了一年……

(1) 人生导师

张浩良老师是一本我到现在还读不懂的词典，他49岁，整个人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同时又有

①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是一家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致力于救助全球贫困与饥饿，向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家庭提供家畜、农作物以及可持续农业教育等。1989年，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了办事处，其中国官方网站为：<http://www.hpichina.org>。

很强的超前意识、旺盛的精力。他走过坎坷的路：来自于农村，无靠山无捷径，靠自己拼搏，写过稿维持生计，做过木料生意支撑家庭，在林业工作过，在政协当过副主席，到成都打过工……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一直支撑着他走过这么漫长曲折的人生道路，并最终创立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以公益服务作为他首要的人生使命。他身上的这些特质吸引着我，跟他一起工作，我每天都感到有压力，很害怕自己跟不上他的节奏；也是这种压力压出我的动力，积极地学习讨教，把我推向了成长区。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张老师就是我的活词典，不懂就问，就讨论，再去做。所以我听了，我读了，我迷糊了，我讨论了，我清楚了，我做了，我明白了。

与张浩良老师在一起，我们既是同事、师生关系，也有如父子关系。他总是教我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都要有超前的意识、创新的意识、一颗赤子童心，才能快乐，才能保持良好心态，才能成就事业！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他每次参加培训回来，都要和我们分享培训的知识、技术还有他的感受。跟他在一起工作，感觉很充实。

（2）支持网络

因为参加了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在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之外，我还结识了很多来自不同机构和领域的老师朋友，认识了很多的志同道合者：日本的吉本美纪、上海的曲栋、北京的陆晓娅、云南的赵群、香港的文嫦、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刘老石，还有我的导师周衍以及其他众多的老师。当然，还有我的同期志愿者团队的“鼠友”们（第一期志愿者给自己团队取名叫“土拔鼠”，编者注）。这些师友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是给我支持、给我辅导，帮助和支持我成长的“理事会”。

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三次集中培训，我都参与了，感觉无形当中我也在学别人的闪光点，也是在丰富我自己对参与式的理解：参加—知情—表达—决策。

在每一次的实习生培训中，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不是那些工作方法，而是众多的同伴、老师系统地帮我梳理了如何面对不完美的现实，如何建立积极的心态。我曾感觉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一个新事物，我总想先把握好它的整体概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我知道，在公益的道路上会有很多的坎坷，没有人会督促和催促我，很多事情只能自己拿主意。不在乎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只在乎自己是否用心去做了。

韦素娜 / 五期实习生 · 南宁市舍
得残疾人职业学校

念，然后才去慢慢地实施，如果一下把握不了，概念不完整，我会迟迟不行动，甚至伤心挫败。但是在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里的每次学习、培训和实践过程中，我明白，概念引导我们去分析、了解问题，它给我们一个看事情的角度，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到何处找有效的解方。概念是要点点滴滴地积累组拼而成的，它需要时间和经历，所以我们不能干等着概念成熟再去行动，我们要行动起来，在行动中让概念成熟。

集中培训其实对我而言不是要帮我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是向我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很喜欢培训没



2006年，韦罗东在通江做社区调查。

有告诉我问题的结果而是指导我去思考，没有告知只有提问；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答案在我日后的思考、践行探索乃至生活奔波中……

正是这样的培训，这样的支持网络，我们各自在点上出现的失衡又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3）四访农户的故事

如果说老师朋友们给的是理论的指导与支持，那么项目中具体的操作就是将理论和理念揉进自我的实践平台。在研究会里我主要参与国际小母牛与我们合作的通江肉羊项目的日常监测实施。这个项目的想法很新：提供种羊资金、种羊及圈养技术给社区里选出来的农户，并跟踪支持农户从购羊、养羊到创收等一系列过程，帮助农户不但在生计收入上提高，更在可持续生计的经验和能力上有所提升。农户不需要归还资金给机构，而是将种羊和技术以“礼品传递”的形式传递给其他农户，这一种创新的方式能将实物、技术和理念的支持在社区里推广，推动社区内部的互助氛围和可持续生计。

然而，真正的运作，可不像项目设计的那样美妙。记得当时有一家项目农户，我四次光顾了他们家——

第一次，一开始，他是自愿加入项目的，但却不知何故，他申请了种羊资金后却迟迟未见行动。我和同事第一次入户监测时，他以种种理由拖延建圈、采购种羊。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措手不及，郁闷而归。当时想，也许他很快就能克服这些因素，走上正轨。

第二次，2005年8月二度监测时，距离拨付种羊资金给他已过了很长一段日子，他告诉我说，已购种羊但全部散养山上，我天真地要求其收回羊只让我看看。他无奈之余令其妻去寻羊，过程中刘妻摔于山坡，态度也变得愈差，两口子直骂我们项目人员是来做生意的！我们再度无功而返。

第三次，再次进入社区已是11月份，与农户的沟通始终进入不了主题，他的思想根深蒂固地认为是在帮我们养羊，我们是做生意的……晚上七点多，双方口角激化，特别是其媳妇在后面说的一些脏话，终于让年轻气盛的我爆发了。

第四次光顾之前，张浩良老师以此案例与我们探讨，帮我们理清了思路。我自己也获得了很好的现实思考的素材，我必须承认作为项目组，我比较关心的是羊只、生产等工作的管理，对于农户，我因为之前沟通的不顺畅，有先入之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只站在“问责”的角度，而忽略了站在农户的立场思考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小母牛的伙伴也教我如何放好心态与姿态，试着坦诚地与他们多一份沟通，多一分理解。农户之所以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太忙？是没有劳力？是养羊方式？……于是，我第四次走进农户家，心结打开了，问题也慢慢地解决了。

虽然“四顾”只是志愿者生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小故事，但正是这些小故事让我获得了很多思考及成长。每次经历这样的挫折然后学习反思的过程，我都做非常详细的个人工作笔记，那是我反思的原始素材，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是能力的提高，更是我的心智茁壮成长的过程。

在外企——关于管理技术思维的思考（2006.7-2008.8）

一年在大巴山的经历，除了收获，也有无数的眷恋和不舍。毕业将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在NGO以及商业和公务员等等选择之间徘徊，一方面，从广西乡村走出来的我，要考虑父母和家庭的期待，以及生计上的压力，另外，年轻的心也不想那么快停歇，总想到大千世界里面多锻炼，多走走看看……

（1）心态调整

面试BP时，我刚刚从大巴山走出来，没有多说社会工作专业以及我的学习成绩，而是谈了很多我志愿者生活的见闻收获、对现实的看法与思考。面试结束时，面试官突然对我说：“你以后不要穿这样的西装来面试了，简单质朴才符合你。”

顾不得很多人的反对意见，我辞掉四川其他单位的邀请，告别女友，南下广东，慕名去学习这个国际闻名的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我的内心渴望在NGO之外，系统学习企业的高效运营管理模式。

2006年7月，我和其他两位大学毕业生被分到顺德区油站实习。一开始，我们跟小学没毕业的打工仔一样，连续上了11个夜班，拖地，擦油机，点货擦货。但我没有半句怨言，我想，这是我的选择，我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成长得很快，12月，我被分在惠州的大湖溪油站。然而，半年过去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公司把我们招进来，却没有让我们参与油站管理。我终于控制不了自己了，电话给Peter，BP公司的大区培训主管。

Peter在电话那端安静地听我诉苦。他说必须放下很多东西从一无所有开始，“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放到下面不闻不问吗？为什么人家接站你不接站？因为时机没有到，说白了，你们都是大学生，学报表你们一周全部都能学会，可是短短时间你们学不会的是做人，是对人的管理。资产都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学会在了解基层员工的时候同时还要了解自己，水到渠成。”

放下电话，我沉思着，龙应台的一句话浮现脑海：“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如果你将工作视为一种积极的学习经验，那么，每一项工作中都包含着许多个人成长的机会，不管它多么琐碎卑微。

很快地，我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一天晚上，顺德区的上司突然电话给我，要我当晚拿出一个有竞争力的标书来参加全公司的油站竞标以及有潜力经理的筛选。

只有一个晚上！那晚，我尝试了好多种写法，我试着梳理这一年多来，走了那么多油站，接触了那么多员工、经理、区域经理的风格，试着去沉淀一个标书。甚至，我想到了在大巴山的经历，我匆忙请教了我入社会的第一任老师——张浩良老师，用NGO项目设计的思路揉进企业思维尤其是团队建设的模式，写了那份标书，让公司及各区域经理认识了我，我也从此调回顺德荔村，开始参与到油站的团队管理工作中。

（2）建立团队

我发现，企业的团队建设和NGO以及志愿者的团队建设之间，有互通的地方。

在头三个月里，我们油站每周的会议都是轮流主持，强调每个人的参与和贡献，很类似于NGO的参与式管理。和在大巴山时一样，我更多的时候是用心地听，记录他们的建议，然后支持他们去改善。我一直坚持我的服务对象不是客户而是员工，我不想用利益挂钩来管理员工，也不想处处以规章做事；我没有像其他经理一样单独住一间房，而是跟员工一起住，分享工作的过程，遇到的困难和委屈，一步步鼓励与肯定他们的成果。对我而言，不是管理者期望员工表现什么，而是员工期望自己表现什么，管理者只是给予适当的协助。为此我也借鉴NGO里的经验，建立了很多对话的平台。

为了照顾到新进来的员工加错油造成的损失、员工生病住院以及其他突发事件，我成立了一个阳光小基金，员工自己管理，资金主要来自销售机油后公司给的提成，一半返给员工个人，一半纳入基金中以及日常的其他团队资金。至于该不该用，员工自行讨论。于是我们多了很多聚会、互动和互助的机会，过年我们还一致同意利用基金置办年货给员工。在这样的互助与互相支持中，大家的心又更近了一步。

（3）反思企业的盈利思维

虽然在顺德荔村油站自己营造的小环境里，我们生活得很快乐，但是我却知道，外面的商业世界更多遵循利润至上的逻辑，利欲熏心的思维模式不知何时会蔓延过来，而我该如何面对呢？

物以稀为贵，石油近年来更是如此。尤其在广东，众多的货运需要石油，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与其说其中的利润丰厚，不如说买卖间的“猫腻”更诱人。公司也使出了自己的销售手段，捆绑销售，我知道这一切都在蠢蠢欲动。荔村油站还在我们自己建立的堡垒中抵御外界的金钱诱惑，但被夹在主流商业运作的洪流中，我们是否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一直梦想成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是生意人，但这其中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很难做到黑白分明。慢慢地，我觉得这个环境已经越来越不适合自己的发展。

很快地，老板提出说调一个大站给我管理，我最终没有去，而是继续留守荔村，但老板也不断善意地提醒我：人不能在一个小平台上过，不能满足于驻足享

受阶段性的成果。我想老板是对的，这两年，从个体平台走向油站平台，我始终知道我需要更大的平台来历练自己，难道是BP内部更大的区域平台、片区平台？还是跳出去？这时的局势由不得自己缓慢思考和选择。

好心的老板极力推荐我调到公司总部工作。当时总部有个项目的主管缺位，需要人。原来的好胜心又驱使我去参加了这一竞争激烈的面试。最终几个面试的经理满意地问我什么时候能到总部上班，那一刻，我的回答却是：对不起，我就要离职了。他们愣在那里……

心智良知与管理技能的糅合（2008.9–2010.7）

（1）重返NGO

我知道，当时让我辞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对企业的盈利模式的质疑，虽然那份质疑已经深深种在心里，但是还不足够强大。当时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份感情在四川未了，再加上油站外部让我无法坦然接受的一些风气正愈演愈烈，所以我决定放下一切诱惑，回四川从头开始。

回四川，我先是很“水到渠成”地进入老本行壳牌石油中工作，但没有料到的是一场突然的变故，让我重新回到NGO。

那就是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

当时，我正在壳牌石油的都江堰的点上。经历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绝境逢生的我，看到了无数的尸体，看到了孤儿们迷茫的眼神，看到听到了无数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些平常人在灾难面前的惨痛境遇，重新唤起了我在大巴山工作时接触的底层老百姓的种种悲凉记忆、我对公益慈善工作的动力以及重返NGO平台的激情。

于是，我开始寻找灾后重建中的平台，回到了NGO。

在BP的日子里，我把NGO初步的手法及心智融入企业里去尝试，在此基础上获得了企业很多的管理技能。如果再把企业的管理思维与NGO更大的平台糅合，又会是怎么样呢？

（2）良师益友

虽然在心灵上依然有更多的碰撞需要调试，但也因为之前参与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而结缘的很多师友及时与我交流沟通，帮我疏导了很多情绪。最让我感激的是与陆晓娅老师一直的对话和彼此鼓励。

在我走向成熟的阶段，晓娅是我最重要的朋友、老师，是她让我触摸生命，感知生命，理解和感恩生活。我一直没有终止过和她分享我个体的成长、个体的困惑，而晓娅老师无论多忙，也总是不忘对我这个晚辈的关怀和开解。

记得2005年，她让我们回顾了自己的生命之河，让我们寻觅那个源头，让我们畅想我们未来之河，甚至超越时间让我们撰写自己的墓志铭；她用简单易懂的游戏、故事、图表教会我们去体验生命，管理情绪，体验个体与他人、与团队、与社会的连结……

记得2006年，我们毕业之际，她用一张画有背包的A4纸让我们整理这一年的个人成长行囊，有感恩、工作技巧、社会责任、挫折、忧伤……她也让我试着从包里释放出一些东西，让我们学会轻松简单地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生活。

记得2007年，她南下广东给中国移动讲课，我们匆匆在顺德见了一面，我们就工作的实例探讨了管理的心理学，诸如追求完美与授权问题、员工成长等话题，让我获得了很多……

记得2008年，在我选择工作与爱情之际，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入，虽然我们年纪相差二十岁，但是我们都在用自己最切身的感受或事情来分享与交流，她总是从积极的角度鼓励我，跟我讨论儿童自闭、单亲家庭、成长心累、恐婚、不自信、两性差异、死亡等种种话题。

记得2009年，我们各自在NGO里工作，通过博客、通过对于阅读和电影等读后感的分享和讨论，对NGO和公益话题的交流及碰撞又重新频繁起来。

我们亦师亦友，从2005年到2010年的五年岁月里从未停止过交流与分享，正因为互补，正因为共同成长，我们的交流对话才会持续到今天，或许正如她所说：“其实在这样的互动中，你给我的和我给你的一样多！”

（3）自我思维冲突

事情多了，当多到应接不暇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也就没有心情去享受工作的乐趣或者工作意义的神圣！

项目生活化，生活项目化，我要推动的不是可持续项目，而是可持续生活！

要是以前我会越战越勇，可是这次感觉有点伤。对于周期内的项目没有游刃有余的感觉，也许是很多的项目工作都进入了尾期，很多的工作需要推进，下半年连喘气的时间都少了，虽然匆匆忙忙安排了十月的休假，但是私人的安排也是很紧张，因为要充的电很多。

进NGO开始很舒服，舒服之感来自于自己内心最本质的东西与它雷同，觉得生命或者生活的合一如此的富有意义。

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钻进了这样的领域，购买了很多从心与大自然重新连结的图书，搜集相关的资料、影像。觉得自己开始反思以前生活的种种不是，觉得社会责任离自己越来越远……

但另一方面，却开始为这种舒服而担心。因为自己依然不时感觉到家庭、外界主流社会所产生的经济、心理意识或社会交往上的压力，所以越发担心——目前这种内心平静而又有意义的工作状态，是否会让我对NGO中毒太深，会跟社会“经济”脱节。如果，哪天因为父母老去、顾家挣钱不干这行了，不得不回到商业社会，自己还能做什么？我是否已经与商业社会脱轨了，一心栽在NGO里，“伟大、心安”却不能顾小家？

在抉择的张力中继续前行（2010.8—2011.2）

（1）定点的罗盘——家庭父母

今天是大年初一，对父母倍感思念。之前一直称呼爸妈，今天特别很想正式地称呼他们父亲母亲，我也一直不知道如何感谢父母，因为他们一生为子女付出了太多，不仅是经济，还有教育，一对农民夫妇如此演绎他们的一生，不问回报……我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太多。

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农民，却用双手和智慧撑起了两个家庭10口人的生活——除了我们家，双双残疾的五伯夫妇及其子女也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大家庭中真正的劳动力只有我爸妈两人，其余个个都没有劳动能力。但他们依然每天乐呵呵地面对生活，承受苦难。他们的爱，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大义，他们的坚忍慢慢地揉进我们的性格里。

也是父母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一直以来能走着自己的路：从考大学，到大学期间文转理，大一攻读文学，大二主学管理学，大三心理学，大四去大巴山投身志愿者工作做公益，出了社会从BP石油到壳牌，又回到NGO……父母从没有过怨言。而今天，父母渐渐老去，我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却一直没能替家里支撑多少。

NGO是梦想燃烧的地方，是你实现社会责任感的地方，可是只要你停不下来，你就永远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你认为你总是对的，因为你觉得是在做一个伟大的工程、一个伟大的大家，可是你的小家却在不断地牺牲，为了生活，你越走越远，家也越来越远。

前两天看了儒家的论述，百事孝为先，孝不是电话不是钱，不是等你有成就，孝不能等……我才恍惚，我才紧张，多年之后的今日大年初一，我倍加思念起了父母，思念兄弟姐妹的笑语。想起了此刻本该属于父母的那个时间、那个空间的家，想起了他们的满足、他们的孤单、他们的快乐、他们的艰辛……

我落泪了，年少太轻狂，总想走出来，可是越走，离家越远；越远，越恋着家；继续的路铺满荆棘，来时的路已经开始模糊。孝不能等，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从事何事，不管你在哪个空间、哪个时间、哪个维度，你都只是一个儿子！请表达你的爱、你的孝，请给你能给的家！

（2）取 舍

我们一生之中，承担太多的角色，有儿子，有父母，有丈夫，有同事……正是这样的角色要求我们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能完全以NGO的强烈理想使命来要求自己，我必须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有能力去承担家庭的角色责任，这也是我取舍的基本原则。

如何博弈，如何在两者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是我要去寻找的答案。

随着工作的深入，状态的改变，我的视角慢慢变得宽阔。原来我们说要让社区参与，使社区发声，其实现在我感觉隐约能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但我想还要做扩音的平台，目的是让其他人能听到这份弱小的声音，理解这种声音，加大这种声音，还有就是他们自己能在大团队、大社区里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以此建立一个相互了解、相互促进、相互教育的社区。于是自我这方面的敏感性越来越强，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对社区的感情越来越深……

若是从工作内容上来说，深深吸引我的，恰是机构的理念，恰是它能给予我的空间，恰是它两年来给我带来的内心平静而激情的生活，也因为我对社区层面很感兴趣，使我想去尝试与探索。

若是从个人成长发展及思维、视野来看，我想在不同的社区、不同人群中去尝试不同的手法、不同的项目。虽然可以通过参观或者访谈别人来学习，但那跟自己亲自来尝试深入推动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后者会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反思与成长。

若是从社会和生活现实看，NGO机构保障型的薪资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正是这样的境地造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与对这个行业选择的冲突，也正是这样的冲突带来了生活、家庭、责任的觉醒、反思，怎样的生活才是你需要的？毕竟我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我。

我想前两年使我沉入社区、激情做事的并不是薪酬，但是当我想把它当成一份有意义的事业、一份职业来做时，我也不能太委屈自己的家人。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

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到自己以前未曾接触过的社会，因此不再狭隘地看待这个社会，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同，也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可以持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人及这个社会。

黄兰 / 五期实习生·爱在绿城志愿者服务队

作出选择很重要，做出行动也很重要，创造出平台来发展自己、平衡自我系统更重要！面临这么多的得与失、机遇与风险、收获与纠结、个人与家庭、个体与社会……我最近一直在问自己该作出怎么样的选择，才是对我个人成长与生活平衡的最好方式？

也许李开复的“追随我心”就是自己尝试解结的最好方法！

编者的话 陆晓娅是韦罗东这几年间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无论实习生项目时培训期间的相遇，还是远隔千里之外通过信件和博客的问候和支持，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未停歇。我们将小韦的文字发给陆老师，希望陆老师为这个小小对话伙伴写下一些什么，很快收到了陆老师的回信：“我愿意试试看。罗东是那批实习生中至今和我有联系的一个，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我愿意试试，也是想从他的成长轨迹中找到一些启发。”

陆老师的回复，让我感动，因为，她在自己的丰盈人生之内，一直保有一颗最年轻的心。她不仅仅是润物细无声地滋润和关怀着小韦等年轻人的成长，更懂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放下自己，以单纯明澈的心态汲取养分，不断成长自身和发现世界的丰富（正如她的电邮签名档“心单纯，世界更丰富”）。于是她能够发现韦罗东身上的“小韦&罗东”，发现那么多年轻人身上的无限可能性，并以长者的睿智和孩童般的好奇，做着他们永远的对话者和陪伴者。

②陆晓娅的“回信”

小韦&罗东：

你们好啊！

当我开玩笑地写出这么个称呼后，忽然心有所动：韦罗东原来是那么丰富的一个人——既有激情，又有理性；既有人性的关怀，又有管理的意识；既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又能踏踏实实地做事；怀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放不下对家庭的义务……“小韦”和“罗东”，有的时候好像会打架，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两

个相互扶持，携手前进，让韦罗东变得更有力量。若是，若是“牺牲”掉他们中的一个，韦罗东恐怕也就不是韦罗东啦，你说是不是？

好吧，玩笑打住，说正经的。答应写这篇回应，也是借此梳理一下自己对公益人生成长之路的一些思考。

走向大巴山的韦罗东，主题词：打开心胸

也许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時候，无比忐忑和心虛。虽说此前我带领青春热线志愿者团队走了十多年，也装模作样地做过不少培训，但这次的志愿者培训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隐隐觉得，你们愿意拿出一年的青春时光，在公益领域试步，真的很难得。我想你们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NGO工作者应该掌握的社会发展理论、实务工作技巧，还需要个人的自我成长——一方面，年轻的你们面临着诸多的选择和挑战，有许多成长的课题需要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太多困难，投身其间的人，必须比常人更勇敢、更坚忍、更开放、更自信、也更能影响和带动他人一起前行——因此，个人成长实乃NGO人的必修课。

感谢以文嫦、曲栋为首的项目培训团队，给了我信任，还有你们年轻的眼眸，让我可以大着胆子进行尝试。

印象中，在培训时你并不是讲话很多的一个。但随后你在实习中写下的文字，却让我分外吃惊。

第一个吃惊是文字量之大。至今，我的电脑里还保存你写的《成长足迹》，长达109页，超过了10万字！

很难想象，在紧张的实习工作中，在艰苦的条件下，你怎么会写出这么多的不是风花雪月、不是闲情逸致的文字来。我猜，通过写作，你可以很好地整理自己，使茫然的心绪变得宁静，让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将纷乱的想法捋出头绪，走向事情更真实的本质，倾听自己内心更深处的声音。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也是自我成长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二个吃惊是你的学习和反思能力。在这些文字中，有流水账式的工作记录，有你整理的培训笔记，也有日志体的观察、思考和感悟。

我最喜欢那些日志体的东西，因为通过它们，我可以感知到你的情感温度、思考深度和行动速度。如果说，商业社会情感温度有点低，政府部门常常习惯于不思考，对于NGO人来说，情感、思考和行动，却是一个都不能少。情感让我们可以与他人产生连结，思考让我们更准确地定位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适时、恰当的行动才会带来社会改变。

你那个四访农户的故事，让我清晰地看到了你的成长。当你把“问责的心态”转向“关怀地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心态”时，我知道有一些很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你校正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不再从公益慈善带来的社会赞许中获取个人的心理满足，而能以开放的心胸，去了解你的服务对象，学习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和思考，你不再是一个批判者，而变成了一个同行者。

这个转变，说明你有了自我觉察能力和同感的能力，它们是“情商”中最重要的成分，也是公益人最宝贵的特质之一。

在我的词典中，“打开心胸”绝不仅仅意味着能够吸收新鲜的东西，更意味着能够放下自我防御，特别是在挫折和困顿中，能够走出“我对你错”、“唯我先进”的僵硬思维，愿意倾听、了解、反思、探索。有了这样一种习惯，人会变得更有韧性，也更有办法找到双赢、多赢的出路。

我用你的几句话作为本节的结尾吧：

我听了，我读了，我迷糊了，我讨论了，我清楚了，我做了，我明白了。

BP加油站的韦罗东，主题词：坚守底线

项目结束时，有些实习生选择了留在NGO中工作。我知道那时你在挣扎，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青年，你觉得自己有责任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我当时特别担心，你会因为无形的压力而不能跟着自己的心走，毕竟这个项目让大家都对公益事业有了更多了解，对农村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而项目本身，也是为了能有更

多的年轻人进入公益领域，成为未来的中坚。

还好，你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你去BP工作的决定一点儿都没让我失望，因为我相信，不，是我确信，你不管走到哪里，是不是进入商业社会，这一年所播下的公益种子，都永远会在你的心底。你一定会在未来的人生中，继续与公益结缘的。

我的直觉果然没错。

那年去广东讲课，拐到顺德你工作的地方，想看看进入企业的你有什么变化。那时，你已经“当官”了——通过竞选，你成了加油站的经理，管着七八个员工，有的年龄比你大多了。

瘦瘦的你，穿着制服从加油站里晃出来，有点腼腆地笑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井井有条的加油站，每道工序都有条不紊，每样货品都码放整齐，更难得的是，每个员工都满脸笑容。

有位大姐跟我说，他们都很喜欢你，说你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同时对员工又非常体贴，她说小韦来了，这里就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温暖了。

你请我吃饭，告诉我你如何把在NGO学到的东西用在企业管理上，如何将管理的重心放在“人”上，员工们又是怎样一点点成长的，加油站的效益又是怎样上升的……

我们的谈话总是被电话打断。广东正在闹油荒，作为加油站经理，你是个“香饽饽”，只要点个头，钱包还不就鼓起来了？但你很执拗，执拗地在自己建立的堡垒中，抵御着外界的诱惑，并苦苦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

最终，你回到了四川，为了给一段感情一个交代，也带着对利润至上、操控垄断的质疑，从商业社会环境中退出。

一进一退，让我想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到底谁是主导的力量？是人，还是环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要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又应该坚持做自己，反过来去影响环境？在不能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底线？

有意思的是，我们机构的年轻人告诉我，大学毕业没有几年，他们发现那些

当了公务员的同学，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表上肥了，内心里瘦了。他们有了房子车子，却好像失去了魂儿（我还是不用“灵魂”这么重的词吧）。

看起来，他们已经被那个环境同化了。当然，对此他们会有各种说辞。

而瘦瘦的小韦，为什么你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呵呵，你心里有种子，有火啊。

还记得我讲过的“关心圈”和“影响圈”吗？作为加油站的经理，你成功地影响了、改造了你的小环境，你在“影响圈”里行动而不是在“关心圈”里讲废话。

当你带着对商业社会的思考、质疑，从那里退出时，我想那并不意味着你退回到“关心圈”，恰恰相反，你将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去影响这个不那么美好的世界。你冷静地观察，清醒地思考，不愿被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异化为“生意人”，在你无法左右大环境时，你选择离开何尝不是一种“影响”？在与环境互动中，你的脚跟还是蛮硬的。

我还是用你文章中的一句话来做小结：

“你以后不要穿这样的西装来面试了，简单质朴才符合你。”

回到NGO的韦罗东，主题词：提升能力

你回到NGO，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种子在，有火苗在。无法对人类的苦难背过身去，给了你选择的理由。

很可惜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只能从你的邮件中，看到一些你人生的新足迹，但不甚清晰。我能感觉到你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希望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有意义的，也是有成效的。你也有意识地把商业领域中中学到的管理方法，用在公益项目中，希望这样的嫁接，能生产出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你的思考和实践，与我不谋而合。

2008年，我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杜爽创办了非营利性组织“歌路营”^①，

开始在公益领域创业。歌路营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成为“专业化、创新型、有影响的教育NGO”。

为什么要提“专业化”？因为我们发现，由于公益领域竞争不强，公益界的服务和产品往往很“糙”，这对公益事业发展显然很不利。

对于公益机构的“专业化”，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做公益热忱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我们却坚持认为，热忱不等于服务本身。好的服务，一定要有理论支撑、有效手法、严格评估、可以复制。那种拍脑袋就上、做完了也不知道效果如何的公益项目，很难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不论是做农村发展、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传承，还是支教或者扶助弱势群体，都应该掌握本领域的专业理论和方法，把事情做深、做精、做好。专业化不仅仅是理论、技术、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在这方面，我们倒是要好好向企业学习。麦当劳、肯德基的成功绝非偶然，即便是擦桌子洗抹布这样的事，他们也都有严格的流程和标准。

专业化的一个陷阱是容易把工作技术化、工具化，失去了人的尺度、广阔视野和工作弹性，因而也随之失去了工作的真正目标和意义。工作中很多宝贵的东西需要整理、提升，但如果发现我们整天忙着这些事情，我们的心已经不再柔软，我们对社会的需求已经不再敏感，我们脱离了自己的服务对象，已经不接地气了，我们专注于“事”而感觉不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这就需要警惕了。

①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是非营利的青少年成长教育机构，成立于2008年11月，以“使青少年乐学习、享工作、爱生活，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新公民、新领袖”为使命，服务于青少年和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人群（教师、家长、青少年工作者和志愿者）。网址：<http://www.growinghome.org.cn/>。

这个假期，我们硬是挤出时间，安排了一次次的内训。作为服务青少年的机构，我们觉得青少年辅导的能力、开发青少年活动的的能力、带领青少年团体的能力、多元的青少年工作手法、项目管理能力等等，都是我们在向专业化努力中需要提升的。我发现：原来做NGO需要学习的东西真多啊。这两年除了心理学，我和我的同事们还读了大量的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管理学方面的书籍，以期不让自己“死”在项目上。我还发现，专业化可以让公益领域的年轻人有更大的成长空间。一旦他们发现需要学习和提升的东西有那么多，他们真是非常快乐呢！

不好意思，怎么扯到我自己身上了呢？

用你的小标题作结吧：

爱如何更有能力？

未来的韦罗东，主题词：？

怎样留住愿意从事公益事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挑战。如你所说，“NGO机构保障型的薪资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作为中国本土NGO，歌路营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留住有理想的年轻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而你将来是重返商业社会，还是坚守公益阵地，我也无法告诉你哪条路对。歌路营所能做的是尽量为机构的年轻人创造发展的空间，让他们的能力实实在在有所提高（他们的成长真是令我赞叹，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带着我成长）。当他们变得更有力量时，我真的也不太担心他们的将来。即便他们有一天离开歌路营，去商业社会谋生（呵呵，恐怕当公务员不是他们的理想，尽管也常常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但他们已经想得非常清楚），我也相信他们会更有能力，同时不会迷失自己。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时，能在公益领域工作，无疑在价值观上打了一个好底儿。而将来，不论他们做什么，都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投入改变世界的努力之中。

对你，我也如此相信，也如此坚信！

再说一句，我也很欣赏你的家庭责任感。看到你成长中家庭给你的滋养启迪，特别是精神上的启迪，很感动。很多人认为做公益的人都是怪物，只对服务对象（大多是弱势群体）有热情，却对家人没热情，比如帮了少管所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成了罪犯。我甚至听说一位女士不仅整天不着家做公益，还一次次偷偷变卖家产，她的丈夫哭着说：“做公益，中毒啊！”

做公益因为能够带来社会赞许，提升自我价值感，所以真的可能使某些人“成瘾”。当做公益成瘾时（症状一，为公益活动而不惜牺牲家人；症状二，在非公益活动中感受不到自我价值；症状三，总是觉得自己正确，代表社会的未来；症状四……），其实就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了。

本来想送给你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两条路》作为结束，突然觉得，难道两条路就截然分开了吗？公益人可不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商业社会挣钱？在商业社会中，可不可以也为公益事业出力？你曾经把NGO的理念和方法带到商业社会，又把商业社会的管理方法带回到NGO，这样的跨界，不是创造了更好的东西吗？

非黑即白，是我们这代人从小习得的思想方法；“混搭”，“跨界”，是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也许，重要的不是所谓“外职业生涯”，不是我们在生命之河上选择了哪条船，而是我们如何把好内心的舵，以及拥有一只永远不会让自我迷失的锚。

我的锚上，刻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小韦&罗东，你们的锚上，你的锚上，刻着什么？也许，那三个问号下面的一“点”就是你的锚吧：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要去哪里？

陆晓娅

2011年7月26日

掩卷有感

花儿终将开放

文 / 曲 栋

翻开厚厚的对话文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然纸上。透过那些名字，那些年轻人的面庞出现在我面前，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远、有的近，不管怎么样，我都仿佛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笑容、他们青春的身影，我从中读到了他们的真诚、纯洁、坚定、激情和可以触摸心房的温暖。此时此刻我感到幸福，那幸福是因为在这个错乱不堪的时代，在这个常常令人无望的社会，我和这样一群有理想、内心充满爱、坚定的青年人走在一起，相互陪伴、相互支持，虽然远方那个我们期待的有爱、正义、平等、自由的世界依然看不清晰，但在这通往远方的旅途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快乐与无畏，我们的人生的闪亮，我们的生命的精彩……

写给志雄、郭慧、糖糖、晓玮、韦罗东的信

志雄、郭慧、糖糖、晓玮、韦罗东：

你们好！

写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样子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面前。生命如此奇妙，几年前我曾经在不同的培训班上和你们相识，没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相连接。我要感谢你们允许我透过你们的信、心得、文章和对话的记录走进你们的生命，我也期待我可以贡献我生命的感悟和回应，让我们的生命相

互影响，让我们一起成长。

首先，我非常非常想说的是我要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开始把握着自己的生命。虽然你们很年轻、很普通，但是我感受到你们清晰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于这个世界，知道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脚踏实地地去追求、去创造你们想要的那一个更加完满的自己，甚至是一个更加完满的社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仍然会有困惑、仍然很艰苦、仍然经常面对自己的弱小，但我相信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的你们，一定会不断收获一个个果实，一定会看到自己的不断成长，一定会发现梦想越来越远。而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快乐的、幸福的。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从大学时代开始，迷茫就伴随着我的生命。我27岁开始接触志愿者与NGO，开始到社区做服务，那时候似乎感受到一些内心的火花，似乎看到了前方的一些光亮，但关于人生价值的迷茫还是无法解开。直到35岁的一天，我又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的人生到底要实现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一刻我感受到内心中那团火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我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和更多的青年人一起，通过更多的公益服务，一起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所以2009年初我辞掉了上海的律师工作，专心致志在广州从事全职的NGO工作。对于现在的生活，我非常的满足和幸福。尽管我的工作中、生活中还有着非常多的困难与艰苦，就像你们也会遇到的那些困扰和困难一样，但我的脚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在土地上，我的心可以平等、真诚地和身边的人交流，我的生活可以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享受自己这样的生命状态，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值得的，是死而无憾的。

在你们的对话文章中，我读到了你们面对理想的困惑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两年前，我和一些青年人探讨在NGO工作生活遇到的困难，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没有困难”，“这些生活的困难是NGO的工作带来的吗”，所以，我非常欣赏你们对这些困惑和困难的接纳。因为只有这样的接受，才能让我们去面对而不逃避，将我们的专注回归到自己该如何去回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更多地在抱怨，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无力和焦虑之中。这样的人是无法有积极的行动的，也没有耐心和平静去思考，当然

也无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是社会服务的发展还是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的转型时期的中国，都牵涉到制度和体制中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和结构的改变，无法依靠一个或一些理论简单地诠释和说明，解决的过程也一定不会是像运用一个数学公式推理出答案那么简单，所以对于志雄说的看不到我们今天的工作和那个宏大的目标之间的联系，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而我想现在我们的所有努力，更大的价值在于启蒙更多的人的思考和行动，在于不断地探索各种解决的可能性。正如梁晓燕老师曾经说过的，我们只是在为历史的发展创造着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决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样的角度下去思考，我们每一天的尝试，每一次的行动，我们所有的失败，我们对未来的经常性的困惑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这些不断累积，就一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让我们将道路看清楚，我们的梦想也一定会在也许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

回到生活中的困难，我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年轻人选择全职的NGO工作，确实要承受一定压力和困难。这些困难和压力一方面来源于收入的微薄，更大的在于作为一个领域的开拓者所不可避免面临的不理解和不认同，甚至如何获得家人、爱人的支持。但同样作为开拓者，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远没有科学家最开始宣告地球绕着太阳转、黑人在美国争取平等权利、甚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家等等历史变革时刻的探索者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大。总要有人去承受这样的困难和压力，社会才会进步，我们的后代才能如呼吸一样平常地去享受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说到底，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承担。

另外，我自己和我身旁同事们的生命经历也让我看到，只要我们以平常心去面对，以真诚的心去感召，我们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支持，一定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困难。NGO工作者不是苦行僧，我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也一定可以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也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

其次，我非常非常同意糖糖所说的，爱是支撑我们每个人不断前行的最重要的力量。

读到志雄写的关于刘老石的那部分内容，无限的酸楚和对老石的想念在我心头久久不能融化。我感受着老石那博大的爱，他的爱曾经包容着许许多多的青年，像一片肥沃的土壤让那么多青春之花在上面绽放。老石说，他就是青年人成长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让青年人踩着他走向远方。在我和你们的生命中，还有许许多多像老石一样的人，或许他们是我们的师长、亲人、朋友、同伴、我们服务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们以爱和关怀滋养着我们前行的身躯，以他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爱中成长，也在爱中前行。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这些爱而变得柔软、敏感、温暖，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世间的痛苦和快乐。我们收获爱同样也有责任将爱奉献给身边的人。在你们的对话记录中，我读到你们对普通的农民、山区学校的孩子、智障的小朋友、甚至是路边乞讨的老婆婆所具有的那一份关爱。我想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爱，不仅可以使彼此靠在一起温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爱在以利益交换为基本价值观的“主流”文化中，正在重新建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理解，以及对相互关爱的和谐社会的解读。

所以，爱是我们的支撑，是我们对他人的服务，更是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武器。在前行的路上，千万不要忘记发现爱、采拾爱、奉献爱……

最后，我想说未来虽然看起来模糊不清，但请相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值得我们期待和不懈去努力的。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这个社会的价值所在，而人的进步一定会引发社会的进步。所以，我相信只要人改变了，这个社会就会改变。在过去十年民间公益的发展过程中，我看到我自己、你们每个人、我身边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的成长和改变，变得关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愿意负责任地参与公益行动，用非暴力、理性、包容的对话和沟通解决争议，这些人不再是“人民中一员”，不再是等待帮助的“臣民”，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这样的公民越来越多地产生和成长，我们所追求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一个美好的和谐社会也一定能够实现。

虽然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社会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个发展的进

程。所以需要我、你们一起去坚持，充满希望地坚持。我相信，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相信与坚持，我们脚踏实地的行动一定会感染越来越多的人。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相互影响和成长，一定会最终触发整个社会的改变。我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爱、公平的渴望，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值得我们毕生去追求和不懈努力的。

最后的最后，放上特蕾莎修女的话，让我们共勉——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
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
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
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

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
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
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
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你们的朋友 曲栋

写给青年朋友的信

各位青年朋友：

我和你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熟，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做过几年民间公益领域的青年人成长支持工作，有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常常碰到青年朋友对我说，他们很迷茫，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不知道应该作什么样的选择。我问他们有没有梦想，他们常常回答我，有，但那不现实，不会真的去实现。对于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很多人会告诉我考公务员、进国企、进外企、继续读书，此外似乎没有什么了。从这样的对话中，我感受到很多青年朋友被牢牢地束缚着，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框框中，看不到、也不相信更多的可能性。这样的状况，不仅严重束缚了青年人自身的发展，而且当其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也严重地抑制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活力。

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什么产生的？是青年人自身的原因吗？他们是“垮掉的一

代”吗？不是。青年人今天的生存状况和成长状况，是由于社会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造成的。现有的社会体制，对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压迫和束缚。

近年来，我们的国家虽然获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累积了极多的国家财富，但由于长期忽视社会体制的调整和社会建设，导致了现实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严重失衡、公平正义的缺少、弱势群体的生存艰难、道德底线的沦丧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对于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来说，还有就业困难、房价高、社会阶层难以上下流动等结构性限制，使他们日益成为边缘和弱势的群体，很难获得自我发展和改变自己命运的空间和机会。

看《蚁族》这本书，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书中被访谈的许许多多的青年人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期相比，同样地勤奋和努力，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的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环境中获得了非常多的自我发展机会，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而现在的青年人，这个社会给他们的自我发展机会太少了。如果持续下去，青年人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社会的发展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那么对于青年人来说，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发展自己，改变自己被压迫和束缚的境遇呢？我认为简单地来说，就是建立独立的人格，探索自我的“另一种生活”，探索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教育、获得的知识、人生经历。受单一化的应试教育和强大的以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非常多的青年人被建构起单一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其视野中缺少“非主流”、缺少多元、缺少其他可能性。所以，作为青年人的我们，需要打开自己的视野，更多地了解不同的思想、观点、价值观，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被批判的还是被颂扬的。用更多的批判和质疑去回应权威，去欣赏和建构不同。另外，我们还应该坚守作为人所应该有的善良、真诚、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等善的价值，并坚持运用这些善的价值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还需要有自由的梦想，以及愿意为自己的相信和所追求的价值去负责任地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形成独立的思想、自我的价值观和积极的行动力，我们

才能有独立的人格。

为什么生活在大都市、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有很多票子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志？为什么居住在乡村、过着简朴的生活就会被人看不起？生活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让很多年轻人重新思考乡村和乡村生活，让很多青年人走向乡村建设自己的家乡。在大陆，同样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回乡，选择过简朴的生活，选择不买房，选择不去大城市，选择不当公务员，他们同样可以创造自己的幸福。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中国走过了前三十年政府全面管理的阶段，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独立发展的阶段，很多人认为未来三十年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我想，未来三十年一定是民间公益蓬勃发展、民间组织深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民间力量制衡政府和市场的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未来三十年是新一轮的改革，而现在的青年人将是这一轮改革中最重要的支持和推动力量。在广州近几年以官民共治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中，很多青年人，如“举牌哥”、“光头哥”、“拇指妹”、“鲨鱼妹”等等，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政府决策、公共政策，其中年纪最小的人只有16岁。

所以，当青年人打开视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当他们找到自己应该坚守的价值观，当他们可以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当他们看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同时他们愿意负责任地为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去行动，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束缚的体制不再起作用，青年人是自由的、独立的、幸福的，青年人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最后，我想说目前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民间公益领域是青年人自我成长的最好、最重要的舞台。在这个领域中，民间自主力量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道路，普通人基于服务和贡献相互服务和照顾，人与人需要以非暴力、宽容、尊重、协商、民主的方式相互交往和解决争议。在这个领域的青年人，就像我们在对话文集中看到的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他们个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融和，他们的独立人格不断被塑造，他们在自由地探索和尝试人生不同的选择。所以，这里是当代青年人成长的乐土。各位青年朋友，我想你

不一定要选择民间公益领域作为你人生的事业追求，但我邀请你将生命的一些部分或者一些过程和这个领域相连，这里有你生命成长的养分，这里孕育着个人和社会的另一种可能。

最后的最后，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这样的问题，“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们每个人都将会面临这样的时刻，你的子孙后代在你的面前问你：“在那些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你曾经做过什么吗？”我想，时常想想这样的问题和场景，我们就不会迷茫了。

你们的朋友 曲栋

结 语

当给以上的文字去确定一个标题的时候，“花儿终将开放”就跃然而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美丽的花，这个世界的美丽就是由我们这些花的灿烂开放所定义出来的。而青年人就像那些含苞待放的花，纵使背负着很多沉重，他们终将会开放的。这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这是花的本能，这是生命的力量。而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阻挡的，因为那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规则，是价值底线。

曲栋，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执行主任。1973年6月4日出生，在哈尔滨市巴彦县长大。19岁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曾在南昌陆军学院军训一年。199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的外企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十二年。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尝试社区志愿者，并在2004年开始从事NGO能力建设培训工作和支持青年人在公益领域成长工作。2009年初加入ICS开始全职NGO工作。

第四章

青年是用来成长的： 青年培力与薪火相传

编者 | 薛启婵

写在前面的话

在前面三部分，我们认识了一些在不同路径上探索着的青年人，这些主人公大多有参与不同的青年实习生项目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身份，他们得以在这本文集里与大家相遇，呈现其生命里的探索与追寻。

认识了这些青年人，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将关注的目光移向他们成长的土壤，去看看那些陪伴并孕育青年人成长的力量。在这里借用台湾的说法——青年培力。“培力”一词，不仅有培育的含义，更增添了一种孕育力量的感觉。青年的成长，既有环境的影响、外力的推动，也有青年人自主的选择与探寻。

“青年由什么样的领袖培养？怎样成长？树立了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以怎样的作风前进？这些才是一个国家明天的路标。”池田大作的这句话，指出了青年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也表明青年成长的重要性。社会之发展当然不能只指望青年，但青年必定是参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今日被什么所形塑，有着怎样的积累和创造，必将反过来形塑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青年，是需要成长的，但青年的成长不是单独的存在，就如同一颗种子要想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不仅这颗种子本身要能够发芽，还需要肥沃的土壤，以及空气、阳光、雨露的滋养。

因此，在文集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几个在不同地方进行的不同类型的青年培力的案例，其中，既有前面三部分的主人公所参与的青年实习生项目，也有诸如台湾和泰国这样的他山之石。不同的案例，展示着对社会发展不同的想象、对青年人不同的期待，以及因之而形成的不同的培力路径，而这些，最终又孕育出青年们不同的样貌。希望透过年轻人对自身成长经历的表述，以及协作青年人成长的师友们对青年人成长平台的探讨，去思考究竟是怎样的土壤、空气、阳光与雨露，在孕育着何种青年力量。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因青年培育而聚集的合力

编者的话 2005年起，社区伙伴与四川多家NGO合作，共同在四川省内推行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支持青年人到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个领域的NGO，进行为期一年的实践与学习，旨在搭建一个多家机构与个人共同参与、管理和决策的青年人培养平台，推动青年人积极投身于社会发展工作，形成一个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志愿者网络。在这样的思路下，四川蜀光社区发展服务咨询中心、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先后承担执行工作，多家国际国内NGO及相关个人共同推动，截至目前，先后有20余家机构参与在青年人的培养过程里，共有4期共60余名志愿者毕业。在前一章里出场的韦罗东，就来自这个项目。

陈杰，是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第三期的志愿者，与韦罗东同样实习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在实习期间，他遇上了汶川特大地震，也因此亲历了四川NGO灾后救援联合平台的诞生与发展。

让我们先从青年人的故事出发，看看陈杰眼中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①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带来的个人改变与思考 ——三年后的志愿者再看“志愿者项目”

文/陈 杰

缘起：我成为一名志愿者

很早就很向往能成为一名“志愿者”，像电视上华中农大的徐本禹一样去深山老林陪伴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我一直寻找着这样的机会。研究生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的课程已经全部结束，导师在国外一直没回来，终于等到有这个机会试试去当一名志愿者。在网上找了很多的志愿者信息，但因为时间和地域的各种条件，合适的并不多。终于在中国青年志愿者网站上找到了一条“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招募信息，看到里面有很早就知道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信息，于是非常兴奋地填了很多的表格，回答了里面的问题，然后就是等待……

一天下午，我接到了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办工作人员帕提的电话，她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然后就跟我说有个“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比较偏远，如果我愿意可能可以去那里。因为对这份差事的期待，我满口就答应了。紧接着几天后就接到了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张浩良老师的电话，他问了我一些情况，记得最清楚的是问我能不能吃苦，愿不愿意吃苦。我告诉他：“我花了10天骑车从西安出发穿越秦岭，您觉得我能不能吃苦呢？”这样基本上是通过电话“面试”了。

终于接到了项目办发来的邮件和电话通知，我被录取啦，将从2007年11月开始到四川当志愿者服务一年。当时的兴奋不亚于考上了大学，于是迅速做好身边的事情，期待着志愿者生活的到来。当时对“志愿者”这份工作崇敬到什么程度呢？有个小故事：我们志愿者到成都报到的硬座和卧铺火车票都是可以报销的，我买票时没有硬座了，只能是卧铺或者无座的票，想着当志愿者就是受苦不应该享受，毅然买了无座票，没想到16个小时的旅途，我能坐的估计还没有6个小时，虽然经受了一晚上的煎熬，到了成都也不觉得有多累。

我的志愿者生活

培训。到了成都以后，我们参加了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第一次培训，认识了同一期的19个志愿者伙伴，我们的年龄相仿，但生活经历却大不相同，所以刚开始认识就有很多想知道的话题。然后熟悉了志愿者项目的操作者，帕提、陶子，她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项目的开始到结束，接着认识了培训老师曲栋、周瑾，还有资助方社区伙伴的启婵，等等。团队建设是我最喜欢的培训内容，经过曲栋精心组织的团队游戏，我们这些伙伴很快就相互了解并建立了友情，关系迅速升温。渐渐地我们有了队名“向日葵”（因此队员不管男女都成了“花儿”），队歌“种太阳”，有了联系人（相当于班长），我有幸被大家选做联系人之一，一支志愿者团队就这样形成了。曲栋的游戏不仅有趣，而且具有很深的内涵，通过游戏不仅能够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性格习惯，打开我们的心结，还能让我们发现自己、鼓励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受影响。团队游戏有时候需要我们克服困难，有时候需要我们发挥智力，更多的是考验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意志力，所以这个过程非常有益于个人的思考和提高，也是我们大多数志愿者喜欢这个培训的关键所在。

后面几次的培训，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需要切入工作知识的层面，所以团队游戏活动逐步减少，被课程教学所替代，因此我们认识了郭虹、王红虹、杜玲、田犁这些来自不同机构的培训老师。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生动活泼的讲课方式让我们的学习效果非常显著，有助于我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的杜玲老师喜欢用一块块的彩色纸片贴在大白纸上讲课，保护国际的田犁则是喜欢用各种不同的腔调和语气跟我们讲话，他们的课都非常的生动活泼，我一直都能记得他们教的社区工作方法和社区调查，以及各种各样的画图，非常有意思。

工作。刚开始我是不知道要到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干什么的，因为最早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可能就是支教之类的活动。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巴山生态

与贫困问题研究会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民间草根组织，却能完成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使馆基金资助的大项目。当初我以为是来干活的，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根本用不上，来这里仍然是学习的。在这里我培训过村民，也被培训过，参与过项目的执行、协作，还编辑过简报，在很多的岗位上得到了锻炼。当然也吃过苦，在恶劣的环境中懂得了适应。通江县位置偏远，这里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尤其是农村，仍然还有很多非常贫困的人。一个名叫“窑坡里”的村子让我终生难忘，这里不仅道路崎岖，而且住房条件异常艰苦，村里面一直以来都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我曾经借宿的那所房子，是用树枝与泥巴搭建的墙壁，床底下是一夜不停的牲畜们的呼吸声和颈铃声，让我的心得到一遍又一遍的涤荡。

我在大巴山开展志愿者服务的时候也曾因一时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加上面临毕业需要完成论文等事情，去了通江不久就产生了想离开的念头，但当想起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里的同伴，有的还在遥远艰苦的藏、彝地区服务，退缩的念头顿时消失。在我生病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志愿者伙伴通过QQ、手机短信



陈杰（中间站立者）与村民访谈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生活的原味应该就是在茫然与无奈中去寻求真理所在，追寻价值所向，有些人穷尽一生的追寻即在此。

宋海兵 / 第一届志愿者·香港互动行动协会

①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是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共同发起的自我服务的信息平台。中心为来自各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及社会爱心人士有序地参与四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和政策分享，定期组织会晤，增进彼此间的认知与了解，推动民间组织相互合作、共同参与救灾工作。网址：<http://www.512ngo.org.cn/>。

给我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坚持，期盼大家的再次重聚，分享自己的经历。

遭遇地震：

民间组织的联合 志愿者学习历练的平台

2008年5月12日中午，我正在网上和在平武县工作的另一位志愿者伙伴网上聊天，突然房子晃动起来，我在张浩良老师的带领下冲出了办公室，看到窗子玻璃像流水一样、外面的电线杆像筷子一样甩起来，人生中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我惶恐地问发生什么了，张老师告诉我肯定发生地震了。在街道上路边到处都是人，大家想给亲朋发信息打电话，手机却没有任何信号。直到快天黑的时候才知道，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通过新闻知道事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通过网络联系上了部分志愿者伙伴，但是还有好几个音讯全无，像地震发生时正在和我聊天的平武的伙伴，还有在茂县、在丹巴的志愿者，都没有任何消息。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这时，我就已经很想去重灾区服务，找找我们的伙伴。

很快，帕提告诉我们他们在成都组织了一个平台，成员多是我们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平台上的。大家正在联合参与救灾，我在通江再也待不住了，跟张浩良老师请好假，就去了在成都成立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①，没想到这一去就度过了我剩下的半年志愿者生活。到了成都，确认了伙伴们全都安全，我就被老师们留下来工作。作为志愿者，在这

个联合平台里我担任信息组负责人，主要开展志愿者管理工作，包括寻找志愿者需求，招募志愿者，发布招募信息，筛选志愿者，联系志愿者参与服务，保持与志愿者的联系沟通，提供后续服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在志愿者招募、管理、沟通等环节当中不断实践，尝试着理解“识人与用人”。

找到最合适的志愿者。在我招募的志愿者里面，让我感动最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老年夫妇，丈夫是退伍军人，60岁了，妻子50多岁，他们在灾区搭起帐篷，照顾老人、孩子和在灾区服务的年轻志愿者。他们当志愿者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说话、做事比小伙子们还好，对所有人都热情，既勤快又认真，在绵竹认了干儿子、干女儿，在灾区他们有了新的“家”。看到他们身上被蚊虫叮咬的痕迹和记载着灾区炎热与雨水折磨的皮肤，我久久不能停止的是感动。

在灾区一线短暂的服务。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去灾区服务的机会，我在北川和先期到达的志愿者看护着我们“帐篷小学”里可爱的孩子们，发放我们带过来的卫生用品和食品。有一个晚上，余震未歇，大雨倾盆，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在一个大帐篷里团在一起。我给好朋友们发信息镇定自己的内心。我们在等待着泥石流把我们冲走的那个时刻，但一直都没有等到，嘴里说明天就走，但大家都依然留下来服务到最后。在绵竹，我住进朋友贾超在自家废墟上搭起来的房子里，我们讨论了在当地要建立的合作社的雏形。利用在灾区的机会，我到北川和绵竹受灾严重的农户家里做了灾后调查，获得了很多值得参考的信息，包括这块土地发生地质灾害的历史和类型、每户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情况，还有他们对政府的诉求等。这个过程中我在学习着，同时也被受灾的乡亲们以及在当地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感动着，鼓励着。

平台里有很多学习的榜样。在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平台上，聚集了NGO圈子中很多资历深厚的老师们。我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模仿也在思索。他们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待人谦逊亲切，成为我最好的学习榜样。我在研究生阶段关于NGO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四川社科院郭虹老师的指导下发表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田军老师经常教我如何关心细节；社区伙伴的何德贤老师提高了我工作的执行力；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高圭兹老

师引导我思辨地看待问题；还有一起来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里的同伴，黄露、许琰洁、杨帆……用细节让我体会到关心、互助与支持，这些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和丰富。

志愿者经历激励我的毕业选择

怀揣着“善治国家”的理想，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志愿者服务结束后我就开始面临毕业选择，通过志愿者项目的培养、在大巴山的扶贫实践、在NGO联合平台里的工作经历，还有这些老师与朋友的影响，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个人价值通过社会价值来体现”这句话的内涵。在毕业后我选择了回到家乡安徽，在基层锻炼两年，弥补了自己在大巴山没有达到原计划服务时间的遗憾。另外，从基层政府治理的层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现状和问题。

因为在四川的这段工作经历，我学会了很多，无论是吃苦干活，还是与乡亲们交心，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芜湖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过程中，我与当地乡亲们结下了深情厚谊。到合肥工作刚刚半年的时间，我就和几个刚认识的伙伴一起申请成立了“安徽益和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正在搭建一个能让政府、企业、NGO相互合作，让弱势群体受助的支持服务平台。

依旧难忘那段美好的记忆，不断鼓舞着我前行。

陈杰，安徽怀宁人，2002-2006年本科就读于西安财经学院经济专业；2006-2009年硕士研究生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期间（2007.11-2008.10）参加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先后在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工作；2009年7月成为安徽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在芜湖县工作，2010年12月至今在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综合开发局工作。2011年5月开始参与筹建安徽益和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担任监事。

编者的话

在陈杰文中一再提及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究竟是怎样一个平台呢？四川的NGO是怎样走到一起开始对青年的共同培育？他们对于青年人的成

长又是何种想象与期待？

2009年，社区伙伴邀请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郝冰，对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过去几年的历程进行了影响评估。之后，郝冰在评估报告里梳理了四川民间精神共同体的诞生与发育过程。这里将节选之后的评估报告分享给大家，让我们透过郝冰的叙述，去一窥四川NGO以群体的姿态所呈现出来的培养青年人的合力。

②四川民间精神共同体的诞生与发育

文/郝冰

青年实习生项目的价值与意义

当我们重新审视青年实习生项目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的宏观环境与社区伙伴机构的现实场景中寻找该项目的价值与意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何社区伙伴要投入一块不小的资源去培养年轻人？如果只是一般意义的NGO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今很多机构都在推动NGO组织的人才培养计划，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独特的价值与贡献到底是什么？

生活在现时代的年轻人，世界很大也很小，通过互联网他们可以无所不知，对世界一览无余，但走过的路可能就是一个人从家到学校，对于路那头的想象，无论美好、残酷，多是由外而来而非体证，也不是和内心里最强烈的声音呼应的人生姿态。就像一条小船，面对广阔的大海，却没有锚。

青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应该如何在每个时代安身立命？

对此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会依据其立场和经验带来答案。经过五年的摸索，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希望生活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里的年轻人能在现实主流发展中看到不可持续性；希望年轻人不冷漠，能和伙伴一起，用生命照亮生命，去关怀弱势群体的生命状态；希望年轻人不是踩着太空步行走人生，而是脚能踏到泥土里，链接起城乡，朝向更加持

续的方向，并从中汲取行走的力量。

高等教育的功利性和就业导向日趋明确，以能否成为现代企业和官僚机器的合格零件论成败，而很少触及“人何以为人”这一基本命题；而机构内或领域内的人才培养的功能性则更强，多对应于一个具体的任务或角色。具体到目前NGO领域内的培训，课程设计还是以外来理论和经验为基本素材的短期集训，难解切肤之痛。青年实习生项目以“青年人的主体性”为前提，在进入社会的现实人生展开之前提供机会，结合具体基层的场景，创造气氛，通过培训和伙伴之间的相互影响，让青年人去发现真实的自我和现实，这在当下对青年人成长来说是极其稀缺和宝贵的。

NGO在中国大陆有十多年的历史，在其工作领域比较常见的思路或是基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对象的受益”，或是“政策倡导与制度的变化”，当NGO人没有准备好，没有自我内在力量和成熟NGO文化的支撑时，在前者，当人的主体性缺位，问题解决会迷失在谁解决了谁的问题；在后者，制度建设也可能落于想象或教条。而二者同时也都隐含着过于急切的心态。一些机构为了解决民间组织人才稀缺的问题，开始在自己机构内培养人才，虽然也用实习生的方式，但是由于解决人才问题的功能性极强，难免视野不够开阔，对于人的成长主体性的关注常常被忽略，而迈进一种功能性的培养“技术人才”的结果。

而社区伙伴实习生项目定位于“人”而不是“事”，“以青年人为主体”，在实习期中透过各种人才培养支持系统的建立，更加关注年轻人人生成长，透过其在基层实践反思城乡关系与主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无论对于现在和将来的NGO人和NGO文化，这都是一个有价值的坐标或者方向。

四川NGO合力培育青年的尝试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萌芽于社区伙伴。社区伙伴的发展策略目标确定为文化反思、城乡互动和协作者培养。在2009年社区伙伴的内部讨论中，对于文化反思作出如下描述：“对于提出文化反思的初衷，是我们的社会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

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社群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平衡的支点。文化反思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一个过程，这个方法要求批判的视角，对问题的觉醒，然后以创造力和行动来回应，它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未来。这应该是一个有力量感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强调互动和自主，不存在自认有优势的人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的观点。”

社区伙伴城市项目团队负责人邓文嫦在访谈中说道：“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把年轻人放在一个场景下，建立热情和行动。这个想法的重点在人，不同于传统的发展工作把重点放在社区。”“过去的经验让我意识到当来自NGO的人离开工作的场景，有时会表现得割裂或狭隘，因此一直非常希望培养一群有行动能力的人，他们能超越不同的领域，超越机构的视角，互相支持，有能力和其他人建立联系。希望他们能超越功能性的工作关系，展开人和事物的情感联系。这一进程在同一时间展开，通过共同生活获得共同身份。”在此背景下，实习生培养作为社区伙伴城市团队的项目，先后以四种模式展开，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作为其中之一最早开始尝试。

文化反思的策略内含着人的主体性，即对个体人生意义的追问和社会文化重构的追求。在物质主义昌盛的时代，一个NGO组织做出如此定位，是超越、前瞻和另类的。但在非宗教的理解和非心理学的语境下进行项目实践，将至少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自身的操作经验有限；二是溢出大多数合作伙伴的经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微小，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那么一点，但是我仍然因此而自豪，毕竟我在为老百姓做实事，而且我相信在志愿者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多志同道合者。

张志辉 / 第一届志愿者·国际小
母牛中国办公室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用一个外地人“有知识有文化”的眼光去度量一切，以“科学”的观念去审视当地的现状，我到底应该站在谁的立场去看待发展的问题？我认为自己绝对不是全对。

冉子姪 / 第一届志愿者·玉妥云
丹贡布医疗中心

验，难于达成共识；三是因为重点放在人而非任务，难以评价产出及影响。

2005年，四川已经出现了一个NGO的群体。2005年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蜀光）在项目筹备期做了一个接待机构的调查，发出问卷36份，回收问卷21份。

成立时间	不到1年	1—3年	3—5年	5年以上
	2	5	3	11
类 别	本 土	国 际	事业单位	
	11	6	4	
工作领域	农村发展	环境保护 (教育)		
	13	7		

21家机构分布表^①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NGO生态呢？

其中有大约一半是本土的民间机构，不断开放的社会为NGO的破土而出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时期机构的出现最重要的动力不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或是公民社会政治结构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一些个体的使命感和对意义的追求。当整个社会走向功利主义，政治隐身于经济过程，公共性丧失的时候，少数人从体制内分身出来创建NGO，走向民间构筑精神家园。这些机构的创始人作为个体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怀有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不断尝试超越原有的生活与

①数据来源：《四川省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接待机构评估报告》，蜀光，2005年。

工作环境，并不断尝试创造精神生活的现实载体，以实现个体生命的意义和社会关怀的表达。在参与项目的群体包括实习生身上同样发现了这一精神基点，而这恰恰和社区伙伴的文化反思、强调人甚于强调事的主体性表达是有内在呼应的：

“原来的大学同事间耻于谈人生、谈理想，多数谈话充满批评和抱怨等负面情绪。”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和你探讨生活的意义，你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把这些带给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是有意义的。”

“当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希望自己能沉下去，社区伙伴把人送到不同的机构和农村，进行城乡互动，进行反思，因为理念相近，就来应聘了。”

“在工作中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知道要什么，但知道不要什么。想换个环境，换个城市。”

无论本土NGO的创始人、国际NGO的员工、项目所聚合来的工作人员及协作者或是社区伙伴团队，根植于这些个体生命内的道德或思想力量和自我深处的准备，是社区伙伴作为外来的组织能和当地多个机构共同合作的深层原因，也是四川项目中最具生命力的种子。在种子没有萌芽、没有长成树、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很难想象它未来的姿态。但显而易见，没有种子，就没有生命和生机。

访谈中，问及大家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谈到最多的是不同角度对于人才培养的想象。

“希望年轻人有‘上山下乡’的机会，到基层去，了解实际情况。”

“一直希望有一种教育能把做人、扶贫和社工联系起来。”

“2002年到2003年一批民间组织涌现出来，感觉人手不够。”

“社会高速运行，老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未建立。职业培训都太功利，读书只为找一个工作，培养志愿者精神，值得试一试。”

“在美国发现实习生制度很好，很多学生在迷茫中多了一次尝试的机会。”

“职场中年轻人出现很多问题，但有一个实习生给机构带来很多好的影响，很想建立员工培养的模式。”

“通过支持青年人参加为期一年至两年的农村发展、环境保护或生态农业等工作，推动城乡互动，使青年人逐步获得深入认识自己及社会的机会，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学习和成长，逐步找到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并且通过锻炼一批年轻人，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库和相互交流成长的契机。”^①社区伙伴这样的想法，和各方对人才培养的想象形成了交集。大家此时在书面上达成了对项目目标的共识。

◎ 推动青年人关注农村发展和自然保护工作，促进青年人在行动中反思主流发展模式、城乡发展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 培养具有清晰的社会发展理念、良好的社会分析及掌握社会发展工作技巧的年轻人；

◎ 促进四川民间组织之间的经验分享与人才交流。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目标^②

在第一期项目过程中，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社区伙伴的项目。第一期项目管理委员会主席周瑾说“自己是被忽悠成主席的”，虽是玩笑，却也是现实。第一期管理委员会在项目决策职能的发挥上是不足的，但由于管理委员会的机构和人选得以落实，得以在形式上开始议事，成为四川在地协作者交流的平台和网络的实际载体。而这一网络的浮现其实起源于更深的脉络。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社会林业项目和后来扶贫系统项目中共同成长起来的项目骨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网络，彼此之间有深厚的友情，而其友情是由对社会的关怀来推动，他们之间的聚会、吃饭、喝茶往往与社会发展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他们的友情中因此有一种不寻常的特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都形成了个体的影响力，拥有相应的资源。社会林业项目在云南、贵州衍生出PRA网，因此大家一方

面对于四川的网络是有期待的，一方面出于对其他地区PRA网的观察，使得他们对于四川将要出现的网络具备一份更加成熟的心态和担当的姿态。他们的影响力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参与。这种内在的动力和影响力，既是长期积淀的结果，也是未来持续性的关键，所以应该说，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协作网络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诞生于原有的潜在网络基础之上。

“到了第二期，管委会成员对项目的认同感增强，更认可这是四川NGO共同的项目，而非某一家机构的项目。各家机构的参与及投入较之前更为积极，尤其在培训方面，并希望这种合作方式能继续下去；管委会的作用比第一阶段发挥得好，在培训和重大事情上都有交流和讨论，对项目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深入，彼此的协作和配合更有效。”^③但是对于第二期的管委会，也有议而不决、多停留在培训的具体议题上的自我批评。议而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除了培训的人力，管委会没有其他可调配的资源，因此也就缺乏了决策的基本条件。议而不决的正面价值在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彼此立场和方式的理解，多元化、包容的气氛慢慢形成。NGO的年轻一代在这里也找到友情，个体的生命超越功能化的联系得以连接。在非功利的前提下，自觉产生的认同感或者说共同的拥有感，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产出和未来精神力量的源泉。有了这种拥有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人挺身而出，并相互支持。而且当管委会内议事的文化和能力形成，就不怕“一群艄翁打烂船了”。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与发展的矛盾冲突让我思索良久，在个人的成长中，这些经历将使我受益良多。

孙吉 / 第一届志愿者·绿色江河

①《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项目影响评估简介》，社区伙伴，2008年11月。

②《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第一期项目建议书》，2005年。

③《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第二期中期回顾之管委会访谈报告》，尹春涛，2008年4月。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产生的影响

1. 培养人才，实习生网络雏形初现

从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中走出来的年轻人，60%的人留在了不同NGO继续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当下补充了NGO的人力资源，更在于他们在未来的路上共同行走，彼此支持，成为承载传递民间精神的榜样。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实习生已经开始了反思。

“原来对于行政体制很不理解，对体制有排斥感，通过实习工作慢慢理解了镇上干部和他们推动的合作医疗，对于中国现实的图景有了更深的感受。开始接受现实的复杂性，不再有那么多抱怨了。”

“在城市里，感觉人可以为所欲为，很强大。但在保护区，在大自然里感觉到人的渺小和对自然的依赖。”



由各机构代表组成的培训团队在探讨志愿者培训的设计

“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会带杯子、筷子，看到塑料的垃圾很受不了。”

“原来很在意周围人的看法，现在不愿意再随着主流漂，相信自己可以带来改变。”

激发实习生反思的契机多是与原来学习生活的经验反差较大的基层的见闻和实习经历。这也说明了课程设计中接待机构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培训给出视角和工具来理解现象，同伴的存在使得反思能在一个群体中进行，思考的结果也得以在群体中分享。培训单独对于反思的贡献是有限的，但是“基层经历+培训+伙伴网络”作为整体项目设计，实现了促进青年人在行动中反思主流发展模式、城乡发展关系及人与自然的系统的目标。

2. 促进四川NGO组织间的互动

项目已成为四川地区NGO之间交流、合作、展示及相互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各个机构彼此更清楚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信任程度增加，相互的碰撞和交流也有利于推动创新。^①在互动的过程中，关于机构文化与策略的反思开始呈现。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之际，这个平台所积聚的力量呈现出来。“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这个平台的迅速建立，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准备是直接相关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机制直接被‘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所借鉴”，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们应该去发现工作中的乐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新的事情，同许多我们以前并不了解和熟悉的人打交道，所以我们每天都能惊喜地发现我们的进步。

何欣 / 第一届志愿者·成都城市
河流研究会

^①《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第二期中期回顾之管委会访谈报告》，尹春涛，2008年4月。

“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原协调人郭虹和田军作出以上评述。

3. 具有榜样力量的协作群体出现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执行人帕提说道：“接触到一群人，身体力行，他们行动比语言更有力。对自己的吸引力在于一群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在推动这个事情。”受访的实习生也都提到他们在这个项目中接触到一群不同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成为年轻人的榜样。真实的人是能够带来力量的。协作的群体也提到他们也是受益人，在项目过程中感悟到的理念和学习到的方法也被带回各自的机构加以实践。

4. 共同经历所孕育的共同身份，成为精神聚合与传承的载体

从当初的社会林业项目走出来的一群人，到现在这个项目具有榜样力量的协作群体，再到未来的实习生，因为共同的经历，每个人精神的种子得以激发并传



接待机构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志愿者培养的话题。

承，在未萌芽、开花、结果的时候，是难以想象其未来的姿态的。但种子的生命力是最大的，会以个人的行动与选择在未来得以表达。群体精神的聚合与碰撞，会以文化的面貌在未来呈现。这个项目最难能可贵的是为人的精神的成长与表达提供了一种可能。

（原文出自《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影响评估报告》及《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影响评估总报告》，2009年。此处有删节。）

郝冰，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中国华德福幼教论坛副主席。从事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十余年。近年主要精力投入于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主持家庭幼儿园天下溪自然学园、天下溪妈妈汇，中国华德福幼师培训与督导项目北京协调人。

编者的话 几年前的四川NGO生态，不同的机构之间彼此有合作，但NGO共同走在一起作为群体的联合尚未出现。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在那个时候诞生，以青年人培育议题为纽带，以共同行动作推动，不仅增强了机构之间的联合，也孕育了参与其间的一群人的友谊。需要说明的是，郝冰的报告是针对一个特定阶段的总结，超越这一阶段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还有诸多的挑战与困难需要面对。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平台上的各家机构迅速通过电话彼此联络，了解各机构动向及可能的参与救灾的渠道。5月15日，在蓉的各地民间公益组织及其在北京、贵州、上海等地的合作伙伴、志愿者团队20余家，共同商定成立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紧急救援阶段，先后有来自国内各地、省内在地的近百家民间公益组织以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为平台，奔赴救灾一线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直到今天，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还继续在为灾后重建工作贡献力量。

而汶川特大地震，也打破了四川NGO原有的生态格局。四川的NGO里开始

出现越来越多的联合平台，也有更多的项目开始去支持NGO工作者的成长。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如何看待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历史意义？怎样想象新形势下项目的发展？

作为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一直的参与者与支持者，长期关注和研究公民社会的郭虹老师给出了她的反馈和建议。

③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文/郭 虹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已经实施六年。

作为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的“四川模式”，项目已经形成了一套可以复制的运作流程和管理经验，其意义和价值已多有评述，无须在此赘言。作为一名致力于四川公益发展研究的社会学者，我更关注的是项目在推动四川公益事业发展方面产生了什么作用，青年人在这个项目能获得哪些不同于其他实习项目的机会，这种NGO共同培养青年人的项目社会影响如何。

有幸的是，从项目的第一期起，我就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相关活动：担任过“公民社会课程”的主讲，做过课程设计和项目管理的顾问，参加过学员的学习活动和毕业典礼，辅导过学员的实习报告、毕业论文等等。特别是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川参与抗震救灾的民间公益组织于5月15日成立了“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其核心力量就是来自项目的学员、机构及其伙伴。正是基于这些因缘，我与项目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我可以从更多的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个项目。

四川的NGO习惯用“这个圈子”来说明自己的群体。对于许多初次进入这个圈子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去全然不了解的“社会”——“居然还有这样一群人”，“居然还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居然还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感叹句是每期学员第一次集中学习时最常听到的。年轻人的感叹来源于他们进入的组织机构、他们接触的工作领域、他们听到的课

程讲座……而这正凸显了项目与其他实习生项目不同的特点：这些青年人不仅是进入一个新机构、获得实习一年的机会，而且由此认识了“公益圈”——公民社会，由此而获得了全新的信息和知识，甚至或许有了新的人生道路选择。就我上课时得到的反馈，很多学员是在项目中第一次听说“公民社会”，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公益事业”，第一次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做公民。就这个意义上讲，项目更像是一所“公民学校”。六年来，参加过项目的青年人中有60%的人留了下来，成为公益界的新生力量；另外40%的人进了另外两个圈子，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把在项目中接受和了解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思维带到公权力部门和市场部门，播撒公民社会的种子。

青年人在这个公民学校里得到成长的机会，远超过只在一个机构里实习所获得的机会。首先，“分散实习、集中学习”制度的设计不仅让青年人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机构，也可以通过同伴交流、报告讲座，了解其他公益机构的情况。由于项目集合了四川数十家NGO，每个机构又有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的工作模式、不同的机构文化和不同的人文环境，让参与项目的青年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多样性和共生性。其次，“导师督导、调研报告”的制度设计迫使青年人在一年的实习中不仅要“实地学习”，还要“调查研究”。有心的青年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动手动脑，真正获得成长机会，即使是不那么自觉的学员也会在执行这个“强迫命令”中，对某一现实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结业时的“调研交流”，哪怕是没有认真完成作业的学员，也能够从同伴们的交流中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引起反思。最后，集中学习时公开课的设置，也给参加项目的青年人提供了“呼朋唤友”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自己最终成为“公益人”，也把自己的同学朋友吸引进了公益圈——可以说，围绕在项目周边的这批青年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志愿者”。“‘5·12’中心”在紧急救援时的骨干力量多数都是来自这群青年志愿者。

毋庸讳言，项目的四川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四川民间组织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如多具有草根性，多以领袖人物为灵魂，多独树一帜而不愿等同于一般，多为开放型等等，或许与川人的文化传统有关。项目在四川开展的过程中也得益



在凉山实习的志愿者，跋涉在通往项目点的途中。

于这一文化底蕴。记得第一期的项目官员尹春涛就经常邀请大家“喝工作茶”，项目的一些公开课也特意在茶馆、书店等场所举行。到项目第二期，由于管理委员会作用的增强，项目已成为一条特殊的纽带，使得分布在城乡各地、各个领域中的NGO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封闭格局，围绕项目共同商讨问题，采取共同行动。同时，由项目学员之间的人际交往带来的群体交往，也形成了四川独特的NGO氛围。这使得项目不仅为各个机构解决了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培育出了一批公益人才，也促成了四川公益圈的形成。

“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四川的公益事业发展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一，经过长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们的感动都源自于对他人的感动，也都源自于生活给予我们的真诚。

葛晓荣 / 第二届志愿者·国际小
母牛中国办

期的历练和地震的考验，四川公益界中的资深机构专业性和执行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批新机构在志愿者团队和草根组织中脱颖而出，更多的志愿者团队和草根机构正在孕育成长，NGO之间的联系更加多样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也比过去有所增加；其二，灾后重建和四川“加快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一轮跨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给公益界提出更多需求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其三，经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社会参与洪流的洗礼，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志愿者”有了更多了解的同时，对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也越来越具有自己的见解和理念；其四，NGO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在成都，试行“社会组织无主管登记”后一批服务型的公益机构纷纷成立。四川公益圈扩大了，对公益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了。

正因如此，对于即将开始新航程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及其今后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期冀：

1. 加强“志愿精神”的培育。虽说项目名为“志愿者项目”，但实质上是为青年人提供的免费实习活动，不是自愿服务，也没有特别强调突出体现“志愿精神”。陕西“红风计划”要求接受捐助的学生在校期间要参加红风的志愿服务，在有能力时返还捐助款，以实际行动体现志愿精神。项目可借鉴红风的做法，把“培养优秀公民、发扬志愿精神”作为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安排相关的实习内容。

2. 开辟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项目曾经有过让机构承担部分资金的设想，但无论是机构的财务制度和经济实力都很难专为项目支付资金。结合前一建议，可否考虑另一途径——让受益于项目的学员在有能力时回馈项目。例如：建立“青年志愿者成长基金”，资金来自受过项目帮助的自愿捐资人和其他资助，由捐资人组成理事会管理，专用于支持四川的青年志愿者活动。

3. 支持青年志愿者活动。如前所述，六年来，以项目学员为核心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已经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怎样为这批年轻人提供社会支持，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参与公益活动，是需要项目关注的，毕竟这个网络与项目有着太多的关联。如果“青年志愿者成长基金”建议可以实现，即可作为一种

新的项目模式，也可作为项目可长期持续的子项目。即使项目完全结束，也能给这批参与过项目的青年人留下一个可以自主运作的活动平台。

郭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城乡社区发展、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侧重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和公民教育研究。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当代青年的乡建运动

编者的话 在郭虹老师的建议里，特别提到了参与过项目的志愿者如何回馈、离开项目的志愿者之间如何增强彼此连结的问题。

一位实习生曾经说过：“离开了人，项目不过是一个躯壳，真正宝贵的，是慢慢连结的生命。”是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连结，正是网络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网络可以持续下去的关键。青年实习生项目的立足点不仅是培养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在实习生项目这个载体中得到成长，将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找到人生的坐标，进一步贡献这个社会。青年人在这类实践中获得的种种成长，不是孤立且单独的存在，它需要在一个共同的网络平台里去相互激发、共同延续和传承。

如何让网络具有内生且持续的生命力？青年人之间可以有怎样的连结？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案例，将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上面的问题。在这里，青年将以群体之姿态，“创造着一种把个人成长、社会理想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他们向时代发出呼喊：“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

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也是在文集的前三个部分里，王永波、丁华明、刘胡佳、何志雄这些依次出场的青年人共同的出发地。基于对“三农”问题和青年人成长的关注而成立的梁漱溟乡建中心，在广袤的农村搭建起青年人实践的平台，在它的推动下，国内大学生支农社团在过去的十年里蓬勃发展，许多的年轻人因之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与农村连结。2005年起，梁漱溟乡建中心开始与社区伙伴合作，启动“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这个计划提供青年人至少一整

年在农村蹲点实践的经历，至今，已有6届100余位青年人参与过该计划，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还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人才计划”第一期学员吕程平的经历讲述，程平除了一期学员的身份外，也曾经作为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工作人员参与推动过这项计划，且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对青年人成长有着怎样的思考？

①作为一种行动的教育

文/吕程平

首先，应该很感谢有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对于我来讲，这也是回顾几年来的成长、探思心灵发展轨迹的机会，其中会有一个青年的情感、思考和困惑，也许还有理想，但单纯涉及“所从事事业”的内容大概并不会很多，可我想，任何一项工作如若要真诚地被视做事业，则必是与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感悟、对自我追求的理解及其征程相融和的。这事业可以包括研究或其他具体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在构筑、书写或践行生命价值或理想。

我的选择与经历

如果说初中阶段是个体身体成熟的阶段，则大学的初年级大约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想法还处于萌芽和混沌的状态，只感觉是一个初生的东西在自己脑海不停地蹦跳和碰撞。有一段时间，一个问题如此让人困扰，以至于稍有些不用特别专注的时间，它便跳出来搅得人不得安宁：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约有半个学期的时间，这个问题纠缠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想起来一个理想主义者犹如恋爱，大约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就像稚芽挣扎着在某一时刻破土，当时给自己的答案是一种社会理想主义的，又融和了些宇宙观的萌动。我很感谢岳麓山的风雨林物和人文积淀。

还没有说我的专业。很惭愧这个学生的专业日语和他所谓的社会理想只有唯一两次结合：一次是四年前的毕业论文“日本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次则是考研的外语科目。选择日本农业作为论文主题，至少在那届的论文设计中是仅有的。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则应先了解农村。同样的想法的驱动下，再经过了一两次决绝的放弃后（这其实是偏离了家人给自己选好的道路，结果给他们和自己都带来很大伤害），我成为北京郊区农村中学的一名老师。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很单纯，虽然那份工作让我懂得了不少东西，但终究离我真实的所愿太远。一年后，我以停薪留职的方式加入梁漱溟乡建中心的“人才计划”，应该讲，之后两三年的经历都和这个项目或多或少有着联系。对于曾参与负责这个项目的我来讲，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教育创新的尝试，在制度设计上是把阶段式的理论学习和农村及公益事业的实践相结合，而更为重要的是所谓教育理念上的创新，即强调理想主义情结与脚踏实地的现实精神的结合，宏大的社会责任感与具体操作能力的结合。

我志愿者经历的开端是在河北一个有着相当历史积淀的村子。当时主要是社区调查、支教和参与当地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做了几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機會，我从冀北跑到了海南。

因为是和海南某市政府合作的项目，又和前段民间机构的尝试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体味。而于我回味最多的，是那里独特的风情、景物和至今想起还会与那湛蓝的天色、透彻的阳光、宁寂的胶林融在一体的别样的经历。

在海南的快乐和痛结束于我的第一次考研努力，那几个月的日子，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痛苦的磨砺，黑暗孤独中的研读、泪水和绝望……如果所谓的学术研究只是空洞词汇的堆砌和精巧而晦涩的框架，那它真与社会的进步乃至人们切实的幸福追求、种种需求和诉求有关吗？

之后的整个春天，我是在厦门与那个花园城市里拥挤喧嚣的工人住宿区的工友们（在经济学上所谓被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一起度过的。在泛公益旗号下的工友教育中，在与那些来自农村的二十岁左右的产业工人、底层销售员的交流和授课中，我体会到的是他们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生活重压下的顽强和



吕程平与村民下地归来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的幸福更来自于有一个宽容的空间和时间让我去沉淀自己，我慢慢有了个支撑自己的体系，渐渐成熟，给朋友们安慰的时候也多了一些更浑厚踏实的力量。

肖晓翠/第二届志愿者·社区伙伴四川办

无奈以及青春在冰冷流水线上的无情消逝。她们多是些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的女孩，因为要在微薄的收入上多挣些加班费，就要一天在机器前工作十几个小时。重复的操作，有毒的空气，许多女孩说自己记忆衰退、脱发……工人聚居区一到傍晚时候就挤满了这样的女孩、烧烤的味道和污水，她们中的很多人家乡是青山绿水，早已不习农技的她们说自己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家乡。我常想，那些机器和这肮脏的街区是不是要将这些姑娘身上蕴藏的天地精灵之气都挤光、变形？这些似乎都是陈词老调了，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如果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

避免的，我们是否能做些什么？

从厦门回到北京后直至读研究生前，我一直在梁漱溟乡建中心参与负责“人才计划”项目。以上是对这几年历程的一个简单的回顾，包括和现在所攻读的政治社会学大致相承：在共同体权力和权威的实现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普通人对自身权责乃至命运的把握和发展等等。

作为一种行动的教育

在“人才计划”五周年学员文集的序言末尾，我们盗用了温铁军老师的口气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心中的良知于困顿中觉醒、寻找自己心灵家园的青年提供另一种教育的方式是不是可能呢？这个项目这几年下来，是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致上，我们是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作出这样的回答。首先是尝试着给不同特质的青年（这里特指那些对主流的追求有差异的青年）认识和走出不同的成长之路的可能；之二，也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我们试图以此教育本身为行动。

如果把“人才计划”和“大学生支农”算作一种教育，则其最珍贵的，我认为在于给青年一个对自身生活意义、对社会现状、对个人与社会重新思考的机会，这里并非全然说这过程有多成功，但却为这种教育的进一步探索，在经验和价值上提供了一个基点。批判地讲，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体制，是不是真的让你有社会理想？入党、三下乡等等，完全或很大程度上蜕变成功利性的。你学习是因为你要工作，你工作就是要做那个职位要求你做的事情，之后挣钱养家或比较精英地成豪成贵，诸如此类。就是说，人已经制度化了，孔子说：“君子不器”，器了就成了类“物”了，类物是不需要考虑生存意义的。话语说出来往往有绝对感，实际并非如此绝对，但大体的逻辑如此。

我们可以对这“潜在设置”再讲一些。我想，这是由行政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共同作用的。最近说得多的所谓大学精神的迷失，是和最近30年来国家奉行的发展主义的路线相表里的。在大学的课堂上，思想政治教育课上还在讲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专业课则要为资本体系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商品。这难道不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话语上嫁接资本主义”（潘毅，1998）实践的一种奇妙的表象吗？而在青年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管他/她身处农村或城市，他/她都在接受和内化这消费主义的话语。广义地说，这包括强调个人的努力、不择手段的竞争、基于市场交换的物质享受等。这样的话语是与资本增值要求相适应的，是与不断被构造的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商品的要求相适应的。这样的话语解构着农耕文明残余的村社互助网络、自然的原始崇敬和道德信条，又轻而易举地将前30年借助国家社会主义构建的集体主义、社会理性主义教条的痕迹抹掉。真正需要追求的似乎只有两样东西——物质的享乐和情感的体验。市场体系提供满足这两种需求的各种商品，并构筑着鲜亮的流行文化来推销。

在人才计划每次培训的初期都会有太多的宏观社会问题的讲座和讨论，以至于占用了太多本应留给操作性课程的时间。其实是想让在种种被构筑的经验话语中混沌茫然困惑的“我们”能有某种自觉和警醒。“信仰”又是什么呢？是一种自由的意志。是在对自身与社会的较深的反思之上的一种自由意志。

我不相信类似“人才计划”这样的教育创新或者叫别的什么的行动真会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就像我不相信所有的大学生都会真的有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存的意义、自己的价值。但我想总有那么一些青年，他们对一些事情会比较敏感，或有敏感的潜质，更有可能去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当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一定的社会问题或身处于一定的不均衡的社会情境中，就有可能去会去思考，是否社会能更好些，可能会去阅读，重建自我意识，逐渐却可能是痛苦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学生社团，等等。当然，更可能在某个环节打住，什么也不发生。乡建中心几年来面对的，多是这样的过程中的一些学生，其中有些是思考得较深的。中心对这样的学生是有自己一些经验的。我基本没见过有老师像刘老石那样有激情地去讲“文化三十年”之类的东西，并非多正确（事实上有些观点往往是偏执的），而是那种态度，是把自己相信的认为是善的东西拿出来，很急切地想给你。这是一种认知、感情、价值和行动统一的态度。我总想，教育，最可

贵和最不该丢的也在这里。我也看到中心的一些同志深夜里和新学员谈心，谈对社会的认识，谈自己的困惑，没人给加班费，但他们都是那么做的。学员们也会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谈爱情观等等，很难想象这样的讨论会在现在的大学出现。这是可贵的地方。

人才计划二期学员丁华明，前几天在一次讨论上，说自己在大学里也是很“颓废”的，是因为临毕业要找工作才参加人才计划，下边是我对他讲话的录音整理：

“……没有想到有这样一帮人在这里谈论农村，以前没遇到这么多人在谈理想，慷慨激昂地谈论理想。在这之前，没有人谈论理想，也不知道理想可以这样谈，每个人都很随意地过，也没人认真对待自己的追求。我感觉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是不是也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理想？怎样度过人生？怎样才是有意义的？以前的自己是不是很颓废？我从那时开始认真对待自己，一直走过来。在人才计划培训的时候，开始上了这艘船，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好像有种沉睡很久后苏醒、看到很多现实问题、后来再难进入梦里的状态，感觉再回不去了。好像在成长过程中埋了澎湃的种子，很折磨很难压抑……”华明现在广西做自然农耕。

我想，并非是要每个青年都立志改造社会什么的，也并不是要每个人都到农村去，而是对那些有着某种敏感潜质的青年，能让他们在思考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支持、引导、同路的伙伴，让这过程更持久些，能让他们知道其实还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和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基本满足生活需要的工资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必须认可和面对的现实，选择了NGO这一行，就必须放弃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无止境追求。

张伟 / 第二届志愿者·攀枝花市
东区志愿者协会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属于奉献，但是最纯洁的那部分必定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快乐的。

陈汉信 / 第二届志愿者·国际小
母牛中国办

生活的道路选择，还会有不同层次的幸福。这样不论他学的专业是什么，选择怎样的人生路径，他都会有些种子在心里澎湃，这样也许社会走向更好的可能性就大些。这样的“教育”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了。

吕程平，200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做过一年老师后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人才计划一期，先后在河北、海南、厦门农村做支农志愿者和工友学习计划的教师，之后参与人才计划项目的管理工作。攻读硕士学位后，在一家杂志做编辑。

编者的话 从程平的文字里，不难看出，梁漱溟乡建中心对青年教育的深刻思考与大胆探索。人才计划由最初的发展农村合作社，为农村培养人才，到后来尝试把青年的教育与社会进步的推动相结合，强调对青年人的教育创新，再到如今对以农村可持续发展为载体的青年人共同成长网络的探索，推动青年人对主流价值的反思并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团队，一直在真诚地思考并实践着不同于主流的青年教育，而刘老石，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旗手。

过去10年，推动青年人到农村去，成为老石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老石说：“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地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在他2010年辞去教职时所写的文章里，喊出了这句：“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一句话，包含了一个师者对青年无尽的热望。

早在老石去世之前，我们就选定要刊出这篇他论述梁漱溟乡建中心青年人工作的文章。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去与老石确认，结果竟成了无法征询的遗憾。在青年人面前亦师亦友、亦兄亦父的老石，将他10年的思考与经验化成了下面的文字，却将未竟的事业留给所有后来者去继承和创造。

②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

文/刘老石

发生在这里的很多事情一定会让年轻的大学生们感觉不可思议，也更会让研究教育的人振奋不已。是的，你可能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

在任何一所大学你都可以看到的奢华、浮躁、气馁、郁闷和沉沦，在这里却一扫而光。和简单的环境、质朴的穿着相伴的是，这里的年轻人跑步、唱歌，每天都在读书和争论，他们高呼“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

这里的大学毕业生也同绝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家庭境况并不宽裕，甚至学校中还有贷款记录。但是和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的是他们已不再把找工作当做人生的目的，他们甚至放弃了找工作，而自己就直接到农村最基层的村子里驻点，并且一呆就是一两年。他们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也只有1000多元，有的甚至只有500元，仅够吃饭。

这里的青年人也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要交友、结婚、生子，他们也面临着住房、嫁妆的困扰。但是和几乎所有年轻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这里办起了青年人自己群体自助的公社，他们依靠合作来居住、娱乐、学习，他们创办了新幸福主义的集体婚礼让自己结得起婚，他们建立“三不问”账户来弥补花费不足，他们建立自己的互助基金来解决内部医疗和保险。

这里的青年人同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都来自普通的农家，他们的父亲是烈日下耕作的农民，他们的母亲是勤劳节俭的农妇。但是他们和绝大多数青年人不同的是，他们决心为消灭农村贫困和农民的辛劳而努力，他们以此为理想，他们把这一切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他们口中听到更多的是“三农、正义和良知”。

他们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也要读书、成长和寻找出路，但是他们和所有的大学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在乡下、在田间、在工厂中读着自己的大学，他们每



公社里常常组织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

年有八个月的时间花在基层，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成长。他们也会回到这个院子里面来，但他们所谈的已经不再是漫无边际的道理，他们彻夜讨论的是如何拿出漂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教授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年轻人说，这是我们的圣地。

这里就是梁漱溟乡建中心——一个青年人的精神家园，你看到的这些年轻人就是人才计划培养的学员，就是这个精神家园的孩子。与其说这里是学校，在培养人才，还不如说这里是在造就一批新的年轻人，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

一种文化的丢失不是仅仅失去了一种可能性、多样性，而是整个人类缺失了自身的一部分。

陈丽霞 / 第二届志愿者·茂县乡村发展协会

从2000年开始，尖锐的“三农”问题督促着青年人必须有所作为。于是在一群富有良知的学者的推动下，各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大学生支农队，他们利用假期到农村支教、扶贫、推动组织建设。几年的时间，仿若春风拂过，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大学都开始了下乡运动。他们组成十人的小团队，到农村去调查，推动农村精神文化生长，协助农民成立合作组织。这些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大学生们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最为瑰丽的篇章，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些不怕吃苦、不图回报、踏实勤勉、胸怀“三农”的大学生们都应该获得最好的赞誉。

这种短期的支农在社会倡导和引发“三农”问题的关注上功不可没，但是想要解决农村发展根本问题，却一定要能够有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一定要解决农村这种创新发展的本土人才匮乏的问题。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发展指的是一个向上的变化的过程，自我发展呢？应该就是自己主导这个变化的过程。

杨芳园 / 第二届志愿者·四川农村发展组织

在顺平康关农场劳动



于是，从2005年开始，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在五年的时间里，在大学生支农的基础上创生：培养长期志愿者，每年从各个学校招募30名左右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农村发展人才来培养，这些学员每年有三次集中学习，每次20天左右，其余大量的时间就到农村基层的学习点中去，在村中度过。这种程序就叫做“理论学习—村中实践—理论深度交流—村中继续实践—汇报毕业”的“理论—实践轮回培养模式”，中间也安排了若干次外出学习考察的机会和外部交流的机会。

这个培养模式的特点是“一个成长，三个回归”，即青年成长是核心目标，手段是三个回归，即回归责任、回归实践、回归团体。具体而言有如下做法：1. 学员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以实践培养为主；2. 实践研究和理论学习互相促进，知行相长；3. 这个培养模式的培养基础是团队为单位的，注意培养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在团队中成长；4. 最大的特点是以责任为导向的，把肩负责任作为所有学员的第一目标。

核心的问题是，这种成长是有指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它是对整个人生、尤其是对整个民族的事业的承担，在关注社会和改造社会中成长，他们的前途和这个社会许多普通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读书和实践的交替冲击中成长，尤其是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体系；这种成长不是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安逸，而是把自己融化在整个群体中，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的基本思路就是对现有整个教育价值体系和实施手段的彻底反叛，是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彻底批判。

现有的教育指向是追求个人成功，教育理想是“美女、靓车、豪宅”，获得这一切的就是成功，在这种理念之下培养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几乎都是带有强烈的个人目标的，是为己的，哪个人说为了自己的发财以及幸福生活而奋斗是非常正常和受到赞赏的事情，但是如果哪个人说自己是为民族的、团体的，其实是很不正常的，非常令人猜疑的。我们近二十年来的消极自由主义的教育、灌输的伟大成绩就是我们的知识精英已经几乎完全原子化了，完全个人主义了，消极自由主义原则已经浸入他们的骨髓。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总是需要有千百万不在

乎自己的得失安危的人，去勇敢承担民族和国家的使命，他们从哪里来呢？尤其是在如今整个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大格局已经重大逆转的时候，没有了大批去承担历史的人，我们的民族要走向哪里呢？

中国大学教育的极端表现是放弃了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天下为先、知行相长，反而自顾自利、闭门造车。我们的大学走向了一个极端，我们期待在大学象牙塔中的知识理论的教育达到人才知识体系和能力培养的目的，我们把培养得像计算机一样的产品叫做人才。但是事实上，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甚至完全是相反的。二十年来教育的结果是，高分低能、智高手低，所培养的人才大多属于考分高但是分析能力差，理论强但是实际动手能力差的人，而更大的麻烦还在于少数看起来还算做有能力、有知识、有实际操作的人却属于品格（社会责任）匮乏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出路在奋斗。所以，这种教育培养的人是“双高双低”的人才，即“高智能、高技术”而“低行动、低品格”，其中低品格是最大的麻烦。

如果不把人回放到真正的实践环境中，怎么能够提升实际工作能力呢？我们培养的人绝大部分是要回应中国世界工厂的这一要求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要普通的生产线中的操作技能人才，而不是高科技人才，这样这些人的实际操作技能就是必须的。实践是学习的第一要务，缺乏实践的学习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二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实践和个人主义的谆谆教导，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终于发现，依靠个人力量的自我奋斗解决不了问题，群体中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群体中去，依靠集体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变。我们也终于发现其实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群体而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本来就属于社会一份子的人回归到群体状态，让青年们在群体生活中成长，为群体而存在，寻找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最好的合适的结合点。在群体基础上重新构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

这种教育方式的基本原则是：

让教育回归人，让人回归社会。

以个体为指向的人才培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它的目标就是培养以个体为基础的所谓个性。但是90年代以后，个性过度，个性演化成了自私自利。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失去了群体的个人不仅仅无所作为，甚至反过来伤害整体生存。所以，让个性的个体重新回到群体，让个体和社会重新连为一体就成为必须。

让社会找到理想，让理想回归现实。

成长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有不同的概念，小孩子的成长是身体的长大，青年人的成长是知识能力的增长，更是个人的品性的养成。但是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大做强，其标准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对事业是否能够成熟地肩负。那么对于这个团队的成员而言，这种评定基础就决定了我们的评判标准不是看这个人个性是否成熟、能力是否足够，而只能是看一个人对待这种理想和信念的彻底性。一个优秀的青年人不应该属于自己，他理所当然属于整个社会。

九十年代，告别革命，同时也告别了理想。但是消极的逃避不能解决青年人心灵的激荡，那些激荡的青年灵魂一定会去寻找属于他们的时代，属于他们的时代必然是满怀向往的理想时代。这种理想不应该仅存于个人的狭隘心房，而更应该是这个时代何去何从的使命。这种理想也不会是镜中美景，它是现实冲撞的真实回音。

让现实回归正义，让正义回归行动。

理想的坚定还不是你整个信仰旅程的真正开始，不过是成长开端而已，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信念无论怎么坚定，如果不能够落实到行动上，都毫无用处。所以是否有行动成为检验理想信念的坚定性的一个标尺。古代的书生们往往是儒家信念最为坚定的人，但是这些人往往每天都在谈经论道，“平时袖手言心性”，却很难有实际行动，“临难一死报君王”，最后成为笑柄。坚定的信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转化成物质的力量，就将成为混饭吃的骗术而已。

青年人之所以有未来，不仅仅在于理想，更在于他们为了理想可以花费不屈不挠的行动。而最为宝贵的东西恰在于这种带着理想色彩的行动。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幼稚和不自量力，但是你永远都会自愧于他们的充满道义的真实行动。

让行动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青春。

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落实在行动上，在做中检验和实践理想实属不易。但是，行动并非有那么值得骄傲。检验一个人的理想是否真诚和彻底，并不是看一次行动，而是看经常，要经受日积月累的日常行动的考验。考验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有修养最后看的是这个人能不能把信仰融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中，渗透到血液中去。值得追求的状态是，把这种偶尔为之的行动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习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在理想中去生活。当一种信念、当一种偶尔为之的行动已经



刘老石（前）与人才计划学员在吉林农村

变成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以后，当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理想信念中，一个真正纯粹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造就了出来。

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可能很少谈及信念的坚定问题，但却是每天都在为信念和理想奋斗；你也很少会看到他们夸夸其谈于理想，但是理想已经就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了，当你问及他们的理想甚至他们都会很愕然，不知道如何应答；他们做的事情未必惊天动地，但是他们会把非常平凡的事情做得很好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实现理想所必需的；他们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和生命都已经蕴藏在奋斗和奉献的群体中。理想、信念和生命三者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一个优秀的成长的链条是这样四个步骤：犹疑徘徊—信念的坚定—付诸行动—成为一种生活和习惯。这样四步如果没有走完，就不会有真正理想的人生。

而一个优秀的青年的人生旅途应该是：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

刘老石（1968—2011），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项目主任、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编者的话 梁漱溟乡建中心的青年教育，不是心血来潮、兴之所至的尝试，它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时代脉络与社会背景。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之下，在以城市区域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背景下，在以强势精英为主体而构筑的发展主义话语下，农村、农业、农民所面对的多重瓶颈和困境。

在接下来的文章里，白亚丽和吕程平将向我们展示，梁漱溟乡建中心旗下的青年乡建运动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同时，在他们生动的语言里，我们还将感受到，在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平台上，青年作为一个群体的主体选择与创造，他们将生活、事业、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青年大多被主流所束缚和控制的时代，活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③ 蜗居时代的“乌托邦”——当代青年的乡建运动

文/白亚丽 吕程平

“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

2000年前后，正是城乡矛盾比较激烈、“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许多多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也面临着个人生活的两难。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到城市来学习，也想摆脱“泥腿子”的命运，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高校产业化改革，既加大了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也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有些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有的被迫开始了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的反省，在这同时，我们也变换了观察城乡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我们所生长于斯的乡村。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展开的。

具体到我们每个个体，参与其中似乎都有些偶然，甚至都可以说有些随意。2000年，刘老石老师来到我所在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任教。在这个以工科专业主导的学校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他在食工系做辅导员的一年，放松社团审批政策，鼓励学生自发成立各种社团。20多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与了“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

在2000年冬天，关心农村的学生并不很多。为了组织大学生乡村调研，我们几个“新希望”的创始人在学校食堂宿舍到处张贴海报，打着的是“文化旅游”的口号。或许还正是因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才招来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队。当时，对于下乡调研，我们都不确切清楚去哪里、如何去。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去了山西左权县麻田镇。

就在我们“下乡”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在1999年暑假以“京楚大学生村民自治宣讲队”的旗号，组队去了湖北随州柳林镇——这也是一位队员的家乡。2000年后，北京大学“乡土中国”、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

等社团都相继成立，也开始了组队下乡。2001年5月1日，我们几个学校的“老骨干”碰到一起，决定组成一支跨校联队，随后这支跨校联队就辗转在苏北丰县、沛县等地。

我们最早的下乡点，绝大部分是队伍成员的老家，要不就是其他来自农村的朋友的家乡。而我们下乡的费用，也是我们自己平常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当时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带上文具教孩子读书，带上衣物看看孤寡老人等等。再多一点的，也就是带上影碟在老乡家里组织大家学习学习科技种田和法律信息。支农调研变得有组织、有目的，是在我们接触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之后。

我们中最早接触到《中国改革》的是刘老石。2000年的一天，他挤在南开大学的走廊里听了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的讲座。在听到温铁军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教人吃饭不种粮、穿衣不纺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挤向金字塔的塔尖，离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越来越远”后，刘老石决定“投奔”《中国改革》。从那之后，刘老石一方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把所有业余的精力都用在推动农村发展和青年学生下乡的工作上。那时，温铁军也在用自己的课酬费资助一些学生返乡调查，他说，他的想法很简单，一是想延续老一辈农村工作者杜润生老先生“动员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夙愿，再有就是要给予长期脱离乡村、漠视乡土的孩子们再次了解家乡的机会。2001年10月，杂志社来了“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执著于平民教育事业的邱建生等等。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核心，也凭着中国改革杂志社等单位支持，大学生支农活动得到了5万美元的资助。在刘老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成立推动大学生下乡的支农队项目组，由京津高校的老支农骨干兼职组成。零散的支农活动在此时变得有组织起来了。

虽然参与支农调研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但通过支农调研，农村却呈现出打开大门后的另一个世界。2000年正值乡村矛盾的尖锐期，我们组织的很多下乡队伍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刁难。盘查、扣押证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支农队因为没有和地方干部打招呼直接进村，还会被地方干部驱赶出去。北京大学

“乡土中国”的一支队伍到内蒙赤峰调研，刚进村，就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围住他们是希望这支外来的队伍能帮着解决问题，而村干部却一再催赶他们离开。在村民们渴望的眼神中，这支队伍坚持留下来做完调查。在赤峰七天的调查，这支队伍是由村民轮流彻夜站岗保护的，调研后也是村民们护送到火车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队学生在江苏调研时，遭遇到冒充派出所的地方恶霸盘查。带队人机灵应变，反问对方是否有合法证件，因而才躲过危险。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刁难与危险，极大地锻炼了这群在学校温室里长大的学生。

调研工作想要真正获得农民的信任，获得第一手材料，和农民打成一片是必然的。支农的学生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许接受任何的礼品馈赠，不随便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北京某大学的一支队伍在河北顺平一个村因为被村干部接到城里吃饭，结果这里的村民拒绝他们再返回。后来这支队伍所在的社团也被支农队开除三年。为了使得下乡学生更快融入乡村，在下乡之前，每支队伍都会就安全问题应对、调研方法等接受培训，老队员也会传授一些经验，帮助新队员熟悉相关的资料。类似这样一些队伍陆续积累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规定，被奉为所有支农队学生的纪律。

后来，钱理群老师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指出新时代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是承接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历史精神的“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

“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以文化活动推动农村组织化

在项目组的推动下，仅2003年下半年全国就有80多所高校组建农村社团。支农队项目组指导各社团将下乡的村庄资料汇集在一起，建立了一百多家农村信息站。但是，在21世纪初“三农”问题仍然很严重的时候，这些信息站点的带头人中一半以上都是上访者。这种结构给支农调研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许多学生社团遭到学校的打压，要求不再组织下乡活动。我们的“新希望”社团甚至被要求改名。在这样的压力下，大部分学生都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

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出于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另一方面，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随着新政，农村政策得到了调整，农村的基层矛盾与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减少，我们也在思考支农调研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扎根在基层的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基层矛盾减少的同时，以城市区域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主义，也通过既有的制度设计源源不断地吸取农村的发展资源。农村的发展危机呈现的是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多重瓶颈和困境。小农的高度原子化状态，造成他们既无力抵抗带有剥夺性质的强势市场，也很难和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政策对接。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关注社会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抑或是《中国改革·农村版》所凝聚的农民精英，都在探索着新的实践方向和内容。新农村建设运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选择了以青年学生动员村民重建农村文化为切入口，开始了通过恢复合作文化进而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探索。

2003年春节，在河北定州历史名村翟城村，邱建生重启了70年前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邱建生和大学生们在村委会门上贴出对联：“平民教育诚可贵，乡村建设慨而慷”后，他自己也搬到了翟城村破旧的村庄小学。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翟城村的建设上。

2003年暑假，因农民维权而寻求外界帮助的东部某村庄迎来了一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十几所高校的近30名学生。这个村庄也因为这些学生的到来出现了新的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村子里村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剑拔弩张，每次乡里干部在村中出现，都会被一群要“讨个说法”的村民团团围住。学生的到来，无疑加剧了这种紧张。地方政府不愿意学生在村里待着，以“安排参观旅游”的名义，要把学生带走。学生们在乡政府和有关人员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学生可以在村里调查，政府则以“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为由，安排了相关人员陪同学生调查。本来一触即发的官民矛盾没有被激化。在接下来几天的调查中，这支队伍又不得不去思考远比他们的想象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发现，维权的确让村民热情高涨，但村民的生活却并未改善：老人病死家中无人知晓；年轻人的不孝顺也完全颠覆了尊老爱幼的传统；

村庄的道路损坏无人问津，村民们却只知成群结队打麻将；夜晚，宁静的村庄因为治安问题频发而令人非常不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村庄里？

面对这些比维权要复杂得多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开始思索如何将矛盾和冲突进行建设性的转化。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村民带头人的认同。起初，一群维权的“硬骨头”对这种思路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但或许是不愿意浇灭学生们的热情，他们也同意尝试看看。学生们找来了村里的老文艺骨干，这些老人从床底下搜罗出30年没怎么用过的二胡、边鼓；“老瞎子”扯着嘹亮的嗓子吼起了老革命歌曲。住在邻县40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也许我可以倾听到自己内心那些已经有些微弱但却真正来自心底的声音，然后勇敢地一步步往前走，并一步一个脚印！

王睿 / 第三届志愿者·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



2004年，白亚丽在翟城参与组织农民综合能力培训。

里地远的王阿姨，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寡妇，也在学生的带动下挥起支农学生的红领巾扭起了秧歌。这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在随后的两年中成功地组织起了村里的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队，还被大家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不孝顺在村里是个普遍现象。有些老年人求助派出所，但常常会使矛盾更激化。于是，学生们想到了“褒奖好的而使不好的害羞”的操作办法。学生们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评出村庄的“十佳儿媳”。然后学生们自己凑了几百元钱，买了大红花和奖状、脸盆，敲锣打鼓送到好儿媳手里。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妇女都是放着鞭炮迎接奖状的，她们还把这些奖状贴在堂屋正中央。

“因为这样的活动，村子的风气在扭转，以后每年我们都评选一次。”一位年轻睿智的村庄带头人说。后来他总结学生们的行动，是“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

随后的几年中，村里陆续成立图书室、经济合作社、生态农业实验田和农村互助金融等。至今，这个远近闻名的村庄不仅实现了以组织为依托、多位一体的村庄建设，还带动了周边十几个村庄共同发展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村民和政府的关系由原来的恶性对立到如今开始良性合作，村民们承接了政府上百万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类似的故事也在湖北、山东、河北等地进行着。这些鲜活的村庄故事让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在协助乡村建设过程中，以本地群众为主体，在基层转化矛盾、建设和谐农村的推动作用。

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

2003年底，中国改革杂志社乡村建设中心成立，开展了村民骨干能力培训项目，目的就是通过对村庄带头人的培训，将力量凝聚起来，通过走合作组织的道路来发展村庄。2004年底，以刘老石为核心的支农学生注册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加上邱建生等人在翟城村成立的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些组织随后挂靠在温铁军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05年暑假，“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乡建中心在全国100多所高校选拔了35名学

生，他们中有的刚刚毕业，有的是特意休学的。

“人才计划”的培养理念就是以实践加理论的方式为农村培养人，在这过程中，也要完成对年轻人的再教育。“人才计划”包含每年三次的集中培训和学习，其余的时间学员们都驻扎在乡建中心的项目点，协助推动合作组织的发展。多年的乡村调研让我们很清楚，乡村治理并非如其表面所显现的仅仅是技术缺乏、资金匮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企业介入不介入农业领域的问题，乡村发展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培养一批能够长期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青年人是乡村建设可持续性的关键。“人才计划”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年轻人去农村做什么？初到农村的大学生常会被村民、基层政府期待带来扶持资金、市场渠道、企业项目，事实上一无资源二无背景三无经验的大学生，在这些方面其实是难有作为的。他们特定的优势是在农村的客观调研、村庄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教育和文化推广等软件能力上。人才计划的学员不是去满足村民短期的致富欲望，不是去处理村庄各种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去跑市场跑信息，不是单一地提供科技咨询，不是越俎代庖替代村民做他们能做的各项事务，而是从公益文化活动切入，发动村庄“能人”，推动乡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改变。事实证明，这样的撬点既发挥了个人的价值，同时也推进了农村基层制度的改良。

参加“人才计划”的学员们，整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直接住在农户家中。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不带任何笔本纸墨，就在炕头和农民一起生活聊天，农忙的时候也挽起裤管和农民一起播种收割。他们每个月要向村民缴纳不低于生活成本的费用，遇到鳏寡老弱者，他们还会挤出微薄的补贴去探望。村民们很快会认识到他们无法直接依赖穷学生发展村庄，但他们渐渐地会被学生的行为带动，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家乡建设的根本。

从2005年至今，“人才计划”已培养出了5期共百余名优秀的农村发展人才，他们中的三分之二仍在农村建设、社会发展的第一线忙碌着。

蜗居时代的新生

2009年12月5日，梁漱溟乡建中心迎来了十周年庆典。12月6日，北京西山已是一片萧瑟景象，可山脚下一个大院子从早上开始就很热闹。菜园的边上，搭起了两口硕大的灶台，许多人忙碌着，有的添火，有的切菜，还有人在房间里牵起彩纸，在门上都贴上“囍”字……这里，正在布置着一场“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

这个院子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所在地。常来常往的青年学生称它为“家”，农民朋友称其为大后方，我们则诗意地称这里为“新青年绿色公社”。说是“公社”，首先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然后就是在生活和成长上互助和协力。在这里，社员自愿“入股”成立了公社互助保险。互助金首要用处是为生活困难或生病的同学提供帮助，另一个用处是通过“美好生活促进会”组织活动。作为对“美好和幸福”的一次重新定义，同时也是“美促会”2009年度最出色的工作，就是“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了。

如今，当全国千万“蚁族”大军奔波在蜗居地和工作地点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探索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活方式。每天6点半，学员们准时集合，进行一个小时的晨练；8点半，是“朝话”的环节，组织者站在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喊口号、唱歌，大家一起分享近期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或心得，之后所有人都要陈述当天的工作计划。公社生活简单而有序。尽管不乏生活上的小摩擦、小插曲，但这里整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院子里有几分菜地，生态农业部把这一小块地小心翼翼地划分为责任田，每个人认领一块，自己耕种。每个微型菜农也都施展着自己的有机农耕法。在公社的食堂，每月仅缴纳一百元就可解决一个月的餐费。工作之余，每周会有定期学习讨论以及其他以团队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娱乐活动。很多来授课的老师称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夕阳下看着同学们一边撅着屁股抬掇着黄瓜藤一边谈论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真是件很有趣的事。

公社的生活，虽非奢华但却很安逸，因而，我们也得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让公社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小圈子。公社被定位为青年人长期参与乡建的大后方，

而前方则是广阔的农村基层。大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农民或者工友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只做短暂的休息和知识的补充，随后就会奔赴全国各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新时期欧文式的乌托邦，其实，在我们眼里再没有比这里更能反映和接近社会真实的地方了。比起大多数为生活奔波但却困于高房价的同龄人，我们在创造着一种把个人成长、社会理想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钱理群老师认为“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自发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发现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对生活的认识，原来快乐的秘诀是找到自己的生活步调，而不是随波逐流。

林竹 / 第三届志愿者·成都华德福学校



在青年公社的小院里，收获玉米的喜悦。

行动，并内涵着对当今教育体系的挑战和创新。当然，这与五四时代欲用“民主与科学”、平民教育等试图改变“愚昧的农民”与“黑暗的乡村”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

对这个论断我们深有体会。一方面，我们所来自、面对并进入的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在通常说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外流的基础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价值体系在解体、崩塌。而现代化的媒介手段无疑加速着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渐渐为人们接受，这个时代还没来得及对17世纪西欧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检讨，就已经抛弃了东方农业文明中的某些优良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精神再造有着更深远的意蕴。

另一方面，精神的危机同时发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在这个开始对人生意义思考的年龄，有多少青年在选择中迷茫？几十年前的民族危亡赋予过去时代的青年深沉的价值坐标，而生于“盛世”的我们，却在意义之网上迷遁。十年前，当“到农村去”的口号将第一批支农队员聚集的时候，谁也不曾预料，这竟是一场以行动来进行的对时代精神和青年价值的探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探求刚刚开始而已。

【后记】 就在此篇文章完成之际，大学生志愿下乡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刘老石，因车祸于3月24日突然离世。作为追随他近十年并被其思想和行动深刻影响的学生，我无法言表失去这样一位已经完全融入自己整个生活、事业和思想价值的老师的感受。这些天来，我按照工作程序处理着老师走后的诸多事项，但在感情上却拒绝承认这样的事实。以我对他的理解，这位脚步永不停歇的行动者，也同样是拒绝躺下的。

我无法以单一的身份界定这位逝者，学者、知识分子、教师、行动者……他博众派理论之长，几度坦诚修正自己的观点言论，但却从未动摇过自己为弱者和

底层鼓呼的立场；他影响青年人舍小我而为民族社会思考，但对数万人的教育却都不是在课堂之内实现的；他本可以有机会撰写学术论文以谋学术的建树和职称的晋升，但他始终坚持用最泥土的语言和农民探讨交流，力图以农民为主体改变乡村面貌；他不仅慷慨激昂且身体力行、表里如一，生活与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有人说他抛家舍子，有愧亲人，其实没一位铁汉比他更懂得处理家庭和事业、小家和大家的关系。他的亲人是那么坚定地支持他，他和家人的关系从未因物质贫乏和他的时间有限而受到影响……

面对刘老石早逝的生命，有人惋惜地问：“平庸而长久与短暂而有意义，你愿意选择哪种？”我想，生命无谓长短，但要对社会和他人有意义才是存在的价值，这也是老石留给他带出来的这个年轻但坚强的团队的最大期待。

（原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此处有修订。）

白亚丽，2002年进入天津科技大学就读，期间参加学校的支农社团——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开始参加由温铁军、刘老石等人发起的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2003年参与中国改革杂志社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组的工作，推动各高校建立涉农社团。2004年休学一年，在湖北房县三岔村参与乡村建设试验点工作，并参与创办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就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机构的工作主要为推进农民骨干培训和青年人培养。

台湾农村阵线： 找一条“回家”的路

编者的话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十载耕耘下，成百上千的青年选择了将农村作为实践理想的舞台，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蓬勃生长。

在与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也有一群人，关心着台湾的农乡永续，追求土地伦理与环境正义。他们除了积极地投入各种农业议题的探索，也引领年轻学子投入农村工作，每年夏天举办“夏耘”农村草根调查营队，让更多的年轻学子有机会进入农村，进行田野工作，迈出青年实践的第一步，并在让青年人体验之后，开始尝试更深入地支持青年人的生涯，为青年铺垫一条进乡的路。

这个平台就是台湾农村阵线（以下简称农阵）。2010年初，初次接触农阵，在与农阵发言人蔡培慧交流时，她向我们谈起农阵在青年培力上的思考与想象，那一刻，我们想起了梁漱溟乡建中心。梁漱溟乡建中心与台湾农村阵线，皆因对农村的关注而出现，在这个农村与农业价值备受漠视的时代，他们都抱持着对主流发展的怀疑与批判，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坚守农村的多元价值；在这个青年愈加离乡背土的时代，他们都逆流而动，要让青年重新凝视农村，回归乡土。

那时就想，两个同样关心农村议题、也关注将青年人与农村建立连结的团队，若是有机会交流，该多好啊！2010年夏天，吕程平决定针对梁漱溟乡建中心人才计划过去五期学员的成长情况做一些个案考察，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农阵的成员蔡培慧、童智伟前来参与部分访问交流，访问的对象里就有这本文集提到的丁华明、刘胡佳、王永波。在结束访问回到台湾3个多月之后，培慧和智伟给我们寄来了一箱的农阵纪念品，里面还夹着一封信：

.....

仿佛，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好像我们才搭着渡船过漓江；背着行李拜访山水涅槃；然后在大河背村的千年大树下，张开双手，环抱，合影。

好像还听到爱农会周会长爽朗的笑声；闻到土生良品一桌好菜的香气；然后胡佳在社区小铺一边招呼着我们，一边走进屋里杀鸡。

我们忘不了永波的硬颈、辛苦与坚持；忘不了河北小水那仿佛一千年以来就这样存在着、生活着的山村；忘不了庭院里孩子们的笑语、月光下农友们的讨论、分享着合作社种种的场景。

十天紧凑的行程，我们能够回馈的不多，但是却学到了很多：我们看到社区伙伴与在地NGO、与农村、与社区之间互为主体、互相回馈的伙伴关系；我们看到一套既制度化又充满弹性与人性的青年培养机制；我们也看到了一种面对土地、面对自然、面对人的谦卑。

.....

其实，农阵已经回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在农阵的朋友身上，我们看到对农村价值的坚守与捍卫；看到那广阔的社会视野之下，鲜活且富于创意的在地行动；也看到，那些可爱的年轻人，是怀着怎样的赤子之心，踏上漫漫进乡路。

在看完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案例之后，让我们来到宝岛台湾，且听海的那一边，当青年与农村相遇时，发生的故事。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体会到了一种在其他领域中所没有的感动，那是一种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精神；对社会责任勇于承担的精神；对个人理想锲而不舍追求的精神。

梁坤立 / 第三届志愿者·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①我的进乡路：关于青年进乡的一些想法

文/童智伟

山城春天

夜里的雾色环绕着台三线上的丘陵山区，老式的路灯，映着村庄的恬静，柑橘花的清香，温柔地宣告着春天的来临。这里是东势，2011年初，我在这个说着大埔腔客家话的山城租了房子，住了下来，开始我向台湾乡村学习的新阶段。

对于我而言，这个安排，自然是有许多的机缘与决定所聚合而成的。而说起来，有些事情还是巧得让人感觉天意自有安排。2010年8月，社区伙伴与梁漱溟



2010年8月，智伟（左）在河北访问，与农民从田间收获归来。

乡村建设中心打算重新梳理过去五年培养年轻人参与农村社区的实践经验，而组织了一系列的拜访行程。我与台湾农村阵线的蔡培慧老师，有幸受到邀请，一同到大陆的广西、北京、河北，与进乡参与农村工作的年轻伙伴们交流。在过程中，看到社区伙伴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如此有组织地进行青年工作，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省与修正，其实深具启发地刺激着我们思考台湾青年人在农村工作上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怎么做。而巧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因缘际会，我接触到一个旨在支持年轻人向社区扎根、投入公共事务的组织——青平台基金会，并且接受了青平台为期一年的支持，开始到台中县东势镇驻点。

东势是台湾温带水果栽培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梨子、甜柿、葡萄、柑橘等，都是这里的主要作物。而我在东势的计划，正是与一群怀着对土地友善的信念、在耕作方式上尽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的果农合作，希望能够让消费者更认识这群优秀农民，打开一个支持对环境友善的农民的通路。

这篇文章，正是想从这样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出发，分享一些关于青年进乡的思考。而首先，我想必须先介绍我自己，特别是那些在我自己的历史里，与“进乡”有关的生命历程。这样，或许读者比较容易掌握我思考的出发点。

离乡的年轻人啊！

我来自台中县沙鹿镇，一个城不城、乡不乡、离台湾第三大城市台中市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或许因为比较能够适应教育体系的关系，我书念得不错，家里虽然并不好过，但是也尽力地支持我一路念书。于是生命的轨迹，就不断地往更现代、更繁荣的城市移动，国中毕业到台中市念高中，高中毕业到台北念大学。我的例子，我想并不特别。对于出生在乡村的、贫穷的家庭来说，好好念书、不断地往城市移动，才是主流社会所期待的道路。进到大学之前，大部分的时光，就是学校、课本与考试，对于故乡是谈不上什么认识的。

然而或许是老天爷留下的伏笔吧，我有一个种植荔枝四十余年的外公。小时候我就常常去荔枝园里玩耍，但是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关于外公荔枝的种种，

则是高中毕业之后的事。高中毕业的暑假，是我第一次成为有用的劳动力，实际参与荔枝的采收。这也是我农村意识萌芽的起点：很现实的，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拼得要死要活采下来的荔枝，交给行口一斤只有9块钱台币？

这种切身的经验，使得我在学习的领域上，渐渐地向乡村社会学、台湾政治经济史、农民研究的领域靠拢。原本我在大学念的是医事检验，后来也决定降转念社会系。

另外，或许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大二那年我开始尝试在台北替外公卖荔枝，品牌的名字就以我外公命名，叫做“陈阿潭荔枝”。第一年是靠社团与身边认识的好朋友们支持，第二年开始透过BBS(电子布告栏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把市场打向学校的宿舍群——透过网络团购方式，节省购买运费，然后统一在宿舍取货。到了第三、第四年，除了BBS之外也开始经营Blog (<http://mygrandfarmer.blogspot.com/>)。虽然外公大部分的荔枝仍然还是要进到传统通路去，但是透过这样“产地直销”的方式，直接卖给消费者，利润还是比较合理的。

除了个人学习与小小的产销尝试之外，走着走着，我渐渐地卷进了一个关心台湾农村的网络之中。2008年，《农村再生条例》引起农民、学者、律师、社区工作者、学生等民间力量的关注，并且化为具体的组织行动。一连串的说明会，向政府的陈情、抗议，在立法院会对政策的监督接连展开，进而催生了台湾农村阵线。在学校里，学生们也自主地组织起读书会，企图了解农村的现况与结构问题，并且在行动中与台湾农村阵线互动、合作。

而我先是参与台湾大学农村读书会，接着也渐渐进入台湾农村阵线的工作网络之中，特别是与青年有关的部分。在议题上，除了《农村再生条例》之外，我们也持续关注几波的土地征收议题(相思寮、大埔事件等)，以及诸如国光石化这样的对农村有重大影响的开发案。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年轻人，开始关心农村，参与农村工作，于是我们举办了夏耘、青年访调训练营，训练青年基本的访调能力，提供管道让青年学子认识乡村。除此之外，我们也举办弯腰生活节^①，邀请农民亲自到校园展售他们的产品，并与学生、消费者对话。

乃至到现在，我进到了一个水果之乡开始蹲点。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酝酿出我对于“青年进乡”的一些看法。

离乡所以进乡

首先我想必须先定位，这里的“青年进乡”所指为何。我想，进乡也就意味着，不论什么原因，这里的青年首先是离乡的——正因为离乡，也才有所谓进乡。

离乡，不仅仅是原本活在乡里后来离开了，而是一种脱离了与土地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离，正意味着原本是在的——我们的父辈、祖辈，多少都还是有农村的生活经验，我爸爸小时候上学还放牛呢！然而，对我们这辈来说，乡村经验是愈来愈少了。不能说乡村的元素完全消失了，但是它是一个愈来愈“离”的动态过程。而我想进乡的概念，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里的一个反思。

每个当下，都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我相信，在每个瞬间，人有决定自己该何去何从的自由。我想，青年进乡的概念对我而言，其实背后是在问：对于青年来说，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我们要继续“离”下去，坐视一个离乡离土的时代吗？或者我们可以改变些什么？

上面谈的是进乡概念的出发点，进一步，我想说明，这里指的青年所指为何。青年并不是均质的。我是在乡村长大的，我的国小同学们，本来就在乡了，

①弯腰生活节，由浩然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台湾农村阵线与台湾大学谷雨社合办，从2009年开始在台湾大学校园内举办。内容包括友善耕作农学市集、农学讲座与农村音乐会等。希望透过市集能够推动友善环境耕作，并且介绍农村议题给社会大众。网站：<http://bowtoland.blogspot.com/>。

有些还结婚生子了，对他们而言，就没有进不进乡的问题。而我想要指出，特别是以农阵的经验来看，进乡首先还是发生在一群知识青年身上。这群青年或多或少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对乡村的挤压，看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所受的苦难，从而开始重新思考主流的发展道路。

这群青年不是我儿时玩伴，从小跟着爸爸做铁工的阿福；不是我在东势看到继承父业学着种梨的阿杰；而是一群在城市长大，或者是往城市流动的读书人。我并不是要展现什么知识青年的伟大，我一向厌恶这种带着傲慢的自我标榜。对于所谓的知识青年，我始终是带着一种怀疑与矛盾的。虽然在许多客观的判断标准上，我或许属于这个群体，然而，我往往又极欲摆脱这个标签。于是，梳理这个命题，对于我而言，也就变得重要了起来。

就请容我先聚焦在一群主流社会所认为的“精英”、一群“知识青年”身上，从这群人的社会位置、社会条件出发，来谈谈我对青年进乡的想法。

进乡先近乡

首先我要指出对于这一群离乡的知识青年来说，“进乡”之前，首先是“近乡”。

我比较相信，进乡要成为青年生涯规划的选项，在客观上必须有许多条件搭配的。而且这这也是一个在时间之流中路径依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因此包括我自己，我想在选择进乡之前，首先是经历了一个农村意识启蒙的过程。比如对我自己来说社会系的训练培养我各种观察事务的视角，外公活生生的荔枝经验，都是我农村意识启蒙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而我身边的朋友们，有的是因为参与读书会，有的是因为参与访调，有的因为看到了例如大埔征地、国光石化这样的议题等等……而让年轻人开始思考农村，开始思考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

而除了意识启蒙，重要也幸运的，我想是这群年轻人开始被卷进一个关心农村的网络，开始与许多从事农村工作的前辈们发生关系，从而开始行动，开始参



智伟在果园学习梨树接穗的技巧

与，也开始发展青年们自己的社群。正因为有这样的网络关系，提供了青年从意识启蒙到实践之间的条件。

于是，这样的一群青年不是个体的而是处在网络之中的，不是光空想但是找不到可以做什么的。

我想正是在这样思考、读书、实践、组织的交错反复之中，青年们取得了更多与农村发生关系的机会。我所谓的进乡前的“近乡”，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的过程，使得青年们能够把“进乡”当做一个生涯规划的选项。

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参与了学校的读书会，参与了台湾农村阵线，并且因为这样的网络关系，认识了在东势大我十几岁的学长吴子钰，才有可能真的进到东势来。

我想，如果少了这些过程，贸然地要把离乡青年拉进乡村，不论对青年本身或者是对地方来说，可能反而会揠苗助长，适得其反。

而如果在进乡之前少了这样的网络关系，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认为，也会限制了青年在乡村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点在后面关于青年进乡的想象中，会有更多的说明。

在谈了进乡之前的路径与条件，我想要接着谈谈关于进乡本身的思考。

进乡是为了更深地理解，一种田野式的进乡姿态

容我再回到一点自己切身的经验，并且以这个经验作为切入点来谈青年进乡。在决定来到东势之前，无论如何，在台北的我，是台北的，是学院的。我们在台北开会，组织一波一波的行动，企图“让农村更好”；我们在学院里高谈阔论着农村的结构、农村的未来。然而，我们真的认识农村了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这种困惑、质疑，对我来说愈来愈强烈。我无法再满足抽象的理论、简单的口号，无法满足于短暂地到农村过过水，做做所谓访调(往往是不见得会有回馈的叨扰)，无法满足于学院中那种仅仅把农村、农民当做是“研究对象”的旁观姿态。

而运动上，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媒体中心，打议题，搞抗争，无可避免的，往往得拉到台北。我相信，政治是象征斗争的场域，在策略上，至少在台北，必须大量地制造象征(当然运动还有其他很多层次，组织的层次、论述的层次、体制内的协商、运动团体的自我维持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参与在以台北为中心的运动，对于农村的认识，总还是稀少的，是印象式的，是想象的，是选择性的，是掌握了一点那么不足的什么，却必须作出判断与选择。我很不安，我却也感谢这样的不安，它迫使我必需停下来思考——对自己而言，或者对于类似像我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来说，下一步是什么？我想“进乡”这个选项对我来说，是在这样的脉络下产生的。

为什么呢？

我想，还是回到那句老话，理解是行动的基础。就这点来说，我想至少对我而言，青年进乡的第一个意义，是透过“浸乡”来让自己更理解乡村。而从理解开始，我想为的是去培养一种以乡村的观点、乡村的现实来跟城市、跟政府对话的能力。换句话说，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视角的切换，过去我们是从台北看着乡村，想象着乡村；而进乡，则是意味着开始试着从乡村看台北、从乡村看世界。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想，必须具备一种“田野式的进乡姿态”，必须悬搁自己的定见，谦卑地让眼前的一切对自己说话。在东势的半年来，我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无知，发现自己过去对于农村的刻板印象有多少错误。这是一个漫长的、永无止境的认识与学习的过程。我想进乡如果是为了有更多的理解与更深的认识，也许必须先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姿态，否则即使进乡，可能仍是离乡的。

进乡搭桥做实事

而从理解出发，从切换到乡村的视角出发，我想接着谈自己对于青年进乡的第二个想法。我认为对于青年来说，进乡，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从城市进入乡村的过程。

台湾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各种外在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现代化的力量，左右着乡村的发展，速度快到以至于失序，以至于乡村在应对上站不稳脚步，所以有一味的土地征收、来自于进口农产品的巨大冲击、乡村世代之间的断层危机等种种的社会问题。

如前面所说的，这群青年首先是离乡的，这意味着这群人多少具有台北的经验、城市的经验，有的可能还有点运动的经验，有各式各样的“离乡”经验。

而如果这群青年又是处在一个网络之中，有一定的实践的准备，并且试着去更为深刻地理解乡村，那么我认为，青年进乡之后接着能够做的，就是搭建起一个城乡之间的桥梁，把乡村的观点反馈到那些左右着乡村命运的种种力量之上，反馈到城里，反馈到学院，反馈到运动，让消费者能够更认识生产者，让执政者能够更体会到乡民的生活，同时也把种种外于乡村的元素带进乡村。乡村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静态场域。在认识乡村的基础之上，让乡村与各种艺术的、科技的、运动的、学院的元素发生关系，具体的作为可能是农产品营销，可能是文创设计，可能是一份好的乡村研究、一个好的纪录片……我想这些或许都是青年可以尝试去做的实事。

而我想网络与关系正是这种“搭桥”、“做事”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说，我想，要让城乡之间开始互动，首先正是从自己原本有的网络开始做起。然后接着去扩大我们的社会连结。

青年进乡，当然也可以不用管那么多，就是单纯想办法在乡村谋生，这也是有意义的。只是我谈的，是对于青年进乡能够如何定位自己的其中一种想象，或者至少是我对于自己的想象：能够让城市与乡村互相理解，并且在这样的互相理解的来来往往之中找到自己能做之事。

对于曾经离乡的青年来说，这正是我们的位置所能够做的。

扩大我们的力量，让下一代不再离乡

文章的最后，我想提出我对于青年进乡的第三个看法。我认为这一群进乡的青年，必须要有维系社群、发展社群的准备，不能只是孤岛式的单打独斗，而是尽量形成一个又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享的群体，带动更多人关心、思考、投入乡村，让量变产生质变，让各种多元的力量可以与乡村结合。扩大我们的社会连结，我想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梦。这个梦期许一股改变的力量，这股力量首先是让我们自己从离乡变成进乡；接着，我想我们也是为台湾社会种下一颗改变的种子——我们曾是离乡的一代，而我们可以试着让我们下一代不再离乡。

童智伟，1988年出生在台湾中部一个城乡交界的小镇。就读台湾大学社会系期间，在校内举办弯腰生活节，希望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接着参与台湾农村阵线，与一群关心台湾农村发展的前辈、伙伴一起——“从土地出发、向农村学习”。2010年冬，进到台中东势，与在地农友、资材行经营者、社区工作者一起组成了“果本山农组合”，从事友善生态农产品的产销工作，朝向建立一个属于农民的友善产销平台而努力。

编者的话 智伟的故事，展示了一位台湾青年的进乡路，这里面，既有他个体自主的思考、选择与努力，也有诸如台湾农村阵线这样的平台给予的支持、推动。正是这种内力与外力的相互协力，共同形塑了像智伟这样的年轻人。

在台湾农村阵线里，还有一大群智伟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称自己为“农青”，意即关心农村的青年。在不同的场合有机会与其中一些农青相遇，惊讶于他们在农村议题上的宏观与思辨，感动于他们投入农村的真挚情感，钦佩于他们尽力在农村寻找自己位置的决心。

也因智伟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特例，我们愈加好奇，究竟这些青年背后有着怎样的土壤，方才孕育出他们今日的模样？

现在，让我们从智伟个体的故事中跳出来，回到他及他的伙伴们成长的平台，去看看台湾农村阵线视野里的青年培力。

② 经验他方结伴同行 ——反思台湾农村阵线青年连结

文/蔡培慧

过去的两年多来，在台湾，我们看到关注农民农村农乡的青年的力量更形集结，他们在认识理解农乡之后，结合自身的专长，连结更多力量为这片土地上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我感兴趣的事情主要有：对生活和人性的探索，对爱和自由的修学，人文与艺术，儿童教育，以及做世界真正需要的事情。活着就要直达生命的最深处，我希望能够好好体验生命的每时每刻，欢乐与痛苦，平和与恐惧……

刘婉琪 / 第三届志愿者·玉妥云
丹贡波医疗中心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只是看勇气有多少而已。

古嘉苗 / 第四届志愿者·四川康美社区发展与市场策划服务中心

的公义与永续拼搏。同时也看到青年与农村的连结，从体验走向生涯。至少有五位伙伴，因着自身的志向与社会网络的协助，得以展开青年进乡的实践，让夏日的体验成为笃实的毕业后生涯规划。这一切，大抵是台湾农村阵线在2009年5月坚持在没有资源的情形下，开办“夏耘农村草根调查”时所不能想象的。虽说，当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让更多青年学子体验农村，必须为长久的农村工作召唤新的队伍。^①然而，当它渐渐成形，我们除了喜悦与感激，更多的是前行的困惑与反思，猜想总有一些夏耘农村草根调查之外的连结与转化，总有一些无法估量的触动与启发。

且先说明台湾这一波农村自觉行动的特质。首先，这是一场进乡行动，但不是浪漫的怀乡之旅。我们的工作主轴之一为“青年进乡”，取其“进乡”有多重含意：“进”总有个往前走的意味，“进”同时也有着奋起的可能，况且“进乡”音同“进香”，而“进香”则是台湾庶民社会最重要也最令人熟悉的地方活动。人们因着感念，因着盼望，因着归属，定期不定期地向所属的、超越的存在表达亲近与崇仰。因而“青年进乡”意味着召唤关怀这片土地的伙伴走进农乡，共同思考农民农乡农业所面对的问题。农乡有其因小农耕作而绵延的厚实人际，有其因近六十年现代化耕作而丰富的生产技术，当然也有长期不均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无论是空间环境或社会人文，这些都是关注农村的工作者所需面对的问题，也是“青年进乡”必须理解的社会真实。它不需浪漫的揣想、空言

①有必要提醒，此篇文字旨在描述参与农阵的青年朋友，青年参与确实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不应被视为全部或最重要的环节，而农阵的青年工作偏重在大学生与研究生经验，很可惜的，尚未触及返乡青年以及留乡青年。

的体贴，它需要走进去，面对它，找到改变的可能。

其次，农乡现况有其结构原因，需要多元的介入。台湾自国民党迁台之后，向来以政府力量计划性地实现经济发展，它带来台湾生产力的提升、物质生活的改变，但是也将台湾带往一个市场化加速以致失速的迷惘中，出现了环境变异、贫富不均、资本垄断、城乡失衡的困境。在这一结构中，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当前的困局，在各个领域要求改变，要求反省，农业部门也不例外。身处其中的我们，感受到这股困局，同时响应具体问题，因而团结行动。名为“台湾农村阵线”的群体是一个复合的组织，它的组成包含农民、农村青年、知识青年、文艺人士、学界人士以及少数的地方层级首长。农阵的工作大抵分为“团结农民追求更合理的体制”、“扩大青年参与农村工作”、“实践小农耕作绿色消费”以及“深化农村行动美学”等方面。这些工作是交互影响、彼此连结的，唯有如此，才有机会稍稍松动结构困局。

第三，相应于过往的现代性假设，认为农民农村农业就是传统落后没出路。农阵倒不这么想，我们认为，如同单向市场化发展，单一现代性价值的笼罩使得大多数人民对他人、对万物、对自然有种唯我独尊、物尽其用的功利思维，而正是这种思维将全体人类带入毁灭性的困局。就此而言，架构在小农耕作之上的农耕文明，或许源自于个体劳动面对大自然的体悟，或是小农耕作所仰赖的社群互惠，或是小农耕作过去曾经有机会较少的货币依赖，农耕文明面对大自然、在社会社群生活中统合为一股扎根、执著与谦让。这在费孝通笔下所谓的“土气”，或许值得21世纪相信人定胜天、科学至上的工业文明反思。直言之，农阵相信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一样重要，农村与都市具有相同的价值，我们的努力应当扩大、体现对此的认识。

在这个理解上，接着谈从调查中开展认识的“夏耘农村草根调查”以及青年连结与转化的因由。

连续三年，盛夏时间，农阵都举办“夏耘农村草根调查”，参加学员都在80-120人之间，若再加上志愿的工作人员与讲师，每一年约摸150人进行这场土地之约。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只要心中有个美好的可实现的愿景，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着，那么即便是遇到困难、坎坷，也可以保持一个很理性的态度，让自己始终处于追求自己所定义的“幸福”的快乐中。

何林 / 第四届志愿者·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夏耘农村草根调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营队”、“访调与劳动体验”以及“书写发表”。第一阶段的营队又分为三部分：前两天的农村发展通识课程邀请资深学者与草根工作者，讲述具体的发展脉络与特定议题；接着两天则由青年学者与草根工作者，分组全程引导学员于农村聚落进行访调与实作；最后一天，则邀请村民参与学员的发表会，同时给予回馈意见。我们择定的营队空间，都在农村。2009年的营队在美浓客庄，2010年在溪州乡圳寮村。借着空间的文化感受与社会脉络，参与学员得以全心地进入田庄，以别于学校的制式场域。营队期间是许多参与学员的农村初体验。置身现实的农村空间，课程中的农乡思辨与访调期间所理解的农乡经验与常民语汇，共同形塑了民间、农乡。透过这层理解、疑惑、认识



“夏耘”大南埔访调，在路上。

与体会，参与学员所产生的内在扰动，或许将随着部分学员回到日常生活，当然也有部分学员主动地热诚地参与第二阶段的实际访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参与学员自我召唤的动能，同时，期待相对而言更深一层的理解得以顺势推展。

访调与劳动体验，我们称之为“夏耘”的第二阶段。此一阶段的形式，因为合作的社区的伙伴以及个别营队组织者的侧重，而呈现出殊异的风景。学员走进农乡人际，走过山林田野，漫游海滨湿地，理解稻农、菜农、花农、烟农、原农^①、蚵农^②的生命故事、产销结构、社会肌理与文化厚度。组织以上性质殊异的营队的不是别人，正在曾经参与过2009年访调的农青以及农阵各地的结盟伙伴。每个地方都因着当地的特色与实时的议题，而有细致的差异。第二阶段相较于第一阶段更是真实理解的开始，特别是参与学员往往需自己张罗访调的食宿以及访调前期密集的联系与准备工作，在这些看似繁琐而终能成行的细节中，农青方才开始身处农乡。在此所指的身处既是空间属性也是社群关系。当然，并非每个访调点都能顺利成行，而挫折，与之所以不能或使其可能，恐怕正是创造青年与农乡多方交会、认识与连结的时机。

农事劳动最能表现身处其中的深层含义。访调期间，总是尽可能地安排农事劳动，因为我们相信农事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相生相成、互为主体并孕化为相应客体的活泼生机的特殊过程，这层体验非得身处其中，脚踏实地（这句成语的原意应当如此）、手感触动才能理解与感受。当代青年已然脱离土地，甚至不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平淡无奇也好，激情四射也好，感动不已也好，都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切身感受，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装饰，简简单单的认真生活便好。

刘园 / 第四届志愿者·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①原住民农民

②在海边以养蚵为生的渔民



“夏耘”访调时，参与树豆的采收。



与乡民一起摘洛神花

曾双脚踩在泥土地，而农事劳动仿佛提供了身体打开五官、心领神会、脚踏实地的机会。

书写与发表互相支撑参与学员的辩证思考。许多学员在第二阶段访调中往往理解到一个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社会维度向他展开。由于这层感受要不太过强大，要不模糊难解，是以很难述说或者隐藏在外显文化形式与生产关系之后，通常需要一些距离与沉淀才能捕捉一二。因此，书写以及书写之后透过正式发表会（青苗发表会），观察与聆听不同学员于不同地方的学习体会，或许有机会触发深层的内在感受，并且再行反思实际经验与社会结构。当然，正式的发表过程，邀请资深报导者、青年学者给予反馈与探问，在过程中探讨某些理解的偏误，参与学员辩证与再行厘清皆有助于文本的内涵。反复思考落笔为文的篇章集结为《夏耘草根调查文集》。文集的出版一方面丰富农乡人文肌理，另一方面鼓舞着青年学子盛夏时节的投入。三年了，“夏耘”是发生在盛夏的故事，是“农青”确立自我形象与认同的基础。

当然，如同前面的报告，农阵确实有意识地办理营队开创学子与农村的接触，并且在每一个可能的行动伊始，邀请学子参与筹备承担工作，让人们在行动中看见彼此的差异，掌握行动的内涵，激发自我的动能，团结奋进。凡此种种，

确实是农阵这一段时间所努力的。当然，我们更相信青年行动是长久以来的累积，同时与各项团体碰撞交会，如同林乐昕等人在《反国光石化运动的青年串联》文中所强调的：“‘青年成事’，不是纯真、年轻的身份使然，而是‘走入民间’与大家在异质的社运场域里擦撞，在团结行动中，激发出个人潜力，看到改变自身与结构的可能性。我们的行动若产生任何创新的形式或者社会能量，那也是从当代各种异质行动者所累积的历史土壤中长出来的。”不过，模模糊糊间，好像也不太能满足于仅仅如此外显的解释，且让我在这个好奇与不解的基础上，试着捕捉脑中的浮光掠影。

我们常常有个假设，透过办理营队，让更多人经验农村进而找到自己投身的位罝，扩大农村工作的队伍，好像人们必然对外在事物有所感受，好像人们是个容器，会吸收接纳他所处的农村经验的真实。这样的假设想来有些天真有些放大，放大了外在经验对内在思维的单向渗透。然而，它是真实发生着的，但它又不应该只是单向的作用。最近我常常想起一个字——“化”：造化、变化、淡化、蝶化、化学。这个字眼有着本体转化为另一个形体的意味。而转化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外在的刺激，一方面是酝酿的时间够久，一方面本体也存在着与之相呼应的质地。或许青年学子们来到农村渔村，他眼中所见所听所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语言、气味，凡此种种，“对”到了某个内在思维，交融产生某种无以名之的质地。

此一转化所形成的自愿自觉的动力，迸发出活泼与多样化的组织行动风貌。比如政大的同学组织起“返谷社”，与苗栗后龙湾宝里的农民互动密切，声援支持湾宝里的行动之外，也积极的办理“绿色魔法学校”，结合环境教育、亲子互动与农事劳动，让更多都市家庭及孩童从种植西瓜开始认识这片土地。“返谷社”的青年同时与社区妈妈共同打照温馨的社区图书室，从行动发想、对外募书、分类整理到木工粉刷都由社区居民与年轻学子共同完成。比如台大“谷雨社”除了在学校办理一系列的农学讲座，同时也结合北台湾的农家，积极办理青年援农行动，透过农事劳动体验，舒缓农家农忙时期劳动的紧张。参与农耕对青年来说并不仅止于身体劳动的节奏，更是超越日常身体感受的潜移默化的学习。

再比如清大“头前溪社”与二重埔、三重埔农民的互动，不仅是学生与农民的关系。在学生与清大老师共同努力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发展出农村作为通识课程与服务学习的基地。“头前溪社”更进一步结合外部资源，拓展农村体验营队的样态。又比如交大农学小组则结合课程，定期地进行竹北璞玉地区的访调，同时在校内发动多波的讨论，探讨交大扩校与大学社会责任的严肃命题。

不仅如此，各个专业领域的学生也参与其中，由法律系学生组成的法农小组，实际参与《土地征收条例》法案的修订，并且逐渐扛起社会行动的责任；由艺术学院的学生所组成的美农小组动能惊人，从声援相思寮的百纳被伊始，纪录片、宣传片及剧情片的拍摄，四大蚵报的编撰发行，土地正义永生树的创意，各项大型活动的美宣，农农文创运动用品的设计，文化行动的介入与干扰，开创了此波土地运动的农村美学意图。当然，在集体的行动之外，还有许多个别的努力。许多人将感受化为文字、影像，以小众传播之势，隐隐然地推进各界对农乡的认识。更有青年进乡或投入农业产销，或进到地方基层机构。回顾青年的行动，我们感到一股超越我们既成范畴的视野，也看到一股清新的动能，以及一股与议题论述的深重相比，显得较亲近的象征与行动美学。

经此一“化”，不是被改变而是相呼应。的确，有些什么不一样了，所认识的世界既真实又陌生。内在的动力逼着人们自证些什么。这股趋力恰巧连结上诸多既存的议题，人们有机会参与其中，成为身影互异的行动者。

因而，关于农乡工作，关于扩大青年的行动参与，据我观察，是创造一个空间，一个开放、让人们得以将自身的才能、手艺、识见具现、实现的空间。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阐述我们对农的本质（essence）的体悟以及农的形式（form）的看见与感受，分享对具体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阐述的过程中，或许也将讨论到那些加诸我们身上的条条框框，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此些框架的背景结构与权有制约，以及论及尽管不愿意承认，却也真实的——某些限制的必要性。当然，我们的工作仍然是有其次第推进的部分，不过，基于对单一价值的怀疑，基于对自身的不确定，基于对人们自身动能的肯定，基于对集体行动的期盼。我以为，在异地，在他方，月白风清的当下，虚玄的流动未必将人带

往远方，或许将更亲近天地。也就是说，当人们身处其中，所见、所听、所闻的景象、语言、气味，将反过来映照青年学子过往学习与理解的框架的局限，从而也有机会在活络的人际中，摸索出社群、归属等温暖的况味。亲近、经验之后，人们的思维之翼将有栖息之所，一点一滴地行走其间，看见横亘的难处，看见彼此，相互支援，找到前行的可能。

[本文由作者将其《盛夏的土地之约》（2010夏耘草根调查文集序言）及《经验他方月白风清》（发表于“上下游新闻市集” <http://blog.newsmarket.tw/>）两文改写而成。]

蔡培慧，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学术工作聚焦于农村发展研究、台湾农业政策；进行“小农交换的社会基础”研究计划，旨在探索小农耕作与绿色消费的连结及其意义。过去十多年来长期投入草根组织，1996-1999年参与社区营造，1999-2007年参与“九二一”震灾重建工作，2008年起与关注台湾农村发展的农民、青年、学者及社区工作者发起组织“台湾农村阵线”，共同透过立法游说、草根组织、小农复耕、青年进乡、农村文化行动，扩展城乡连结、社会认识，深化城乡永续发展的基础。

编者的话 同梁漱溟乡建中心一样，在台湾农村阵线这里，青年也以群体之姿，展示着相互陪伴、一起探寻的力量。这既是农阵推动青年串联的结果，也有青年们对结伴同行的内在渴望。

在农阵里的青年人究竟是怎样的模样？培慧提到的“农青”又是怎样一群人？下面，就让我们透过农青成员的描述，来认识这群因关心农村而连结在一起的青年朋友。

③农青简介：只是想回“家”

文/邱星崴

近年来，台湾农村似乎犯了太岁，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上门：前年的莫拉克风灾重创中南部，造成90亿农损；全球暖化下，虫害和病变也不断增加；而同样

增温的，还有土地行情，政商联手不停圈地。台湾的农村像是送入了巨大微波炉一般，被看不见的外力加热，直到住不下人为止。大埔征地事件正是这一连串掠夺行动的缩影——高高举起的怪手驶入稻田，铲毁金黄熟成的稻穗——仿若台湾农民的长期困境，以前被榨取作物和劳动力，现在则被强抢安身立命的土地。大埔事件燃起烽火，面临同样问题的各地农村自救会则蜂起来援，于2010年7月17号夜宿凯道，发出“还我土地”的正义怒吼。

相比于1988年的农运单单由老农对抗“国家”机器，“7·17”农运出现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这些年轻人头顶斗笠，系着布条，挂着“农用”字样的书包，在场内外穿梭。无论是舞台架设、传递茶水、安排队伍还是组织纠察，皆可见这群年轻人一起为争取农民尊严而努力。接下来，每役必与，反对国光石化、抗议中科三四期，那些呐喊的身影，就是我们——一群关心“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的青年学生，自称“农青”。

2008年水保局提出《农村再生条例》，大开土地炒作便门，使我们陷入某种集体焦虑。我们害怕田地不再种植作物，而是一栋栋的农舍别墅。我们想做些什么，可是却发现对脚下的土地异常陌生。因此，身为学生的我们，决定要从理解开始，从学生最擅长的读书开始。主流体系中，读书毋庸置疑是一种异化，是一种筛选的过程：越与土地疏离无关，越被褒奖赞扬。于是，我们决意倒转读书与土地的价值观，把焦点放在向土地学习。同年起，农青开始组织读书会，试图开展寻根的理解：阅读乡土文学作品，感受农村的真实故事；阅读农业发展史，辨认出台湾农民的剥削主题。慢慢地，我们窥见农民在工业化迷雾之后的众生相——农与地的苦难和哀愁，与道德、能力无关，更是与个人无关的。台湾的农村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工业毁弃回馈农业的承诺，更是全球化下的牺牲品。在农青的读书会中，我们以结构性的视角来观看抽象的数字和概念，以期对农村有宏观的掌握。然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却是承载生命历史的血肉之躯呀。过于抽离的认识，反而远离了关怀的初衷。所以，我们决定做些什么，将自己准备完善，以实地走入复杂与深度兼具的农村之中。

由台湾农村阵线所主办的“夏耘农村草根调查”正是针对青年实际走入农村

所设计的培力工作坊，一共分成社会文化、社区空间、产销体系三部分调查，由具备实务经验的专家学者来讲授。“夏耘”已经举办三年，人数和规模都越来越盛大。2009年在高雄美浓，2010年在彰化溪州，2011年重回美浓，每次都在农村举办，青年上完课后即可以就近在地实作；营期后，农青们还得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散落到台湾各地的农村，探索彼此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农青因此而结集，因为共同的热情，迸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为了凝聚更多进步力量，2010年秋季，农青自行举办了共识营，从各自既有的基础出发，就校园组织、信息平台、农村访调等面向深入讨论，并且积极交换对于农村未来的想象。在脑力激荡中，农村的形体越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也许我的力量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让自己更多地来关注这些问题，而不是只生活在自己舒适的小圈子里，即使这个世界不可能向着我们预想的那样发展，但至少我们努力了。

王亮 / 第四届志愿者·香港互动行动协会

农青下田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我想，这就是志愿服务的意义吧！

刘明敏 / 第四届志愿者·成都华德福学校

来越清晰，宛若流着蜂蜜与奶水的应许之地。一个人进乡，容易孤单害怕乃至自我质疑；一群人结伴则勇气倍增，敢于追逐梦想。当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一齐向农村奔跑时，“青年进乡”就不再只是口号，而是有望落实的生涯规划。

而另一方面，透过阅读书籍和与农民的交往，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农村固然惬意，却不只是浪漫无边的童话布景，更是奋勇求生的试练场所；农村，正是与大自然共舞美丽与残酷的舞台。农青既然要进乡，就得搭起从理想到现实的桥梁。因此，我们开始一些尝试。首先，我们在台大举办了弯腰生活节，邀请各地进步农友设摊，让学生有机会直接认识发生在土地上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推广绿色消费的理念，“地产地销、爱用国货”正是永续台湾农业的不二法门。

农青合影



我们企图让学生们知道：吃，不只是果腹；关乎健康，关乎生态，关乎正义，更关乎让一切的美好免于受伤。2009年开始，一年一度的弯腰生活节已经举办两届，并得到热切的回响；2011年9月起，弯腰市集常态性举办。但我们不以此为满足，毕竟活动是节庆性的，而农村是日常性的。久旱的农村，不只要及时雨，更要稳定的涓涓细流。事实上，农村工作绝对不是善行，而该是正常的、有收入的工作，但是目前农村普遍缺乏青年的就业机会。因此，自2011年1月开始，台湾农村阵线与青平台基金会合作，提供经费支持农青进乡，并集中在已经有在地工作者耕耘的农村，一方面协助在地议题并且吸收前辈经验，另一方面也在第一线练习日后进乡时要如何着陆。

于是，一步一步，从焦虑到好奇，从好奇到理解，从理解到行动，我们逐渐从校园踏向农村，从驻足观看弯向躬身实作。我们开始能够体会，农村的美丽与哀愁原是一体的两面，都源于决定农村节奏的农作。无论是香醇的人情还是怡人的风光，其实都来自农作物的交换和展演；而农作往往又是被榨取的对象，二十年不曾涨过的米价，是老农说不出的辛酸。当我们越来越深刻体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得不身体力行在各个层面战斗了。于是，我们成为农青，在滚烫热气的凯道，在阡陌纵横的田埂，在老三合院的稻埕，在清癯老农的身边，都有我们的身影。毋庸讳言，成为农青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寻觅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想回到故乡的泥土或理想的乐土，其实都在找一个家，一个值得回去、可以回去的家。而我们真切地知道，农村，就是我们的家。当然，回家的路很远很长，但就像农作一样，只要播种，就有喜悦收成的希望。

邱星威，台湾苗栗县南庄人，台湾大学社会系毕业，台湾清华大学人类所研究生，正在家乡从事地方派系的田野研究。2007年，回到南庄从事社区营造工作，累积地方文史数据和摸索产销结构。同时，也在校园内成立农村读书会，催生学生行动者。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头前溪社的社员，农青成员。

泰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的改变与力量

编者的话 梁漱溟乡建中心与台湾农村阵线，两个平台上的青年有不同的表现与样貌，其背后是因为推动者及其所处大环境对社会发展、农村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的培育青年的视野、文化与想象。如果说，梁漱溟乡建中心里的青年人，胸怀的是服务“三农”的理想，那么，台湾农村阵线里的青年人，怀抱的是进乡自我改造与再造农乡的心意。同样站在农村的土地上，在梁漱溟乡建中心的青年眼里，农村是亟待援助改造之地；在台湾农村阵线的青年眼里，农村有其丰厚的文明与生机。梁漱溟乡建中心对农村的关注基于问题出发，着重于改造；台湾农村阵线将农村视为主体的存在，看重的是与农村的连结。

在看过大陆和台湾的经验之后，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延伸更远一些的泰国。过去几年，我们与泰国推动青年人成长的平台多有互动，如与TVS^①的交流，泰国伙伴的经验，启发了大家对社会视野、个体改变与社会转化、内心的觉悟与力量等方面的思考。

位于泰国清迈的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是一个以传统文化、本土智慧来培育青少年，搭建青年人学习与行动网络的平台。与泰国经验多有互动的尹春涛在《走进本土文化的沃土》里写道：

“1996年，为庆祝清迈700周年纪念，政府组织了一个庆典活动。清迈是兰纳（Lannan）文化的中心，以前曾是个独立的王国，包括北部8省。700年前，来自山地的先民创建了该王国，150年前才成为泰国的一部分。借这个庆典活动，差猜万·通滴叻（Chatchawan Thongdeelard）与一些学者、资深民间教育家、商业

团体以及很多兰纳文化活动小组组织了一次对兰纳传统文化的反思，回忆兰纳的历史，它的生活方式，过去繁荣的传统和文化，以及对新一代的意义。这些活动和反思，创造了更大的社会空间，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关注兰纳文化的团体。之后这个关注兰纳文化的网络倡议成立‘兰纳文化智慧传承节’。从1997至2001年，清迈大学的学者和民间组织、政府、艺术家等共组织了五次兰纳传统文化节，社区的长者和智者都被邀请参与文化节，这个节日为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提供了一个全面理解本土知识和文化的空间。

“在2000年举行的第四届兰纳文化节之后，差猜万和一些朋友决定创建一所‘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希望把民间各种丰富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年轻人。经



差猜万·通滴叻与中国朋友分享他的经验与思考

①TVS是泰国志愿者服务社(Thailand Volunteer Service)的英文简称。TVS于1980年4月由19个泰国非政府组织联合推动成立，致力于服务和支援本地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以提供志愿服务和发展培训工作为主。TVS鼓励和推动青年人在不同社会发展领域的NGO全职实习工作1-2年，支持青年人成为了解社会问题并具有社会发展、公正理念的人。TVS不断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协助泰国非政府组织发挥其角色和发挥工作效果，共创公义与和平。

过几年的发展，学院在本土文化的传承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它支持本土的智识之士在不同的场所传习本土知识和文化，用论坛的形式向公众展示传统知识的智库，制作多媒体产品以传播传统知识和文化，开发乡土知识课程，建立覆盖泰国的另类教育网络，开展青年夏令营和志愿者项目，让年轻人到社区中去学习生活知识，了解社区的历史、生计，接触传统的智慧及文化艺术，让年轻人在一起相互交流对兰纳生活方式的意见和看法，并把兰纳的传统文化和当地智慧应用在当下的生活方式中。他们期待着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帮助泰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建立信心去继承过去的生活方式，并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调整，也期待着以文化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扩展，能够创建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社区生活模式。”

过去，一些伙伴曾有幸亲临位于泰国清迈的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访问学习，或是有机会聆听到差猜万的分享。差猜万，这位智慧的长者，用他亲身实践的案例和生动通俗的语言启发我们对另一种社会发展的想象，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开始的改变的力量。

① 青少年传承地方文化的习得和诞生之路

文/差猜万·通滴叻 (Chatchawan Thongdeelard)

第一部分 认识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

乡野知识并不是过时的产物，而是当地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忽视和轻视那些在漫长岁月中累积得来的乡土知识，缺乏对本地社区的自豪感，盲目追随新时代的社会潮流，其实是在降低自己的生活价值，并使得当今的青少年缺乏思想上的免疫力。鉴于此，知晓和重视本土知识文化价值的“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团体”才得以诞生和聚集。他们发掘和学习本土、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与当地的青少年群体一起在学习探索中建设求知体系，扩展成了“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建立了向当地青少年传承兰纳（清迈）地方文化的网络体系。该网络秉

承“了解家乡，跟上社会，自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理念，认为继承本土的文化智慧，是凝聚青少年、社区、寺院和学校共同传承各种地方习俗和传统文化的永恒之道，也是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创建和谐安定社区的永恒之道，让青少年们通过对家乡的学习、了解，感悟乡土文化的价值所在，培养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文化自豪感，将本地文化活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目前已经连接到“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的青少年团体有17个，均在清迈府和南奔府内。这些青少年传承团组建的时间从3至10年不等，有城区的，也有郊区的。

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有三个等级的发展目标，分别是：

1. 培育青少年的传承之心

青少年是文化遗产的核心所在。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培养对新社会潮流有免疫力、不随波逐流的新一代青少年。他们必须有知识，有文化，了解自己的根、自己的社区，对当地及本土文化有自豪感，热爱自己的家乡，自觉保护传统文化，并且可以将本土文化传承给下一代的青少年。此外，还要培养敢想、敢做、敢于适当表现的新一代青少年领袖——他们须有志愿服务社会之心，积极参与社区集体的文化活动，推动和创建自己社区的安定和谐，最终的目标是使青少年们可以做到自我依靠，“不恋旧物、不迷新物”，自觉自愿地选择“兰纳式”的生活方式。

2. 培养地方文化的青少年传承者

当那些喜爱本土文化的青少年回到本地社区，他们自然而然会产生组建小团体的想法，于是就会邀请自己的朋友、同学或者兄弟姐妹来创建自己社区的本土文化团体，向本社区的青少年传承本地文化，并在青少年领袖的带领下，将求知网络从本地社区青少年群体拓展到社区内的各种群体，并与邻近社区的团体连结起来。

3. 推动所学习和传承的地方文化服务于社区的自立和可持续性发展

社区内的青少年结成小团体之后，就会在团体内部举行一些文化活动，进而拓展到与社区内的人共同举办一些传统文化活动，使得青少年、社区、寺院、学



社区里的打陀螺活动，年轻人与陀螺艺人在一起。

校联合起来共同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智慧——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重建当地传统，发掘本土文化，创建丰富多彩的可供本社区青少年和长辈学习的本土文化知识库；使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地配合本地文化的重建工作，建立能把社区内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连结起来的社区学习中心及本土文化知识库，使得社区的团结和自立建立于当地传统文化智慧的基础之上。

地方文化传承的四个阶段

“地方文化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作为城市里的新一代，也想保住它，不让它消失，想让它一直传到子孙后代。”这是传承地方文化青少年网络的一位青少年所说的话，他参与了当地的本土文化艺术传承活动。

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会有传承本地文化之心，并结成团体，连成网络，向自己社区所在地的弟弟妹妹们传承本土的文化艺术呢？他们聚集成团体，跟社区内的居民一起共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成为深受社区和当地居民肯定的青少年团体，同时也成为重建当地地方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使得当地的乡土文化重新成为人

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也让社区内的儿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开始回过头来学习、感悟和传承自己本地的文化。

“看见、学习、喜欢、爱”，这四个阶段是培养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之心、热爱之心、自豪感并最终传承本土文化的必由之路。学习过程从儿时见到、接触到的本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开始，家人、亲近者、亲戚朋友在参加活动时的谆谆教诲往往为青少年埋下文化遗产的思想根基，激发出他们的兴趣和求知欲，从而自觉自愿地去学习了解本地的文化智慧。

青少年开始从社区内外的各种文化知识源那里寻找、了解和获取当地文化，比如兰纳地方文化遗产学堂，就是此类地方文化艺术知识源的中心，汇聚了众多深谙兰纳各地传统文化艺术知识的爸爸妈妈级教员，以吸引感兴趣的青少年儿童前来学习体验。前来学习的青少年，有的是为了学以致用，有的则是为了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基础。他们不仅从学堂得到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艺术知识，还有机会结识志趣相投的青少年团体和朋友，进而相互交流，并在学堂的牵头带动下，共同举办各种活动，最终发展壮大并连结成了“兰纳地方文化遗产青少年网络”。

1. 看见：潜移默化地接触生活

在洋溢着传统兰纳风情的社区中成长，是许多日后成长为地方文化遗产领袖的青少年得以耳濡目染、于不知不觉中了解和继承本地风俗文化的重要原因。一些青少年的家庭本身就是自己的第一所本地文化教育学校。例如，哇里沙·沾诗里和哇拉信·沾诗里就来自一个传统医药世家，二人从小就得以接触和学习传统医学，且家人又支持二人去学习了解自己所感兴趣的其他传统文化知识，开启了他们向家庭外的智者师者学习更多兰纳传统知识的大门。

青少年同时还有机会与各种传承当地文化的青少年团体一起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当他们看到那些向他人传承本地文化艺术的青少年团体在社会上所受到的肯定，就会加入其中、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进而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社区复制，向本社区的青少年传承。

2. 学习：了解祖宗理解生活

通过对青少年领袖的成长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有对当地传统文化

习俗的兴趣，加上又生活在还保留着兰纳式生活方式的社区内，而后才有机会向社区内的智者师者咨询、学习、调查和收集各种知识点，然后就会发现本土的文化智慧正越来越少，从而心生传承下去不让其消亡的想法。

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习得一般都始于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如文化艺术、表演、历史、习俗礼仪等。在得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后，青少年往往还会继续去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其他方面的文化点，直至成了掌握一定信息量的小专家。有些青少年还亲自到实地考察了解，如想了解社区的历史，就去社区内的重要地点景点去调查了解等。

与此同时，青少年们（特别是那些曾参加过相关地方文化活动的青少年）往往喜欢互相交流自己从他人那里学习到的新事物的感想和看法。如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在举办培训、考察、提升潜力营、文化交流等活动时，往往会注重创造让青少年们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青少年对地方文化的习得途径非常多样，有自己习得，有从社区内外的师者智者那里习得，有通过实地实践习得，有从兄弟姐妹、朋友身上习得，也有通过野营或某方面的专门培训等共同参加活动的方式习得。

青少年传承地方文化，可分为三大学习内容：

（1）学习了解祖宗、乡土智慧和本地文化习俗

就是学习了解地方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当地历史、文化习俗、自然资源、名胜古迹、乡土艺术表现形式如乡土音乐、当地鼓、舞刀舞剑、当地舞姿、舞鸟舞狮等，包括学习当地的传统手工技艺，如织布、刺绣、编灯笼、制作供奉品、剪纸、制陶、编织竹器等。

（2）学习与时俱进，跟上全球化步伐

是指让青少年与其他青少年团体共同参加活动，以学习营的形式，通过对当今媒体、广告等的分析解读，学习了解消费、消费主义以及因当今社会潮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让青少年认识当今社会和全球化，以培育他们的思想免疫力，不迷恋和追随全球化下的消费主义思潮。

（3）通过学习，挖掘潜能，提高技能

是指通过学习，发展和提高青少年在开展地方文化传承活动时所需要具备的各方面的技能。

3. 喜欢：找到自身兴趣所在，发现通向文化传承之门

当青少年得以跟社区里的师父师母学习了解当地文化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物。不少青少年并非师从一人，而是分别师从多位老师，学到了多种技巧和方法，然后加以刻苦练习，直至熟练掌握并烙上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大多数青少年在熟练掌握某种本土文化知识或技能后，一般都不会深藏不露，而是会发现掌握这种文化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从而产生将其传承给社区内外更多人不让其消亡的想法。因此一部分青少年学到知识之后，会转过来将其以“哥哥姐姐教弟弟妹妹”、“朋友教朋友”的独特方式传授给社区里的弟妹、朋友或其他青少年。

当然，当青少年们在向师父师母们学习某方面的文化知识技能的时候，师父



社区的青少年向来自中国的朋友表演他们的地方文化

师母们往往不会单单教授知识本身，而是会在传授中夹带哲思、礼仪、道理等他们认为对青少年的发展有益的东西，并且往往通过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使得青少年们在学习和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转变思维模式以及观感社会的视角和态度，进而学会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在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时，能比一般的青少年更好更从容地应对和化解。

4. 爱：身体力行，传承兰纳灵魂

从接触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和朋友团体环境下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到跟师父师母师兄师姐拜师学艺，再到跟青少年朋友团体一起参加地方文化学习和交流活动，假以时日，这些青少年在看待生活、社会、文化时，其思维、态度和视角就会与社会上的其他青少年有明显不同，他们理解本土文化、艺术、习俗、技艺的重要价值，且由于自己已熟练掌握相关的知识，要将其传承给更年轻一代的思想动机和行动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不少青少年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了社区里的同龄人，还组成团体，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文化活动，并渐渐在穿衣打扮、思想表达、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

第二部分 解码新一代青少年成长之路

哇里沙·沾诗里：从医药之家到当地鼓的传承

“地方文化就是我们的自我，它早已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没有必要寻找什么词语去限制和描绘它，地方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本身。”

哇里沙·沾诗里，小名“棒”，清迈皇家大学师范系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她出生于沙解岭县的一个乡医世家，却成为一个传授沙巴猜鼓表演艺术的教师。在过去的10年里，她和爱兰纳团的青少年们一起在清迈举办了很多兰纳乡土文化表演方面的活动，走上了传承兰纳乡土表演艺术的道路。

棒的家庭祖祖辈辈从事草药和佛家祭祀品制作，她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读初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她都被送到寺院里学习佛学。“那时候每个星期天妈妈送我去学习佛学，下课后寺院里有举办促进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其中

有打鼓、舞剑表演，那时候佛学班里的同学有的也参与了演出，后来我也参加了。”寺院可谓是让她学会舞剑、打沙巴猜鼓的第一所学校，并让她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在寺院举办的活动中上台表演。

棒说，她觉得学打鼓、舞剑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比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知识更有趣。她说：“喜欢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至于表演，则是在练习和训练之后。表演会让人乐在其中，但能去做、去玩、去学，这些本来就已经很有趣，而由此结交到了许多朋友，又使我有了自己的社会。”

“后来父母就带我去跟潘师傅学，每个星期学一次，或者两个星期学一次，这使我又想学更多，于是就想单独一个人跟师傅学，爸爸妈妈也愿意，放学后就带我去。”从那以后，棒就一直跟着潘师傅学舞剑、学打沙巴猜鼓直到熟练掌握。此外，她还学会了不少当地舞蹈和其他形式的表演艺术。她从潘师傅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表演艺术，还有思想和很多对人生有益的教诲，这些都让她印象深刻，并更加认识到了自己本地文化的价值。

谈到自己从潘师傅那里学到了什么时，棒说：“跟潘师傅学习有很多感受，他教这教那，跟他在一起学习很快乐，他会教你一些佛道，教你怎么生活，当你试图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日常生活里的时候，你总能想起潘师傅曾经说过这方面的什么道理‘佛曾说过什么什么’。而当我们接触社会，接触了更多成年人，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就宽广起来了。当碰到某种情况或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会改变，解决问题时的方式也会改变，因为我们接触了更多成年人，得到了更多成年人的思想。”

除了跟老师学习舞剑和打鼓之外，棒还参加了爱兰纳团所组织的很多活动。爱兰纳团从1999年起就开始持续不断地组织举办各种地方文化活动。通过跟青少年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棒有机会学到了其他方面的乡土文化和表演艺术，包括有机会参加地方文化传承学堂举办的文化活动，从学堂的众多师父师母那里学到了更多的当地乡土文化表演艺术，如鸟兽舞、土著舞、面具舞、剪纸，编织竹器等。“加入这个集体我感到很开心，我很享受这里的表演机会，但除此之外我还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同龄人，学习到了知识、方法等很多东西。这里的活动很多，

比如做一个什么项目，我们参加了之后就会知道整个的流程是怎么做的。比如帮助传承学堂搜集资料这个工作，虽然我没有多少时间帮忙，但还是学会了做这类事情的工作流程，以后自己做的时候就会了，这种知识读大学的时候肯定会用得到。”

如今，棒不仅熟练掌握了击鼓艺术，而且可以帮助潘师傅教学生了。她还成了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的老师，向前来学习打鼓的学生们传授沙巴猜鼓表演艺术，其他学校也不时邀请她前去授课。“击鼓艺术大概需要学习1年，现在我也还没有大范围地教过学生，开始时只是教给到寺院里学习的学生，那时候我也正在读高中，教别人也都是以‘姐姐教弟妹’的方式教的，这一两年才开始比较正式地到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以及网络内的其他学校去教。”

除了已经可以教授别人学习击鼓艺术之外，棒还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自己的想法了。她说：“小时候主要是外婆把我带大，那时我没有什么外向的表现，跟普通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每天醒来就看看电视，吃吃睡睡，后来去学佛学，学兰纳鼓，自己的生活就变了，原来的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看电视、吃吃喝喝、瞎玩的那些时间消失了，变成了用来练习打鼓的时间。”

棒认为，当自己参加地方文化传承团举办的各种活动时，就等于减掉了那些坐在家看电视的时间，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参加社区活动可以促使自己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代替那些无所事事的空闲时间的，是知识、社会、朋友走进了我的生活，”棒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成熟了。到了大学里，虽然大家读的都是本科，但你总能听到不少人说‘为什么你能想到这个，我却想不到呢’，我想这是因为，这些知识我们是从地方文化传承团这种地方学到的。”

棒说，有些知识她是从潘师傅那里学到的。“潘师傅喜欢反反复复地给我们讲啍哒的故事，用来教导我们应该懂得向别人学习取经，不要忘了自己，不要忘了恩师，不要迷恋自己，不要美化自己。潘师傅还喜欢说，‘你们可别忘了是谁教你们的哦！跟谁学来的就说是跟谁学来的，不要拿它来抬举自己！’于是当我们在把它运用到生活中的时候，也总会提醒自己说，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出类拔

萃，不要把自己变成盛满了水的杯子，应该尽量使自己成为空杯子，以便随时可以接纳新事物。”

从家庭的熏陶，到跟老师学习地方文化表演艺术，再到跟爱兰纳青少年团体和地方文化传承学堂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棒得以提高自己，成长为新一代的兰纳鼓表演艺术教师。她有思想，有能力，理解地方文化表演艺术，在飞速变化的社会大环境下，懂得把自己学习到的本土文化智慧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她说：

“无论社会生活如何转变，无论将诞生什么新的科学技术，我都将在这里传承我所知道的地方文化，虽然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可能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些本土的东西将流淌在我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

奇大弩森·塔军巴：回顾地方文化传承青少年团体诞生之路

“我个人非常喜欢地方文化，自己学会了之后，就想让小孩子和青少年们也一起来参加活动，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更年轻的一辈。”这是南奔府永农隆镇李燮守护团的创始人和领袖——奇大弩森·塔军巴（小名Art）给出的缘由。

Art还小的时候父母就经常带他去参加寺院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他对本土的文化习俗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而且特别喜欢当地的乡土音乐。于是他就跟社区里的音乐老师学习，然后又接着学习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学习兰纳古文字。

在学习的同时，Art也经常跟清迈的青少年一起，参加爱兰纳团举办的各种文化和环保方面的活动，参加多了，就想把从活动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区和日常生活当中，于是回到家里就想组建自己社区的青少年团体，把自己知道的知识传达给社区里的小孩子们。

Art先从教社区里的孩子们学习乡土音乐开始。起初他想组建社区乐队，但由于人数太少，凑不够一个乐队，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位置从鼓手换到了传教的位置上。没想到的是，有兴趣跟他学习的青少年越来越多，于是他就把学习内容转到了打沙巴猜鼓和跳当地舞蹈上来。后来Art又组织他们一起参加文化活动，他

们以“李燮守护团”的名义亮相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2004年4月17日传统泰历新年期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为树祈福”活动上，并从此开始被社区所熟知和接受。

在“李燮守护团”期间，Art有机会跟社区和团体里的青少年一起参加了不少社区文化活动，如让青少年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寻访永农隆镇的名胜古迹，向社区内的老者搜集关于李河的由来的各种民间故事和传说，这点燃Art在自己社区挖掘文化资料的热情。他开始留心搜集李燮社区的各种历史文化资料，打听关于某件古董的历史传说，发动青少年们从各个家庭搜寻老照片来举办社区历史展览，并邀请社区里的大人和其他团体也来参观他们的成果展。

李燮守护团的一位成员回忆说：“举办老照片展览是搜集社区历史的一种手段。因为大家都把家里的老照片拿出来展示和讲述，可以让大家了解到以前祖先们是怎么生活的，跟我们现在比较起来，社区里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怎么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

这次老照片展览使得社区里的居民开始对自己的本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人还主动补充讲述了一些关于本社区的其他方面的故事。后来经过由社区里的老者、精英和青少年领袖三方共同参与的会议，催生了梳理李燮村历史的项目，以及编辑出版《李燮村陈年往事传说》一书的事情。与此同时，随着对社区学习了解的深入，Art发现李燮村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智者能人和本土智慧，于是他就开始认真研究社区里的文化和智慧资源，将社区里的智者能人集中起来，通过举办活动让青少年们向社区里的智者能人求教诸如纺棉线、制作乡土小吃、磨石磨等。

Art的习得，来自于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学习。从他自己动手去学，到学会、理解和掌握，再到有计划地传承给感兴趣的青少年，他使用的是自然而然的学习方式，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实际内容灵活变通。大体的路径是：让小孩子和青少年去跟社区里的师者学习（Art本身就曾经作为老师，向学校的学生传承过当地的文化智慧），然后又让团体里的青少年跟其他团体的青少年一起参加文化活动，以达到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和交流互动的目的，并将地方文化传

承网络内部的各个团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在Art看来，目前李雙村内那些参加团体活动的青少年，他们的行为正朝着多个更好的方向发展。青少年们开始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社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对关系到自己家乡和社区的事物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小孩子们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社区的兴趣比前更高了。”Art说，“他们现在可以在各种活动中演奏一些乡土乐器，参加各种社区文化活动时也更加踊跃。他们开始被社区居民所熟知，成为社区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小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变得更好了。至于社区居民部分，他们非常理解和乐意向青少年们传承自己知道的地方文化和智慧。”参加社区活动的团体内青少年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个说：“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就是自己的感受变了，变得想做乡土艺术方面的工作，变得想保护它，很多东西都觉得我们应该把它保护住。”

此外，许多青少年还邀请自己的朋友、兄弟姐妹也加入团体的各种活动，如骑自行车考察社区、社区老照片展览、学习纺织棉线、跳乡土舞蹈、演奏本土乐器等。当社区里有文化风俗活动时，青少年们就会组成团体在活动中演奏乡土音乐以创造活动氛围，使得该团体被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所认识。社区领导、居民、寺院和学校都很认可这些青少年团体的活动，老人们更是非常乐意把自己知道的关于本社区的知识传授传承给青少年们，以共同重建社区的传统文化习俗。

（陈兵 翻译）

差猜万·通滴叻 (Chatchawan Thongdeelard)，毕业于泰国法政大学法学专业。1980-1981年，TVS第一届志愿服务社会项目志愿者。之后在不同组织参与推动了多个社区发展项目。现为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董事会主席，非主流（另类）教育协会秘书长。出版有《信仰之路》、《10年兰纳传承》、《智慧传承少年》、《有活力的教室》等书。

编者的话 兰纳地方文化传承学堂的经验，只是我们接触的泰国众多年轻人培养经验之一，事实上，在泰国，还有很多如差猜万这样的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丰富多样的尝试，却又因对社会发展的共同想象而朝向同一方向。

这几年，中国的青年伙伴因着不同的机缘与泰国的朋友时有互动，在憧憬与回望之间，拓展着对青年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想象，也滋润着自己的精神与心灵。对我们来说，泰国的经验，是参照，是启发，也是养分。

2010年秋天，社区伙伴组织国内十多位做青年人工作的青年伙伴，前往泰国交流学习年轻人培养工作经验，对推动青年人成长极度热衷且亲身实践着的彭燕辉，参加了这次的访问。并在2011年初夏，陪同泰国伙伴一起到四川、广西回访中国经验。

他怎么看待泰国的经验？与泰国伙伴的互动给了他怎样的启发？他又如何想象自己在中国所推动的青年人工作？

让我们透过彭燕辉的眼睛，看看与泰国经验的碰撞，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火花。

②青年培养与社会发展的想象力

文/彭燕辉

我们经常会想厘清青年人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有些什么“问题”，整个社会环境、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支持，期待青年人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也经常想去反思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去看清我们可以如何去推动它更好地发展，等等。许多青年人工作者也期待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青年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在参与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得到成长。然而这个互动的过程如何进行，青年人需要什么样的成长？而他们对社会发展作出的回应如何发生？我们都认同青年人不是工具，是成长的主体，那怎么能让大家在这个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有力量去冲破外在的束缚，成就完整、自在的自己？

2010年，跟社区伙伴的朋友们去泰国访问学习，2011年，与泰国做青年人发展相关工作的朋友一同走访四川和广西。与泰国的一点点接触让我意识到，或许我们工作者本身就需要跳出一些认识的框框，特别是青年是怎样的，他们的能力是怎样的，社会的规则是怎样的，权利分配是怎样的……此等框框，更有想象力地与青年人一起互动，建构各种变化中的可能性。

对社区营造的想象

考查貌保育组^①从爱护家乡的环境开始，让他们走进就在家门口的大自然，体验自然的美，学习和认识各种植物，掌握通过动植物来了解环境的技能，而在生活中学习如何从自然中获取以及如何向自然回馈。跟环境的友好相处已经是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不需去教要不要保护环境。考查貌保育组组织青少年们去采访本地老人的传统工艺，学习天然草药、染织、玩具的制作，从自然中获取建房子的材料等等，生活就这样活出来，也不需去刻意强调可持续生活、消费主义之类的。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想象，可以一起活出来。社区里的事务也不仅仅是大人的事，让年轻人跟大人一起去讨论社区里的公共事务，不用到外在的环境里去学习结社与参与，生活成长的社区就是与自己紧密联系的空间。这种参与让大人和小孩共同去学习，其本身也是在对原有权利关系的重新构建，生活习性如此形成。

① 考查貌保育组 (Khao Chamao Preservation Group) 位于泰国罗永府甲铃县，于1994年由一群年轻人成立。保育组现时有大约150个非正式会员，包括原来社区、附近社区以至县内其他社区的儿童。保育组正努力在县的层面组成一个青年网络，并培养青年人参与社区管理，并在“青年发展网络”的旗帜下跟全国的青年组织合作。保育组期望通过销售对环境友善和复兴民间智慧的产品，如利用天然染料的产品、有机农业产品等来赚取收入，从而达到财政自主。除此以外，小组以“关注全球、本土构想”为口号，鼓励社区成员通过合作达到可持续的社区发展和环境保育。

回想起我们让年轻人去反思生活方式，去回应社会问题，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会不断经历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割裂与冲突，带着理想与冲劲去创造理想的社会，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不知在哪里。有位年轻朋友跟我提起，毕业找工作时让他很痛苦，因为平常参与的公益活动让他对社会发展有更多的认识后，他想要去回应更多，而要找的工作似乎在无视这些社会问题，这让他内心满是冲突。也许让青年人在其所在的社区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去反思去探索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性，去活出理想的空间，是重要的想象。

对行动与改变的想象

给青年一个空间让其用行动去带来改变，TVS的青年志愿者计划除了要创造这个平台，还期望年轻人在做各种小事的同时，要明白愿景是什么，手上的这事是指向什么问题，要带来什么改变，在要实现的社会愿景中是什么位置。这个过程是青年人从对议题的认识、理解、行动、反思到再行动的过程，志愿者工作的NGO提供的是其实践的平台。所以TVS选择接待青年人的NGO，在自身的愿景使命上也需要有很清晰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有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指导和引领。

类似的青年人培养计划在国内也有较多的尝试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许难题在于，NGO的土壤还有待大家共同培育。每次想要推荐身边有理想的年轻人参与到NGO的基层工作中时，都无法把握接待的NGO是否能给青年人提供较好的支持和成长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志愿服务的主流化，各种浮躁的公益潮流影响年轻人的心，踏实行动的风格易被这风潮掩盖。如何让青年人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脚踏实地，并心怀理想，这是重要的想象。

对青年网络的想象

在泰国，最让人羡慕的是这些与青年一起工作的NGO们，除了对青年人的培

养有重要的共识，他们还正共同分享着一个社会愿景，甚至会让我想象这是否是信仰的关系。他们在做着不同的事情却追求着同一个对社会的美好想象。当然这与TVS二三十年来的长期推动很有关系。

在青年人部分除了同是志愿者的伙伴网络，在全国各地也有不同议题的青年网络在让青年人自主地产生连结、合力。湄公河流域青年网络更是让来自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青年人在一起学习和回应这些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工作者只需要搭个桥，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会创造出什么火花，就尽情想象吧……视野有多广，心就能有多宽。

国内的朋友也在构建着这种工作者和青年人的网络，属于刚起步阶段。我们在沟通青年人工作的理念和愿景时，各地社会环境的不同也让相互间的经验交流与互动相对缓慢。我们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敢于想象，当一个个的年轻人遍布各个角落推动着他们所在社区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无形的线连结着，那不是我们期待的美好愿景吗？

对内心力量的想象

那么，年轻人在这些过程中会有怎样的成长呢？工作能力的锻炼不用说，青年人在这个过程中与底层人群一起工作和生活，向他们学习，在行动的过程中也更加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适合什么。在这次泰国朋友到中国的回访中，我碰到了正参与TVS另类教育志愿者计划的Chate，他是工作过一年后才加入志愿者队伍的，他跟我说，他在穆斯林为主的山区里体验着当地的文化，经常在大山里跟自然在一起感受自己跟这一切环境的联系，让他更清楚内心的富足才是他想追求的。去泰国时遇到的另一位朋友Art，他说他明年就会回到清迈的家乡，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去申请一些支持，做儿童教育的工作。在TVS志愿者计划里的青年人，有的实习结束后留在实习机构工作，甚至变成陪伴其他年轻人的角色；有的离开这个领域去追寻自己的梦。无论在哪里，只要找到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并充满力量地去选择、行动，就是幸福的人儿。我们跟青年人一起成长不也

以此为幸福吗？

想起我在广州的青年工作，除了强调年轻人视野的开阔外，个人探索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让大家学习去觉察自己多些，反问自己多些，力量就来自于对自己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追求的清晰，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

成长如何发生？改变如何发生？是我一直想要从对泰国的片面理解中梳理清楚的问题。前几天我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系列沙龙，主题是“青年与时代”，我作为一个围观者，听到他们分享对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看法，对主流价值的看法，对青年在社会参与中的角色的看法等等。看到他们自己自主在描绘着这些“知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让我佩服。

现在回想，我们正在跟青年人产生的各种互动，就是构成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更重要的是享受跟他们在一起，发挥彼此的想象力，共同去创造各种可能性。

彭燕辉，生于1983年。从做乡村教育志愿者开始接触公益领域，并对教育与人的成长有了深厚的兴趣，参与不同的教育相关工作与青年行动团体，现就职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2009年开始主要负责青年人公民教育工作，让更多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与他们一同成长。

编者的话 接下来的分享者，与泰国的互动就更为深厚了。事实上，社区伙伴开始开展青年实习生的培养工作，其最初的启发就来自于TVS。作为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工作最初的推动人之一的尹春涛，早在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启动之前，就曾带领大家一起去泰国学习取经，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的雏形。

春涛在过去几年里曾先后几次到访泰国，并在不同的机缘里与诸如差猜万这样的泰国朋友有一些相遇和交流。希望她对泰国经验的思考，能激荡起我们对青年人工作的另一些想象。

③ 泰国青年成长与另类发展的经验

文/尹春涛

自2004年参与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项目开始接触泰国NGO网络，我曾先后三次去泰国学习考察：2005年参访TVS及其合作伙伴，了解他们培养青年志愿者的经验；2006年参加泰国青年创意行动小组（Creative Youth Group，简称CYG）与TVS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学习营；2011年赴泰国参加为期7周的生态家园教育设计培训。虽然三次内容不同，但均与青年成长和另类发展的议题相关。而今，国内NGO也越来越关注青年成长的议题，许多不同的尝试正在进行中。两相对比，我觉得泰国NGO在支持青年成长方面的经验有三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值得中国同行们关注和思考。

第一个特点是这些不同的青年成长计划都与地区性NGO网络及基层社区组织网络有紧密联系。NGO与基层社区组织为青年人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平台，而年轻人的持续参与使得这些组织所探索的社会/社区发展工作的理念和经验得以代代传承，进一步促进了地区性NGO与社区组织网络的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是TVS，它由19家NGO共同发起，致力于年轻人的培养。这些早期NGO的创办者大多学生时代即积极参与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之后逐步意识到社会运动的策略缺乏社区民众的主动参与，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走入社区，帮助改善不同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处境。这些NGO规模不大，他们主张保持一个灵活而富有活力的小团队，可以深入扎根到社区开展工作，同时又通过与其他NGO、社区组织建立合作网络的方式来拓展工作广度，以避免视野的狭隘。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很清楚：支持基层社区组织的发展，让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经过数十年不断的行动、总结和反思，推动文化为本的社区建设逐渐成为这些NGO的共识。他们在全国和地区层面形成了高效的协调机制，一起制定发展战略，各自承担不同角色，并专注于不同议题，如北部网络颇为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这种平面的网络结构使得每个志愿者都可以成

为一个小小的中心，也更能体现公民社会所强调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精神。透过与这些网络机构的合作，TVS得以为青年志愿者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环境，让他们在参与社区发展工作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认识社区，认识社会，找到自己真正想要过的生活。经过30年的发展，TVS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志愿者，其中三分之一仍留在NGO工作，或成为组织中的骨干，或创办新的NGO，他们在共同学习的经历中所建立的友情又进一步加强了NGO之间的合作和网络建设。

同样，致力于在乡村地区帮助青少年成长的CYG也特别强调让年轻人与本地社区以及不同的发展网络建立联系。他们鼓励年轻人根据他们的兴趣组成行动小组，深入社区开展研究，或是学习社区传统文化，或是调查社区环境问题。他们还经常组织年轻人去考察和了解不同NGO和社区组织在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农业、妇女、人权等领域开展的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CYG已成为活跃在当地许多中小学及社区的青年人另类学习网络。透过参与CYG组织的学习活动，年轻人学会分享友爱，关心他人，对自己生活的社区产生了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他们内在的潜力与创造力被充分激发，并产生了关注和参与社区/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与责任感。

6年前，我刚加入社区伙伴没多久，和参与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项目的合作伙伴一同赴泰国拜访TVS。所到之处，耳闻目睹许多年轻志愿者和接待他们的NGO的故事，他们扎根社区的坚定信念、对人类发展问题的自由探索和试验精神、彼此结下的深厚的同伴情谊，无不给予我们深深的触动。至今仍记得临别前夜，TVS的朋友以传统方式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在摇曳的烛光和吉他温馨的弹唱声中，TVS的朋友们依次将象征着信心和友爱的白绳系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臂上，祝福我们将爱和信心带回我们的社会。在他们的感染下，仿佛一种久违的精神的力量开始渗透身心，尽管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她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那个长久以来只敢埋藏在心底的梦想却开始生长：但愿我们也能共同创造这样一种自由、友爱的氛围，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我们真正想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充盈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然而又不是孤立的

个体，而是在内心中时时可以感受到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联系。这个梦想后来一直支撑着我与四川的伙伴们共同推进当地NGO联合培养青年人的实习生项目——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

注重发展内心的力量是泰国青年成长计划的第二个特点。他们认为社会发展是做人的工作，仅仅用脑是不够的，需要懂得用心。用心包括奉献、给予、对社会的责任感、爱及友好等，这些品质不是自发的，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才能养成。那么他们如何帮助年轻人发展内心的力量？简单归纳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创造一个轻松自由友爱的氛围，让年轻人彼此建立自然的情感联系，形成同伴间的相互支持与互助关系；二是鼓励年轻人进入社区做他们感兴趣的事，因兴趣而了解，因了解而热爱，由热爱而自然地生发出责任感；三是在培训中增加自我认知和觉察的内容，从觉察和理解自己的感觉与情绪入手，学会自我调节，发展同情和理解别人的能力；四是鼓励年轻人参与精神修行的实践，如学习佛陀的教义，在自然中练习禅修，透过不断增强对外在事物、内心感受及相互间关联的觉知力，发展内在的智慧，培养起对生命平等和慈悲的态度与行为。

这不是透过一次培训或一次社区行动就能实现的，甚至也不是一年或两年的志愿者计划便能达到的目标。它需要的是唤醒年轻人对于内在精神成长的愿望，并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愿意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实践。唯有透过将精神实践落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建立深度的连结，内心的力量才会慢慢增强。而作为陪伴和支持青年人成长的协作者，更需要有精神成长方面有自觉的追求与实践，方能将信心和力量传递给年轻人。

作为一个佛教传统深厚的国家，近代以来，泰国有许多学者、僧人与社会发展工作者从佛教教义出发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佛教教义与精神如何融入社会发展，如著名的高僧佛使尊者、学者苏拉克、生态家园教育的协作者普拉恰等。他们的推动，对泰国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们重新认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关注自身的精神成长和内在生命的转化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这一特质自然便也体现在他们所发展的各类青年人成长计划之中。

2006年，我去泰国参加国际青年学习营，在佛使尊者创办的“解放之园”，

遇到一位曾经是TVS志愿者的比丘，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说从事社会发展工作需要强大的内心，而佛教的禅修能帮助他增强内心的力量。他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蓦然间为我打通了世界与心灵的联系。在那停留的两天中，我开始接触到佛使尊者从佛教角度对当代种种社会及环境问题的思考，并学习静坐，而且第一次体验到当真正安静下来时，我们的心可以变得如此专注、清晰，充满内在的力量。

从那之后，遂坚信“觉悟的心能照亮世界”，回国后始有意识涉足佛教与禅修领域，很幸运地遇到两位让我至今仍深为受益的老师。一位是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大和尚，从师父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将此深心奉尘刹”的清净无染的慈悲精神。每每想到师父的形象，心中总是会涌出深深感动，在生命陷入低谷的时刻，重新找回温暖和光明。另一位则是现在与我一同在山西永济寨子村从事乡村社区教育的牛见春老师。他对佛学、乡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曾下过多年的工夫研究与实践，乡村文化重建与促进个体精神的觉悟是他毕生的心愿。从他身上我获得的是洞穿现实的智慧与勇往直前的勇气。这四年来在乡村开展工作的不顺，以及随着年龄增长日益增加的对现实生活的焦虑，曾让我内心极度疲惫，并一度怀疑自己从前的选择。在与牛老师的交往中，他极为耐心地与我探讨佛学、乡村问题和传统文化，帮助我澄清心中种种困惑和迷茫，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与他重新开始乡村文化建设的试验，创造有精神期待的生活成为激励我们的愿景。

再说最后一个特点。今年年初赴泰国参加为期49天的生态家园教育培训，我看到泰国这些另类的青年教育已经推展到第三个阶段，即在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重新构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主张和方法。虽然各个机构侧重点不同，但具有共识的思想则是通过转化人们自我中心的意识，共建生态社区，实践和倡导基于佛教教义、文化多样性和环境可持续，结合精神实践与社会参与行动的简朴生活。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理解超越了制度层面，而进入人类发展范式变革的范畴，即在全新的生命彼此关联的整体世界观的引领下，从个体意识觉醒和精神成长出发，以社区生活重建为核心，居民共同参与，

在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变革，促进人类整体生活朝向生态方向转化。

建于1985年的翁松·阿什拉姆生态村即是经特意规划而体现这一理念的社区。这里原是四面为运河环绕的一片荒地，经十多年经营，已成绿树葱茏生意盎然的绿岛。现有的20多位常住居民主要是社会活动家，生活在林间泰式的土木房屋中，吃自种的有机食物，用生态灰水系统处理废水及灌溉菜园，只使用必要的现代设施，靠提供培训及接待来访者维持运营。如今这里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环境可持续发展及草根组织领导力的培训中心。它致力于促进学生、教师、僧人、社区民众及NGO工作者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社会公正的项目中，增强亚洲人对本地传统文化的自信，培养慈悲精神，增长智慧，提倡把行动、禅修、艺术、知识及技能的学习融为一体。所有教育活动旨在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经济结构对社区生活的影响，构建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愿景，以及参与生态社区的共建。

这49天的培训，让我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身心洗礼和转化，从直面现实的痛苦与绝望中重新开启对未来可持续生活的想象。即便这样的生态家园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它而准备，这就已经足够了。

五年前离开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项目时，心中有许多困惑和不安。一方面与年轻人有关：当他们心中的理想被唤醒，他们的未来将去向何方？在被消费主义浪潮充斥的社会中，他们将如何面对来自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如何承受现实的压力？当理想在现实中一再碰壁，他们能坚持多久？当他们去到不同地方不同机构，即便仍在不同的NGO里做发展项目，他们是否会因为忙于各自的工作，而疏远了彼此的友情？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是如何让理想一点一点落实扎根在生活中？这些问题其实也与我自身相关。另一方面的问题则与乡村有关：乡村的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些来自城里的青年志愿者？乡村难道只是我们去帮助的对象吗？乡村生活本身对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下，乡村的人们又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五年，走过了一些不同的乡村，又看了更多泰国的经验，困惑和不安有所

缓解，但问题依然存在。前面总结的泰国经验的三个特点，我认为正是我们今日的瓶颈所在。

首先，真正能扎根乡村支持社区组织发展的NGO仍是极少数。乡村社区组织的发展一直是薄弱环节，更遑论建立地区性NGO与社区组织的网络联系。有一些机构，将志愿者和年轻员工长期派驻乡村，无论从支持青年人的成长还是乡村发展的角度，若缺乏有经验的实践者的陪伴，这种做法的效果都值得商榷。

其次，许多NGO的老员工正在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多有心力不济之感。这也会是每个年轻人在走过一段时间后将面临的问题。如何发展内心的力量？既需要每个个体独自去探索，更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对于发展的理解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听上去似乎是较为遥远的事，但若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则非有对此的讨论与共识才可能。第一阶段，我们更多受西方理念的影响；第二阶段，逐步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那么未来呢？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如果我们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源缺乏深入理解，对当下的发展模式 and 生活方式缺乏真正的反思，我们无法提出更长远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和脚踏实地地践行，就只能永远处于疲于应付各种现实问题的状态中。理想与现实割裂，生活与工作冲突，身与心分裂，这样的未来对年轻人有多持久的吸引力？

但愿社区伙伴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对于这些问题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尹春涛，曾先后在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社区伙伴及北京富平学校从事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青年志愿者培养及乡村发展等工作。现与朋友共同创办芬芳田野文化书院，致力于建构社区新文化新生活，通过在城乡社区开展生态家园—可持续生活教育，推动妇女及社区合作组织共同创造有精神期待的美好生活。目前正在为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开发系统的文化培训与生态家园建设相结合的课程。邮件：fenfang2010@sina.cn，博客：<http://blog.sina.com.cn/fenfangshuyuan>

编者的话 以上几个不同地方的青年人培养案例，只是当今青年培育浪潮里的几朵小小的浪花。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案例里重要的特点和经验，但这并不代表案例本身的完美性。事实上，在这些案例背后，都有着各自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寻找到愿意同路的青年？如何在对青年的期待与青年的主体成长间取得平衡？如何积累力量，耕耘出可以孕育青年成长的沃土？个体的改变怎样转化为群体的力量并能延续和深化下去？青年的成长又如何与推动社会的发展相连？……怀带社会理想的实践，是漫漫长路，有待上下求索。

不论是哪种方式的青年人培养，回到核心，都免不了要面对几个想象：对社会发展的想象、对青年的想象、对人的改变的想象。而在想象的构建中，也需要学习，有想象，但不封闭自己、不强制他人。理解人成长的无限可能性，也是一种想象。

愿这本文集里所呈现的青年伙伴们故事，能启发大家更丰富的想象，也让我们带着愈加丰富的想象，继续上路。

掩卷有感

将理想根植在土壤里

文 / 麦 芒

抚摸着这些滚烫的文字，我内心感慨不已。一方面，我被这种和主流教育截然不同的理想主义的教育理念所鼓舞，“让教育回归人，让人回归社会。让社会找到理想，让理想回归现实。让现实回归正义，让正义回归行动。让行动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青春。”我相信这些真诚的文字来自于那同样真诚的心，让我心生共鸣。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做青年人教育的教训又总是让我有一种迟疑：这种教育培育出来的青年人，他们究竟该走向何方？正如在这一组文章的最后，尹春涛提出的她的困惑，这些困惑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那些培育青年人的NGO似乎无力承担教育的使命——这些组织力量微小，缺乏经验，员工又常常备受压力，心力不济，如何能够带得动这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则因为这套教育似乎并没有给出对当下发展模式真正长远的根本解决的方法。因此，一旦这些年轻人离开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系统，他们似乎将无力面对依旧在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狂奔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割裂，生活与工作冲突，身与心分裂，这样的未来对年轻人有多持久的吸引力？”春涛在文章的最后发出这样的追问。我自己虽然是一个长期做青年人培力的公益讲师，也常常把自己放在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的道路上，但是同样的问题其实一直陪伴着我，它让我困惑的同时，也让我清醒。我看到过我的学员从我们的理想教育模式中冲出现有体制的束缚，听从内心的召唤，走上自己独立的和社区相结合的道路；我也看到同样的学员在选择了草根NGO后，与劳工村民一起苦苦挣扎，最后又迷茫地走向主流中去。这些是同样真

实的教育的结果，无论这种教育过程本身让他们内心如何激荡，又无论他们如何自恃年轻，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实的残酷性总是如影随形。“青年人是用来成长的”，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关键是谁在“用”，是青年人自身，还是带着固定的理想主义教育理念和社会改造倾向投身于青年人成长领域的教育者？而我们教育者又凭借什么可以“用”这些青年人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式成长 and 参与社会？这些问题虽然刺耳，但却必须面对。

21世纪见证了中国的青年人的崛起。当一个时代的思想出现断裂，而原有的观念权威又逐渐坍塌以后，青年人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载体。他们希望不同于前人，又力图要开辟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在这一章里，无论是白亚丽，还是彭燕辉，似乎都代表新一代“我不相信”同时又“相信未来”的年轻人。当然，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青年人虽然套着“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由年龄界定的统一标签，实际上却分化明显：他们中有的立志与主流社会决绝，投身变革；有的从主流社会内部开始学习做一个好公民；有的另辟蹊径，退隐山林和乡土，进行一个人的探索；也有很多青年人，如闻丘露薇所说，“务实，投机，清醒的犬儒主义与良民心理”。其实在这个转型年代，这些思潮相互交织，同时彰显在每一个活生生的青年身上，使得他们常常纠结、迷惘又躁动不已，并感觉孤独——他们彼此之间都很难互相认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这个时代的大部分青年对现行的主流教育体系都有普遍不满，他们越来越觉得学校无法教给他们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是如这一章里所叙述的各种另类教育兴起的原因。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用理想主义教育来概括这类青年人的另类教育比较合适。它们将教育视为理想，或者是通往理想的路径，理想主义教育谋求社会的改变，将教育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将价值理念彻底化的过程，乃至希望人可以“道成肉身”，并在生活中加以实践。它所激励的是一个青年人对理想追求的激情。这类教育与主流的现实主义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立。在主流的现实主义教育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市场或者政坛上的成功者，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传授工具理性的过程，它所唤起的不是激情，而是受教育者的精英成就感。毫无疑问，这类教育对于目前贫富分化、城乡

对立、环境公正与社会公正双双缺失的现实问题不但无法解决，反而还会进一步加剧问题本身。这一章里所讲述的青年人种种对现实教育的不满，正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理想主义教育在今天社会中的可贵，也正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现实主义教育的种种弊端。

但是，我这里着重想谈谈的是：理想主义教育本身可能要比现实主义教育更为复杂。因为这类教育常常溯源于纯粹的甚至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愿景，但又必须面临最繁复的现实社会的挑战以及主流教育体系的反扑，如果运作不当，实际的教育过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可能越理想，越脆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体会，以及这部分的几篇文章，我认为，理想主义教育大抵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 (1) 对现实世界中的现代性、发展主义的弊端和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评；
- (2) 然后在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纯粹状态下，让青年人讨论、分享和对话；
- (3) 学员在经历了价值淬炼之后，会投身到边缘或者底层的社区中去，尝试各种改造的工作，边干边学，以证明世界改变的可能性。

这种教育模式从逻辑上来说是可行的。无论是社区伙伴在四川的实习生实验，还是台湾农村阵线的青年进乡运动，都看得出这种方式的大体套路，只是阶段重点有所不同。但是，虽然每一篇都写得充满激情和信心，在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这类教育的很多辛酸和不易。从自身的经验和教训中，我发现理想主义教育最容易造成的困境就是：培育出来的青年人一旦缺乏长期的支持体系或在现实中面临太多压力，就往往脆弱不堪，被现实洪流吞没，甚至沉沦，或者形成固化思维，自我封闭，与周遭社会格格不入、抵触或疏离。这样的青年人不用说改造世界，连改变自己都很困难。

究其原因，我想，这并非是理想主义教育的道路不通，而是我们在开展这样的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教育时，更要意识到它短期内可能带来的局限和危机。这方面，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人们对于现实主义主流教育的批评总是显得容易一些，而对于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的批评则常常颇多忌讳或心存犹豫——要么因其价值和意义的可贵而将其神圣化，要么因此道路和处境的艰辛而难以启齿。但我觉得，恰恰是不断地自我解剖和自我反思，才能给这一群

教育领域的先行探索者以真正的力量。由于这一部分的文章中对这一视角着墨甚少，我在此不妨大胆多说几句，提提在我的探索过程和反思中，所认为的理想主义教育可能面临的局限和阻力：

一是理想主义教育对发展主义的批评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框架之中。理想主义教育者因为改变社会的愿望迫切，并怀带坚定而纯粹的理念和激情，更容易看到社会的弊端和问题，这是好事，但却也因此容易“心急”，而缺乏对社会复杂性的足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及多元理性而平和中正的辨析辩论，因此不容易看到或者承认社会现实中的复杂性、模糊性甚至部分的合理性，也不容易看到或直接忽视现实中仍然存在的某些积极力量（他们甚至常常忘了：自身日常或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植根并习惯于主流社会及其各种制度中的）。理想主义教育者的这种理念和意识形态纯粹性上的坚持，可能会让部分年轻人深陷对现实世界的绝望甚至恐慌之中。如果再缺乏开放性的讨论以及长期沉潜的践行，理想就可能成为教育者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当价值观和反思被意识形态化，就可能走上极端，培养出许多愤怒青年，而缺乏理性和包容力的愤怒不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无力感和挫折感。

二是类似于乌托邦的纯粹状态固然是宝贵的教育体验，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乌托邦”却对人的情感、品质和思维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这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是很难达到的。于是，本来理想主义教育所强调的扎根底层和本土的“劳动者”状态，在这种乌托邦的期待下，反而有可能与日常生活以及人群脱节，演变为一种“革命小将”般的另类精英心态。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参与其中的略为“普通”或依然带有不少主流视角的青年人，如果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就要么可能自我迷失或产生被边缘化的情绪，甚至被迫离开、回到主流社会；要么不得不在理想主义的集体中“伪装”成积极分子和拥戴者，但内心却可能充满压力和挣扎。蜗居时代的乌托邦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沉迷在里面，那么既容易自我封闭，也容易党同伐异。

三是当理想主义教育下的青年人要真正走入社区时，将会发现，今日中国的众多基层社区和弱势群体，都正被主流观念和欲求所充斥和影响，并对现代性满

怀急切期待。如果理想主义教育没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让年轻人理解这样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趋势，甚至教育者自身对社区都不具有足够长期的学习了解乃至工作实践经验的话，那么在这类教育浸淫下的青年人在被“空投”入社区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自身的理想主义诉求和正要融入的多种世俗价值庞杂并存的真实世界中的社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内在张力，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彼此的排斥和隔离。我接触过的一些年轻实习生在进入乡村社区时，就常常面临这样始料不及的状况，别说社区工作，甚至连沟通起来都手足无措。这一类挑战和处境，所影响的还不止是年轻人和乡民之间，有时甚至造成年轻实习生和他所在的NGO或志愿团队之间很深的误会、矛盾，乃至长期沟壑，这进而可能让这类青年人对NGO或民间团体产生比对社区村庄更加严重的失望和愤懑。在这一章中，梁漱溟乡建中心进入东部某村庄和当地乡干部的那种“短兵相接”，就让我读起来分外紧张，虽然在最终化解后，我松了一口气，但我知道：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微妙关系和角力，稍有处置不当，就可能损伤这些年轻人难得的激情和理想情怀。

以上的分享，绝非要质疑这一章记录下的这些组织、青年人工作和参与其中的伙伴们的努力投入以及有目共睹的成绩，恰恰相反：这些努力如此可贵，值得我们珍惜、敬佩，特别是像刘老石这样鞠躬尽瘁、甘做铺路石的教育者，恰恰是今日中国最为需要的。但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肯定和珍惜中，我们更需要看到，理想主义教育模式值得我们做更多的反思、更开放和多角度的探讨。而这一章，在我看来，在它对跨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几类青年人教育项目的丰富而引人深思的经验分享之外，稍显不足的，就是过于偏向正面称颂和期许，批判视角不够。我们必须看到，现实主义的主流教育模式虽备受批判，却仍然保持强势甚至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除了背后的历史或现有社会权力架构的支撑因素之外，也是因为它具有从批评和问题中吸取元素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能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理想主义教育模式更需要如此：不断在阻力和困境中保持反思学习及自我批判的力量，以不断创新进步，才能对主流教育模式真正有所冲击和超越。

那么理想主义教育究竟如何向前推进？我个人更推崇一种“根植”的路线，就是理想需要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中。这当然会让理想不那么纯粹，不那么浪漫，

也不那么赏心悦目，但是只有在现实中真正粗粝、黝黑甚至充满杂质、混浊不净的土壤中，理想才能吸收进足够的营养，才能在现实的复杂性和不完美中慢慢开花结果。这种根植不是仅仅指根植于底层、乡土或NGO，我认为根植应该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种是让理想根植在真实之中。人们在获得善之前，需要首先求“真”。在我看来，在价值观的探讨中，人们需要首先了解复杂混沌的真相，而不是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图景。需要学习如何通过不乏科学理性的、充满经验的直觉和实践，去学习和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社区中究竟真实发生的是什么，它们面对的现实困难和处境是什么，而不是仅仅依靠话语层面的、对理想和意识形态的倡导与争辩。在求得真相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对多元化的包容，需要营造一种产生多方批评和对话的气氛，来探索真理；在对真理的认识中，人们又要建构起自己真实的行动策略。在这个建构真实的过程中，需要让理想能够融进自己现实的策略中。没有这样的策略考虑，理想就容易脱离我们对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而变成潜在的意识形态。

第二种是让理想根植在地方之中。根植在地方，首先是让理想和本土的文化传统脉络可以连接起来，这一章所记述的泰国的兰纳地方传承学堂，就展示出这种发掘本土文化资源之后的理想教育的魅力。但是根植在地方还不仅仅指这一点。事实上即使在清迈，在我曾经的走访和体验中，也发现现代性已经无处不在。而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接壤中，存在着无数模糊的界限，彼此早已互为作用、吸纳和融合，教育不能让自己只着眼于“传统”，也需要和现代性的那部分进行对话，因为那同样是地方生活的一部分，是当地人早已融入甚至不无向往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些，都要求理想主义的教育者的直面、接纳和学习，特别是要求教育者在教育年轻人之前，就应亲自投身真实社区，去直接体验和感受现实和传统的接壤及其对自身的影响。我相信在诸如泰国这样的地区，在这方面应该有不少经验个案，很多理想主义教育者自身就有多年根植于社区的经验体悟，也正是他们经由诸多艰难和挣扎而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为青年人对本土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投入，提供足够的经验以及榜样力量。希望在今后这一类文集中，能够呈

现更多这方面的先行者的足迹和经验。

另外，也要看到，全球化并不是脱离地方，而是渗透在地方之中，被地方文化所吸收，呈现出所谓全球地方化的过程。这些都需要理想主义教育有敏锐的意识，敢于直面这种纷繁芜杂的地方文化，并让自己也成为这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种方式，我们还应该让理想根植在生活之中——一种开放、多元的现实生活中。这一章所有文章都在强调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生活是日常的，也是符号的；生活是乡村的，也是城市的；生活是细节，同时也是一种远景规划的展开。它并非诸多两极中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要一味去拥抱乡村，抛弃城市；拥抱传统，质疑现代；拥抱日常和文化的，而轻视政治的、经济的发展和变革……理想主义教育不应模仿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去建立二元对立的世界（如果这样的话，这种理想主义教育和它试图质疑的现代主流教育模式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应该去掉意识形态的坚硬框架，倡导一种柔软然而有力的对话与容纳，让我们的青年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建构自己的理想和对世界的展望。

总之，还是切·格瓦拉的那句话：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而脚踏实地恰恰是理想主义面临的巨大挑战。理想主义需要将自己埋在泥土中，这当然就要面临被土壤彻底埋掉的风险，但也无疑是对理想主义教育者更高的磨砺和要求：如何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如何能够身在红尘，心在山林。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教育者必须每日警醒，战战兢兢。因为青年人是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他们关系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能否真正成为可能。

与大家共勉。

麦芒，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曾参与创办多个社会组织，目前任职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著作包括：《国与家之间：关于上海邻里的民族志研究》、《社区、空间与行动》、《责任·行动·合作：“5·12”抗震救灾中的NGO合作研究》、《行动的力量：对民间志愿组织的实践逻辑的个案研究》等。

致 谢

从策划、组稿到此书出版，历时三年有余。本书最终成形，有赖于无数人的努力与付出，三年多的对话过程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结晶的过程。

感谢本书的主要编者、社区伙伴的老朋友周行，感谢她在繁重的学业之余，为这本文集所倾注的心血与情感。因为她的严谨、认真以及不懈的推动，这些鲜活跳跃的生命故事才得以在大家面前徐徐展开。

感谢每一位参与在文集内容书写里的朋友，谢谢大家坦诚的分享与反馈，你们毫不保留的信任、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前行路上不变的信心与温暖。

感谢所有将自己的文章慷慨地授予我们转载的朋友，你们的文字让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

感谢郭净、张正扬、洪馨兰、曲栋、麦芒几位老师在每个章节之后的总结与回顾，你们真诚的鼓励、敏锐的观察以及引人深思的思考，温暖着这群青年朋友成长的路。

感谢此书的特约编辑郜璐莉、张乃亮两位朋友，文集的原始素材甚为庞杂，正是有了你们的敏锐、果断与字斟句酌的耐心，才让全书的框架与血脉渐渐建构、通畅。

最后，衷心感谢以下为本书提供图片的朋友：

王永波、王小英、童智伟、洪馨兰、张正扬、徐楠、白亚丽、刘胡佳、李明苹、杨丽芬、丁华明、朱明、何志雄、郭慧、郝冰、刘晓玮、王吉勇、唐婧、韦罗东、陆晓娅、薛启婵、陈杰、吕程平、曾光明、叶振宇、宋小海、Netting

如有遗漏，请予包涵！

社区伙伴
2012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梦想扎根：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 社区伙伴编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2
ISBN 978-7-220-08540-6

I. ①让… II. ①社… III. ①青年修养-中国-文集 IV. ①D432.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7808号

RANG MENGXIANG ZHAGEN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社区伙伴 编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防盗版
举报电话
制 作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章 涛
蔡奇真
戴雨虹
徐 英
李 剑 孔凌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65mm × 230mm 1/16
23
35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8540-6
28.0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社區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BN 978-7-220-08540-6



9 787220 085406 >

定价：28.00元